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乔治桑



第一节 天使使者

风流成性的贵族青年与一个貌若天仙的妓女一见钟情。

恪贞操的寡妇接受了儿子放纵的行为，却不接纳一个妓女成为自己的儿媳。

小姑娘的出生改善了奶奶与父母的关系，真是天使。

乔治·桑的祖辈们在男女关系上的表现，极能显示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多情与放浪。

翻阅这个家族的发展历史，很容易让人感觉仿佛在读一本通俗的言情小说。

男人们到处留情，私养情妇；女人们红杏出墙，在情夫中间如鱼得水。

在这种混乱的男女关系状况下，私生子一个又一个地降临世上，有时他们不得不为自己获得与真实身分相适应的权利付出努力。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进入上流社会并拥有财富。

到了乔治·桑的祖母玛丽这一辈时，情况大有改观。虽然玛丽也是个私生子，但她骨子里是个谨守贞操的女人。

她结过两次婚。第一任丈夫霍思是个步兵上尉。在他们新婚不久，霍恩被国王派到一个小要塞担任司令官。但到那里没几天，霍恩就因病去世了。玛丽头一次成了寡妇。

她与第二任丈夫杜邦结婚是她孀居十几年之后了，而且他当时已经六十二岁。婚后他们的生活非常愉快，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莫里斯。

在莫里斯十岁的时候，杜邦先生辞世。玛丽再次成了寡妇。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回她有儿子与她作伴。

莫里斯生性风流。在他当兵离家之前，便与年轻女仆发生性关系，使她怀了孕。在国外驻扎期间，他与当地的许多女人有染。

被认为是因为性欲冷淡而不愿搭搁男人的玛丽虽然不太理会儿子的这些不负责任的放纵行为，但后来当莫里斯诚心诚意地要与一位名叫索菲的女人结婚时，她坐不住了。

索菲是个妓女。她虽然美若天仙，但出身低微。在当时的动荡岁月里，娼妓是一种恣意蔓生的职业。她曾与一个情人生了个孩子——卡洛琳娜，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容貌和随军漂泊的生活，同样也没有影响她和莫里斯的爱情。

他们是在意大利的米兰相遇的，时间是 1800 年。已经晋升为副官的莫里斯到将军那儿去，而做为将军情妇的索菲正好也在将军的房间里。两人一见钟情。

索菲离开将军，投入了莫里斯的怀抱。当时她已经三十岁，但是她在男女交往中获得的经验足以令莫里斯神魂颠倒。

如果说莫里斯以前与女人的交往属于那种和风细雨、优雅缠绵的方式，这次他尝到的是从未有的积极大胆、风骚浪漫的女人的激情。换句话讲，他已经离不开这个女人。

犹如是一局棋的旁观者，玛丽在棋局开始时心境平常。她已经目睹过儿子太多的与各种女人的纵情接触，以为这次也不过是数量上的变化，不会

有什么质的不同。

但是，棋到中盘，玛丽感到不对劲了，自己儿子一方已经失去了理智，脱离现实的感情因素蒙昧了他的灵魂，那个她从未见过的出身卑贱的厚颜无耻的女人占了上风。

两个人的感情在不断地发展，日益加深。

玛丽惶惶不安，觉得自己必须出面干涉，扭转这不利的局面。

其实，在玛丽决定并实施干涉之前，那两个处于恋爱中的男女并未考虑过结婚的事，不管是出于哪方面的原因或何种考虑，反正他们没将这事提出来。倒是由于玛丽的介入，使他们有了这方面的心理和行动准备。

结果变成了母亲与儿子之间相互说服的一场论战。在经过一次不愉快的冲突之后，莫里斯重新与母亲和好如初，不再赌气，但他没有离开，或者说抛弃索菲。事实上，玛丽虽然口头上说她不接受索菲不是因为自己的贵族偏见，但却没有其它理由让她那样做。

莫里斯则根本不考虑那个讨厌的门当户对的社会风俗。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爱情使一切变得纯洁。爱情使卑下的人变得高尚，更何况他们并没有别的过错，不过是不幸被孤助地抛到世上，既无财产，又无人引导罢了。一个本来已经这样的女人，为什么人们还认为她错了呢？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说服对方。

1803年年底，索菲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

到了第二年的六月，索菲的预产期快要到了时，为了保证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的合法地位，莫里斯孤注一掷地决定与索菲结婚。

对索菲来讲，这是一个不期而至的幸福时刻，虽然她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就希望出现这种结合的局面，但她又从不相信那真的能够实现。直到最后一刻，她甚至建议莫里斯放弃与她结婚的打算，因为她看到自己的情人不敢把结婚的消息事先告诉他的母亲，不仅如此，他还为自己如此的作法充满内疚，心虚得很。然而，他们最终在巴黎秘密结婚，成为合法夫妻。

约一个月后，婴儿呱呱落地。是个女孩。因为索菲有过生孩子的经历，所以她的降生非常顺利。当孩子的姨妈吕茜告诉莫里斯他有了个女儿时，“就叫她奥洛尔吧，”他说。

这个孩子就是以后的乔治·桑。

玛丽得知儿子背着自己结婚的消息后，悄声前往巴黎，想让莫里斯赶快解除婚约。

她满怀希望他能够接受自己的意见，她有她的杀手锏，儿子还没有过在她哭泣的时候仍旧固执己见的时刻。到达巴黎后，她先去找人请教莫里斯的婚姻是否有效，结论是它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接着她又向两名非常有名的律师咨询可不可以就此事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婚约。这当然可以。

事实上，或许玛丽根本就没正经八百地想过要跟自己的儿子打官司，或者说即使她做好了这样的打算，她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毕竟她是一个心地极为善良柔弱的女人，这一点可以从她后来的举动上看出来。所以，尽管她既没通知儿子自己启程来巴黎的时间，到巴黎后也没与他见面，她的这种作法不过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表明了她对儿子的举动的愤怒，以及要拆散他们的决心，仅此而已。

另一方面，莫里斯获悉母亲已经来到巴黎后，马上就明白她已经了解

了一切。他毫不犹豫地希望寄托在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的身上。

他抱上孩子，叫了一辆马车，赶到母亲住的地方。他说服了看门的女人，请她把孩子抱给他母亲看一看。

看门女人来到玛丽住的房间，见到了玛丽。两个女人谈了一会儿，话题转到这个孩子身上。

“太太您瞧，这个小姑娘长得多秀气呀。她是我的小孙女。她的乳娘今天把她抱来的，我真是乐坏了，简直一刻也离不开她。”

“是啊，小姑娘长得又壮实又漂亮，”玛丽一边说，一边找糖果盒。

这时，看门女人把孩子放到玛丽的膝盖上。玛丽随即把一块点心送进她的嘴里。继而她吃惊地盯着那孩子的脸，情绪激动起来，突然大叫一声，把孩子推开，对看门女人说：“你骗了我，这孩子不是你家的，不是……噢，我明白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玛丽的言行把小孩子吓了一跳，轻声抽泣起来。

看门女人觉得她的使命结束了。她一边安慰着那孩子，“好啦，可怜的小宝贝，”一边重新把她抱起来，嘴里嘟囔个不停，“人家既然不要你，那我们就走吧。”

此时此刻，玛丽终于软下心来，她被打败了。“把她还给我”，她说。“可怜的孩子，这一切都不是她的错！是谁把她抱来的？”

“您的儿子本人，夫人。他在下面等着呢，”看门女人赶紧回答。

“你去吧。去把我的儿子叫上来，把这个孩子给我留下。”

莫里斯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来。进入房间，一把抱住他的母亲，热泪横流。他的母亲也禁不住哭了。

眼泪是一种稀释剂，能够化解紧张的对立。

当莫里斯重新抱着孩子回到索菲身边时，那孩子的手里多了一枚漂亮的红宝石戒指。

那是玛丽从自己的手指上摘下来，送给她未见过面的儿媳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在接见了索菲之后，玛丽主持了儿子按照宗教礼仪安排的婚礼。

他们终于成为了一家人。

回过头再看一看索菲其人。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低微的出身、动荡的社会环境，加之天生的美貌，使她沦为妓女，成为一个又一个男人的情妇。

把一个女人的美貌做为其沉沦的原因之一，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而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理解漂亮的女人较容貌普通的女人更易招致男人的勾引，成为始乱终弃的目标。

索菲不幸就是这样一例。富有男人拙劣的感情表演迷惑了她，然后把她引入火坑。

但是，她终究没有继续沦落下去。她与莫里斯的爱情生活改变了她的人生旅程。婆婆玛丽的最后让步使她光明正大、体面地迈进了显贵人家的厅堂。

不管怎样，她的出身局限和其聪明的大脑使她在把握处世原则和待人接物上表现得极为得体。

在得到婆婆的接见之前，她显露出终日坐立不安的样子，一方面惹人怜爱，同时又恰当地突出了她对婆婆的敬重，毫无疑问地满足了莫里斯潜意

识中必定存在的自尊与虚荣。

这是一种弱者向强者的谄媚，但又丝毫不是以谄媚的俗套表现出来，而是将之变成了一种高尚的、知书达礼的尊敬，结果莫里斯必须为她的这种尊重付出努力。

在与婆婆玛丽见面时，她是那么的温柔恭顺、纯真无邪，顿时改变了玛丽脑子里原有的为她特制的形象。当这一切都不是她故意做出来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承认索菲的教养和天生潜质。

索菲不喜欢抛头露面，她进入上流社会活动圈子大多是因为丈夫必须去。

在与上流社会达官贵妇的交往中，她既不因为自己以前的卑贱身分而低声下气，也不因为丈夫的荣耀而趾高气扬。她厌恶那些自以为是、傲慢无礼而又愚蠢至极的显贵和小人得志的暴发户，认为虽然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百姓，但要比所有的贵族大老爷都高尚得多。

她既不愤世嫉俗，跟世上的种种偏见作对，也不会忍受羞辱，看着别人的眼色，依此搭搁上那些徒有其表的大人物，使自己在他人的眼中份量加重。

在她冷漠地对待那些流露出比她高贵、比她强大的人的背后，她对普通人和朋友则是亲密、信任、友善和赤诚相待。她做事有自己的准则，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习惯行事。

不可否认，长大以后的乔治·桑很大程度地继承了她母亲思想和性格。

孩提时的小奥洛尔与她的表妹克洛蒂德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克洛蒂德是奥洛尔的姨妈吕茜的女儿，比她小几个月，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和亲戚。

长年从军在外的莫里斯在女儿的脑子中是一个画像中的角色。所以，小奥洛尔接受的启蒙教育来自于她的母亲，两个人的关系相当亲密。在索菲的种种美德中，还有她对女儿教育的尽心尽力。她会设计出一种环境，在里面给奥洛尔看画册里的神话图像，并给她解说这些图画，另外给她讲童话，教她背诵寓言故事。

在小奥洛尔的记忆中，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当她的母亲去了意大利，她和表妹克洛蒂德被寄放在巴黎郊外的一户善良的人家里。一到星期天，她们便被放在箩筐里，与将送到市场去卖的青菜、胡萝卜一起，由驴驮着去巴黎的市场。

1808年，莫里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驻扎。索菲担心丈夫受好调情卖俏的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勾引，不顾自己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带着女儿与丈夫相聚。

当时的西班牙与法国是两个敌对的国家，她们的这次旅行因此历尽艰难。

抵达马德里不久，索菲分娩，生了个男孩。

高兴异常的莫里斯心血来潮，决定带领妻儿回法国诺昂老家去见母亲。

这又是一次艰难的旅途。马车穿越尸体狼藉的战场，孩子们忍饥挨饿，发烧。在肮脏的旅馆里，他们染上疥疮，长了虱子。

高烧使得奥洛尔神智恍惚，直到了诺昂才清醒过来。奶奶玛丽在院子里迎接他们，而她几乎不认识她了，满脸惊奇的盯着身体健康的奶奶，目不转睛。

玛丽热情地发号施令，一边让儿媳索菲去休息，一边把奥洛尔抱进自己的睡房，放在床上。小奥洛尔从未见过这般富丽堂皇的寝床。四角扎着装饰性的羽毛，床上摆着带花边的枕头，她以为自己进入了天堂。

这是一家人头一次大聚会。奥洛尔很快恢复了健康，而男婴却不幸夭折了。更不幸的事还在后面，仿佛命中注定，一天夜里，莫里斯从马上摔下来，头撞到石头上，不治而亡。

在无奈地承受接踵而至的沉重打击之后，沉浸在深深痛苦中的两个女人生活在了一起。

这是两位性情迥异、习惯截然不同的女人。做为婆婆的玛丽一直充满好奇心观察儿媳索菲，寻找儿子为什么那般钟情于她的原因。她很快为自己找到了各种的答案。索菲是个天生的艺术宠儿，她能够写流畅达意的书信，能够唱动人的歌谣，能够画美妙的图画，而这一切都是在她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学习和训练情况下完成的。另外，她还会做别的事情，一句话，她什么事都敢干，干什么都有模有样，不像个新手。

如果说以前两个人之间尚存在一定的隔阂，那么住在一起之后，尽管偶尔也发生不快，她们便因为注意到了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的魅力而情不自禁的彼此吸引，彼此喜欢上了。

比较而言，小奥洛尔与其母亲的感情自然比她与奶奶的要亲密一些。从教育孩子的角度，索菲的方式比玛丽理想中的更自然，所以小奥洛尔更乐意接受。

诺昂的乡间环境为奥洛尔提供了自由自在的天地。她喜欢这个地方，喜欢这个地方的一切，牲畜、木车、乡村集会、农家婚礼和古老的传说故事。她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牧羊、喂小鸡。

索菲支持她干这样的活儿，而她的奶奶则对此不感兴趣，甚至持反对的意见。玛丽觉得从小就该培养她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甚至包括如何使用刀叉用餐以及指东西的姿势一类的事情，而不该让孩子整日与一些农家孩子到处乱跑，养成不雅的生活习惯。

在玛丽的眼中，小奥洛尔是理所当然的诺昂的继承人。她喜欢这个孩子，儿子死了，奥洛尔便成为儿子的替身。小奥洛尔很快便学会了识字看书，于此玛丽已经感觉到这个孩子天生聪慧，她希望把她培养成一个漂亮、娴雅、会妆扮自己的淑女。

所以，玛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小奥洛尔从孩子与母亲的天然亲密状态中拉到自己的身边来。这种争夺是极为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尽管发生在两个相互尊重、相互喜欢的女人之间。

实事求是地讲，这两个女人骨子里的东西确实不太一样，甚至差距甚远，生活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久了，冲突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而且越来越多。那种相互尊重和喜欢也就变成了短暂的礼仪，淡化并逐渐消失。

后来，索菲不得不离开诺昂。因为玛丽不喜欢卡洛琳娜——小奥洛尔的同母异父姐姐，索菲与她的情人所生——呆在诺昂，而索菲又不能弃卡洛琳娜不管，这个孩子在世上只有她这位作母亲的一个亲人。

但索菲在去巴黎前也曾做过巨大的心理斗争：该不该带小奥洛尔一起走？按照她的心愿，当然不愿与自己的心肝骨肉分开，要带她到巴黎去。另一方面，理智地想，小奥洛尔留在诺昂与她的奶奶在一起确有种种有利的理由，她可以接受良好的、正规的教育，还有金钱上的利益。再者，每年冬天

她们都可以聚在巴黎，享受亲情欢乐。

小奥洛尔却希望与母亲呆在一起。母亲的宽容与自由思想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她敬爱母亲，依赖母亲。尽管索菲有时也粗暴地管教她，打她，骂她，但她的记忆中留下的都是母亲与她一起玩耍的日子，是母亲鼓励的言语和目光。反过来，她对母亲走了以后与奶奶生活的日子感到害怕，因为以前这方面确实没给她值得信任的东西。那是一种母亲不屑一顾的生活方式，是约束，也是她所不喜欢的。所以，她哭着喊着哀求母亲，结果未能如愿。

接下来的日子出于奥洛尔的预料。母亲离去后，她在诺昂完全是自由自在的，而且非常有意义。

父亲的家庭教师德沙尔特此时开始教她学习自然科学和拉丁文，奶奶则向她传授音乐和文学知识。小奥洛尔练习着写一些有关乡间生活的小作文，并阅读文学名著。

未至的假想中的严厉与约束转换成一种有趣的学习生活，她逐渐地习惯了，并且兴趣一天比一天浓厚，全心投入其中。这个聪明的小姑娘开始积极主动地用她的小脑袋瓜思索一些稚气的问题。她的想象力异常活跃，就像她以前在田野里奔跑游戏一般，忘我而充满热情。

当然，她也思念她的母亲。这种思念愈强烈，愈招致玛丽的妒嫉和不愉快。宽容大量的长辈怎么也容忍不了孙女执著的情感，她太需要了，而别人又是如此轻易地得到。

这太不公平，所以她要改变它，甚至不惜一切手段。

当按照原来的约定，玛丽把小奥洛尔带到巴黎去见她的母亲时，小奥洛尔乐坏了。

在母亲的住处，她重新见到了记忆中和梦里的一切，那么亲切，那么温馨，令她依赖不已。她又见到了小姐姐卡洛琳娜，与她在一起玩耍同样是小奥洛尔的快意之事。然而玛丽不让她们在一起，总要因此惹出令人伤心的争吵。

索菲得知婆婆不愿让小奥洛尔来巴黎，她安慰自己的女儿忍耐着，等自己弄个营生后便把她接来，让她当助手。

听到这些话，小奥洛尔心里豁然开朗，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时开始为那一天的到来做准备。她天真地把她的首饰藏起来，想到时候将它们卖掉做为逃走的盘缠。但是她的计划有一天被奶奶的贴身女仆发现了。

那个一脸阴气、铁石心肠的女人本来就不喜欢小奥洛尔，在揶揄她一番之后，把这事告诉了孩子的奶奶。

碰巧这时候玛丽闹了病，正在卧床休息。于是她让仆人把小奥洛尔叫来，让她跪在自己的床前。她错误地以为是儿媳妇索菲唆使孙女从感情上疏远诺昂，按照她的思路，必须让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了解她母亲的不光彩的过去，使她从心里厌恶她的母亲，或者最起码让她为她母亲的过去感到羞耻，这样才能改变小奥洛尔对母亲的依赖，进而与高贵、有教养、有身分的奶奶亲密起来。

她躺在床上，从头到尾地讲述了索菲的出身和生活经历，没有丝毫表示同情的宽容，甚至有些夸大其辞，总之把索菲说成了一个堕落的荡妇。同时，她又给小奥洛尔描绘了自己及莫里斯的生活经历。两相对比，最后她顺理成章地指责小奥洛尔不明是非，她的行为和想法是被什么东西蒙住了眼

睛，往火坑里跳。

玛丽忽视了她面对的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姑娘，她的言语虽然成功地破坏了儿媳索菲在小奥洛尔心目中的形象，遂了自己的愿，但同时这个孩子不可能马上转而投向她。

最可怕的，小奥洛尔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变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这是玛丽始料不及的。她不再用心学习了，而且谁的话都不听。她的言行与以前相比判若两人。

玛丽动此手足无措。她不明白是什么妖魂附住了这个孩子的心灵。但她毕竟是这个家族的传人，是这个家族的未来，所以自己有责任不让她如此继续下去而自毁前程，有义务想方设法改变她，让她最终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让人尊重的淑女。玛丽下定决心，要把小奥洛尔送到修道院去，除此她没有别的办法了。

“孩子，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简直连常识都没有了。”她数落了小孙女一通，为自己的决定做了铺垫。

听说要把她送进巴黎的修道院，小奥洛尔非常高兴。确实，她也希望在修道院里改变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在她的内心中，她想在巴黎见到母亲。虽然奶奶曾经向她讲述了母亲的不洁的生活经历，但她从未真正地抛弃母亲。

也就是在她进修道院这件事上，小奥洛尔开始对她的母亲流露出失望的情结，两人之间的亲情出现了裂隙。

小奥洛尔原以为母亲不会同意她进修道院，当看到她那坚定不愿在诺昂生活，会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

她与奶奶一起来到巴黎，像从前一样，为能见到母亲而激动不已。然而，母亲对待她的方式令她大失所望，既吃惊又伤心。索菲变得与小奥洛尔心目中的母亲判若两人，极为冷漠无情。

索菲给女儿讲了一通有钱又有本事的好处，这两方面可以从她的奶奶和修道院处得来。所以她赞同自己的女儿进入修道院学习。但同时她又嘲笑了一番修道院，还丝毫不客气地向女儿数落了婆婆玛丽的种种不是。在小奥洛尔的心灵当中，她发现了母亲的自相矛盾，言不由衷。母亲一边指责奶奶在讨厌和看不起笃信宗教的行为的同时却把孙女托付给修女们，一边又支持奶奶的作法，这是多么滑稽的事啊！

小奥洛尔感到她的母亲不再爱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此后，她逐渐地不再想念母亲，不再到母亲那里讨得建议和意见。虽然这样做令她心里异常痛苦，但毕竟母亲是她的痛苦的最初制造者。

小奥洛尔进的是一家由英国人在克伦威尔执政时期建立的女修道院。这里的一切都是英国化的，嬷嬷都是英国人。在修道院里，小奥洛尔养成了说英语、喝茶的习惯。当然，这些习惯都是被迫养成的。修道院里一天中有好几个场合孩子们不允许用法语说话，而嬷嬷们对那些孩子只讲英语。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帮助小奥洛尔和她的伙伴们迅速掌握这种语言。

这里还有个插曲。刚到修道院时，小奥洛尔是由奶奶陪着去的。修道院里的孩子们分成两班，也就是大班和小班，两个班的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不尽相同。孩子们该进入哪个班是按其的年龄来划分的。而按照常规，小奥洛尔该进入小班。但是，玛丽不这样想。她在向院长介绍小奥洛尔的情况时，忍不住得意地说这孩子虽然年龄小，但已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如果

现在把她编入小班，那么就有点儿让她虚度岁月了。确实，小奥洛尔已经掌握了许多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知识，但在英语和时事知识方面，她则一窍不通。玛丽也正是忽视了孙女的短项。修道院方面对此倒是处理得非常老练，他们没有受玛丽的左右，最终把小奥洛尔编入了小班。小奥洛尔自己乐得如此。

小奥洛尔进入修道院时年方十四，是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她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同时又非常富于反抗精神，这或许是莫里斯和索菲两相结合的产物在她身上的突出表现。她是个小淘气鬼，但她的艺术才华此时亦初露锋芒。

她在修道院里生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周围的人物和环境造就了她。她变得多才多艺，风度迷人，勇敢的性格中又添加了优雅的一面。她变成了一个姑娘，一个祖母玛丽理想中的淑女。

促使奥洛尔离开修道院的原因来自她的奶奶。按照奥洛尔自己当时的意愿，她想一直留在修道院作修女。

这个时候的玛丽身体状况不太好，她以为自己活不了太长时间。唯一让她时时牵挂、放心不下的是在修道院里的孙女。她与儿媳索菲之间的隔阂，令她不希望在她死后奥洛尔由她那不称职的母亲监管，那样她将死不瞑目。所以，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奥洛尔离开修道院，择婿成婚。

“孩子，我得让你尽早结婚，我必须这样，因为我的日子不多了。”她非常从容冷静地对孙女说。

第二节 情窦初开的少女

一些男人在打奥洛尔的主意，但看中她的是她家的财产。这令奥洛尔恶心。

贵族青年斯特凡·格朗萨涅使她一见倾心。

奶奶——她的保护人、最亲密的朋友——去世了。母亲得意洋洋，颐指气使。

告别修道院的生活之后，奥洛尔和奶奶在巴黎逗留了几日。开始她还担心奶奶会马上给她介绍男人，催她结婚，但很快她就安下了心。

奶奶的一位老友给她物色了一个男人，但奥洛尔认为他其貌不扬，根本就没什么寻思，后来这事就算完了。不久，她们便收拾行装，准备回诺昂老家。奥洛尔听到奶奶就她结婚之事对别人这样说，“她年龄还小，过一年再说吧。”

但还有一件事令奥洛尔担心，并让她付出了很大努力，那就是妈妈与奶奶之间的关系。此时两人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奥洛尔原本希望母亲能够去诺昂，庆祝她从修道院回家。但是母亲态度生硬地说：“说什么我也不会去！只有我的婆婆死了，我才会去诺昂！”

奥洛尔劝两位长辈相互谅解，但徒劳无功。后来她又与母亲商量，请求留在巴黎与她一起生活，但母亲一口回绝了她：“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新在一起生活，而且肯定比别人预想的要早。”

她的这番话赤裸裸地暗示玛丽活不了多长时间，让奥洛尔听了非常难过。

“你母亲一点教养都没有，”奶奶玛丽对奥洛尔说。

两人彼此恶语相加，使奥洛尔自觉无能为力。于是，她只得与奶奶启程回诺昂。

在外生活了几年，回到诺昂后奥洛尔深深体会到了世事的变迁。她儿时的朋友如今也像她一样长大成人。他们当中有的已出外谋生，有的成了她家的雇工。她们对她的称呼发生了改变，从以前的直呼其名变成了敬语，她成了他们的主子。兴奋过去之后，她慢慢地感觉到了孤独，因此更加怀念修道院的日子。

她的同父异母哥哥伊包利特当了兵，而且晋升为轻骑兵中士。在他回家度假时，才算给她的生活添了些趣味。

奥洛尔与祖母的关系变得亲密。两人经常在一起交谈，尤其是涉及与男人的交往和对感情的理解方面的内容。玛丽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她所受的教育使她能够清楚地理出谈话的头绪。

玛丽对她婚外的男人不感兴趣，更确切地讲，她对与男人发生纯肉体的性关系深恶痛绝。尽管她生活在一个人们放纵情感的时代，但她一辈子从未有过情夫。她周围的某些妇人曾经好心地劝说她去找男人享乐，对此她的回答是“不”，并以男人的无情无义、自私自利与粗俗无礼做为拒绝的理由。当她们用露骨的情色暗示向她表白男人的好处时，她感觉无法接受她们将本来属于个人隐私的事情如此贱谈。但是，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并不拒绝男女之间浪漫情事，她的身体没有任何缺陷，只不过较之追求肉欲她更企望情感交流，而男人们则恰恰对肉欲更感兴趣。这使她对此失却幻想。

在与奶奶的经常交谈中，奥洛尔了解到了很多事情。她以后可以继承一大笔足以让她富足的财产；由于她母亲的出身和经历，她并不是年轻男人理想的婚姻伴侣。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已经有一些男人在打奥洛尔的主意，想与她缔结良缘，但他们都不是年轻人。他们看中奥洛尔的首先她是个女人，然后是她将继承的财产，至于她的相貌、学识、品行等方面的情况，他们视之如同他将娶的女人所穿的衣服，并不重要。而那些保媒牵线的人关心的也只是这些，这令奥洛尔感到恶心。

那些男人中有一位四十岁的男爵。他结过一次婚，但妻子没有给他留下子嗣便去世了。男爵对奥洛尔极感兴趣，通过种种关系了解奥洛尔的情况，得到的结果也令他满意。

但是，奥洛尔既没有与这位男爵结婚，也没有与别的老男人结为眷属。

在诺昂，她过着自由自在、积极过活的生活，还没有那种依赖于某个男人的要求。

她经常与老管家一同出去打猎，穿着男式服装，戴着鸭舌帽，追逐野兔。男性气概在她身上充分体现出来，她也因此感到骄傲。奶奶病情再次发作，一病不起后，她又接管了家庭事务。

这时，奥洛尔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的年轻小伙子。他的名字叫斯特凡·格朗萨涅，出身贵族，不过由于他有九个兄弟姐妹，所以家庭并不富足，甚至生活有些拮据，而他所能继承的家产也微不足道。奥洛尔家的老管家德沙尔特对这位正在念书打算学医生的小伙子极为关心，把他介绍给奥洛尔，让她

向他学一些医学常识。

俩人以前见过很多次面，奥洛尔对他印象不错，所以她乐意向他学习。

斯特凡很高兴能有机会来诺昂给这位迷人的姑娘上课。黑发明眸，身材窈窕、混身散发魅力的奥洛尔让他着迷，斯特凡很快便堕入情网。

奥洛尔也是情窦初开。但当他向她求爱时，她的理智战胜了情感。虽然她愿意接受他的感情，嫁给他，但她清楚地知道斯特凡的伯爵父亲和自己的奶奶都不会同意这桩婚事。伯爵先生会因为他虚伪的自尊与骄傲——儿子出身于贵族家庭，而奥洛尔的母亲出身低微并有着不光彩的过去——心生反感；玛丽看到的是斯特凡虽然出身高贵但徒有虚名，他没有什么财产，并且她感觉出斯特凡性格暴躁，脾气不好。她不会让自己的心肝宝贝孙女遭受那份罪。奥洛尔年方十七，做为一个尚未成年的姑娘，她得考虑家庭方面的意见。

这两个青年男女并没有深层的感情交流，他们之间的相互吸引不过是品貌上的相愉，这对处于青春旺盛的人们来讲是正常的，自然的。所以，一旦中间发生阻碍，而且当他们意识到没有进展的可能，那种温情也就很容易冷却下来。虽然课程学习仍旧继续，斯特凡对奥洛尔变得冷漠，直截了当，奥洛尔则像心思转过她平常的日子上了。

奥洛尔的母亲在巴黎听说了人们对女儿这段暂短的风流韵事的流言蜚语，写信给女儿一份忠告，而随着奥洛尔给母亲的回信，那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1821年年底，处于垂危状态中的玛丽在对奥洛尔说过“你失去了你最好的一个朋友”之后，走完了她的生命里程。

在她活着的时候，玛丽无疑是奥洛尔的保护神，一切怀有恶意的或者对奥洛尔心存觊觎的人都被她排斥在外。这位十分明智的老人高瞻远瞩，在她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孙女指定了监护人——丈夫与前妻之子的儿子，也就是丈夫的外孙维尔纳夫伯爵。

本来，奥洛尔应该与维尔纳夫一家住在一起，不过奥洛尔更愿意生活在乡村里，而不是她的监护人所在的城镇，她喜欢清静的乡村，去一个陌生的城镇她会感到无聊。她的监护人一家接受了她的这个请求，但做为唯一的交换条件，奥洛尔必须断绝去巴黎与母亲一起生活的念头。

十七岁的奥洛尔将继承一大笔财产，这包括巴黎的一座公馆，诺昂的地产和一定数目的年金。这些财产会让任何一个想与她结婚的男人动心。

维尔纳夫伯爵在玛丽死后立即赶到诺昂。这是一位亲切、活泼而且博学的先生。奥洛尔很高兴由他做自己的监护人。

然而，奥洛尔的母亲索菲的合理插入使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一听到婆婆的死讯，索菲便与妹妹吕茜奔赴诺昂。当初她曾经对女儿说过：“只有我的婆婆死了，我才会去诺昂！”她此番的践约当然不是为了凭吊死去的婆婆，她是冲着女儿来的。

奥洛尔热烈亲切地欢迎母亲的到来。但是最初的亲热过去之后，索菲的论题转入到对以前的不愉快之事的回忆上。她对死去的婆婆大发怨语。母亲的这番显得过于斤斤计较的举动让奥洛尔感到难受，甚至不快。不管祖母和母亲之间有怎样的隔阂，或者祖母曾做过怎样的对母亲不利的事情，母亲也不应该对一个死去的人再说三道四，奥洛尔这样理解。“您对奶奶的这种态度不对，”奥洛尔冷静地劝说母亲，语气充满尊敬而又不失坚持己见。

当索菲听到婆婆的遗嘱内容时，她变得更加怒不可遏，暴跳如雷。她没想到婆婆会如此怨恨她，临死也不肯把女儿交还给自己。“我是女儿的当然的合法监护人，我永远也不放弃这个权利，”她歇斯底里地喊道。

奥洛尔按母亲的要求做了，在她无言的顺从背后，驱使她的不是对母亲的敬爱——像她从前那样，而是做为女儿的无奈。

她跟从母亲到了巴黎。按照奥洛尔的本意，她希望留在诺昂，或者回到她原来生活的修道院去。她对母亲失去了信心和爱戴，从心眼里不愿与她一起生活。离开诺昂的时候，她的心情非常沉重，像告别深深依赖的旧友。她随身带上了几本最爱读的书，贴身女仆和她的狗，这些是经过她的母亲允许的，而且只能这样。

维纳尔夫伯爵于是实际放弃了他的监护人身分。做为有地位和名望的贵族人物，他当然不愿意掉价与索菲这样的女人身夺奥洛尔，在他的眼中，像索菲这种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同时，他也不愿意与索菲一同做奥洛尔的监护人，虽然这样做的结果有负玛丽的重托。维纳尔夫一家的冷漠使奥洛尔十分伤心，她对他们已经产生感情，或者说她实在不愿受母亲的粗暴约束。

奥洛尔去巴黎后，诺昂的地产交待给了老管家德沙尔特。

一年之后，奥洛尔结了婚。

第三节 与卡西米尔·杜德望结婚

她从来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来自异性的关心，她被打动了。

母亲无理取闹，横加干涉。

一个出身低微的、有着不洁经历的女人，终于有一个贵妇人来拜访了。

爱情有时候不期而至。起码对奥洛尔来说正是如此。

从修道院出来后在诺昂生活的日子里，她是一个小主人，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姑娘，到处受到人们的尊重。跟随母亲到巴黎后，她的生活变了一副模样，随时随地受到母亲的约束和指责。两个人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和对抗。

当然，索菲也有厌倦与女儿争斗的时候，而也就是有一天她的念头一转，便奠定了女儿的婚姻生活。莫里斯·杜邦——索菲的丈夫，奥洛尔的父亲——有一位好朋友杜卜列西斯先生，索菲一直与他们一家有来往。为了缓和与女儿的关系，索菲决定带她去杜卜列西斯先生家住几天。

杜卜列西斯先生家住在布列西斯乡村。对于热爱乡村景色和生活的奥洛尔来说，那里虽不是她熟悉的诺昂，但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她一下子喜欢上了那个地方。杜卜列西斯先生和他的夫人昂日莱都是善良、直爽之人。当索菲决定回巴黎，而他们看到闷闷不乐的奥洛尔没有此念时，昂日莱便提出奥洛尔可以在此再住几天。索菲同意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奥洛尔与杜卜列西斯先生一家成了好朋友。杜卜列西斯夫妇有五个孩子，他们把奥洛尔也当成了自己的女儿。而奥洛尔的母亲仿佛把她给忘记了，以至于她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

或许索菲如此作法是早有主张。杜卜列西斯先生的领地经常有年轻军官到此，她也许想让奥洛尔有个接受求婚的机会。确实，她希望女儿早点成家，甚至有一次她曾经逼迫女儿遵从她的意见，为此俩人闹得不亦乐乎，奥洛尔对母亲心生恨意。

不过，不管怎么说，与杜卜列西斯一家一起生活的几个月确实对奥洛尔产生了影响。

乡村的新鲜空气使她恢复了活泼的天性，杜卜列西斯夫妇相亲相爱、儿女相依的幸福家庭生活情景令她对婚姻产生了好感。她开始对自己的婚姻生活充满憧憬，觉得需要找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爱自己的男人。

奥洛尔的念头有一天终于成为现实。她回到巴黎的家后，杜卜列西斯夫妇来巴黎看望她。他们一同出去散步、吃饭、看演出，索菲虽然也受到他们的邀请，而且本来她也喜欢这样出去玩，但她常常只让女儿一人跟他们去。“我感觉她好像要把做母亲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统统交给杜卜列西斯夫人，”奥洛尔说。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有一天晚上，他们看完戏后到一家名叫多尔多尼的咖啡馆喝冷饮。他们是坐在外面的露天座位上。突然，昂日莱对丈夫说：“瞧！卡西米尔来了。”

一个身材瘦长、风度翩翩、满面春风的小伙子，迈着像个军人的步子走了过来。他跟杜卜列西斯夫妇紧紧握手，并回答他们对他父亲的亲切问候。

随后，卡西米尔坐在昂日莱夫人身边，低声问她那个姑娘——奥洛尔——是谁。

“这就是我的女儿，”夫人大声回答。

“噢，那么说这就是我的妻子啦？”卡西米尔说，声音仍旧很轻。“您答应过我把您的大女儿嫁给我。……这位小姐看上去同我的年龄正相配，要是您肯把她许给我的话，那么我就把她接走。”

昂日莱夫人笑了起来。不过这个玩笑真的成为一个预言。

卡西米尔的父亲杜德望男爵是杜卜列西斯家备受爱戴和尊重的朋友。他是父亲与一个女仆的私生子，但父亲承认了他。

几天以后，卡西米尔·杜德望来到杜卜列西斯先生的领地布列西斯，与奥洛尔和杜卜列西斯夫妇的儿女一起游戏。他热情、快活，而且显得特别关心奥洛尔的处境，给她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所以给奥洛尔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觉得他非常讨人喜欢。

卡西米尔没有特意对奥洛尔献媚讨好。如果他那样做的话，或许他们在一起相处就不会那么随随便便了。他甚至根本就没想过这样做。因此，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平稳自然的伙伴关系。昂日莱夫人一直习惯把他称为自己的女婿，而卡西米尔则把奥洛尔当成自己的妻子。

奥洛尔呢，在她的心目中，卡西米尔是一个善良、诚实、无私的保护者。他们在一起玩耍、笑闹时，她乐意“假装”成他的妻子。一股爱情萌芽在她的心中拱动着，如此的不经意而又如此的脆弱，那是一个埋藏得很深的秘密。她是真诚的，秘密的谜底是她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无可言表的快乐。她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她以前憧憬中的朋友，而当梦想与现实相吻合时，是多么美妙的事呀！

玩笑开得久了，尤其是他们经常在一起游戏，这招来旁人的俏皮话。奥洛尔的自尊心容忍不了这些。虽然心中她已倾情于卡西米尔，但她口头上

还要拼命地抵赖。

事情没过多久便有了结局，卡西米尔正式向奥洛尔求婚。他在她面前一本正经，态度诚恳，言辞明确。他说：“也许我这样做不合乎常规，但我想从您那里得到肯定的答复，而且这个答复是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压力做出的。如果我还不至于惹您讨厌，而您又不能马上表态的话，那就请您多注意一下我。如果您同意，让我叫我的父亲到您母亲那里去提亲的话，那么就请您过几天告诉我，过一些日子也可以，只要您同意就行。”

卡西米尔的言语和举动令奥洛尔心里非常得意。杜卜列西斯夫妇也对奥洛尔讲了卡西米尔和他家的许多好的方面，奥洛尔觉得她真的该从婚姻的角度审视一下他了。

杜德望男爵家产很多，收入也很可观，其中有一半来自男爵夫人。卡西米尔虽然是独子，但他只能得到父亲家产的一半，因为他是私生子，并不是男爵夫人所生，无权继承父亲的家产。其余的所有财产，男爵一概留给了妻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她得把家庭财产再传给卡西米尔。可是，这也意味着婚后他得过比较简朴的生活。所有这些证明了他要娶奥洛尔不是为了钱财。

通过奥洛尔的观察，她发现，正如卡西米尔自己说的，他不是那种感情冲动、只凭一时热情办事的人，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善于用令人激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以前虽然没有对奥洛尔说过表示爱慕的话，但他这时对她说：“我愿意坦率地告诉您，从看到您的第一眼，我就被您那善良而又懂事的神态深深打动了。当我笑着告诉昂日莱夫人您将成为我的妻子时，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地马上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如果您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该多么幸福啊！这种想法每天都出现在我的脑子里，而且一天比一天清晰。同您一起说笑、游玩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与您相识很久了，我们已经是老朋友。”另外，卡西米尔还向奥洛尔谈及那种经得起考验的真正的友谊，谈到杜卜列西斯夫妇家那种安宁、和谐的幸福家庭生活，并说他自信有能力让奥洛尔也得到那种幸福，并描绘出了那种生活的具体画面。

奥洛尔觉得卡西米尔的话十分中听。她从来都没有受到这样特殊的、来自异性的关心，也从来没有谁如此心甘情愿、快快乐乐地一味顺从她，这一切把她那颗感情丰富同时又需要呵护的心完全打动了。

她去征求了杜卜列西斯夫妇的意见，在得到他们的首肯之后，便同卡西米尔保持恋爱关系。很快地，她就把他当成最知心、最信得过的朋友了。

奥洛尔的母亲索菲来到布列西斯，与杜德望男爵会面。这是由两位年轻人与昂日莱夫人一道安排的。索菲掌握着这桩婚姻能否成功的钥匙，一切都取决于她一时的兴致，她只要说个“不”字，那么所有的都可以推翻，统统不算数。也就是说，如果她拒绝这门亲事，不论是奥洛尔还是卡西米尔，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念头，他们只能做一对好朋友了。

上了年纪的杜德望男爵一头银白色的头发，神态和善而又显得尊贵，让人感到亲切而又敬重。他给奥洛尔和她的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加上杜卜列西斯夫妇等人一起，相互交谈。

之后，索菲对女儿说：“我同意这门亲事。可是我不是就此便答应了。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否讨我的喜欢。他长得不漂亮，而我倒是喜欢模样英俊的女婿挽着我的手臂。”

杜德望男爵特别喜欢奥洛尔，散完步分手时他对未来的儿媳说，他觉

得她能够做他的儿媳是他一生中极大的幸福之事。

索菲留下来住了几天。在这几天里，她显得十分愉快，待人亲切。她捉弄了她的未来女婿一次，目的是想考验考验卡西米尔。最后，她终于觉得卡西米尔是个好孩子。离开布列西斯之前，她表示同意这一对情人留在那里。

可是，半个月后，索菲又突然来到布列西斯，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她说卡西米尔是个生活放荡的人，而且过去当过咖啡馆的侍者。没人知道她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些话。虽然亲友们对她说那些内容都是无稽之话，并告诉了她卡西米尔以前的生活经历，但毫无用处。索菲仍固执地坚持己见，而且声称大家都在拿她开心取乐。她对着自己的女儿把昂日莱夫人大骂一通，说她为人不善，家风不正；并说杜卜列西斯先生专门干把有大宗财产的继承人同骗子联姻之事，以从中谋取私利。

奥洛尔不得不迁就她的母亲。为了消除她的怨气，她对母亲说可以马上收拾行李随她离开此地回巴黎，如果这还不能令她满意的话，做女儿的可以答应以后不再同卡西米尔见面。

听到女儿的这番言语，索菲怒气全消，平静下来，张落着收拾行李。可转而她又改变了主意，对奥洛尔说：“我想好了，我这就走，这地方让我讨厌。你要是乐意，那你就留在这里。我会把我了解到的情况转告给你。”当天晚上她便回了巴黎。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索菲类似这般地大吵大闹了几次。她就像一个病人，任性而且全然不顾别人的脸面。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杜德望夫人前往巴黎正式拜访索菲。此前这位老夫人回她的老家了，所以无缘与索菲和奥洛尔母女见面，商讨儿子的婚事。她的屈尊而至使索菲心里十分得意，或者说抚慰了索菲那颗长期遭受婆婆玛丽挫伤的心。一个出身低微的、有着不洁经历的女人，终于有一个贵妇人来拜访了。杜德望夫人雍容华贵，风度怡人，而又像天使一样温柔和善。儿子的婚事中发生的波折给这位贵妇人增添了诸多烦恼和痛苦，这在她的眉宇之间充分表露出来。一个美貌的夫人的这种神态，人见犹怜，加之她在索菲面前声音柔弱，态度谦恭，所以一下子打动了索菲和奥洛尔，使她们产生了好感。经过一番商谈之后，这桩婚事决定下来了。

然而，一切并没有就此了结。处于更年期的索菲客观上不停地挑起事端，忽而某天心血来潮说这桩婚事不行，于是它的进展便不得不搁下来，忽而某天又说可以了，让人摸不着头脑。可怜的奥洛尔因此凭添许多苦恼和伤心。

索菲对卡西米尔的态度再也没好起来，用她自己的话讲，这是因为他的鼻子她看着不顺眼。她一方面心安理得地接受卡西米尔的关心和照料，另一方面变着法考验他的耐心，并以此做为一种乐事。同时，她还经常在女儿面前说他的坏话，简直荒唐到了极点。

好在她的作法过了头，人们——包括她的女儿——已经认识到了她只是在从中作梗，她的所做所为没有任何根据，也就于事无损。

1822年9月，两位有情人终于举行了婚礼。

第四节 新婚之床

结婚后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怀了孕，接着又发现自己准备一生托付的丈夫是个粗俗的男人。

卡西米尔属于那类自私而又淫荡的男人，希望温文尔雅的妻子在床上突然一下子变成欲火高涨、行为放浪的情妇。

新的生活是从诺昂开始的。婚礼结束，经过短时间的拜亲访友和迎来送往之后，一对新人便与奥洛尔的同父异母哥哥伊包利特一起，奔赴诺昂。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德沙尔特——他一直管理着那儿的一切——的热情迎接。

与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确切地讲，奥洛尔对婚姻生活的实质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以前她所接受的教育，来自她的奶奶，来自修道院，以及来自书本上的，从未告诉她这方面的知识。换句话说，她比普通的女人——做了新娘之后——心里上的束缚更多一些。她希望从婚姻中获得理想中的幸福。可是，与成了自己丈夫的男人一起睡在新婚之床上，享受鱼水之欢时，她那丰富的情感成为审视两性生活的第三双眼睛，反到使她无法进入角色，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因而，她的感受是十分奇怪的，究竟如何她也不很清楚，或许是失望？

在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做出判断之前，十分快地，她发现自己怀了孕。这不过是结婚后一个月的事。像其他的结婚后马上怀孕的新娘一样，奥洛尔心满意足。女人成为母亲的天性在她的身上表现得毫无二致。

得知妻子怀了孕，卡西米尔对奥洛尔温柔体贴，关怀备至。因为奥洛尔的胃口一下子变得特别大，卡西米尔千方百计地张落到处买东西，满足她的心愿。同时，他还不忘开一些粗俗质朴的玩笑，逗她开心。

由于怀孕后精神不太好，奥洛尔放弃了她一直热衷的读书和其他精神生活。

冬季下雪的时候，卡西米尔出去打猎——他爱好打猎，并且是个好猎手——奥洛尔则一边想象着、期待着子宫中胎儿的初次蠕动，一边开始为孩子做衣服。她以前没做过针线活，第一次干这活时，她兴致高昂，满腔热情，而且她发现缝制衣服其实挺容易的，另外剪刀和针线在她的手中可以发挥她的创造力，这是她尤为热衷的。

此后，在她怀孕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干针线活成为她打发时光的一种消遣，成为一种精神生活的替代。有六个星期，按照德沙尔特的吩咐，她一直躺在床上。人们把她的床用松树枝和绿布装饰起来，让她感觉是躺在丛林中，自得其乐。

即将分娩的前夕，奥洛尔和丈夫一同去了巴黎。他们在旅馆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客房。

1823年6月底，奥洛尔非常顺利地生产。这是个男婴儿，胖胖的，活泼可爱。夫妻二人决定给他用奥洛尔父亲的名字，于是这个婴儿名为莫里斯·杜德望。

奥洛尔爱自己的儿子爱得发狂。她决定亲自给他哺乳，她的母亲索菲赞同她这样做，并鼓励她。

这位岳母与女婿的关系，因为种种原因十分不睦。她对女婿怨言极多。卡西米尔则认为岳母是个不知羞耻、没有道德的女人，不让她与奥洛尔接近。

对此，索菲讲：“他这样做毫无道理。他有什么理由把我扔在一边？如果不是我生养了他儿子的母亲，他大概不能给自己生个媳妇吧。”

婴儿出生后，诺昂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德沙尔特年岁太大了，管理诺昂的产业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在奥洛尔怀孕期间提出退休，把这个位子让给了卡西米尔。

以前，在这位老家庭教师的管理下，家里的年收入在一万五千法郎之内。在这笔钱里，奥洛尔每年打算给母亲三千法郎，同时还要支付几位老仆的养老金，剩下的钱做日常开销。

卡西米尔接管之后，热情极高，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全面变动。家庭改变了过去的习惯作法，花园面貌一新，仆人们更守规矩且恶习减少，房间布置得整洁大方，小径两边的草拔得干干净净，路修得平平整整，枯死的树枝推起来烧掉。卡西米尔还把腿脚不灵便，肮脏不堪的几条老狗杀掉，几匹跑不动路的老马也卖掉了。总之，一切都变了样。

这一切，把卡西米尔忙活得不可开交。

然而，这些焕然一新的变化使得奥洛尔情绪上有一种失落感。当她看不到守在壁炉边的老狗，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再也看不到杂草丛生、僻静幽暗的角落——那些地方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儿时嬉戏的影子——她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迷惘的痛苦和忧郁。她是诺昂的女主人，这个地方是属于她的，而此时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有什么东西仿佛被别人一劳永逸的拿去了，而她则没有发言权，她感觉被人忘记了。

奥洛尔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怀着孩子的时候，做母亲的憧憬改变了她固守的生活方式，她乐得如此。而这时，她又开始像以前一样，拿起书来，从中寻找心灵上的慰藉。

当然，这只是一种表相。她绝对不会因为庄园的变化产生那么大的倦悒。问题的实质出在卡西米尔身上，是他使她产生了失望。

奥洛尔婚后发现，她曾经深爱的、准备一生托付给他的男人，原来是个粗俗的、没有志向的、热衷于鸡毛蒜皮之事的小气鬼。她试图让卡西米尔读书，可是他对此觉得索然无味，一拿起书来就打瞌睡，经常是让书从他的手中滑落到地上，非常可笑又大煞风景。她想与他谈论文学和哲学，可他对提及的人物根本就不熟悉，或者一无所知。每当她向他描绘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感想，叙说自己极为激动时，他便晃晃膀子，对她进行讽刺和挖苦。她还试图引起他对音乐方面的兴趣，可卡西米尔一听到钢琴声便溜之大吉。

能让卡西米尔感兴趣的事情就是驱狗赶兔的打猎，或者是参加纵酒寻欢的聚会，再就是奢谈地方上的政治之事。

他终日在外，我可以说不几乎看着他的踪影了。我曾经把他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可现在他早已厌倦对于崇高爱情的热烈的向往之情。他为人忠厚、温顺，只是不再提到爱情的字眼了。他的来信越来越稀疏，而且根据我对他字里行间的意思的理解，他的话说得要么越来越激烈，要么就越来越冷漠。他的激情不再需要热烈的情谊和亲密无间的鱼雁往来维系，而是需要另外一种东西来滋养。他曾经立下誓言，也曾经为了我而恪守过他的承诺，若是没有这一点，我或许早就同他一刀两断了。但是他并没有对我做过保证，约束自己不去别的地方寻欢作乐。我觉得我在他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羁绊，或者只不过是聊以自慰的玩物罢了。

从奥洛尔上面的自白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她对卡西米尔的认识，或

者说当时她对夫妻关系的失望。虽然她客气地谈及了卡西米尔的为人，但与其说这是在赞扬卡西米尔，不如说这是在讲她所谈及的内容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

对于维系夫妻关系，某些情况下良好的性生活较理智和情感更容易一些。这种自然的行为不像后者需要更多的学识和修养。可是，在这方面他们也不是那么和谐。

奥洛尔感到失望。她读书挺多，渴望精神上的爱情，并早有心理准备，而肉体上的结合却知之不多，婚后也得不到满足。对于女人，获得性爱的快乐涉及许多因素，她需要被人爱，也需要对那个男人的认可和爱慕。

可是，卡西米尔属于那类自私而又淫荡的男人，希望温文尔雅的妻子在床上突然一下子变成欲火高涨、行为放浪的情妇。

这怎么可能呢？简直是在做梦。

“婚姻只是在结婚之前才赏心悦目，”奥洛尔心道。她在做姑娘的时候，做的都是高雅的、美妙的爱情梦。她不能容忍自己跌落到如此粗俗的趣味当中。

婚姻之床是个严酷的、实实在在的决斗场所，它最终给奥洛尔的感觉仿佛自己是个输光了的赌徒。

对于卡西米尔这个平庸透顶的男人，爱情不过是获取一个女人与自己结婚的手段，就那么回事。结婚之前，他就与别的女人有染，得到了男女肉体关系的体验和经历。他希望在妻子身上也得到快意的感觉，就像他毫不费力地从其他女人那里得到的快感一样。

同时他希望奥洛尔也同他一样会轻易地获得满足。

他的希望落空了。奥洛尔同意给他肉体的享乐，但她自己并不能分享这种快乐。当他自己完事之后无忧无虑地呼呼入睡时，她则失望地悄悄落泪——性生活成为对她的一种刑罚。

慢慢地，卡西米尔觉得她十分冷漠，开始说三道四：“你拒绝我的拥吻，我还觉得你的情感经得起任何考验呢……”

夫妻之间感情上出现了裂隙，彼此开始争吵。这是实质。但是表面上，两个人仍旧如平常一般，给别人写信时一起签名，分隔两地时像情人一样通信，而且充满柔情蜜意。

在外人看来，他们是一对深爱的夫妻，美妙的伴侣。

在卡西米尔给奥洛尔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一起床，头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的小爱人……我把你紧抱在胸前，吻你漂亮的脸蛋，每个脸蛋上吻一百万次，以补偿你可爱的眼睛中流出的泪花……

亲爱的人，我不在家你觉得忧伤，我特别感动。请你相信，我非常真诚地分担你的忧愁。回到家后，我一定对你温柔体贴，以补偿你的愁苦。一定，我的小天使……我善良的小天使，远离你，我度日如年。再见，亲爱的人。我把你，还有那可怜的小宝贝紧紧搂在怀里。

而奥洛尔给卡西米尔的信是这样的：

我善良的小天使，我心爱的人，你不在我身边，我只能给你写信，而不能和你交谈，而且这还只是分别后的第一天，真叫人惆怅。这一天我觉得多么漫长啊！我是多么的孤寂！我希望你今后不要经常离开我，因为这使我非常难受，我永远也不能习惯。我不知道今晚我该干什么，因为我哭了，哭

得身体疲倦，昏头昏脑。然而，我的天使，你不用担心，我会尽可能保重身体，也会尽可能让我亲爱的小宝贝健康。可是绝不能让我经常度过如此这般的白日！直到此刻，我一想到你我分别的时刻，我就忍不住要哭泣。……我希望此时你能回到我的身边！……晚安，我心爱的人，我亲爱的小宝贝儿！我就要躺下，一个人在床上哭泣……

虽然信写得柔情蜜意，实际上，两个人都不愿意，甚至害怕一起呆在诺昂。他们彼此心照不宣，而且出于默契，双方都避免做出解释。

在这种无聊的生活中，奥洛尔心情抑郁。万般无奈之下，她去找了她从前的听忏悔师。

教士给了她一些忠告，告诉她沉湎于忧郁之中她的灵魂已处在最危险的状态，希望她能够恢复快乐和勇气。然而，那位听忏悔师的话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倒是教士的另一个建议提醒了她，他劝她在少年时呆过的修道院里隐居一段时间。

奥洛尔渴望一种纯粹的信仰，而尘世的生活拒绝把她所希望的东西给她。女修道院的院长嬷嬷同意接收她。

奥洛尔把自己的想法跟卡西米尔讲过之后，他乐得如此。不管怎样，这样做使他去了一块心病，所以他马上表示赞成。卡西米尔自己不信教，但他也许希望自己不同意的信仰能令妻子平静，也使自己安宁。

修道院里的修女们善良慈祥。奥洛尔每日去教堂祈祷，聆听上帝的呼唤。“您有个可爱的孩子，这就是您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生命是短暂的，”一位善良的嬷嬷劝慰她。

对修女们来说，生命确实是短暂的。她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宁静的、没人打扰的世界中，修行是她们的生活全部。可是，对于每天都会因情感和热情的波动造成痛苦和疲倦的人们来说，生命又是何等漫长啊。

喜爱思考和幻想的奥洛尔听过嬷嬷的话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并向嬷嬷吐露了心声。

很快地，由于修道院平静而美妙的生活，奥洛尔的心灵和健康得到了恢复，由此她更希望能在修道院里多居住一段时间。但是天气开始变冷，而修道院里不能保证屋里的温度，她又是怕冷的人，况且小莫里斯又生了病，于是她重新回到了家中。

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一对相亲相爱的人从结婚到貌合神离，出人意料地快。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尤其对心高志远的奥洛尔来说，更是如此。不过或许正是这次不幸的婚姻，产生了后来的乔治·桑，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第五节 婚外情人

她强烈地需要爱，心底里有一股压抑着火苗，渴望着爱情劲风。

“以您看来，所谓贞洁是什么？是一种习俗，还是一种偏见？”他问她。

从巴黎回来时，她已有身孕。那或许是斯特凡干的好事，因为受孕

期与在巴黎居住的日子相吻合。

奥洛尔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对于情人，结婚是美妙的……结婚是爱情的最终目的。当婚姻里不再有爱情，或根本没有爱情时，所剩下的便只是牺牲。

夫妻不合，家庭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奥洛尔感觉好像陷入了绝境。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德沙尔特去世的噩耗这时又从巴黎传来。在奥洛尔的心目中，他是她最敬佩、最尊重的人。老人学识渊博，为人诚朴，勤勤恳恳地为杜邦家族服务了几十年。奥洛尔失去了他，更加觉得孤立无援。

还有谁能给予她心灵上的慰藉呢？

她的同父异母哥哥伊包利特？他是个胸无大志、随遇而安的人，乐天而随和。他贪恋的只是酒肉和女色。尽管他住的地方离诺昂不远，但对奥洛尔来讲，哥哥只是个好邻居，而不是知心人。

她曾给母亲索菲写信，诉说心中的苦闷。母亲的回信却丝毫不能让奥洛尔心情放松，相反，她埋怨女儿一番之后，只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如果你不是一个好女儿，那就努力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好妹妹、一个慈祥的母亲吧……”或许做母亲的真的不了解女儿的性格和抱负。如果如此，她又怎能给予女儿以真诚的安慰和贴心的建议？

奥洛尔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处于精神完全孤立的状态之中。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倘若是别的女人。一旦与丈夫不睦，便会去找一个情人。奥洛尔尽管天真纯朴，但她的身上所拥有的一切，秀美的眼睛，迷人的身材，卓越的组织才能，确实叫周围的一些人神魂颠倒。可是，她一直保持着对丈夫的忠诚。

奥洛尔在感情上生了病，她强烈地需要爱，心底里有一股压抑着的火苗，渴望着爱情的劲风。对于病中的人，她的身体是虚弱的，抵抗力极差；而对于感情上出了问题的奥洛尔，红杏出墙的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潜意识在不停地叮咛着她，她已需要一个心心相印的异性朋友。

一个长着两只漂亮眼睛的美丽的少妇要寻找知心的异性朋友，那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825年的初夏，有两位修道院里的好朋友来到了诺昂。她们是雅娜和埃美。奥洛尔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她们。朋友到来，她们之间的话题很多，由此又引伸出了其他的内容。

当奥洛尔得知雅娜和埃美要去比利牛斯省的科特莱时，她想与朋友们结伴出游，到比利牛斯山去避暑。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卡西米尔也乐意去那里打猎。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在科特莱，奥洛尔结识了一个名叫佐埃、来自波尔多的姑娘，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这个姑娘后来成了奥洛尔与情人之间的联络人。

紧接着，奥洛尔结识了一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他是波尔多法院的代理检察长，名叫奥雷利安·德·赛兹。当时，他正与未婚妻一家在比利牛斯山消夏避暑。初次相见，他就被奥洛尔的魅力，被她的美貌，被她的聪慧和极高的修养，被她热情掩盖之下的忧郁所迷住了。

卡西米尔继续热衷于他的打猎爱好，每日凌晨两点钟便起床，到夜里才回到住所。

奥洛尔向他抱怨他的早出晚归，而他充耳不闻，继续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意识到妻子的感情已经出现波动，会乘机外泄。

从结识后相处的最初几天起，奥雷利安就爱上了奥洛尔。卡西米尔打猎的落脚处总是在变，可是他让奥洛尔跟随着他，在他预定的下一个住地会合。这给奥雷利安和奥洛尔提供了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因为他坚持陪着她前往那些个地方。他陪着她爬山越岭，过湍流溪水，在临渊的山径上搀扶她。俩人很快成了知己。当奥洛尔打算让他回到他未婚妻身边时，这个男人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对奥洛尔说他对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兴趣，她虽有漂亮的脸蛋和悦人的外表，但脑袋里却空空如也。

奥雷利安是个直率而又性急的年轻人，他很快就开始向奥洛尔发动了强大的求爱攻势。他对奥洛尔直陈：“我喜欢您的品格、心灵、才华，喜欢您十足的纯朴和过人的智慧，以及广博的知识……即使您不是这般美丽，我也爱您……”

一开始，奥洛尔严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她希望自己保持忠贞。但不长时日，奥雷利安便以他那上流社会中的亲切和风趣，以及他的浪漫和温情，赢得了奥洛尔的一颗芳心。

在后来奥洛尔写给奥雷利安的信中，她承认：“天哪，我们在一起真愉快！我们彼此多么了解！我们的说话内容虽然普普通通，谈的是陌生的事情，对我却具有何等的魅力。您讲的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我听起来却是那么高兴。我觉得，那些从您的嘴里讲出来，就变得妙趣横生。谁也不能像您这样讲话。有谁能有您这样的语气、嗓音、笑声和才智呢？谁会有您观察事物，并得出概念的方式？谁也不会有，唯有您独占鳌头。”

奥洛尔感觉到，奥雷利安是她梦中之人。但她一直不敢承认有那么亲密。为了使她的生活安宁，她害怕承认。另一方面，她发现奥雷利安对她的情感很纯洁，而她感觉自己对他的情感也很纯洁，所以，她不相信这些情感是罪恶的。于是，她任自己无邪的感情自然发展着。

有一天，他们一起在湖上泛舟。谈话之中，他们涉及到了爱情。

“以您看来，所谓贞洁是什么？是一种习俗，还是一种偏见？”奥雷利安问道。

奥洛尔立即想到了她的母亲和吕茜妈。她们对贞洁的看法是不屑一顾的，按她们的认识，是“没有任何重要意义的”。而奥洛尔还不能像她们一样，她在迷茫的同时坚守着自己的贞洁。

这时，奥雷利安用小刀在小船的船板上刻下了他俩名字中相同的起首三个字母，以表示自己对奥洛尔爱慕的心情。

面对他如此赤裸裸的表白，奥洛尔自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爱他。于是，她假装极不高兴，大光其火。实际上，她的心里高兴极了，差点儿抑制不住兴奋之情。

奥雷利安却误会了，不知道她是在故做姿态。他在气馁中有点害怕，害怕因此而得罪她，进而失去她。在以后的三天之中，他小心翼翼地，不敢跟她说一句话，以免再得罪她，惹她生气。

奥洛尔也因此而感到非常遗憾。她的爱情之火已经点燃，她私下里对女友佐埃吐露心扉：如果奥雷利安除去继续做她的兄弟、她的朋友，他要求的还要多，要她做他的情妇，那么她将“做出自然牺牲”。上帝会原谅她一切出格行为的。

出于种种考虑，结果奥雷利安离开此地，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要躲开奥洛尔，把选择的权利留给了她。

甚至连奥洛尔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张无形的情网已经牢牢地缠住了她。

爱情使一个人失却了自我。她感到自己已经不能失去奥雷利安，他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撕扯着她的心灵，令她不能离他太远。她要追随他，随时随地能够见到他那张风趣的笑脸，听到他那带有磁性的声音。

她把卡西米尔带往奥雷利安去的地方。卡西米尔隐隐不安，仿佛已经发现了某些端倪。他试图阻止妻子，责备她太任性了。

可是，他怎能拉住一个奔向爱情的女人？

一对心中装着对方的有情人终于会合了。

一天夜里，在一个舞会上，他们单独相处。他向她说明自己出走的理由：他不愿勾引良家妇女，不该追求一个有夫之妇；他试图忘记她。听到此处，奥洛尔痛苦至极。爱情淹没了理智。她希望留住一切，于是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情感和心灵中的痛苦。她表示出亲密的友情。

夜色融融，四周幽静。冲动之中，他把她搂在了怀里。

哪个男人夜里与爱自己的女人单独相处，能够控制自己的肉体欲望，不令其表露出来？

奥洛尔感到被抚爱的幸福、温暖，但是转瞬之间，偷情的罪恶感又占据了上风。她害怕奥雷利安可能的下一步举动，于是，她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求他送自己回去。

奥雷利安安慰着她，以他的名誉担保让她放心，他不会再做出她所不情愿的事，可是无济于事。

奥洛尔坚持着要离开那里，她害怕俩人在月夜里抵御不了情欲的诱惑，做出越轨之事。

奥雷利安一声不吭地服从了。

一切都明朗化了，两个人都知道对方的心与自己贴得很近。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频频约会，无所顾忌地在一起，尽享美妙时光。

在这段日子里，像一对情人最初相识时一样，卡西米尔继续打他的猎，奥洛尔和奥雷利安跟随他爬山越岭，在目的地与他会合。当然，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两个人得分手单行。

大自然鬼斧天工的风景令他们陶醉，徜徉其间，伴随着他们随意捕捉到的话题，他们热情洋溢地交谈。俩人的情怀得到了升华。他们更加亲昵，在过陡峭的山坡时，奥雷利安会极为自然地伸出手臂搂住奥洛尔，并且，在分手时，他以吻与她相别。有一次，他们之间亲密的举动差点儿让卡西米尔撞上。

比利牛斯山之旅是奥洛尔情感生活中的一个分水岭。从此，她跨越了婚姻生活的园圃，一个二十余岁的美貌少妇开始追逐浪漫的婚外恋情。

告别比利牛斯山，奥洛尔心中充满幸福。临别之际，奥雷利安向她海誓山盟：“……面对庄严的大自然，我向您庄严地发誓：终生爱你，像爱母亲、爱妹妹一样，并且像尊敬她们一样尊敬你。”

奥洛尔终于找到了一个高尚而美好的灵魂，一个正直而坚强的才子，一个可以奉为楷模和向导的男人，一个她极为倾心而且令她颇感充实的情人。

她跟随卡西米尔去了吉勒里的丈夫家。公公婆婆对远道而来的儿子和儿媳热情款待。

奥洛尔也与他们相处甚好。

而奥洛尔的一颗芳心，却不断地牵挂着波尔多的奥雷利安。卡西米尔表现得殷勤、多情和亲切。对比，奥洛尔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责备自己对他变了心：“我更爱奥雷利安”。

后来，她把自己当时的心情说给了丈夫：“我需要小心翼翼地对你隐瞒我的心事，这使我极不舒畅，你的抚爱让我难堪。我怕回报你的抚爱而对你倾吐一切，暴露我和他的关系，所以你以为我对你冷漠。”

她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她思考着向丈夫坦白自己的婚外恋情，请求他的原谅；可是，冷静下来，抛开丈夫的殷勤相待，放纵起内心深处的情感狂潮来，她又割舍不断与奥雷利安的恋情。不管她怎么做，不是让卡西米尔感到绝望，就是让奥雷利安感到失意。这种心灵之中的激烈斗争，对丈夫与情人的感情权衡，使奥洛尔辛酸和甜蜜交加。

然而，没过多久，奥洛尔的秘密就被卡西米尔撞破了。

在吉勒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奥洛尔的朋友佐埃邀请他们夫妇去波尔多附近的小镇布莱德观光游玩。去那里的途中经过波尔多。奥雷利安来旅馆看望他们。奥洛尔此时打定主意，想说服奥雷利安断绝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她利用卡西米尔让他们单独相处的那一会儿时间，对奥雷利安倾吐了心中的矛盾和自己的想法。两人之间谈话充满哀婉之情。话到深处，她感到有点支持不住，一下子靠在了奥雷利安身上。正在这时，卡西米尔突然进门，发现奥洛尔的脸贴在他朋友的肩上，两人之间充满暧昧之情。

奥洛尔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搞得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情急之下跪倒在卡西米尔脚下，恳求他的宽恕，接着便晕了过去。

可怜的卡西米尔也是倍感突然，尽管是发现了妻子的奸情，也是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因为害怕上流社会的舆论，这毕竟他面子上也不好看。他显得左右为难，一方面要相信妻子，另一方面又觉得耻辱。

第二天，他们在布莱德与奥雷利安和佐埃的游览计划并未取消。事情化解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在整个游览期间，奥雷利安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偶尔地，两位多情的朋友还能在一起交谈几句。经过谈话，他们认为排除一切谎言，三人在一起生活是高尚的，只要彼此之间开诚布公。他们的主意就这样定了下来，他们是兄妹，彼此相亲相爱，但决不发生任何肉体关系。这样便顾及到了卡西米尔的名誉。因为卡西米尔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既照顾了自己的脸面，同时也没有让奥洛尔和奥雷利安出丑。做为对其慷慨大度的回报，他们当然也得让卡西米尔愉快和放心，确保大家名誉的安全。

事情就是这种奇妙和有趣，以前一对情人之间的来往还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当情事暴露之后，他们反而可以光明正大地相互联系了。

于是奥洛尔开始了一个兴奋时期。

回到吉勒里公婆家后，她通过女友佐埃与奥雷利安通信。她为他记日记，其中叙述自己的童年，详细记载她征服的人，因为周围邻居的小贵族都在追求她。尤其是奥雷利安写给她的信，她无休无止地反复阅读。情书能使人们忆及往昔的幸福时刻，并重新体验那种幸福，它把分离变成一种更美妙、更甜蜜的聚首。奥洛尔认为自己可以毫无顾忌、毫无内疚地读那些情节，因为她已经同意牺牲自己的幸福。

一对情人永远相亲相爱，不过他们谁也不属于谁，他们只是陶醉于崇高的感情之中，而不是彼此肉体的占有。

在精神上，他们从未分离过。不管是奥洛尔骑着她的马驰骋于灌木丛

中，还是听人讲述古老的传说，或躺在床上时，奥雷利安一直都仿佛在她的身边。他们的思想始终保持着一致。奥洛尔终于找到了一个男人，能够纯洁地、无私地、高雅地爱她。

在他周围，人们生活在令人难堪的快活之中。这些淫荡的外省人放肆而又贪婪地谈论情欲，以蔑视高尚的情感为荣。他们根本就没有清白、纯洁、恪守贞操的观念。奥洛尔知道，奥雷利安帮助她保持贞德，她多么感激他啊！尤其是她承认，只要他再进一步要求，她就会为了留住他而失去自己的贞操：“世上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位，可以长久地满足于一个女人的爱情。奥雷利安也许指望成功，如果他知道把成功的时间推迟，那是因为他有把握获得它。如果必须让他成功，我就会因此死去；然而如果不让他成功，我就会失去他的爱情！”关于这一点，奥洛尔心如明镜一般。

奥雷利安不失理智，发誓尊敬她。奥洛尔坦言：“是您，奥雷利安，促使我拒绝您的要求，促使我不怕使您伤心。”他留给了奥洛尔一个充满幻想的空间，使她想到了永恒的生命。

“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奥雷利安，您相信，是吗？……到那时，我们永远结合在一起，住在一个安宁的居处，在那儿，爱情合法，幸福长久。”奥洛尔的一片痴情爱意，赤裸裸而不加任何掩饰。

按照奥雷利安的主意，奥洛尔给丈夫写了一篇洋洋 18 页的《忏悔书》。

我的处境是多么可怕啊！当我觉得自己就要沉湎于懊悔与激动的时候，我又感到某种东西把我拖住，强迫我把言之成理而又冷冰冰的理由，代替我的心里话。该怎样给那阻止我、让我不知所措的东西下定义呢？这肯定不是居心不良的无动于衷；这是自尊心的活动，有时我把它当作高尚的情感而运用，有时我又把它看作人间傲慢的暗示而懊悔……你好几次要求我解释、坦白，可我不能下此决心。这不仅因为说出过错我觉得难堪，而且因为怕伤害你。然而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详谈那也许使你伤心、发怒的细节。同时必须告诉你，你对我也应负一定的罪责。用罪责这个词并不恰当，你对我一片善意，你，总是这么善良、高尚、亲切、热情，可是你不知不觉地、并非故意地犯了过错。我斗胆地说，我误入迷途，完全是你好心办坏事造成的……

接下去她给他讲述自己忧郁的生活，结婚几乎剥夺了一切本可以使生活更美好的东西。她放弃了音乐，因为他听见钢琴的声音就躲开。

我们谈话，尤其是谈文学、诗歌或伦理的时候，我谈到的作者你都不熟悉，而且你还认为我的思想疯狂，情绪偏激，浪漫。我停止谈论这些。想到我们的情趣永远不可能有共同之处，哪怕最微小的一致也不能存在，我便开始真正的忧愁……

奥洛尔承认卡西米尔过去待她极好，他过去爱她，但俩人总是缺乏广泛一致。在她这方面，由此便产生了反感，令她偷偷落泪。她认为，不管怎么说，她诚恳地向他讲述了自己与奥雷利安的交往，并提出了奥雷利安怎样为他的宽宏大度而感动。

他说：“奥洛尔，我永不对您说一句他不能理解，也不能赞同的话。我们将齐心协力为他的幸福而努力，竭力关心他的幸福。假如哪一天一个恶念闯进我们的头脑，那我们就厌恶地把那恶念驱逐出去。要是我们觉得又在走回头路，就要记起他对您说过的话：‘尽管你现在仍可以蒙骗我，但我还是相信你。’怎能辜负如此信任的一片好心？奥洛尔，我要责备您，您对自己的丈夫不怎么爱，您从未对我说过您爱他。我不相信他的心胸能有这样博大。

我呢，我衷心地爱他。”……我高兴地笑了。“您现在了解他了，”我回答说，“我也一样，我了解他，喜欢他，钟爱他。我懊悔犯了那些过错……”

奥洛尔巧妙地让丈夫对情人有一个好一些的印象。

……从没有人教你了解自己的感情。感情在你心里，是老天的安排。你的智力虽没有受过培养训练，但上帝造了你的心灵，并一直保持原样，在各方面都配得上我的心灵。

直到今天，我一直看轻了你，还认为你不可能理解我，要是早些时候，我决不敢给你写这样一封信。我怕你读过后会说：“我可怜的妻子丧失了理智！今天，我愉快地向你坦露心扉。我让你察看我的心。我坚信你理解我，赞成我的看法。

再往下，她拟定了他们家庭未来的规章：

今年冬天，我们不去波尔多。伤口还未弥合，而且我觉得对你的信任不能做过分的要求……因此我们去你愿意去的地方，你来安排我们冬天的活动，要么在巴黎，要么在诺昂，我将毫无遗憾地服从。

我向你发誓，我答应永不与奥雷利安秘密通信。不过你要允许我一个月给他写一封信。……他来的信，我复的信，都将给你过目。我向上帝保证，决不隐瞒一行字。

如果去巴黎，那我们就一起去听语言课。你可以学习，可以分担我的工作。这将使我极其高兴。我在一边画画或干活时，你就给我念书。我们的日子就这样惬意地度过。……我并不要求你爱好音乐。我尽可能不让你厌烦，你去散步时我再弹琴……

如果我们在诺昂过冬，那我们就阅读一些有益的作品。……你把读书的情况告诉我，然后我们一起交谈，你把你的感想告诉我，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你。我们的思想和快乐将会一致。

你永远不生气，不发火；我也永远不忧愁。我平心静气地和你谈，你就会很快恢复冷静。以后我们再谈论起过去，就不会感到痛苦、刻薄和互不信任。既然你已经知道一切，又何必要那样呢？既然我们现在幸福地生活，又何必要对已发生过的一切表示遗憾？这些事件难道最终没有让我们言归于好，握手言欢？是什么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爱你？没这些事件，我就不会知道你的价值，而你也不会明白该怎么办才使我愉快。

总之，我们将愉快、安宁地生活。我们会排除一切遗憾、一切痛苦的想法。看谁能遵守得更好，从而成为完美的人。

下一年，如果你觉得可以，而我们的事务又允许，我们就去波尔多过冬。不然，我们就推迟这个计划，不过，你总得让我有朝一日在这方面有指望。

这就是我的计划。请你认真地读一读，想一想，然后给我个答复。我相信它不会伤害你。我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你的决定。在那之前，我满怀希望地等待……

这个《仟悔书》完全出乎卡西米尔的意料，他没有丝毫准备。读过这份听人吃惊的东西，他为弄得妻子如此不幸而内疚，既不愿意让她失望，同时又害怕自己滑稽可笑。

在与妻子的同父异母哥哥伊包利特吃过饭，酒足饭饱之后，卡西米尔向他吐露了心中苦涩的隐情。伊包利特马上给妹妹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其中责备她具有一个坏妻子的所有缺点。

奥洛尔对兄长毫不客气，坚决地反驳他。接下来，兄妹之间互相评论起来，而且极其冷酷。伊包利特同情妹夫，他责怪奥洛尔让卡西米尔苦恼、不快。而对卡西米尔，劝他采取严厉态度。不过对这个酒鬼的劝告，卡西米尔不太愿意听。

这时，卡西米尔也染上了幻想的毛病。他想提高自己，好让妻子不再因他而脸红。

痛苦唤醒了思想，不幸是走向同情的通道，情感在不安中发展。卡西米尔突然一下子渴望做出牺牲来了。在诺昂，他从书架上拿起了书，试图像妻子劝告他的那样，认真地读一读。在每封寄往吉勒里的信里，他都向妻子表示自己的强烈爱情。奥洛尔的成就和征服，使他认为自己不如她。在波尔多，有关她的评论既使他惊讶，又使他自豪。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你在此地名声大噪，引人注目。人家只谈论你非同寻常的才智，你想想，我是多么骄傲。……正如你想到的，我在讲废话……”他带着一些书和一部英文字典回来了。“我放弃打猎，我不再独自外出，我伴着你过日子……”

不幸的是，在夫妻生活中，良好的决心几乎总是跟在使以往的决心化为乌有的事变之后。

卡西米尔并未被妻子“蒙骗”，不过他失去了她的尊重。他那些可怜的信件，尽管多情、悱恻、委婉，然而笨笨拙拙，被不无嘲弄地拿来与奥雷利安洋溢着激情的文字做比较。在吉勒里，她亲切而高傲地对待他。有一天，在餐桌上，卡西米尔开了一个稍嫌粗俗笨拙的玩笑，奥洛尔便俯身对他说：“我可怜的卡西米尔，你真笨！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你这样。”声音不大不小，意在让大家听见。

夫妻之间，最有罪的行为不单是通奸，而且还有贬责。

那封洋洋数千言的《仟悔书》，不过成为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状况下的过度品，它所有的内容，根本没容得时间的推敲，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仿佛是一个有意设下的骗局。

角色倒换了。该轮到卡西米尔郁郁不乐，心事重重了。奥洛尔则恢复健康，重新获得了幸福。由于夫妻生活的经验，她已厌恶“自然而全面”的爱情，希望以柏拉图式的伟大爱情来自救。可是她怕这个词使男人吃惊，便让奥雷利安认为那不过是安宁和圣洁的友谊。她仅仅是在幻想中委身于他：“我独自生活在我自私和隐秘的快乐之中。我拒绝让我奇特爱情的对象分享我思想的精妙和快乐……”

当卡西米尔因为自信同意领她去波尔多时，她与奥雷利安重逢了。她优雅风流，使人迷恋，因而长时间地俘虏了他。“我喜欢给人以快感的痛苦。对我来说，它是这种隐秘斗争的结果。”满足性欲的情景使她快活，而肉体的占有却叫她痛苦，二者旗鼓相当。

她清楚自己对朋友有支配力，一个注目，一次握手，就可以叫他“心砰砰直跳”。

奥洛尔在波尔多大受欢迎。恰在这时，消息传来，她的公公杜德望男爵去世了。于是，年轻夫妻立即赶赴吉勒里。

杜德望男爵夫人虽然精于处世之道，却缺乏魅力与温情。她使男爵立下遗嘱，保证她占有男爵的所有财产。因为卡西米尔是私生子，这样做是合法的。她尽管极为富有，却不肯让卡西米尔分享一点父亲的遗产。

没有办法，只有摆脱这种贫乏而痛苦的命运了。丧事处理完之后，卡

西米尔和奥洛尔返回诺昂，不顾以往的失败，决心把这里当作最后的住所。

重返家园，回到仆人、牲畜和农舍、家具中间，奥洛尔感到特别快乐。村里的小广场、种着洋槐和丁香的院落、铺砂的小路、千金榆的树篱笆、鸟的啁啾、神妙的清香，一切的一切，令她回想起自己的全部生活，每棵树、每块石头都向她叙述着她的经历的一部分，她心满意足地呼吸着必需的空气。

在鲜花盛开、声音可闻的诺昂，并不是什么都最好。她很喜欢她的贝里人，却觉得他们没有加斯科尼人活跃。许多人都酗酒。她哥哥伊包利特——他已到蒙古弗莱城堡生活，就挨着杜德望一家——常常喝得烂醉如泥。卡西米尔学他的样，大概是为了忘却忧愁。尽管两夫妻互作保证，家庭关系也未见十分融洽。产业成了两人冲突的经常的缘由。

丈夫不在时，奥洛尔使经管它。丈夫同意她统治一年。这是一场惨败。他拨给她一万法郎，她却花销了一万四千。因此，她失去了支配职务，觉得十分悲痛。她继续与奥雷利安通信（有时卡西米尔去波尔多时，亲自担任信使）。因此，不可看见的情人日夜都在她身边。

他们交换着一些礼物。她为他钩了一个钱包，绣了几条裤背带；他则寄来一顶巴斯克人的无沿软帽，一些书。奥雷利安的信与其说柔情依依，不如说风趣，或者庄重。由于不能谈论爱情，他便论述政治。她写信比他勤，有时还责备他不回信。于是他便抱怨收到的信太短。

事实上，尽管卡西米尔批准，奥洛尔去了几次波尔多，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还是日渐衰弱。

政治使充满激情的情人疏远，却暂时地使夫妇接近。

卡西米尔和奥洛尔一样，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共同支持拉夏特尔在野党的候选人杜利——杜弗莱斯纳。为了支持他，杜德望一家来到拉夏特尔，租了一幢房子住下，经常举行家宴和舞会。

奥洛尔在那里又遇见一些童年的朋友。她丈夫起初疑心重重，后来则容忍了，因为这些人跟他观点一致。

一头金发的夏尔·杜维纳，是个作忧郁幻想的年轻男子。

弗勒里，外号叫“高卢人”，一双大脚板，胡子浓密可怕，目光吓人，好似化石人，或者原始人。

才华横溢的律师阿列克西·杜特伊，虽长一脸麻子，却是个杰出的、愉快的健谈者，奥洛尔忧郁的时候，他便来宽慰她。

富有诗意的儒勒·内罗，外号叫“马达加斯加人”，因为他游览过马达加斯加。他和奥洛尔一样，是卢梭和夏多勃里昂的信徒。

这群狂热分子在月光下，在大路、森林、街道奔跑，吵醒市民，窥伺恋爱的男女，或者加入工人的舞会。

有时，奥洛尔乘卡西米尔呼呼大睡的时候，离开诺昂，与哥哥一起连夜策马奔到拉夏特尔，在杜特伊的窗下唱一支抒情歌曲。或者她凌晨即和内罗——他是个博物学爱好者——一起出发，去观察植物、矿物和昆虫。有一年秋天被用来观察蘑菇，另一年秋天则研究苔藓和地衣。卢梭的影子在这一对植物标本采集者的上方飘荡。

自然，无论是做游戏的伙伴还是做研究的伙伴，都爱这位穿长裤、粗布罩衣的漂亮女子。杜特伊已经结婚且掉了牙，却也要来碰碰运气。他当然遭到了拒绝。奥洛尔开着玩笑，告诉卡西米尔别人对她表白的爱情：“我没

有一颗易于感受爱情的心，所以我不觉得他、或者他的人值得爱。”然而对“马达加斯加人”，她承认“却稍稍有点爱意”。

这不能阻止内罗夫人给她写信，指责她“虚伪，风骚”。

确实，她越来越乐于唤醒自己的情欲。不过她无意于满足情欲。拉夏特尔的乡绅和资产者指责她的妖媚与放荡。人们一听到某种新的出轨行为，便说：“这又是杜德望夫人所为。”

这些不公正的批评使一个年轻女人倾向于放荡。

直至此时，奥洛尔虽然轻率，不检点，却是贞洁的。奥雷利安的信越来越少，感情也越来越淡薄，不能使她抗拒诱惑。

她已经放弃拯救卡西米尔。卡西米尔因为失去了妻子的爱，不可能再度征服她，并明白自己不如她而忧愁，便更加狂饮。奥洛尔感到奥雷利安在疏远她。奥雷利安发过誓要尊重奥洛尔，可是并未发誓不到别处寻欢作乐。奥洛尔原先想把他捧上台座，他自己把台座掀翻了。

难道不发生肉体关系，就不能留住男人吗？她终于想到这点。

既让人爱自己，又不委身于他；既是平常女人，又是巾帼丈夫；既是无可指责的妻子，又是被人爱慕的情妇，这些美好的梦想，却并不能与现实融合。

她又遇见了那个斯特凡·格朗萨涅。以前，她在闺房里向他学习那易动情感的骨学。

他比以前更为博学。他的脸上有了一圈髭须，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却仍然英俊。看到他面颊瘦削，两眼无神，身躯伛偻，她大为激动。他身上的一切都吸引着她。他在她身上唤醒了最初的爱情的冲动。他是学者，而她则喜欢学习；他自称无神论者，而她尽管信教，却被他的这种大胆搅得心慌意乱。她看到他是病人；而她喜欢照料病人。有时奥洛尔以为他就是自己要寻求的师傅。很快，拉夏特尔的人便认为她与他干出了有损名誉的事。

伊包利特和他年轻的妻子在巴黎买了一个套间。斯特凡不在贝里时，他们便接待他，并把他的消息告诉奥洛尔。

1927年秋天，斯特凡回到家乡。其时卡西米尔正在外面。斯特凡给他的出生地贝里带来了巴黎的空气和最新的思想。奥洛尔见到他许多次，她把这些会见写信含蓄地告诉了丈夫，用女性特有技巧：在微不足道的云朵里，隐藏着真情。

我的身体好多了。虽然仍吃不下饭，但睡得还好。因此，这没带来什么不良后果。

我担心生病，但最终发现这种不适是由月经期引起的……

可是卡西米尔一回到诺昂，她就去了巴黎，与斯特凡相会。

对奥洛尔与斯特凡的关系，有许多闲言碎语。当时，谁也不怀疑这种关系。奥洛尔与斯特凡一道旅行，跟他回贝里，随他上巴黎。而且斯特凡的后代也透露了两位情人有热情的情书来往。奥洛尔在同一时期写给卡西米尔的信，表现得过份深情，显露出一个女人因某种过错而感到内疚的痕迹。她请卡西米尔别来接她，斯特凡将负责送她回贝里。

在巴黎居留的借口是需要看病求医。她认识一些最著名的医生，但医生们都认为她身体很好。

其实，她只是有心病。

回诺昂后，她陷入了颓丧和忧愁之中。她像罪犯一样可怜。她写信给

佐埃：“我不再要求您像从前一样爱我。我配不上任何人的友谊。我好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一个角落里悄悄死去，而不会在同类中寻找安慰与救助……”

一个那么骄傲的人，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谦卑呢？

从巴黎回来时，她已有身孕。那或许是斯特凡干的好事。因为孩子是1828年9月13日降生的，受孕期与在巴黎居住的日子相吻合。奥洛尔说孩子是早产，原因是伊包利特的女儿小莱昂蒂娜在诺昂的楼梯上摔倒了，使她受了惊吓。可是卡西米尔本人会对此抱有幻想？

9月初，有一天大清早，奥雷利安出人意料地来到了诺昂。他发现奥洛尔独自待在客厅里，折迭婴儿的衣服，并把衣服放好。

“您在这儿干什么？”他问。

“肯定您也明白。我在为一个比我料想的来得早的人忙碌呢，”她回答。

他不能把这意外的生育，同她在信件与言谈中大讲特讲的保证协调一致起来。她曾保证忠于美好、纯真的感情以及夫妻间的爱情。

他变得有点疯了；一时似乎在沉思默想，一时又拨动火炉里的火，一时又跑到钢琴边，用两个指头弹奏。

佐埃在写给奥洛尔的信中说：“我见到了奥雷利安，不能不想象他在诺昂留下了伴随他的痛苦、撕心裂肺的难过和可怕的孤独……”

分娩是痛苦的。

伊包利特喝得烂醉，要在妹妹房里的地毯上打滚。

奥洛尔在床上听见了丈夫与女仆佩皮塔在隔壁房间打情骂俏的交谈。他们的话语一清二楚地表现了他们的关系。

婴儿是一个胖乎乎的、漂亮的女孩，起名叫索朗芝。

后来，斯特凡·格朗萨涅要去诺昂，朋友们便逗弄他，说他在那里与情妇有个女儿。

“好吧，我就是去看我的女儿！”他便说。

奥洛尔自己有时也称女儿为“斯特凡小姐”。

然而，杜德望先生从没提到要离弃妻子。他依恋诺昂，舍不得儿子，甚至也舍不得奥洛尔。何况，如果真的分开，他又往哪儿去？吉勒里属于他的养母。

于是，夫妇间达成妥协。她容忍他与女仆的放荡行为和纵酒作乐；他则让她自由，只要她不向他要钱。

此时，卡西米尔把产业经营得一团糟，1828年，他还听信了一个骗子，那人请他喝香槟酒，并把自己的情妇借给他，最后骗了他一大笔钱。

奥洛尔不再与丈夫同住一房。她把两个孩子安顿在底层杜邦·德·弗朗科依夫人的黄色房间里，自己则住在隔壁的小客厅里。在这里，她觉得安全，因为这间客厅只与孩子们的房间相通。她睡在一张吊床上，把一块雕花护墙板当书案。护墙板倒放下来，像一张写字台。这个小房间里摆满了书、蜡叶植物标本、蝶蛾标本和石头。她就是在这里写作、沉思、幻想。由于对生活不满意，她便开始写小说，尽可能以此来补偿。她仍像在修道院里一样，寻求与上帝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对宗教仪式，她并不怎么注重。

她从未疏远过她的上帝。不过，正如任何人，为了生活，需要与自身协调一致一样，她也从头脑里抹去了通奸是滔天大罪的想法。她终于也像她母亲一样，认为“只要爱情真诚，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遗憾的是，奥雷利

安过早进入了她的生活，而且是在她尚未准备“下重大决心”的时期。对她来说，他或许是她需要的浪漫的情人。奥洛尔多次去波尔多旅行，并重见她的朋友，然而发现他变得“衰老而丑陋”。两人之间没有做什么解释，他们的书信联系仍继续了一段时间。

莫里斯长大了。做为卢梭的忠实信徒，奥洛尔开始关心他的教育问题。

一个偶然的机，她们说某位家庭教师有一种非常高效的教育方法，便设法打听到了那个家庭教师的名字：于勒·布古瓦朗。她写信与他联系，并聘请他担任儿子的家庭教师。不过这仅是一次为期三个月的试验。没过多久，她便把他辞退了。

布古瓦朗并非真的不讨杜德望夫人喜欢。这是个年轻的南方人，乐于助人，讨人喜欢。他成了她的一个朋友，自然也怀有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使他敬畏。即便他在巴黎替她采办了一些物品，她最多也只许他“吻一吻，以感谢他的劳苦”。他是个优秀的家庭教师，“语法掌握得十分准确”。

莫里斯才六岁，就能流畅的阅读。他已开始学音乐，学拼写，学地理。

卡西米尔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两个女仆保持着关系，一个是佩皮塔，另一个是奥洛尔嫂子的侍女克莱尔。

奥洛尔试图写几部长篇小说。她在家吵架，即使是最激烈的吵架之后，第二天又笑呵呵地，好像什么事情都未发生过。有时，晚上她独自披星戴月，骑马从拉夏特尔回来，走在父亲当年坠马身亡的那条路上，不禁思考起自己的奇特处境来。她认为周围的人几乎都庸俗不堪，可是她自己又更好一些吗？

第一节 情人于勒·桑多

于勒·桑多被这位诺昂的女主人带有野性的美貌，大胆而又说一不二的性格，以及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和柔软的腰肢迷住了。

他们的手第一次重叠，彼此相拥相吻，尽享爱情的甜露。

卡西米尔自从知道妻子即将出走后，悲伤不已。

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合作者关系之后，生活变得日复一日地平庸。直到进入 1830 年的仲夏，奥洛尔结识了于勒·桑多，一下子堕入情网并不可自拔。

于勒·桑多是一个拉夏特尔小城税务官的儿子。他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天赋，聪明伶俐。他的父母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不惜一切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中学的学业结束后，他的成绩优异，接着去巴黎攻读法律专业。那时他 19 岁，白里透红英俊的脸庞，一头金色的鬈曲头发，漂亮而又潇洒，是个十分讨人喜欢的青年。

因为是假期，所以他回到拉夏特尔。他的身体瘦弱，性情也较为懒散。与朋友们在一起时，他不太喜欢凑热闹，常常是平静地抱着一本书，找个地方一个人消磨时间，做为享受。

在诺昂，卡西米尔整日在田野与林间追逐猎物，晚上要么坐着打盹儿，

要么与女佣逗闹偷情。奥洛尔对此视而不见。好在周围城堡有一些向她谄媚示爱的小伙子，他们乐意与她在一起高谈阔论，听从她的调遣，把她众星捧月地做为中心。这成了她唯一的乐趣，几乎每天都骑马去拉夏特尔或其它一些地方。

一日，奥洛尔又一次来到古德莱城堡她的朋友杜维纳的家。此时，在他的家中除了经常见面的几个朋友外，还有一个她不认识的小伙子。这个气质脱俗的年轻人马上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却拿着一本书离开了大家，走到草坪中的一棵苹果树下的长凳上坐下。他的这一举动令奥洛尔情绪产生了波动，甚至有些不愉快。于是她把别人也带到树旁，在他的周围开始他们的交谈。

由此，开始了奥洛尔与于勒·桑多的交往。没过多久，这一对多情的男女之间便深深留下了对方的影像。于勒·桑多被这位诺昂的女主人带有野性的美貌、大胆而又说一不二的性格，以及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和柔软的腰肢迷住了。当他发觉她好像对他感兴趣时，便发狂地爱上了她。而在奥洛尔的内心深处，于勒·桑多年轻英俊，聪明灵慧，他那略显柔弱的风度和充满幻想的浪漫，这一切也无时不在诱惑着他。他们之间有许许多多共同话题，而俩人超越现实的浪漫的追求又是那么的一致。这构成了他们相互吸引、相互仰慕的另一个方面。事实上，她的谈锋胜过他一筹，因为性格上奥洛尔较为刚强，是个女中豪杰，而于勒·桑多则较为软弱，是个多少带有一些女人味儿的男儿。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崭新的风景线，一个兼有母亲色彩的情妇与一个兼有儿子色彩的情郎。

这是俩人独特的性格决定了的，而他们彼此适应。

我是多么地爱他，这个可怜的孩子。从见面的第一天起，他那内涵丰富的目光，那有点笨拙而又直率的举止，那对我略显腼腆而又有点不知所措的神态，深深打动了，令我不禁想再次见到她，留心他。这种只能意会而不可言谈的兴趣与日俱增，而且我从未想到要去抑制这种想法，甚至到我对他表白我爱他那会儿之前，也没有这样想过。有那么一阵儿，我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看书，可是我什么都没看进去。我的大脑完全被对他的爱占据了，而那是多么甜蜜和令人陶醉啊，朦胧、神秘的爱情。

奥洛尔的表白透露了她内心的真实感受。

终于，两个人开始单独出去约会。很多时候是在诺昂，在奥洛尔领地花园中的一片小树林里。就是在那里的长椅上，他们头一次毫不隐讳地互表爱心，叙述思念之情。也就是在那里，他们的手第一次重叠，彼此相拥相吻，尽享爱情的甜露。有许多次，于勒·桑多或是顶着夏日的骄阳，或是冒着风雨，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地从拉夏特尔的家中起来。

处在爱河中的人会时常搞一点小把戏，这一对偷情的人也是如此。当于勒·桑多来到他们约会的那张长椅前时，会发现奥洛尔留在那儿的书和头巾。这时，他便留下自己的帽子和手杖，然后藏到一边，看一看奥洛尔来到时的模样。而他们都觉得这样十分有趣，隐含着一种幸福。

他们的关系不断地发展，爱意渐深，对对方肉体的渴求也日渐强烈。在花园旁边一个不易有人路过的小屋里，两个人终于走过了男女间最神秘、最撩人的一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小屋和小树林成了他们舔情吮蜜的住所。

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奥洛尔和于勒·桑多选择的约会地点都比较偏

僻，而且于勒·桑多来诺昂去相会地时尽可能避开这里的人，但他们的关系还是被人发觉。一时，毫无善意的言语评论在拉夏特尔传开了。

相比起享受甜蜜爱情的幸福而言，拉夏特尔的那些添油加醋的流言蜚语对她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把我的生活注意力集中在我所爱的人身上。我的身边聚集着我所爱的人，他们就像一支神圣的军队。这令我无所畏惧。”这就是奥洛尔的回答。

然而，这种浪漫、舒心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于勒·桑多是回拉夏特尔放假休息的。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他必须回到巴黎。这对奥洛尔不啻一个冷水击身的打击。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离别多。这是一对情人发自内心的苦闷。

在于勒·桑多离去后，奥洛尔的日子过得相当糟糕。她唯一的伴侣就是嫂嫂艾米莉。

这是个温婉、善良的女人，可是在九点钟就要告退。此时奥洛尔便去小客厅里写信或者画画。

两个孩子睡在隔壁的房子里。索朗芝长胖了，面色鲜嫩；莫里斯学习很不错，母亲教他拼写。

伊包利特和卡西米尔几乎总是去参加风雅的聚会。这种死气沉沉的景象不可能持续多久。杜德望夫人已打算去巴黎与小于勒相会。她的夫妻生活越来越叫她觉得不可靠。

只有逃跑，她才可能恢复那本来的样子。

至于她丈夫，他有一些情妇，但她不容许这种放荡是单方面的。

一天，在丈夫的书桌里寻找东西时，奥洛尔发现了她标明给她的一个包裹。那上面写着：我死后再打开。

奥洛尔可没有耐心等到自己成了寡妇后再打开它。她想，既然它是给我的，我就有权打开它。这不是什么不得体的行为。而且，既然丈夫身强力壮，她也就可冷静地读他的遗嘱。

打开一看，她才发现他在那里集中了对她的所有怒气和愤恨，对“她的堕落”的所有感想，对她性格的所有鄙视之情。而且他是把它当作爱情的证明留给她的！

奥洛尔以为是在做梦。读了这份遗嘱，她终于清醒过来了。她想，和一个对妻子不尊重、不信任的男人过日子，这无异于希望让一个死人复生。她的主意已定，并且坚信永不改变。

她一天也不能等，马上向丈夫宣布她的不可动摇的决定：“我希望得到一笔生活费；我将去巴黎，孩子留在诺昂。”

卡西米尔对妻子的神态大吃一惊。

她要求的比所希望得到的更多。她根本不想抛弃孩子和诺昂，甚至也不愿抛弃丈夫。半年住巴黎，半年住诺昂；三千法郎的生活费。如果这些条件卡西米尔接受了，她就会同意维持名存实亡的家庭。

卡西米尔接受了这些条件。

剩下的就是解决孩子们的命运问题了。奥洛尔打算一有把握提供衣食住宿，便把“胖姑娘”索朗芝带在身边。三千法郎，对她这个乐善好施而不喜欢计算的人来说，简直太少了。她得挣些钱。她毫不怀疑写书、画画、或者画烟盒一定能达到目的。至于莫里斯，他父亲打算让他进巴黎的寄宿学校。可是他年龄大小，身体太弱。他得有一个家庭教师。而且奥洛尔希望有古瓦

朗当他的家庭教师。

“如果您在诺昂，”她给他写信道，“那我就可以轻松呼吸，安心睡觉了。我的孩子将由能干的人教育。他的功课将会有进展，他的身体将有人照料，他的个性既不会因放任自流而惯坏，也不会因过严管教而伤害……”

无疑，卡西米尔·杜德望不讨人喜欢。然而一个妻子的感激，一位母亲的温情难道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您知道，我的心并不冷漠。我感觉到，他除了尽义务，没有留下什么……”于勒·布古瓦朗一如所有年轻男子，被杜德望夫人迷惑，最后这一句话展示了美妙的前景。

他接受了。

可是，当他建议她可以与他一同去尼姆旅行和探亲时，她回避了。她说，她得照顾丈夫，并且不能使孩子未来的家庭教师受人怀疑。“我至死都将感激您，然而我却不能报答您。”

家庭教师上任了，再没什么可拖住她的了。唯有伊包利特企图阻止奥洛尔出发。风趣的醉鬼喝酒后生出了同情心，晚间，来到妹妹的房子里，哭着说道：“你想象一下，带着一个孩子在巴黎，每月二百五十法郎，怎么过日子？这太可笑了，你连一只小鸡值多少钱都不知道！你住不了十五天，就会两手空空地回来。”

“那好吧，”她回答说，“我试一试吧。”

确实，这个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人，由于被婚姻合法地剥夺一空，手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掌有。但她希望有朝一日重获孩子、财产和家园。

卡西米尔自从知道妻子即将出走后，悲伤不已。她说：“他向我哭了。我向他表示，我不希望像一个被人家背着包袱，而愿意像被人家寻求、召唤的伴侣……”

她梦想到巴黎与优雅而轻浮的桑多会聚以后，既当他的情妇，又做他的家庭主妇与母亲。她结婚以来，一直在麻木之中；而今，她终于活了。

“生活！多么美好，多么甜蜜，尽管有忧愁，有丈夫，有烦恼，有债款，有父母，有流言蜚语，尽管有令人伤心的痛苦和令人厌倦的烦人事！生活是令人陶醉的！生活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天国！”

1831年1月，奥洛尔·杜德望离开诺昂。她兴高采烈，因为获得自由；她又黯然神伤，因为她抛下了孩子们。

第二节 文人拉杜什

赚钱成了不可推却的任务，可是怎么去赚？

“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在开初的时候，两人署名为J·桑多。两个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

来到巴黎，奥洛尔已经疲惫不堪。因为公共驿车的门关得不严，她冻了一路。于勒·桑多一直在心情激动、充满热情地等着她。她在塞纳街31号伊包利特的套房里安顿下来。

在他们周围，很快就聚起一小群贝里人：菲利克斯·皮亚特、爱弥尔·勒尼奥、弗勒里，还有古斯塔夫·帕佩。

这些小伙子都有些爱慕她。在他们之间，奥洛尔觉得心情愉快。

1831年的巴黎是令人兴奋的：革命经常发生，议会不断更迭。在刺刀、骚乱和破产之中，人们还像在和平时期一样快活地生活。

同时，文学革命毫不亚于政治革命。

这是浪漫主义戏剧举行盛大首演的时代，鼓吹民主的青年向墨守陈规的人挑战。1831年2月，《巴黎圣母院》面世；米什莱出版了《世界历史导言》；布洛兹当上了《两世界评论》的主编。稍晚之后，玛丽·多尔瓦尔，这个为青年反抗者们所喜爱的女演员，表演了大仲马的《安东尼》。这出戏是通奸和私生的辩护辞。奥洛尔和朋友们为了捍卫这出戏，都在戏院正厅里观看。当时女人只在楼座或者包厢里看戏。为了自由通行，也为了衣着省俭，奥洛尔身穿男人服装。她过去穿粗布罩衣，戴护腿套，和德沙尔特一同打过猪，所以乔装改扮，她不感到任何为难。当时的服装也有助于女扮男装。男人们穿着宽大方正的礼服，名曰“业主装”，一直垂到鞋跟，并不怎么突出身段。奥洛尔穿一件灰呢的“哨兵服”，戴一顶灰礼帽，系一条羊毛大领带，俨然是个瘦小的大学一年级学生。

不过，更重要的是，她摆脱了女人受支配的地位。在她挽着一个小伙子的手散步时，不再有拉夏特人的窃窃私议：“这好像是杜德望夫人！”

为了使生活环境完全改变，她与从前自己的那个阶层完全断绝了联系。她只在需要丈夫的时候才想到丈夫：

“请你给我一些钱，以购买鞋、袜，等等。请马上写信给萨尔蒙先生，让他交给我三百法郎。再见，我的朋友。我看到了我母亲、姐姐、夏尔·杜维纳和于勒·德·格朗萨涅。我将去欣赏帕格尼尼的表演……我衷心地吻你……”

对她亲爱的英国女修道院，她做了最后一次拜访。

七月的大炮把修道院的修女们震得惶惶不安。阿莉亚娅嬷嬷忧形于色，忙忙碌碌，只和她过去的“女儿”会见了片刻时间。

奥洛尔明白，在修女们眼里，外边的友谊无足轻重。她又去探望科特莱的两位朋友：雅娜和埃美。两人都结了婚，如今是伯爵夫人，有钱有势，受人奉承。她离开她们后，决心永不再来。这些可爱的姑娘选择的是正统观念，谨遵旧习。奥洛尔·杜德望却更喜欢在人类的荒漠里自由自在地踟躅，昂着头，“脚踩薄冰，肩披雪花，两手插在口袋里，有时腹内略空，然而脑袋却更因此充满梦想、旋律、色彩、形状、光线和人影”。

然而必须生活。

她不能在伊包利特的套房里住下去。因为他常来巴黎，需要房子。租一间最小的屋顶室一年也要三百法郎的租金。雇一个看门女人做做家务，一个月就要十五法郎。一个蹩脚厨子送几餐饭，一天就要两法郎。严格地讲，如果她不买家具，不购书，勉强可以靠着三千法郎维持生活。她想方设法在马萨林图书馆住下，并在里面工作。可惜奥洛尔畏寒怕冷，而图书馆里供暖不好，冷冰冰的。

赚钱成了不可推却的任务，可是怎样去赚？

用水粉去涂画盒子？给人画肖像，十五法郎一张！可有一些可怜的画匠准备五法郎一幅给人画像。而且她把看门女人的肖像画糟了，在附近一带

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写作行吗？为什么不行？“我发现我写得很快，很轻松；写很久也不累。思想原来昏睡在头脑里，信笔写来，便都苏醒了，并且都环环相扣……”她在谈话中表述自己的想法相当迟钝，在写作中却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总之，她是天生的作家，并且自己已感觉到了这点。她总是乐于记录自己的印象、感受。她的行李中带了一部长篇小说《埃美》。那是在诺昂写的。

可是，迄今为止，她的写作都只是一种消遣，如何把它变成谋生的手段？而且，又怎样进入文人的圈子？

她思考着找一位能推荐自己的人。

她当时在巴黎熟识的人中，最有势力的是杜利—杜弗莱斯纳，拉夏特尔选出的议员。

她去拜访他。

对这位漂亮的女同乡，他显得殷勤而谦恭。奥洛尔向他谈出自己的写作打算后，他打算把她介绍给德·拉法耶特先生。

“别攀求那么高。”她说，“太出名的人没有时间注意次要事情。”

于是他不得已，转而选择他议会中的一个同事，德·凯拉特利先生。他是布列塔尼的贵族，小说家。奥洛尔曾读过他的一部荒谬的小说：《最后一个勃玛诺瓦尔》。在那部小说里，一个教士强奸一个死了的女人。

“您的同事是个疯子，”她对杜利—杜弗莱斯纳说。“然而人们可能既是好的裁判，又是坏的实践者。”

白发苍苍的德·凯拉特利先生，早上八点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气派十足地接见了奥洛尔。他的年轻妻子盖着玫瑰红丝绸面羊绒被子，睡在那间房里。

“我也许直言不讳，”他对她说，“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说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确实是的，先生。”她回答道，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您把这个劝告给您自己留着吧。”

一番努力白费了。但奥洛尔并不灰心，为了在巴黎生活下去，她继续寻找机会。

后来，拉夏特尔城的女友杜维纳夫人，把她介绍给一位贝里籍的文人：亨利·德·拉杜什。

此人以难得相处而闻名。他谈吐文雅，以致人们起初以为他是装腔作势，其实那只不过是他说话的方式。戏剧、小说、新闻、学术研究，样样他都涉足，可谓通才，不过都是二流水平。他的长篇小说《弗拉戈勒塔》——说的一个女人女扮男装，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引起了小轰动。拉杜什是个出类拔萃的批评家。他培养出许多天才作家，自己却从未达到天才的水平。他辛酸地说：“我培养的作者多于我写的作品。”他是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老师。19世纪上半叶法国较有影响的文学家夏尔·诺地埃对拉杜什推崇倍至，以至于他女儿说：“幸亏上帝创造了世界，要不然就会是杜什先生创造它了。”

在当时在文学界身分卑微的杜德望夫人看来，拉杜什是一个大人物。

她到马拉盖滨河街他的套房去拜访他，见到的是一位四十五岁的男人，胖胖的，脸上容光焕发，十分机智，仪态大方。他的声音低沉，甜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既温柔又有点像嘲笑人。他的一只眼睛童年时瞎了，不过并

没有使他的面目变丑。在女人方面，他大有成就，与一个叫玛塞琳娜的女人有一段悲剧性的爱情。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拉杜什耐心地听人朗读奥洛尔带来的《埃美》的手稿。朗读完毕后，他问奥洛尔：“夫人，您有孩子吗？”

“唉！有，可我既不能把他们带在身边，又不能回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您打算待在巴黎，用您的笔来挣钱吗？”

“我必须这样。”

“这很难哪。我在这方面看不出您有成功的因素，相信我的话，尽可能回家去吧。”

她恭恭敬敬地听着，却和贝里的女人一样固执。他说那部小说不合常情，她回答：“说得有理。”当他说必须重写时，她回答：“这也可能。”

她写信告诉卡西米尔说：“只在你我之间说说，我永不能和拉杜什这样的男人融洽相处。”

她也许不久就会发现，“在把他容纳不下的才智抛到外边后”，拉杜什亮出一颗温柔、忠诚而高尚的心。

他刚刚接管了一份讽刺性的小报《费加罗报》。他向这位少妇提出，请她参加编辑的工作。他骄傲地说：“那是奋飞的雏鹰的窝。”

奥洛尔高兴地接受了。

报纸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套房里壁炉边编写。每人都有一张小桌子。奥洛尔在壁炉边上占据一隅，小心翼翼，生怕弄脏社长漂亮的白底子地毯。

拉杜什好指点人，好责备人，好发指示。他把题材发给雏鹰们，同时他按实际需要，裁切出一张张或大或小的纸，分给他们。按要求，必须在上边写出一篇文章，或者一则“社会新闻”。这是学写短小精悍的文章的极好办法，可恰恰又是新手自觉无能为力的东西。

拉杜什把爱情的逸闻趣事交给乔治·桑写，可是枉然：“在规定死的这么一块地方，我既不会开头，也不知结尾。刚开始动手写，结束的时候又到了……真的受折磨……”

然而大伙儿还是谈笑风生。拉杜什虽然文字极为刻薄，却表现出父亲般的仁厚，令人敬爱。奥洛尔听人说话，消磨许多的时间，没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到了月底，他发给她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做为薪金。

然而，1831年3月5日，她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功。那天，为了嘲笑政府的谨慎，她写了如下的社会新闻。

警察局长将发布一个新的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召集所有能持武器者，每天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一点，保卫王宫；每天晚上七点至次日早上七点，保卫寺院教堂和其它公共建筑物。在此期间，女人、孩子和老人在自家门口站岗放哨。未履行此条的家庭将失去要求武装力量保护的权利，将有被骚乱者侵犯蹂躏的危险。

第二，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宁不再遭到扰乱，每天早上，日出之间，在公共场所鸣炮二十五响。夜里不论任何时候，每座教堂都将敲警钟，每条街都将敲集合鼓。国民白卫军的巡逻队将跑遍城里的每一条街；一边叫喊：“你们要小心！”正如城堡里的习惯一样。

第三，鼓励每个产业主在房屋周围挖掘一道七尺半宽的壕沟，加固车辆进出的大门，给窗户装上栏栅，并至少在家里存放二十支枪，以便在需要时武装房客和仆人。

依靠这些措施，政府保证居民们有完全而持久的安宁。他保证每月挫败的阴谋不超过十二起，每星期忍受的骚乱不超过三回。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将用于通知集会，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则用于解散集会……

咖啡馆里爱打趣的人欢迎这则新闻，可是国王却老大不悦。《费加罗报》被查封了。

生活刚刚稳定，渐有生气的奥洛尔又一次陷入了初来巴黎时的困境之中。有一阵子，奥洛尔倒希望法院追查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把她逮捕。

奥洛尔在《费加罗报》写小文章的那段日子里，于勒·桑多也一样步入了文坛。奥洛尔起初犹豫不决，不敢把他推荐给拉杜什。因为她知道珍惜他的支持。当她本人获得了“公民权”以后，她才敢于亮出于勒的一篇文章。拉杜什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于是，桑多也坐到编辑室里来了，占有一张铺有漂亮台毯的小桌子。后来，他带给《巴黎评论》一篇文章。这是两个情人一起写的，由于勒署名。《巴黎评论》的主编维隆博士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奥洛尔深为于勒感到高兴。这向人们证实他能够成功。她决心让他参与自己的工作，或者她参与他的工作。不过，他坚持要让这种“文学上的合作”秘不外宣，以他的名义来写作。这不成问题。

因此，在开初的时候，两人署名为 J·桑多。两个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奥洛尔写信给朋友和知己爱弥尔·勒尼奥说：

对我来说，必须有颗火热的心，像我所知道的那样爱我，来安慰我，驱走使我青春痛苦的种种不快。而且，尽管日渐年老，我也发现我的心与这颗心一样年轻。我发现了这种终生的爱慕，什么也不能使它消沉；它与日俱增。于勒重新把我与我已厌倦的生活联系起来。从前，我仅仅是由于孩子、出于职责才忍受它。我从前厌恶的前途，他使它变得更美。现在这种前途满载着他的身影和成就，满载着他诚实而谦恭的品行，在我眼前出现……啊！您要知道我多么爱他，那该多好！……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忍受了忧愁。

那么多次不由自主的发作，可人们还为此指责他……啊！至少您，您从不让他为此脸红……必须理解他内心火热的友情和无限的忠诚，而不计较他有时表面显出的冷漠……

由于于勒·桑多总给人一副冷冰冰的印象，而他又有些慕虚荣，还流露出野心勃勃的姿态，在巴黎的贝里人都不太喜欢他。每到这时，奥洛尔便出来为他辩护。两个人在一起，奥洛尔与其说是情妇，不如说更像母亲。她安慰他，照顾他。他的身体孱弱，常常不思饮食，她便一定让他吃东西。他工作不勤奋，她便强迫他坐到桌旁，好像是强迫一个儿子似的。她喜欢行使这种温柔甜蜜的专制权。对于她，劳动并非一种束缚，而是一种自然的功能。

他们在巴黎的同居生活如鱼得水。两人一起写作，一起出去欣赏巴黎的景色。然而，自然地他们招来了别人的非议。

她哥哥就这事从诺昂给她写来一些威胁的信：“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生养了你的儿子。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更爱你。你要小心点，别挫伤了他的感情。”

但于勒和奥洛尔自以为有把握建立一个自由的家庭。两个情人意趣相同，感触一样。

这间简朴的斗室，里面没有地毯，也没有挂毯，可是鲜花使房间里春意永在。

第三节 乔治·桑问世

“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候，没有遇见今日的于勒？”

她不仅在拉夏特尔与情人相会，甚至在诺昂自己的房间里与他纵情享乐，行鱼水之欢。

《印第安娜》的出版，作者署名为乔治·桑。

她反对情夫干涉自己的自由，就和先前反对丈夫干涉自己的自由一样。

1831年4月，奥洛尔遵守与卡西米尔订下的协约，与于勒·桑多吻别，回到了诺昂。

她回家后受到的接待十分平常，就好像她从最普通的旅行中归来一样。她的女儿如花似月般漂亮。儿子拼命吻她，差点叫她透不过气来。她丈夫大声叫嚷，吃饭津津有味。重见她贝里的孩子，她非常高兴，不过她的心留在塞纳街的那套房子里了。

诺昂的一切如她记忆中的一样，白天，田野的风光如画，晚上，一阵一阵的丁香、铃兰花香袭进她的房间。可是，她老是发觉自己在想念着巴黎，想念它那雾气朦胧的黄昏，想念它那屋顶上的红云，想念簇拥着老亨利铜像的翠绿的柳树，还想念那些深灰色的可怜鸽子，它们在新桥古旧的怪面饰上营巢做窝。巴黎，那里有恋爱的自由、感觉的自由，有她所钟爱的于勒，有朝向滨河街的那间小房。在那里，于勒穿着肮脏不堪、破破烂烂的礼服，领带系在背后，邋遢的衬衣摊在三张椅子上；在激烈的争辩中，他跺脚，折断了小火钳……

她写信委托勒尼奥照料桑多，并禁止他照自己的习惯，不吃不喝，让自己饿死。

她急于赶回巴黎。

有生活的必需品，与情人厮守在一起，这就是奥洛尔的全部要求。别的她都顾不上了。在她的意识中，这就是幸福两块排骨，一点干酪；一间屋顶小室，可以眺望圣母院和塞纳河；一份工作，以支付房租和粗茶淡饭。让她牺牲自己的爱情去迎合公众不可靠的偏好，除非她变成了疯子。她觉得以于勒·桑多的才能，完全可以挣钱养活他俩。

巴尔扎克和他们一样，也是被拉杜什保护的人。他和两位年轻情人有来往，他们使他感到亲切友好。于是他不时地以他快活的、热闹的激情，给他们的屋顶小室带来生气。

由于她即将回巴黎，便希望勒尼奥帮忙找一处住所，因为伊包利特要求她把他的套房还给他。

“于勒无能力做这事，而您就不同了，”她在给勒尼奥写的信中说。

勒尼奥起初提供了圣路易岛一间六楼的房子。

奥洛尔觉得六楼高了一点，圣路易岛又远了一点，而且一间房。未免不够。她考虑到母亲、姨妈、姐姐和哥哥肯定要来打扰她。如果只有一间房，

那于勒·桑多就有被困住不能脱身和当场被逮住的危险。她希望有个出口，好让于勒在任何时候都可走脱。因为丈夫可能突然降临，由于到了巴黎没有住处，他便来她那里。

“要是我听见他拉门铃，并感觉到他静静地站在门外边，我会慌成什么样儿。您想想看！不等我开门，他可能就会破门而入，不过这也许是完美的戏剧性情节……”她的担心是实际的。

由此可见，杜德望先生的通融是有限度的。此外通融的程度也难以确定。于是爱弥尔又提出一套三间房子的寓所，在圣米歇尔滨河街二十五号。

奥洛尔同意去圣米歇尔滨河街的房子住。她喜欢那个位置。她计划将那所房子整理一番，腾出一屋来做她和于勒桑多的欢乐窝，而看上去那里只有两个房间。这样，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被捉奸在床。

她要求一份寓所的平面图，并附带所有的尺寸，以便能从诺昂带些家具去。因为即便在诺昂，她也只想到她和于勒一起的生活。她去小树林里遐想，从前，在这里，她那么经常地与他相会。偶尔她思量，于勒·桑多“以他二十岁的年华，白里透红的脸蛋”，何以会爱上她这一个年老色衰、体弱多病的于瘳女人呢？

事实上，她是个风姿绰约的少妇。不过由于她比情人年龄大，而有了一些多虑。

我正在对过去生气。我问我的命运：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候，没有遇见今日的于勒？而我现在年老体衰，红颜消逝，精疲力竭，却又在这感情热烈的年轻人身边……

每个情妇都惋惜未能将自己的童贞献给情夫。不过奥洛尔很清楚，她仍取悦于年轻的男子。她生性难以满足，喜欢感觉到勒尼奥与弗勒里两人都爱她。她梦想建立一个四人共同生活的团体：“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谊，这一切相互依存，如此紧密，以致靠拢一个，并不就疏远另一个。我们四人之间，难道有什么思想是不一致的？”

其实，她并未“衰老”。她只有二十六岁，而且，除了有些不适，她的身体健康得很。不过由于她的年龄比情人大，而产生了一丝多虑。

卡西米尔在诺昂为所欲为。找情妇或不找情妇，全凭他的口味；喝葡萄酒还是喝清水，全看他是否口渴；是攒钱还是挥霍，全由他的兴趣；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奥洛尔认为丈夫享有的这种极大自由是互惠的，这样才公正。要不然，对她来说，他就是变得可鄙、可恨。而这正是他所不希望的。因此，她也完全会独立自主：去拉夏特尔还是上罗马，是半夜归家还是六点归家，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事。

因此，当她决定7月份回巴黎定居时，并未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她的母亲、姨妈和哥哥都指责她。她则反驳，让他们住口。

劝说妹妹无效，伊包利特便反过来安慰妹夫卡西米尔：“你妻子希望得到她的自由。

她希望无拘无束地自由活动。对于她，你不是个坏丈夫。在这里与在家乡的人们正确地评价你。让她这样做吧。如果她因此倒霉，那她别来怪你，也别来怪我以及她的亲戚。

既然她一意孤行，你又有办法呢？你可以干的，就是打定主意，不要烦恼，保持沉默，管理家产，照料孩子……”

重新回到巴黎后，奥洛尔住进了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那是广场弯角上一座大房子的屋顶室，三间房朝向阳台，看得见天空、流水。空气流通，燕子飞翔。远处矗立着圣母院。

为了购买一些家具，她不得不向拉杜什和杜利—杜弗莱斯纳各借五百法郎。而怎样偿还这笔巨款，却让奥洛尔犯难。

于是，她不得不给丈夫写信求援：

我确实十分朴素地生活，没有半点奢华。我的家具是胡桃木和甜樱桃木的。我的住室在六楼，我必须继续这样过下去。如果你让我掌握我每月的生活费外，另外给我几千法郎，那就让我方便了。我觉得，你通过向拉夏特尔的人借，可以弄到钱。对我来说，此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买了些住家必需的东西，没打算哥哥和丈夫会让我除了向陌生人伸手借钱还急债。我本应更好地了解我该指望的东西！我给我的地毯商签了一份票据，二百五十法郎，八月十五日付清。我母亲借给我二百法郎。现在必须生活下去。我还需要一些物品，一顶帽子，几双鞋子。另外，还得给一个木匠三百法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尽可能节省，除了乞讨与还债以外，我别无他路可走。我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尸体认领处。它就在我的窗户对面。每天，我都看到一些人，就因为缺少二十法郎而寻死。我总不能喝西北风过日子吧。我等待你的答复，以便向一些外人交涉。祝你吃得香。

八月初，她哥哥伊包利特来看望她。她对他大诉其苦，并指责娘家人对她怎么、冷漠。

伊包利特不愿独自承担责任，他给卡西米尔写信：

我看望了好几次奥洛尔。她对我表现得大不公道了。她尽可能让亲人们远离她，然后指责我对她自私，冷漠。她对我说，她有三天饥饿难当。我妻子和我邀请她二十次，可她连一次也没接受。怎么办？我不知道。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贫困，可对此又惊愕。

她原以为能在文学上挣钱。在这方面，看来她已幡然醒悟。她最近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如果我与你串通一气，让她既远离孩子，又处于经常不断的拮据之中，她就要投水！她叫我将此事告诉你，以免出现她死亡，令你自责的事情。我自己提前给她五百法郎，可以支持到十月。她开了一张凭证。我相信你将偿还，因为说到底，尽管她的行为荒谬，但不能让她处于困境，陷于忧伤的想法之中，从而可能走入绝境，使我们永远也不能良心轻松。我告诉她，你大概不会拒绝支付她的家具款，并会继续供给她生活费。我对她说，如果她不让第三者涉足于她和你的协商，而是对你表现出友好和信任，那么她从丈夫那儿得到的，就会比该得到的更多。这些话说得她哭了，我也落了泪。因为尽管她头脑古怪，我们终究还是不能阻止自己爱她。她答应我九月份回诺昂。

奥洛尔确实回了诺昂，不过于勒同时也在拉夏特尔住下。而且两个情人的生活，几乎和在巴黎毫无二致。

他们在一起写长篇小说《玫瑰红与雪白》。有个名叫雷诺的出版商同他们签订了合同，答应每卷交稿后，支付一百二十五法郎，三个月后再付五百法郎。

对桑多的爱情，奥洛尔·杜德望一点也不掩藏。每当人们把她视为要求“人家尊重其秘密”、并“爱护其名誉”的女人，她就大为气恼。

她不仅在拉夏特尔与情人相会，甚至在诺昂自己的房间里与他纵情享

乐，行鱼水之欢。当然，这时候有忠厚的古斯塔夫·帕佩替他们放哨。

古斯塔夫没有抱怨；他忠心耿耿地参与这对情人疯狂的行动。于勒在她房间的时候，古斯塔夫便在她的帐篷里过夜。

于勒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她的房间的，冒着卡西米尔、她哥哥、孩子和保姆等人都有可能发现他的危险。奥洛尔什么都算计好了，都预料到了。他来到她的房间之后，便被她搂在怀里，愉快地捶打，亲吻。他们又是叫，又是哭，又是笑。两人狂欢极乐，在一起做爱。

于勒的身体从不曾强健过，狂欢纵欲的生活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他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拉夏特尔的人都把他视为肺病患者。奥洛尔也清楚，他的身体确实变得很糟。这是一对矛盾：看到他她是那么高兴，拥抱她是那么快乐，可是这消耗精力的爱情在慢慢地杀死他；她知道这幸福的快乐在燃烧他的血，耗费他的生命！

在诺昂，写作与纵情齐头并进。五卷《玫瑰红与雪白》完成了。这是一个女伶和一个修女的故事，但拉杜什从里面看到的，只是对浪漫派和感伤派作家的模仿。书中不过也有引人入胜的方面：比利牛斯山的风光，粗犷的人物，有韵味的语言，最优美的部分出自奥洛尔的手笔。她把修道院的回忆、母亲的隐情话，旅行的印象都写了进去。桑多则增添了相当粗俗的放荡语言。

该书出版后，激起了奥洛尔的母亲索菲的反感。做为生活的讽刺，许多作风放荡的女人，也爱读贞洁的小说。

奥洛尔开始写另一部书，不过这一回是一个人写。桑多去了巴黎，她没有马上跟随他去。一段时间以来，她觉得丈夫“非常好”。况且还有莫里斯，越来越可爱。她正在教他历史。

然而，到了十一月，勒尼奥写来信说于勒病倒了。于是她急忙赶去。拉夏特尔的人说他有肺病并没错。他经常发烧。她心中内疚不已：难道这是过度耽于肉体享乐的结果？

在写给勒尼奥的信中，奥洛尔做了一番反省：

我是多么不安和内疚。那是因为看到别人或许可以救活的人在我怀里死去，感到他日渐消瘦、衰竭、虚弱，意识到这是叫他死，因为抚爱是毒药，爱情是火，只消耗精力而不能使生命复苏，吞噬并且烧毁人，只留下一堆灰烬。想起来是多么可怕……我给他的只是损害。三个月里，我让他在我的怀抱里遭受着痛苦的折磨。我有一百次看见他几乎昏厥，我还继续坚持。最后，我终于让步，害怕把他弄死。为了治好他，我牺牲了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总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吧！可是，今天，我因我的忠诚比我的坚持给他造成更大的损害而颤抖，是我毁了他。我给他的肉体快乐是用他的寿命换来的……

十二月，《玫瑰红与雪白》出版了。公众和批评界的反映不错，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十分畅销。卡西米尔来到巴黎。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里，那几天他们过得相当愉快。

奥洛尔已习惯过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所以卡西米尔在这里的几天对她来说，简直是大吃大喝、奢侈享受。

卡西米尔离去不久，她也回到诺昂。老家需要她去料理。而且家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伊包利特夫人的侍女怀了孕，莫里斯的家庭教师布古瓦朗被人指控。但奥洛尔并不把事情看得严重。

她只想安静地写作，而诺昂乡间的夜晚无比宁谧。

1832年春天，当她重新在圣米歇尔滨河街出现时，带来了她的女儿索

朗芝和一部长篇小说：《印第安娜》。

索朗芝的到来叫母亲年轻的贝里籍伙伴大吃一惊。让一个三岁半的小孩与姘居的男女一起生活，这合适吗？

奥洛尔并不担心有女儿在身边生活有什么不便。索朗芝只有三岁半，她既不会有所注意，也不会发议论，更不会提问题，多嘴多舌。

于勒爱上了“他的女儿”，带她上飘溢着刺槐清香的植物园，指给她看长颈鹿。他还牵着她的手，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阳台上浇花。一次，索朗芝折断了几枝花茎，怕挨母亲骂，便试图用封信用的小面团将它们粘接好。

桑多钦佩地读了情妇的《印第安娜》手稿，既觉得惊讶，又有一定的难堪。在他看来，这部小说写得太好了。

但是，在作者署名上出现了问题。对于一部他未付出劳动的作品，于勒·桑多拒绝署名。于是，她应该用个什么笔名呢？由于《玫瑰红与雪白》，他们共用的笔名J·桑已经小有名气。署“杜德望”是不可能的，婆婆和丈夫都反对；要是署上“杜邦”，母亲本人大概也会感到不便。

最后，他们决定用乔治·桑这个名字。她保留姓氏“桑”，改换名字。由此诞生了乔治·桑，因为她一心想要人家把她看成男人。她念念不忘妇女受支配的状况，希望通过姓名和衣着来摆脱。

五月底，出版商刚把印刷出来的第一册样书寄到圣米歇尔滨河街，拉杜什来到了屋顶小室。

他拿起长篇小说，嗅着，既好奇又不安，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他翻着书页：“这是部模仿之作；学了巴尔扎克的！你要我说什么？我说模仿之作。你要我说什么？我说学了巴尔扎克的。”奥洛尔在阳台上。他拿了书，走过去，一清二楚地向她指出，她仿效了巴尔扎克的手法。她明白自己不应该遭受这种指责，但她没有为自己辩护。

拉杜什带走了她签名送给他的这册书。

次日，一醒来，她就收到了这张便函：

乔治，我来当众认罪，我跪倒在您膝下。忘记我昨晚说的无情话；忘记六个月来我对您说的无情话。我昨夜未睡，拜读大作。啊，我的孩子，我真对您满意！

快乐！奥洛尔快乐极了！由于是来自这位严肃的、好挖苦人的评论家，这种激动的钦佩便叫人极度兴奋。

很快各家报刊都做出反应。

巴尔扎克在《漫画》上撰文，写道：“此书是真实对幻想的反抗，是现代对世纪的反抗，是内心的悲剧对历史上体裁的束缚的反抗……我未见过笔法更简朴，构思更精妙的作品。事件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纠合一起，宛如在生活中。生活中，万物互相触碰，偶然常常聚集着连莎士比亚都写不了的悲剧，总之，此书的成功是确实的……”

为作家们所惧怕的、瞧不起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古斯塔夫·普朗什在《两世界评论》上，把乔治·桑捧上了天。他认为她在法国著名女作家德·斯达埃尔夫人之上。他赞扬她心灵的说服力和表述的简朴：“无疑，《印第安娜》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变得更为灵巧。”

奥洛尔向古斯塔夫·普朗什表示感谢。他则代表《两世界评论》的新主编布洛兹来看望她，并提议她与杂志合作。

乔治·桑喜欢这个独立、骄傲、贫穷的怪人。他们结下了友谊，于是

她与布洛兹达成了交易。她保证每星期交给《两世界评论》三十二页稿子，布洛兹则每年给她四千法郎，由于同一时期，《印第安娜》的出版商为另一部长篇，即她向他们谈过的《瓦朗蒂娜》预支给她一千五百法郎，所以她突然发现自己名声大振，发财变富了。

《印第安娜》写的是什么呢？乔治·桑本人在序言里谈到了这点：

如果您硬要希望在这部书里解释一切，那么，印第安娜就是一种典型：这是柔弱的妇女，她的职责是代表被压抑的——或者，如果您更愿意这么说——被法律剥夺的激情；这是与贫困搏斗的意志；这是用额头盲目地撞击一切文明阻碍的爱情……

用这种方式，小说把作者强烈的情感表达出来了。有些性格特征是女主人公和女作者所共有的：“由于人家把爱丈夫定作她的义务，由于默默地抵抗所有的道德约束成了她的第二天性，成了她作人行事的准则，成了她良心的法则，所以，她不爱丈夫……”印第安娜对情人雷蒙·德·拉米埃，对丈夫戴尔马上校都感到失望。她丈夫是个莽夫粗汉，俗里俗气，却没有邪心恶意。主题是妻子与丈夫的不合。妻子寻求一种纯粹的感情，而丈夫却总是喜好虚荣，贪图肉欲，缺乏爱情。最后，一位高贵的、沉着的英国表亲拉尔夫·布朗爵士，人为地拯救了印第安娜。爵士把她带回她童年时期田园诗般的河谷。

第二部长篇小说《瓦朗蒂娜》的女主人公瓦朗蒂娜，也是一个婚姻不理想的女人。

做为一个贵族小姐，她嫁给了本阶层的一个平庸人物。佃户的儿子贝内蒂克对她的爱慕使她不安。这本书是成功的。一方面是因为回到人民中间，一如回到往昔，引来的生活环境令人愉快的改变是美好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奥洛尔在其中描写了她的贝里地区的一隅，诗情画意缓缓渗入心灵与文笔之中。二十四年以来，她生活在这些小溪边，在修剪过的树木中间，在绿树成荫的“围栅”里；她对此一一作了描述。

若干年来，在法国，圣西门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大受欢迎，此时因为信徒们在婚姻问题上存在分歧而遭到损害。昂方丹神甫是这个教派的大教士，他教导说：只要妇女继续服从忠贞不渝的法则，其解放便是不可能的；基督教对于肉体的爱恋的处罚大概撤销了。

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读了《印第安娜》和《瓦朗蒂娜》以后，都转向了乔治·桑。这个大胆的、突然成名的少妇，打开了婚姻的缺口。对于新的教派，她会是众所期待的女首领吗？圣西门主义者希望如此，并企图吸收她入会。但她并没有任人摆布。

她有农妇的谨慎，女人的明智。然而这种传闻还是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不再去报社，可是为数众多的来访客一直到她家里来找她。晚间，她把自己和笔、墨、钢琴、火一起关在房里。她异常勤奋，喜欢这些温暖的写作的夜晚。一些较长的中篇小说在她笔下诞生：《梅泰拉》、《侯爵夫人》，桑多虽有点不好意思，却是这种多产的见证人。她鼓励他仿效自己，却是徒劳无功。

“你希望我写，”他写信给她道，“我也希望如此，可我无能为力！我不像你，天生脑子里就有盘小的钢发条，只须按下按钮，就可使意愿运转……”

情妇不可改变的职业使他暗自担心，怕失去她。

她反对情夫干涉自己的自由，就和先前反对丈夫干涉自己的自由一样。“我觉得哪里好，就去哪里，”她相当生硬地对他说，“无须向任何人报告。”

拉杜什由于总是闷闷不乐，心怀嫉妒，慢慢染上了被迫害狂想症，于1832年离开巴黎，去夏多勃里昂地区一个叫欧内的村镇居住。

临走前，他将马拉盖滨河街的寓室赠送给乔治·桑。他曾在此接待她的初次访问。

现在，白色的大地毯和侵入窗户的刺槐都属于她了。

1932年夏天，她常去欧内看望拉杜什。坐公共马车，然后走小路，便到了愤世嫉俗的诗人僻静的乡间住所。这些探访亲切、愉快，宾主交谈直到深夜。乔治·桑去鸡舍摸鸡蛋，去果园摘果子，并且准备晚餐。

“有人说他爱上了我，他大生醋意，却不承认……”奥洛尔说。

巴尔扎克相信他们有关系。不过拉杜什回忆的是友情，充满爱恋、遗憾与幻梦破灭。

第四节 漂亮的女友

杜德望夫人尽管有点放荡，却仍属拉夏特尔的守旧派。天才的玛丽给她显示了一个享乐的世界。

既然情夫不是盼望之中的神，那么便成了她必须推倒的偶像。在这对情人中，他是被牺牲的一方。

乔治·桑失去了第一个顾问拉杜什，圣·勃夫又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她的知己。

梅里美勇敢地对地进行征服达四十八小时。

一天，马拉盖滨河街的寓所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然而大受欢迎的女客，她就是玛丽·多尔瓦尔。

玛丽·多尔瓦尔是一位演员，是大仲马和维尼的剧本的表演者。乔治·桑热烈地敬慕她，曾写信要求她接见。

那天早上，乔治·桑和桑多聊天的当儿，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气喘吁吁地叫道：“我，我来啦！”

乔治·桑从未在舞台以外见过多尔瓦尔，但是马上认出她来了。

多尔瓦尔小巧玲珑，棕色头发，体质柔弱，额发髻曲，两只眼睛水灵灵的，嘴唇微微颤抖，脸上富有诗意，很是迷人。她身材瘦削，腰肢柔若无骨，似乎总被某种神秘的、仅她一人感觉到的微风吹拂摆荡。这天，于勒·桑多拿她与装饰她帽子的折断的羽毛相比：

“我可以肯定，”他说，“人们将在整个宇宙寻找和她找到的这根一样轻飘、柔软的羽毛。这根唯一的、神奇的羽毛，是某位遨游的仙女的羽翼摇落在她身上的……”

在乔治·桑的生活中，多尔瓦尔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某些书信中透出狂热，某些表象看似痴恋，在与男人的爱情中，乔治·桑从未体验过这种纯粹的激情，这种愉快的狂热，这种她寻求的最终轻松。羸弱的桑多缺乏人类的热情。乔治·桑竭尽所能使自己相信是一往情深地爱他。她和他一起疯狂地追求肉体的快乐，却从未达到目的。玛丽·多尔瓦尔正是乔治·桑所

希冀的榜样。

做为两个流浪戏子的私生女儿，多尔瓦尔是在强烈而卑劣的感情中长大成人的。当她脾气发作的时候，有时便操起了泼妇的腔调。在舞台下，她什么都见过，什么都说过，什么都做过。在舞台上，这个美丽的女人则变得生气勃勃，激情洋溢。

她原来嫁给演员阿朗·多尔瓦尔，二十二岁时死了丈夫，膝下有三个女儿。她 1829 年改嫁，第二任丈夫让—图森·麦尔勒是圣马丁门剧场的经理，也是一个殷勤的丈夫。

1831 年，阿尔弗雷德·维尼子爵显得特别多情。这是奇怪的一对情人：维尼子爵是荣获马尔他勋章的骑士，性情高傲，好做沉思；玛丽·多尔瓦尔则不拘礼节，对人热情，不过，在她那严肃的面具下掩盖着淫荡。维尼做为情人，以为使一个堕落的天使重新飞升。在世上，还有什么比一个在化妆室里“检验其灵魂”的女演员更令人爱慕？两人互相吐露神秘的想法，互相给予无法满足的亲热。多尔瓦尔曾笑着对大仲马说：“我变得聪明了。我又使自己恢复了名誉……到底什么时候子爵先生的父母来向我求婚呢？”在这种关系之初，维尼毫无憾意；甚至也不内疚，他说：“在情火中，生活是双重的。”

多尔瓦尔马上邀请桑多与乔治·桑两人去她家，与她丈夫和维尼共进晚餐。

乔治·桑穿一条紧身裤和一双带流苏的靴子来了。

维尼大为不快：“这女人看上去有二十五岁，面貌像美术馆里的女英雄，头发乌青，鬈曲，并按拉斐尔笔下的天使的式样，一直披到颈项。眼睛大而黑，形状恰似典型的意大利女人优美神秘的眼睛。严肃的脸上毫无表情。面部下方不大好看；嘴生得不好。举止不雅，言谈粗鲁。表达方式像男人，言语放肆……”

乔治·桑对他的评论要公道一些：“我一点也不喜欢德·维尼先生这个人，但我向您担保，要是光论心灵，我就不会这么说，”

很快，乔治·桑与玛丽·多尔瓦尔两个女人的亲密关系便发展了。

杜德望夫人尽管有点放荡，却仍属拉夏特尔的守旧派。天才的玛丽给她显示了一个享乐的世界。

维尼惴惴不安，感觉到了一种危险：“我尚未猜测出这个女人的生活。她不时地去乡下探望丈夫，却又和情夫住在巴黎……她和拉杜什有某种情谊……”

对于作家们来说，巴黎总是个很小的城市。一如从前在拉夏特尔，善良的人们现在说奥洛尔有三个情夫：桑多、拉杜什和普朗什。

桑多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于是醋意大发。他清清楚楚，情妇固有的冷漠，他并没有战胜。即使他有时上别处寻找些庸俗的、短暂的安慰，他也非常害怕她如法炮制，他不能离开她。

1832 年夏天。诺昂。

奥洛尔·杜德望刚刚过了几个月的独立生活，回到童年的房子时就已经是个名人了。

现实的结果，已经超出了她的最为雄心勃勃的梦想。然而她觉得生活吉涩、空虚。她探索如此热爱的道路，却毫无结果。

“一切都变得丑陋不堪。充满了朝气，青葱翠绿和诗情画意，给河流、

沟壑和美丽的草场带来盎然生机的日子哪里去了？……”

唯有那泓小泉水保持着美妙的薄荷和芳草的香味：

“它在那，宛若在雷雨之灾和时间异常之中，一颗保持着纯洁的灵魂……”

奥洛尔寻找桑多在上面刻下他们名字的树，但卡西米尔已把它修剪了。

“那时我多么愉快！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可眼下这村子是多么空寂、阴忧、失去了魅力！一切都成过去……幸福隐然消失，地点面目全非，心灵已经衰老。”

痛苦的事实是：对一个既不能给她以肉体享乐，又不能给她以仰慕的幸福的情夫，她觉得厌倦了。

“与他分开，她体验到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又使她惊愕。”

这一年，桑多没到拉夏特尔来。其父已到别处任职。

奥洛尔没有召他来。她给另外一些男人写信，语气如此温柔，不知究竟是倾诉爱情还是表示友谊：“我亲爱的朋友……很快我会在您的怀抱里，亲爱的……我衷心地吻您……”

这是杜德望夫人的风格，大概没有表明任何意思，可是于勒忐忑不安，力求使自己放心。

对这种爱情，奥洛尔失去了信心。而且，哪个男子又可能不让她失望？

她期望理想的情夫是个主宰，是个神。可是，偏偏选择的情夫却是个弱者，是个凡夫俗子，因为她想支配他。她既是个男子汉，需要自由自在；她又是女人，需要她的“窝”，她的孩子。

她希望离开诺昂，独立无羁地生活，可一旦放弃家，放弃家务活动，她又发现强烈的爱情由于缩小到她仅有的热情，便不能长久地满足她自己的需要。

桑多是个毫无经验的青年，因为爱得大强烈，也就爱得不高明。他不知道，“自负的女人鄙视那相当谨慎而为之牺牲自尊的情夫”。

然而，奥洛尔并不希望断绝这种关系。获得如此大的荣誉之后，她把幸福变成了一个自爱的问题。不过她并非不明白自己的恋情。当他决定返回巴黎时，她写信给古斯塔夫·帕佩，说：“我走了，血液带着激动，心灵却怀着失望。不过您别介入此事……我将看望于勒。如果我们互不理解，那谁也不能医好我们……”

1832年10月，她和桑多恢复了同居生活。两人互换戒指，重修旧好。不过，美景不长，无聊潜入了两人的内心。

于勒游手好闲，这激怒了勤奋的情妇。

“这种艺术家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从前相当吸引她；这种财富和贫穷的交换，起初她觉得那样有诗意，现在她只觉得是一种相当没趣的怪僻行为，或至少，是一种幼雅的举动。”

几个最要好的朋友指责乔治·桑。他们原来喜欢这一对情人，因为在他们眼里，这对情人是浪漫主义爱情的化身。可现在女主人公表现脆弱，他们因此颇有怨词。

公众的议论坚持说拉杜什、普朗什是她的情夫。乔治·桑自己不承认。不过爱弥尔·勒尼奥看得仔细，责备“她的难以满足的风骚”。

在她这一方面，她也埋怨于勒。她原先借口写作，放弃共同生活，给他另租了一套小寓室。现在她指责他在那里接待一些情妇。在她的《私人日

记》里，1832年夏天，她曾写道：“别人有懒惰的习惯和温柔的谅解，且让他们有吧。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了严重的创伤，那就不可能重修旧好……”

既然情夫不是盼望之中的神，那么便成了她必须推倒的偶像。

他们之间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闷。起初，是一些不知怎样引起的争吵，最后以哭泣和亲抚结束。只要泪水加入其中，对于爱情，这些小风雨就犹如酷暑季节降给大地的一场阵雨。不过，很快就形成了一些雷雨：吵骂划过长空，像惊雷一样炸响。

在日常生活中，奥洛尔如此淡漠，而在脾气发作的时刻，她勃然大怒，性情极为凶猛。由于这是名誉攸关的问题，所以对于断绝关系，她还踌躇不决。到了1833年初，她下了决心以后，便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干脆地一刀两断，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她把于勒的房子出租，让他申请得到一张护照，在去意大利的驿车上订了一个座位，并且借钱给他旅行。

那天，奥洛尔穿着灰色的男礼服，烫了褶线的裤子，迈着坚定的步子，来给予勒·桑多送行。

事实上，桑多并没有马上走，他吞服了吗啡醋酸盐，但剂量过大，呕吐了出来。在这对情人中，他是被牺牲的一方。

在他们周围，人们都指责奥洛尔，然而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她无情地行动，以了结使她难以忍受的恋情，但这并不阻止她怜悯受害者。

断绝关系的那天，她写信打发勒尼奥去桑多那里：

去于勒那里，照顾他的身体。他的心灵受了伤。您不要再使它振作，不要尝试这样做。我什么也不需要。我甚至希望今天独自待着。

再说对于我，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努力让于勒活下去。对于他来说，长时间内，这都是可怕的，不过他毕竟还这么年轻！或许有朝一日，他不会后悔这样生活过。您不要抛弃他，我也不抛弃他。我今天和以后每天都去看望他。让他不要放弃写作，叫他不要在痛苦之外又因自甘贫困而节衣缩食。他永无权利阻止我当他的母亲。去吧，朋友，上他那儿……

关系绝断后，乔治·桑恢复了平静，重又成为她得心应手的女活动家。

她通知房主，解除于勒住房的租约，并结清了两期房租。她把于勒留在衣橱里的几件旧衣服打了一包，让人送到勒尼奥那里，因为桑多回来后，她不希望和他做任何会见，发生任何联系。他的所作所为，使她觉得内心受到的伤害太深，以致除了深情的怜悯，不能对他保持任何感情。他的自尊心——她仍希望——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她要让他明白，将来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他们再度亲密。

在圣洁的友谊与漂亮的女人之间，永远有障碍存在。对于乔治·桑来说，与桑多的绝交并不是那年唯一的伤心事。

当拉杜什这个尖刻易怒的男人、嫉妒的老师“培养一个才子时”，不容许雏鹰以自己的羽翼飞翔。他给了巴尔扎克支持，但新近又与他闹翻了。

巴尔扎克说：“拉杜什嫉妒、记恨，心地歹毒。这是个毒液库。”两人从此不再说话，并且拉杜什指责乔治·桑继续接待巴尔扎克，而巴尔扎克则对乔治·桑说：“您得小心！哪天早上，也不知为什么，您就会发现拉杜什成了死敌。”

拉杜什为了反对浪漫主义团体，写了一篇题为《文人相亲》的文章，巴尔扎克就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文人相轻》作答。这时，事情

便发展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拉杜什感情被大大刺伤：“做为一个作家，我刚遭受了一场攻击，和一些尖刻的批评……而侮辱者却实实在在是杜德望夫人的常客。”

一些好心的朋友告诉奥洛尔，拉杜什从此一谈起她就怒不可遏：“她被光荣弄得飘飘然了，牺牲真正的朋友，轻视忠告良言……”

那些好心人又把乔治·桑也许说过的话带到欧内。

“在这上面，我感谢杜德望夫人，”拉杜什说，“尽管她迫不急待罗致恶意反对我的人，并到处宣扬，以便更稳当地充当他们的首领，我也宁愿被我尽力效劳的人冒犯，而不愿什么时候忘记感谢人家。”

他托人传话，叫她不要再去欧内。于是她因为发现自己与第一位老师不和而痛苦。

至于与巴尔扎克，他们一直相处融洽。乔治·桑钦佩他，觉得他谈吐有趣，才华横溢，并喜欢叫他满怀激情地讲述他未来的作品。不过巴尔扎克喜欢桑多，因此，桑多他们绝交以后，他便很快做出了抉择：

于勒·桑多是个年轻男子。乔治·桑是位女人。我对两人都感兴趣。因为一个女人为了追随所爱的可怜青年，不惜抛离一切，我觉得这是壮举。这个女人名叫杜德望夫人，碰巧才华冠世。……我喜欢这两个情人。他们住在圣米歇尔滨河街一幢房子的顶楼，又高尚，又愉快。杜德望夫人已经有孩子。光荣到来了，把不幸扔在鸽棚门口，杜德望夫人认为，由于孩子的缘故，她得离开他。于是他们分离了。可是我认为，分离起因于乔治·桑，或杜德望夫人新爱上了同代人中最恶毒者拉杜什。此人是我从前的朋友，是最有诱惑力的男人之一，可是极为歹恶。即使我没有证据，表明杜德望夫人疏远我——因为我过去经常友好地接待她与桑多——有这点也够了。可是她写了一些讽刺短诗，挖苦从前的主人，并且，我昨天遇见了灰心失望的桑多。这就是《瓦朗蒂娜》和《印第安娜》的作者其人……

当桑多几个月后从意大利归返时，巴尔扎克大为怜悯他。小于勒心灵有伤。巴尔扎克受了感动，表示愿意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并且一直让他住到他在戏剧方面取得成功的时候为止。他说：“这艘痴情的沉船，必须先把它装备起来，然后把它领入文学的海洋……”

事实上，被抛弃的情人即使没有忘却旧情，也已经平静下来了。

两年之间，于勒·桑多的面貌奇变，生着金黄鬃发的头开始过早地谢顶。眼睛更凹，更富有表情。他经受了痛苦；他诅咒奥洛尔。然而从这种痛苦中，产生出了他微少的才华。他根据这段艳史写作了长篇小说《玛丽亚娜》。这部小说倒也不乏真情。他在里面客观地描绘了他的不可忘怀的第一个情妇：

田野的寂静、学习、悠思遐想和阅读培养了玛丽亚娜。她的才干胜过温柔，想象胜过感情，好奇心胜过真实的感受。迄今为止，她仅是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她独自一人在克勒兹河边，在山坡上，沿着青翠的篱笆，预先安排一种英雄的生活，充满了耿耿忠诚和高尚的牺牲。她隐约窥见了斗争、拼搏、受阻的爱情和动荡的幸福。还没来得及享乐，她就已经精疲力竭了……

时间的水流和生活的巧合不断地把陌生人冲到人们身边，且其中有一些留在这里。

新朋友就这样代替了被落潮带走的旧朋友。乔治·桑失去了第一个顾问拉杜什；圣·勃夫又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她的知己。

圣·勃夫，这个年轻的批评家和乔治·桑一样，1833年29岁。他已经因为观点的敏锐而使人敬服。由于担心变化无常的生活，他便尽力依附维克多·雨果的家庭，然后，由于爱上了雨果的妻子阿黛尔，他又憎恨维克多。在他的内心和日记本中，他嘲笑雨果既幼稚又巨大，其玩笑“是用白色的缆绳串缀的”，其戏剧是“独眼巨人岛上演的木偶戏”，这个“卡利榜装出莎士比亚的样子”。

圣·勃夫做为评论家，错误地为自己没成为一个创造者而惋惜，就好像重要的批评不是一种创造似的。他喜欢刺探女人的秘密。他进入她们家里，听她们忏悔，给她们忠告，然后把泄露秘密提到天才的高度。在谈话中，他把才智掩藏在平庸的话语后面。

从《印第安娜》问世起，圣·勃夫就赞扬乔治·桑这位神秘的、天才的女小说家。

她知道这点，因此，1833年，在《吕克莱修·波基亚》首演之时，曾写信向他索两张票，给自己和桑多：“您是维克多·雨果的朋友，而我们，我的假名和我本身，都是他热烈的仰慕者……如果我给人添麻烦，就请告诉我，不过您亲自来告诉我……”

他寄来了票；她则坚持要他来访：“您一定要来，什么时候想来都行；我随时都在家接待您……尤其是您不要恨我，因为我渴望着您的友谊。对您说这个或许有点荒谬，不过既然人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也就不会因为担心错误的解释而打退堂鼓……”

对于热衷于听人家秘密的圣·勃夫来说，乔治·桑确是一个好猎物；对于乔治·桑，圣·勃夫很快成为难得的文学和情感顾问。在乔治·桑与桑多绝交的风暴刮起时，圣·勃夫得意地注视着这个好现象。有好几次，他和可爱而无耻的霍尔滕丝·阿拉尔一起在马拉盖滨河街乔治·桑家吃饭。

霍尔滕丝·阿拉尔当时是作家夏多勃里昂的情妇，从她嘴里，圣·勃夫获得了有关夏多勃里昂晚年的珍贵叙述。霍尔滕丝带来一个日内瓦青年，他的名字叫夏尔·迪迪埃。

在佛罗伦萨时，他也是她的情夫。

对一个女朋友爱着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感兴趣。乔治·桑以好奇与赞许的目光盯着迪迪埃。他英俊，举止冷漠，不过有男子汉气概，非常吸引女人的目光。杜德望夫人这一天并不让他喜欢：“她既不热情，又不随和，”他写道。“她是一个怪人，我不相信她能够满怀激情。”

耽于肉欲者自有本能。尽管乔治·桑表面冷漠，日内瓦人迪迪埃却并未弄错。

乔治·桑当时在痛苦中创作，并念了长篇小说《莱莉亚》的一部分给圣·勃夫听的。

这部书虽然仅仅是肉体上无能的长篇自白，却因忏悔的直爽而具有重要价值。在那里面她通过描写爱情的失望，并分析其原因，而感到一种忧伤的慰藉。

女主人公莱莉亚是个拒绝爱情的女人。她姿容秀美，人品高尚，但是像雕像一样冷漠。年轻诗人斯泰尼奥热烈地爱着她，试图让她激动，却是枉然。

莱莉亚富于幻想的知己特朗莫尔，既是上流社会人物，又是苦役犯。他求她不要把她冰冷的气息吹到斯泰尼奥的大好年华上。

但莱莉亚没有勇气弃绝。“我乐于抚摩您，”她对斯泰尼奥说，“乐于端详您，就好像您是我的孩子……”

这就是爱情中的母性不协调的、令人不安的主题。后来，这种主题那么经常在乔治·桑的生活中引起回响。

可是莱莉亚希望的，不是像一位母亲那样去爱，而是像她亲姊妹，妓女普尔舍莉（她在小说里象征肉欲的爱情）那样去爱。她试图那样作，但大失所望。

于是，对莱莉亚来说，开始了她称为“牺牲与克己”的生活，因为她同意给予情人她不能分享的肉体快乐。

对于想了解乔治·桑的人，小说中下面的内容是极为重要的：

缺乏个人满足在我的官能上引起的强烈刺激，使我长久地爱他……我和他在一起，便有一种奇怪而狂热的欲望，任何肉体的拥抱都不能使它满足。我觉得我的胸脯被一团熄灭不了的火烧的，他的亲吻并没带来任何缓解。我以超出常人的力量将他紧搂在怀里，然后我倒在他身边，精疲力尽，灰心泄气……欲望在我身上，是一种心灵的活力，早在唤醒感官的能力之前就已经使它麻痹；占据我的头脑并仅仅在此集中的，是一种粗野的狂热。在我的意愿巨大发展的期间，我的血冰冷、无能而又可怜。……

当他心满意足，昏昏沉沉的时候，我却躺在他身边，一动不动，心情沮丧。我就这样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看着他熟睡。这男人，我觉得他那么美！……我沸腾的热血波浪般涌到脸上，接着难以忍受的颤抖传遍了我的四肢，我觉得感受到了肉体的爱情带来的心绪不宁，和肉体的欲望越来越大的骚动。我极想一下把他唤醒，抱在怀里，要求他亲抚。这种亲抚，我尚不善于受用……我抵抗着我难以满足的要求的痛苦，因为我清楚，他不能平息我的痛苦。……

有时，在困倦中，被这些打破禁欲主义思想的狂喜所俘虏，我就觉得自己和他一起被带走了……于是我在一种说不出的感官快乐的波涛里游泳；我伸出懒洋洋的手臂勾他的脖子，身子倒在他的胸部上，嘴里喃喃地说些含糊的话。但他醒来了，于是我的幸福就完蛋了。我又发现了人，粗鲁的、贪婪的，像猛兽一样的人，于是我惊恐而逃。但他紧追不舍，声称他的睡眠并不是白被打扰的，他将在一个昏厥的、半死不活的女人胸脯上，领略他粗野的快乐……

我的官能远未减弱，反而恢复了。春天的芬芳和光彩、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令人兴奋的影响……又把我投进新的惶乱之中。我感到焦虑不安和模糊无力的欲望在刺激我，我觉得我还能爱，今后还能对此有所领会。第二个青春比第一个青春更旺盛，更激昂，让我的胸脯频频颤动。在这些欲望和担心交替出现之中，我随着力量的恢复，又把力量消耗……我梦见一个陌生的魔鬼拥抱我；我感到他的热烘烘的气息灼烧着我的胸部，我把指甲掐进我的肩膀，却以为是他的牙齿咬我，留下齿印。我以永被罚入地狱为代价，要求快乐……曙光出现时，我已疲乏不堪，脸色比晨曦还苍白……我发出痛苦和愤怒的喊叫，试图以此来解除痛苦……

由于莱莉亚的想象使她的希望升得过高，所以落下来也就更头晕目眩。她因为这场跌落耗尽了力气，所以不再爱她的第一个情夫。不过，分享这种她未感受过的、但被别的女人如此轻易地获取的幸福——肉体的爱情，成了她唯一的念头，她的行为的唯一准则，她的意愿唯一的目的：

在让我的欲望朝影子飘去后，我有时在梦中跟在它们后面跑，在它们飞的时候抓住它们，蛮横地向它们要求幸福，至少也要求几天的感情激动。由于这种看不见的放荡不可能使人不快……我便毫无内疚地沉溺其中。在想象中，我不仅对正在爱的男人不忠，而且每天都背弃头一天所爱的人……

莱莉亚跟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因为没有有一个男人给她快乐。

小说显示出，在作者的头脑里，已经产生了照亮思想的光辉。年近三十岁的乔治·桑分析自己时已有自知之明。

圣·勃夫读完这部小说，次日就写信给她：

夫人，我急于想告诉您，昨天晚上我读了您的书，先前我也听过您朗读它，引起我许多思考。《莱莉亚》使我继续进一步对您表示由衷的钦佩，巩固和发展了你对我的友谊。……普通的读者，在借阅处随便借一本小说看，会讨厌这部书。不过，在那些认为长篇小说只不过是永恒的人道思想较生动的形式的人们中，您会名列前茅。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女人（而且根本看不出有这么大），就具有广博的学识——而且是轻松自如地获得学识，并不加声张——而我们要得到这种学识，真要穷年皓首才行。这就是我首先钦佩您的地方……夫人，您是个罕见的能人……

她第二天就回了信，心里不安，因为她想象着在一个敏慧的读者眼里，她大概会变成畸形而衰老的人物。这个读者把她与莱莉亚视为同一。她在信中说：

听了您朗诵《莱莉亚》以后，您对我说了一件事，让我难受：您说您怕我。驱走这个念头吧，我请求您，并且请您不要把人痛苦混为一谈。您听到的是痛苦……请替我向上帝求情吧，您这个永远信教、经常祈祷的人……并且不要过于相信我的魔鬼般的样子。我向您保证，这只是我给自己装的样子……您差不多是个真正的天使。因此，伸手拉我吧，别把我丢给撒旦……

这证明了两点：其一，她对圣·勃夫了解不深；其二，男人比女人更善于装出有道德的样子。

任何一个女人，由于对情事的爱好，都是不被了解的撮合者；而圣·勃夫身上女人的一面使他倾向于做这些好事。

乔治·桑独自一人生活在巴黎，且无羁无束，不能长久没有男人在身边。可是要找到一个信服的情人绝非易事。

圣·勃夫起了一个怪念头，想把哲学家泰奥多尔·儒弗鲁瓦提作候选人。他俩交情甚笃。这是一个蓝眼睛、思考缓慢、严肃和温和的人。他和杜德望夫人一样，都喜欢乡村的、自然的盎然诗意。可是想叫他与乔治·桑成一对，那是发疯，她一下就会把他斗垮。

不过，由于乔治·桑把圣·勃夫当作神师对待，所以她还是谦卑地回了信。

我将从您手里接受儒弗鲁瓦先生。尽管我对身边添些新人无甚准备，但我将克服我孤僻的性格所作的这种暗示，并且，我将可能在您如此热心地推荐的人身上，发现值得尊重的所有长处。我请求您把我外表的冷漠与生硬，不可克服的懒惰和可耻的无知——它们使我在大部分时期沉默寡言——告诉他，以使他不要把我是一种习惯、一种怪僻，但绝非恶意的东西当作无礼行为。在儒弗鲁瓦脸上，我看出他能够有美好的心灵，良好的理智，但我也许承认他具有这些优点（当然，这些优点是很罕有的，很值得尊重），却不表示很大的钦佩，有些男人来到世上就很成熟，无须像别人一样陷在暗礁里，

互相碰撞，拼命搏斗，他们穿行过去，甚至不知道存在有暗礁，有时看到周围漂浮着那么破片残骸，他们大觉惊讶。这些生来就有美德的人，我有点怕……

但在最后一刻，她突然有了理智，取消了约会。

她仍然忧郁、执拗地沉陷在冷酷无情的、带有嘲笑意味的痛苦中。在这难过的几个月中，只有玛丽·多尔瓦尔是她真正的知己，玛丽·多尔瓦尔无耻、自然、伟大和激情的混合？当时与乔治的失望十分相宜。可能莱莉亚与聪明的妓女普尔舍莉的对话就是从乔治·桑与玛丽的谈话搬移而来的。

她们见面频繁，今天在你家，明天在我家。乔治·桑总喜欢看戏，多尔瓦尔演的戏她场场必到。给票和讨票，这几乎是她们所有书信的总的主题。然而乔治·桑把讨票变成了写作多情的便函的机会。

多尔瓦尔回信很短，稍微疏远了这位朋友。大概那是为了避免使维尼不愉快。

对此，乔治·桑颇有怨恨。

乔治·桑本想陪玛丽去巡回演出一次，哪怕是以女仆的身分也行。她听玛丽·多尔瓦尔激烈地抱怨上天和人，感到一种奇特的魅力。

玛丽·多尔瓦尔一点也不掩盖自己的思想，什么也不修饰，什么也不假装。她信口而言，口才罕见，有时粗野，但从不下流，即使说粗话也是纯洁的，然而到处显露出她对飘缈的理想的追求，对纯粹的幸福向往。

在这个生活经历比自己丰富很多的女人身上，乔治·桑又发现了自己绝对的需要。

维尼嫉妒这种热烈的友谊。不幸的维尼幼稚地担心，自己的情妇会受到这个鼓吹爱情自由的理论家的影响。

事实上，令人快乐而又卓越的多尔瓦尔，本身就无须从任何女人那儿获知这类事情。

当乔治·桑惶惶不安、寻找慰藉和启示的时候，她遇到了唯美主义作家梅里美。

梅里美是圣·勃夫的挚友，他和斯汤达一样，童年时代就被培养成为猎色之徒，从那时起就心灵受伤，多愁善感。他乐于以技术专家的身份，操着医科学学生的露骨的话，来谈论爱情。这使他在歌剧院的休息室和贵妇人的小客厅里受到欢迎。

与乔治·桑这位漂亮、怪异、不受拘束、聪明的女人邂逅后，梅里美便着手准备征服她。从1833年初，他就向她献殷勤，但是没有成功。

她答应接见他，然而在最后时刻又借口神经痛或丈夫来了，而请他原谅。

他变得爱挖苦人，并且有点辛辣：“您告诉我您是否好了，您的丈夫是否有几次单独外出，最后我是否有点运气见您而不使您烦恼，我将对您感激不尽……”

他勇敢地对她进行征服达四十八小时。

他大胆地置人们的尊重于不顾，背着睡熟的小索朗芝，站在歌剧院大楼梯的最上面，亮相给全巴黎的风雅人物看。

她发现他是个沉着而坚强的男人，他思想的力量迷住了她。

1833年4月的一天晚上，他们两人在马拉盖滨河街沿着塞纳河的陡岸散步时，她提议建立一种钟情的友谊。

他回答说，他只能以一种条件来爱，其余的条件都是不现实的。

这是最虚伪的爱情观。

可是，她像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妇女，准备抱住任何希望。

她写信给圣·勃夫说：“我相信，他掌有幸福的诀窍，他会告诉我的……但愿他傲慢的无忧无虑治愈我幼稚的敏感易怒”

最后，他终于使她相信，也许有一种适合她的爱情，肉欲既可以接受，灵魂亦感到陶醉。

这正是乔治·桑仍存希望的。

她听任自己被有技能的人的魔力迷住。

“好吧，”她终于对梅里美说，“我很愿意。既然这让您如此快活，那就照您所希望的做吧。至于我，我应该向您声明，我确信没有半点快活。”

他们一起上了她的寓所，吃了点东西。她便在女佣帮助下换上睡服。

梅里美后来声称，她在这个场面缺乏廉耻心。

无疑，在他面前，她装得更加随便。

无论如何，这是个可悲亦复可笑的失败。一如他的朋友司汤达类似的遭遇，梅里美遭到了彻底失败。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假正经的女人，缺乏援助人的机灵，既是由于无知，也是由于傲慢。

他大为恼火，以一场辛辣而无聊的讥讽，给自己做了补偿。

他走了后，她痛苦、厌恶、沮丧得哭了起来。

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玛丽·多尔瓦尔。她认为自己值得同情，也不应该遭受责备。

多尔瓦尔嘴里不牢，不能严守秘密，把此事告诉了爱饶舌的大仲马。

于是，这场艳事在巴黎流传开了。

大仲马说这句话是乔治·桑说的——“我昨晚骗了梅里美，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一些好心的朋友来告诉乔治·桑，说玛丽·多尔瓦尔出卖了她。

乔治，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你们说她出卖了我，这我清楚。可是你们，我的好心朋友们，你们中谁又没有出卖过我呢？她才出卖了我一次。而你们呢，你们一生中每天都在出卖我。她不过把我告诉她的一句话讲了出去，而你们则把我没有说过的一些话在外面宣扬……”

圣·勃夫这个十分关心别人缺点的人，已经从传言中得知了这一事情。于是，乔治·桑向他作了完全的忏悔：

您没有要求我吐露隐情，因此我在对您说出以下的话时，不是向您吐露隐情，因为我并不要求您严守秘密。我一生中的所有事情，我随时准备讲述出来，只要我认为这对某人有益。由于您的尊重对我有益，而且必不可少，我便有权利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您，即使您拒绝听我忏悔。在我烦恼、失望时的一天，我遇见一个厚脸皮的男人。他一点也不理解我的性情，嘲笑我的忧愁。有一件事，我颇不相信，即我地地道道、完完全全是茉莉亚。我想相信我不是的；我希望能够放弃这个冷漠可惜的角色。我发现周围有个妇女毫无约束，而且非常美丽。而我呢，严肃，几近纯真，却因我的自私和孤独而丑恶，我试图克服我的秉性，忘记过去的失算……我传染了这种浪漫主义的不安和叫人晕眩的疲倦。这种疲倦使人在否定一切之后，又认为一切有问题，

并开始接受比放弃的谬误要大得多的谬误，这样，在认为几年的私生活不能使我与另一个人结合之后，我便想象几天的迷惑会对我的一生起决定作用。总之，三十岁上，我的举止行为比十五岁的姑娘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请放勇敢点……余下的故事说来叫人讨厌。既然我没有罪过，那我又为何羞于被人讥笑呢？我毫无经验。我因痛苦、厌恶、沮丧而哭。我得到的不是能给我同情和补偿的爱情，而仅仅是辛辣而无聊的讥讽。这就是事情的原本。可人家用两句话概括了整个事情。我既没有说这两句话，多尔瓦尔夫人也没有泄露，更没有创造。这两句话不会给大仲马先生的想象力带来什么光彩……

她毫无悔恨，叙述着事实，既不说谎，也不辩解。她曾在危险的场地猎逐幸福；她错过了它。这最近的失败使她更不安。像多尔瓦尔那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情妇，在她眼里，这也许是一种成功，一种赎罪。即使对梅里美本人，她也未怀怨恨：

如果普罗斯佩·梅里美理解我，他或许会爱我的；如果他爱我，他或许会使我顺从他；如果我能够顺从一位男人，或许也就得救了，因为自由在折磨我，杀害我……

不过，如果她能够顺从一位男人，她也就不成其为乔治·桑了。

十年前，她曾是个满怀希望和诚意的少妇。她曾认为自己能够改变爱她的男人，把他们引到她当时的神秘而高尚的爱情观念上来。她没有经验，忐忑不安地等候，对前途热烈地向往。接着，与奥雷利安的爱情破裂和与卡西米尔·杜德望的结合失败之后，她便寻思不幸存在于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存在于严酷的婚姻之中；只要摆脱平庸的偏见和陈腐的法律，自由的情人便能实现他们的理想。这同样也碰了壁。自由的爱情和夫妻的爱情同样显得叫人失望。

在家乡，由于对于小城市人的心胸狭窄生气，她曾相信学有专长、彬彬有礼、雄辩滔滔的人们。她曾想象在巴黎“有一种高级的生活，有一个和气、优雅、有教养的机会，具有某种长处的人在那里受欢迎，并找到交流情感与思想的机会”，她不知道天才永远孤独，也不知道并不存在为优秀人物所一致接受的精神等级制度。所有写诗的人，她都把他们当作诗人。两年的艰苦探索给她指出，伟人们并非巨人；世界是由野蛮的人铺就的，在上面迈一步，不可能不引起一块铺地石叫喊。她曾寻找导师，她找到的是一些谨小慎微的、虚伪的可怜人。她知道了直爽的危险。

1833年夏天，乔治·桑处于厌倦和不安之中，在自杀的恐惧与隐修院永久的安宁之间摇摆。新的伤口在流血，她真的成了地地道道的茉莉亚——渴望爱情，值得人爱，却不能接受屈辱。而没有这种屈辱，任何爱情都不能成立。

然而，她内心清楚，在英国女修道院时的少女，诺昂的女骑士，乐于救助穷人、渴望学习、纯洁而严肃的那个姑娘并没有死。

当乔治·桑与霍尔滕丝·阿拉尔一起愉快地进餐时，当她贪婪地倾听玛丽·多瓦尔说话时，她不再是乔治·桑。她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又恢复了心灵的青春，又恢复了奥洛尔·杜德望的希望。

于是，她想到了诺昂的小径，想到了星光，想到了如此有利于吐露隐情的庄严、肃穆的静寂，想到了贝里籍的朋友。有一天，她也许会倚在他们的手臂上，向他们讲述所经历的风暴。而当她的客人们走后，她独自留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寓室里，伴着睡熟的索朗芝时，在这个波涛汹涌的灵魂上浮游

的，是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仍然相信有爱情，或许有神圣的爱情的需要。

第一节 诗人缪塞

缪塞是个被女人惯坏的孩子。还在产生爱情之前，他就尝到了肉体享乐。

在永别的亲吻中，让我们的嘴唇紧贴，在冰凉的睡眠中，让我们的情欲泯灭。

新欢的确立，引起了朋友间的不愉快。

人们把一个少妇留在马拉盖滨河街的一套小寓室里了。

她已经看破一切，心灰意冷。在婚姻与通奸中俱已失败后，试图以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示她的反抗。

但别想象她会泪流满面，她仍充满生机和力量，决不会长久流泪。

她思忖自己看错了人。

理想的情人，能尊重她的敏感、克服她的厌恶感的情人应该存在。她遇到他的那一天，激情做为良心的提示，因而也是上帝的提醒，将会给她引路。

她继续寻找他，眼睛在她周围的才子行列里扫来扫去，就像土耳其的苏丹，在后宫的密室里审视他的姬妾。

尽管圣·勃夫也许不使她讨厌，而且在梅里美彻底失败后，她也许心甘情愿把小生的角色分配给这位知己。可是，圣·勃夫在大献殷勤之后，却退避了。

她不明白他为什么沉默，而且，她也许喜欢“爽快的出其不意的攻击，甚于这种傲慢的静默”。

乔治·桑不停地在想：

难道是因为她蒙受了某个奇耻大辱，而吓坏了“他庄严的定期来访”？

难道他把她当作讨厌的人避而远之？

难道自己的失望扰乱了他对生活青年人般的信心？

或者他是一个醋意很重的女人的情夫，她禁止他上一个危险女人的家？

——“假若确是如此，您不能安慰她，告诉她我是个老朽的女人。”

这是阿黛尔·雨果和圣·勃夫都不相信的东西。

他俯身在乔治·桑的魅力掩盖的深渊之上，吓坏了，赶忙后退。但他较亲切地对她讲述这事，并赞扬“受女人宠爱的男人的正直”，但是指出与她建立友情不易。

“要使男女间的友谊成为可能，必须结束生命的多变和冒险的状态，必须让所有的人很简单地结束生命，就像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长凳上，晒着四点钟的阳光结束白昼一样……”

总之，圣·勃夫很希望与乔治·桑隔一段距离，保持一种严肃的、但决不是两人单独相处的友谊。

她觉得这点可悲、好笑。

“我的朋友，无论如何，如果我让您厌恶，那您就摆脱我好了……我再也不扰烦您。

您高兴吗？好极了！我为此感谢上苍，并认为您做得对，避开我……”

但她避免与他闹翻。他是个有影响的批评家——除了在爱情上的事，她也并不怎么记恨他——而这并未涉及到爱情。

另一个批评家古斯塔夫·普朗什，自《印第安娜》面世以后，就成了马拉盖滨河街的一个常客。他是她的情夫？巴黎人是这样说的。

卡西米尔信以为真，而乔治·桑则坚决否认。

事实上，普朗什并不诱人。不过是由于他能干，乔治·桑让他成为自己在社交场上的男伴，而他也欣然接受了这一角色。

她常去科尔德利街他租的那间带家具的脏乱房子找他，给他一些奇怪的使命：卡西米尔来巴黎，陪他去剧院是普朗什；索朗芝病了，叫医生的也是普朗什；早上，他送莫里斯去上学，晚上接他回来；多尔瓦尔每出戏的首演，也是他陪乔治·桑去观摩。

严厉的古斯塔夫完全被娇小的杜德望夫人降服了。

玛丽·多尔瓦尔仍是最亲爱的朋友，但她根本不可能参与乔治·桑的生活。

维尼竭尽所能，使情妇与他称之为“可怕的女人”的乔治·桑疏远。

玛丽手头总是缺钱养她的三个女儿，只得一次接一次地巡回演出，忠心耿耿的普朗什每到这时便派往维尼家，向他索取地址。

在心灵的沉默之中，乔治以同样的速度写作。但她觉得生活空虚。

1833年初春，《两世界评论》举行盛宴，招待合作者。古斯塔夫·普朗什做为该刊物的批评家，领来了乔治·桑。

出于偶然，或者是布洛兹的恶作剧的安排，乔治·桑与阿尔弗雷德·缪塞相邻。圣·勃夫在为她寻觅追求者时，就已经打算把这个身材单瘦、金发飘动、仪容英俊的年轻诗人介绍给她。

缪塞当时23岁，比乔治·桑和圣·勃夫小六岁。但圣·勃夫欣赏缪塞。

缪塞讲究衣着，天鹅绒衣领一直开到腰部的礼服，歪戴在头上的高礼帽、挺括的领带、天蓝色的紧身长裤，都给他一种略为过份的优雅。

当圣·勃夫向乔治·桑提议带他来时，乔治·桑拒绝了。她说：“他太讲究衣着了，我们会合不来的。”

人们明白她是出于害怕，因为文学界的人讲了缪塞许多坏话。

1840年，缪塞步人文坛，成就辉煌，文学界马上接受了他。可是，他忘恩负义地嘲笑和讥讽同仁们，最终招致了大家的攻击。

缪塞是个被女人惯坏的孩子。还在产生爱情之前，他就尝到了肉体享乐。他以幼稚的疯狂，滥饮白酒，大抽鸦片，狎妓嫖娼。如拜伦一样，他被放荡所吸引。他被妓女娼妇弄得自觉失望，留下了丑恶的回忆。

从青年时期起，他的神经就有病。做为一个诗人，他的灵感时有时无。他的钱包空空如也。

在《两世界评论》举办的宴会上，乔治·桑发现讲究穿着的缪塞既不是放荡哥儿，也不是花花公子，尽管他两者都打算做。

他言语讥俏，引人注目，让这位默不作声、眼睛漫不经心的美妇开怀而笑。

她也需要笑。

乔治·桑虽缺少风趣，却善于评价别人的风趣。她觉得他讨人喜欢。

至于他，他觉得她有一双印第安人的大眼睛，沉凝、黑亮而温柔，盯着他的时候，像是在询问。

他便被迷住了。

她的皮肤呈黄褐色，闪着青铜的光泽，通过缪塞的诗，歌颂“一位褐色胸脯的安达卢西亚女人”，可以知道他喜欢“处女的胸脯，如嫩葡萄一样金黄鲜嫩”。这种琥珀色的皮肤大概为他隐秘的肉欲所喜欢。

回到家，他阅读《印第安娜》，并且写了一封情给她，信中他表现出十分钦敬，末尾是：“夫人，请接受我对您的敬意。”还附上了下面的诗句——《印第安娜读后》：

桑，你写书时，在哪儿看见，
印第安娜床上的可怕场面：
半裸的诺娜，与莱蒙陶醉欲仙？
爱情以颤抖的手，徒劳地寻觅？
它幻想中深深钟爱的幽灵。
谁让你写下这热情的一页？
莫非你心里有这悲伤的经验？
莱蒙的经历感受，你又记起？
那隐隐痛苦的所有感觉，
无比空虚怅惘的快乐，毫无幸福，
乔治，你是想象，还是回忆起这些？

以“你”相称和恳切的提问产生了一种富有诗意的亲切感。于是，他们之间的情书便随之而来了。

缪塞在写作中善于讨人喜欢，乔治·桑则重新感到了快乐。

“我的孩子阿尔弗雷德，”她马上就这样称呼他。

他们一起制订了一些浪漫的计划：登临巴黎圣母院的塔楼，去意大利游历。

她不拘礼节地接待他：黄色丝绸晨衣敞开着，脚趾踩着土耳其拖鞋，头上罩着西班牙发网；她让他吸埃及烟，自己则垫个垫子坐在地上，就着一杆波斯尼亚产的樱桃木长烟斗吸烟。

阿尔弗雷德跪在她旁边，把手放在她的拖鞋上，借口说注意上面的图案。声音则仍是打趣的调子。

七月，《莱莉亚》完成，缪塞接到了一些校样。

他很兴奋：“在《莱莉亚》里，有二十页直达心灵，坦诚，有力，其优美与《勒内》和《拉哈》不相上下……”

接着，可爱的孩子又回到爱情上来：“您相当了解我，可以确信那可笑的话‘您愿不愿意？’永远不会从我嘴里出来。……在这方面，您我之间隔着波罗的海。您只能给予精神上的爱情，而我则不能把它献给任何人（姑且认为您不会一开始就撵走我，假如我竟敢向您求爱的话），但假如您认为我配得上，我也可以不是您的朋友——对于我，这仍然太偏重于精神——而做您的某种同伴，既无足轻重，也没权利，因此也无嫉妒和不和，可以抽您的烟，搓皱您的披肩，与您高谈阔论，染上鼻炎……”

乔治·桑需要给《莱莉亚》安插若干句亵渎神明的诗，那是小说中斯泰尼奥酒醉后以变了样的声音唱的。

缪塞写了这首《醉酒歌》：

如果我的目光从狂饮中抬起，如果我颤抖，沾着红泡沫的嘴唇去寻找亲吻，但愿我强烈的情欲，不会在快乐来临时，面对情场女郎的裸肩有所减弱；但愿她们淫荡的抚摩，今天在我平淡的血液里，重燃起二十岁教士痉挛的欲火；但愿她们头上的花是我亲手撒；我的手指把她们飘散的头发，编结成芬芳的辫子；但愿我疯狂的牙齿从她们颤动的肌肉夺得一声惊叫；但愿她们喘息的声音频频向我求饶；但愿最后一次努力，我们的叹息包融合一起。通过最后一次对抗，我们的叫声互相应合；但愿我就这样死去！……或者，如果上帝拒绝给我幸运的死亡，赢得光荣与幸福；如果我感到我的情欲，像暗淡火光的苍白的倒影，以永久临终的无力的狂怒，继续在享乐中残存，模仿我师傅的嫉妒任性，让这慷慨的酒去缩短那麻木躯体的痛苦；在永别的亲吻中，让我们的嘴唇紧贴，在冰凉的睡眠中，让我们的情欲泯灭，上帝真可恶。

1833年7月29日，缪塞给乔治·桑寄来了爱情的表示。

亲爱的乔治，我有某件愚蠢可笑的事情要对您说……您会当面耻笑我，会在迄今为止我和您的所有联系上，把我当成一个说漂亮话的人。您会把我赶出门，您会认为我撒谎。我爱您。从头一次上您家那天就爱上了您。我原以为只要以朋友身分看到您，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它……

她犹豫不决。

人们经常把她说成一个必然带来不幸的女人，一个寻找新鲜肉体的吃人女妖。事情根本不是如此。她觉得一个年轻人才华横溢，令人快乐，便与他一起娱乐；但他的放荡事，她都清楚，感到害怕。

“我爱所有的女人，但我也鄙视所有的女人，”他曾对她说过。

她梦想的爱情大概是深厚而忠贞的，即使她本人曾做过不忠的事，她认为那也是由于失望与灰心。

缪塞猜出了这种感情，并且在另一封里作了回答：

“爱善于爱的人吧，我只会蒙受痛苦，我像个孩子一般爱您……”

“像个孩子……”他找到了最能打动她的东西。

“像个孩子。”她重复着，两手紧攥着信，激动得一个劲地颤抖。“他像个孩子一般爱我！天哪，他在这里说的什么话？他知道他给我造成的痛苦吧？”

她再见到他时，他哭了，于是她让步了：“要不是你的青春，要不是你的眼泪给我引来的软弱，我们仍会是姐弟……”

很快，缪塞就来马拉盖滨河街生活了。这一次仍像过去的一样，她需要和所爱的人一起吃饭，既做他的情妇，又做他的家庭主妇、护士，尤其是母亲。

新欢的确立，引起了朋友间的不愉快。巴黎的贝里籍人和古斯塔夫·普朗什这些习惯于匍伏在乔治·桑脚下的忠实奴仆认定，与一个金发青年、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一个花花公子的这种公开关系将损害乔治·桑在文学上的前程。

普朗什的肮脏惹得讲究的缪塞不快，因此被扫地出门。

在这当口，《莱莉亚》面世了。乔治·桑把它题献给“拉杜什先生”，希望重新征服这位欧内的隐居者。拉杜什表示抗议，于是，乔治·桑在后来的版本中划掉了这个名字。她送给缪塞一套，在第一册上写道：送给我的孩

子阿尔弗雷德先生，乔治”，第二卷上则写着：“送给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子爵先生，忠诚的仆人乔治·桑敬赠。”

这部书在报章上引起巨大轰动。有一位记者要求把“一块烧红的煤”放在乔治·桑嘴唇上，以烫去这些下流无耻的思想。“您翻开《莱莉亚》的那天，请关在您的书房里（以避免传染任何人）。如果您有个女儿，您希望她的灵魂保持纯洁、天真，那就打发她和同伴们去田野玩耍……”

普朗什具有骑士风度，与这个记者对抗。1833年8月，他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赞扬《莱莉亚》及其作者的文章：“有一些命中注定的个性坚强的人，不能不具有长期斗争的激情……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以令自己失眠的不安与折磨，来赎补自己的过错。除非不了解他们才会指责他们……”

接着，他遣他的决斗证人去那位记者那里。巴黎以这次决斗为娱乐，人们发问：古斯塔夫·普朗什以什么身分自任乔治·桑的“刺客”？这是他在失去他的权利之时，来声明自己拥有那些权利的方法吗？

古斯塔夫为自己辩护：

“如果我对于乔治·桑，不是有一种深厚的友谊，而是别的东西，那么我昨天的行为就会是一种粗野举动。我就好像一个莽汉，没有教养，在利用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我没有，我仅仅滑稽可笑而已，但社会并非要知道事实不可，它对此并不关心。”

阿尔弗雷德·缪塞怒不可遏：“我的意图是我去作战，谁知被人抢先了。”从这天起，他对普朗什的厌恶一变而为憎恨。

圣·勃夫谨慎地等待风暴过去。乔治·桑催他好几次，他才在《国民报》发表一篇文章。接着，她正式地把自己的新关系告诉了他：

我爱上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这一回，我是非常严肃的。这不再是一时的兴趣，这是感觉到的爱慕。在另一封信里，我将把详情告诉您。给这种爱许定一个期限，使您觉得它与您能接受的情感同样神圣，这不是我的权利。我头一次爱了六年，第二次三年，而现在我不知我能爱多久。我的脑子里经受了許多幻想，但我的心受到的损害却不像我害怕的那样严重。我现在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感觉到了。我远未苦恼，远未被埋没。

这次我体验到了贞洁、正直、温柔。它们使我陶醉。这是年轻男子的爱和同志的友谊。

这是某种我没有概念的东西，是我不相信在什么地方能遇到的东西，尤其是在这里。过去，这种爱，我否认，我摒弃。起初我拒绝它，后来我让步了。我庆幸我这样做了。我让步是出于同情，而不是爱情，然而我不熟悉的爱情却给我显现了出来。我认为没有感受任何痛苦。我高兴。请为我感谢上帝……既然我把心里的事情告诉了您，我也将告诉您我该怎么办。

普朗什曾被认为是我的情夫，这对我无关紧要。他现在不是。现在，对我甚为重要的是，人们知道他现在不是的。同样，人们认为他过去是的，我对此根本不在乎。您明白，我不能同时与两个男人亲密相处，因为这两个男人会被人家认为与我有同样性质的关系。这与我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相宜的！因此，我拿定主意，疏远普朗什，尽管这让我非常痛苦，却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相互坦诚而深情地作了解释，然后我们握手而别，在心底互相挚爱，互相答应永远尊重……我不知道我们的大胆行为是否让您满意。或许您会认为一个女人应该掩盖她的情爱。但我恳请您注意我是在一

种特别的处境，被迫从此将私生活公开……

她年轻了十岁；和缪塞在一起，她恢复了最初和桑多在一起时的快活。马拉盖滨河街寓室里又起了欢歌笑语。

阿尔弗雷德做了很多荒唐事。有一晚，他装扮成女仆，穿着短衬裙、颈上挂着十字架上菜，把长颈大肚玻璃瓶打翻在哲学家莱米尼埃的头上。

乔治·桑总喜欢玩笑。由于天生忧郁的缘故，她为了让自己快乐起来，需要一种粗俗的快活。这种大学生的生活使她快乐。俩人互相暴露思想，各自炫耀自己才智的珍宝。

在那套窗户面对着世上最美的风光的寓室里，头几星期是一段长时间的狂喜。

“自由自在的生活，令人喜悦的亲热，如此的安宁，新生的希望。有什么比爱还要甜蜜？”

他们是一对奇怪的同床共枕者。乔治·桑认真，守时，一心想在许定的时间交稿，常常在深更半夜跳下床写作；而阿尔弗雷德却像睡鼠一般，呼呼酣睡。他醒来后，她训戒他，就像从前训戒桑多一样，因为她做为教育者，甚至甚于情妇。他笑嘻嘻地抱怨，“我工作了整整一天。晚上，我写了十行诗，喝了一瓶烧酒，而她喝了一升牛奶，却写了半卷书。”

不过，头几天，他感谢她把从这种慢性自杀中抢救出来。而乔治·桑却沉浸在使一个优秀人物重又高尚的喜悦之中。

然而一些朋友让阿尔弗雷德小心提防；他们回忆起桑多的不幸：“在这个女人的生活中，有一面黑旗，暗礁被标明……”

但缪塞属于这种情人，他们寻找危险，心甘情愿地把心交给保证撕裂它的人。

九月，缪塞向情妇建议，去枫丹白露，在弗朗夏尔的森林和峭壁悬崖间居停几日。

她接受了；她喜欢将自然与爱情结合在一起。

她既不怕劳顿，也不怕夜晚，一身男人打扮，在林间行走，以坚定的步伐踏着沙地，女人的娇弱与孩童的冒失迷人地交织在一起。她像个士兵一样朝前走，声嘶力竭地唱着歌。回来的时候，她偎着同伴的手臂，低声他说着情话。

这次游玩起先是愉快的，因为缪塞在懊悔的时候，总是回想起弗朗夏尔的女人，但后来一个夜间的景象把一切都破坏了。

月华之下，在一块坟场，阿尔弗雷德产生了幻觉。他看见朝欧石南方向奔跑着过去了一个苍白的鬼魂，衣衫撕破了，头发随风飘。“那时我骇异不止，忙把脸贴在地面，因为这男人就是我。”

次日，他拿此当笑话说，并做了漫画。在他自己的漫画下面，他写道：“在森林和在情妇的思想里迷路。”而在乔治·桑的漫画下面则这样写着：“心灵和裙服同样被撕裂。”

这幅画使乔治·桑大为不快；她拒绝看到自己在危险面前惊慌失措，显得滑稽可笑。

在人指出乔治·桑夸大了缪塞的幻觉。不过，他的幻觉，除了缪塞本人在《十二月之夜》中描写过的之外，还有一个证明，即美丽的女伶路易·阿朗的证明，她在乔治·桑后的十六年里充当缪塞的情妇。她的描述与乔治·桑的描述完全吻合：出众、有点爱幻想的诗人，突然一下变成了一个疯子。

这就是乔治·桑面对的双重性的男人。她依恋他身上的魅力：软弱。她总是如此不可避免地喜爱这种魅力，他清楚这点，并以无限的真诚与感动的激情，表露出他的才华动人的弱点。接着，当他的软弱成功之后，他便恢复了力量，以便让人经受痛苦，并且也让自己经受痛苦，因为这个患受虐狂者为了自己的写作和享乐，需要痛苦。

这时，强健的乔治·桑便关怀他，称他为“我可怜的孩子”，而他则称她为“我的大乔治。”

乔治·桑又一次做了两个人中的男人。

第二节 情人之间的情人

缪塞避开滚烫的床，开始游荡、饮酒。他已厌倦乔治·桑称之为“崇高的爱情”的东西。

如他所言，在威尼斯，与乔治·桑发生关系，会造成多大的轰动！可是，他怎能抗拒这个魅人的外国女人的诱惑？

乔治·桑从诺昂匆匆赶回巴黎，以便先安慰帕吉洛，之后再牺牲他。两人都希望去意大利观光。

缪塞歌咏过这个国家，却从未到过那里；乔治·桑被威尼斯吸引，希望变动一下生活环境最终会给她带来某种神秘的启示。

在一次大胆的拜访中，乔治·桑向阿尔弗·雷德的母亲保证，她对缪塞有母亲一般的关心和爱护，以此获得了她的同意。

至于卡西米尔，他得到消息后，极力促使妻子去旅游。

于是，他们于 1833 年 12 月出发了。乔治·桑穿一条灰色的长裤，戴一顶饰有流苏的大盖帽，兴高采烈，从里昂至阿维尼翁，他们与司汤达一道，沿罗纳河而下。在马赛，他们乘船赶往热那亚。缪塞缩在大衣里，忍受着晕船的痛苦。乔治·桑则两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叨着烟卷，以优越的神气注视着自己的同伴。

最浪漫的旅行也没有改变乔治·桑勤奋生活的节奏。她有部长篇小说要写完，交给布洛兹。在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她要求夜里写作八小时；只要当天的任务没有完成，她就不开门。如果情夫表示不满，她便鼓励他在自己身边写作，并给他提示题材。

“男人的真正胜利，就是女人坦率地把他看作她的命运。”可是乔治·桑的命运却一直与爱情有区别。

缪塞厌烦受了轻侮，便变得粗暴。他称乔治·桑为“讨厌的化身，空想家，傻瓜，修女”。他责备她“从不会给人以爱情的快乐”。

这正是乔治·桑的弱点。

她心灵受了伤害，被人冲犯，便做出反击：“这种快乐比你将在别处找到的更严峻，更含蓄。我很高兴。至少，你在别的女人怀里就不会记起我。”但这种虚张声势并未使两人之间的矛盾缓和下来。

在热那亚，她病了，发烧。

性欲与疾病不和。缪塞避开滚烫的床，开始游荡、饮酒。他已厌倦乔治·桑称之为“崇高的爱情”的东西，一心向往“往昔有害的陶醉”。

他又恢复了诡辩：“变，就是自新。艺术家难道天生是当奴隶的？”

一个过于有自制力的女人让情夫恼火，叫情夫不安。当男人在爱情中寻求忘掉自我的时候，她却仍是个头脑清晰的见证人。

男人并不单单要战胜羞耻，而且要控制自由，把一个能思维的动物变成一个物件。

乔治·桑使男人不快，因为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她曾对威尼斯寄予了那么多的希望，可是到达该城时的景况却是凄凉冷清的。

天黑了，水道上黑黝黝的轻舟像棺材一样。他们进城时，黯淡泛红的月亮照着穹顶一片晶莹洁白的大教堂，公爵宫殿和天主教钟楼出现在天边的光亮地方，这时他们以为看到了一幅画。不过，是爱情美化风景和城市，把光明投射其上，而不是背景的优美引发爱情。玫瑰色的宫殿和教堂的金碧辉煌不可能改变两颗心。

他们在达尼埃利旅馆租了房间。晚上，在这家旅馆里，缪塞对情妇说：“乔治，我弄错了。请你原谅。但我不爱你。”

乔治·桑惊愕不已。她本想马上就走，只是因为自己病了，又不忍把这个孩子独自一个、身无分文地留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一时犹豫不决，才没有走。

他脱离她，首先是由于厌烦，因为她待他如“孩童”，并训戒他；其次则是出于反感，因为她患有严重的痢疾。

由于担心让她看见自己的厌恶，他早就耽于浪漫的放荡之中。他跑遍了威尼斯低级的酒吧间，饮一些不知名的烧酒。那些酒吧间里飘散着死水的气味。接着他寻求舞女的亲吻。

乔治·桑由于苦恼和愤恨，强迫他保持贞洁。可是他又找了一些女人。她大概再也忘不了那些孤独而漫长的等待，梯阶上神秘地汨汨作响的水声，河街上警察沉重而整齐的步伐，在大石板上争吵的田鼠尖利而几乎是稚气的叫声，所有这些悄悄的、怪异的声音微微地打破威尼斯夜晚的岑寂。

有一天早晨，缪塞不知跟谁打了架，一身鲜血淋漓地口到家，很快便开始他的最厉害的一次发病。近乎发狂，近乎大脑发烧。近乎伤寒。不管是什么，其状况都十分可怕。

她害怕了。因为他可能自杀，或者由于此病而死在威尼斯。她得负多大的责任！她曾经想象的一部壮丽的传奇故事，结局是多么可怕！

她请来了曾给自己治疗过的年轻医生帕吉洛大夫。并且，为了启发他的诊断，她在信中对叙述了弗朗夏尔夜间的事情：

“此前三个月，有一次，在极度不安之后，他像疯子一样，闹腾了整整一夜。他看见周围有一些鬼魂，惊恐、骇异得直叫。……这是世上我最爱的人，看到他这种情况，我真是惶惶不安……”

在那样失望之后，乔治·桑仍称缪塞为“世上我最爱的人”。

后来，人们写了多卷著作，以证实乔治·桑与帕吉洛在一个杯里喝酒，在病人的床头相爱，人们探寻究竟是谁的错，乔治·桑还是缪塞。不过答案很简单，过错与损害双方都有。缪塞是把她当做情妇抛弃的；她则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他本人也承认“他失去她活该”。可是缪塞具有男人的习惯，

往往纵容自己。他对女人不忠，却希望她对他保持忠诚。

在他二十天的谵妄和狂热之中，乔治·桑和帕吉洛忠心耿耿地照料他。

为什么当时乔治·桑会与帕吉洛睡在一起？首先，由于对既是心灵又是肉体的爱情怀着执着的希望，她便把任何年轻、强壮、仪表英俊的男人看作对问题的回答。其次，在威尼斯，她与...个半疯的孩子在一起，土地是陌生的，周围是异国生人，孤立无援，感到寻找依靠的需要。女人们在绝望与恐慌时，有时把这种需要与爱情混在一起。最后，由于威尼斯的传奇故事的题材吸引，她希望能与意大利亲密地相通。而任何艺术家都知道，唯有爱情才使与另一国、另一民族的肉体亲近成为可能。

帕吉洛与乔治·桑共度了许多夜晚，来守候缪塞这个一时谵妄、一时昏睡的病人。

分担的不安、共同的工作使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亲密。

疲倦则是淫媒。

帕吉洛欣赏这位异国女子，给她投去炽热的目光，却不敢向她求爱。她是个大名鼎鼎的作家；而他才是个可怜的医界新手。

他有个意大利情妇；乔治·桑在威尼斯则与一个情夫住在一起。而且，这个情夫还是大夫的病人，因此职业的责任是明显的。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正直、胖胖的、长着金色头发、没有爱情纠纷的男青年，这个良心问题倒是颇为微妙。

有一天晚上，缪塞想睡，便请情妇与医生离远一点。

他们便在壁炉附近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帕吉洛真诚地问她：

“那么，夫人，您是否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描述美丽的威尼斯呢？”

“说不定会写，”她回答。

她拿了一些纸张，热情地写起来，然后把纸页塞进一个封套，递给大夫。他问她这封信交给谁，她一把夺过来，在封套上写道：“给傻瓜帕吉洛”。

他回到家后，展读了这篇浪漫的作品。这是爱情的表白，远比她在她的长篇小说中赋予主人公的那些表白优美。

它是由一个紧接一个的问题组成的，在她，这是真正的风格的表露，因为提问是这个不满足的女人对生活所持的态度。

信是这样写的：

你将是我的依靠，还是我的主宰？

我遇见你以前经受的痛苦，你会使我减轻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忧伤？

你理解同情、耐心与友谊吗？

人们或许是在女人没有灵魂的看法中把你培养成人的。你知道她们有灵魂吗？

.....我将是你的伴侣，还是你的奴隶？你是想我还是爱我，你感情满足之后，你会不会谢我？

我让你愉快时，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灵魂的欲望，任何人为的亲抚都不能使其厌倦，也不能使其疲乏？

当你的情妇在你的怀里睡着了，你仍会张着眼睛，端详她，祈祷上苍，流泪吗？

爱情的快乐是让你气喘吁吁，昏昏沉沉，还是把你投入绝妙的陶醉之

中？

当你离开所爱之人的胸脯时，你的心会不会跟随着你的身体？……

我可以阐明你的沉思，让你的沉默雄辩他说话。

我将给你的行为赋予我所希望的意图。

当你温柔地注视我时，我相信你的灵魂在对我的灵魂说话……让我们保持这样吧。

别学我的语言；我也不愿在你的语言里寻找把我的怀疑与担心告诉你的词。

你怎么安排你的生活，你在男人中担负什么角色，我不愿知道。

我也不愿知道你的名字。

掩盖你的灵魂，让我永远以为它是美好的……

在这件艳事里，帕吉洛不仅默不吱声，而且被吓坏了。在他平静的生活中，这个爱情的表示有如一声晴空霹雳。一如许多征服者，帕吉洛觉得自己在征服中被战胜。如他所言，在威尼斯，与乔治·桑发生关系，会造成多大的轰动！可是，他怎能抗拒这个魅人的外国女人的诱惑？

她变成了他的情妇。

缪塞发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

他大脑发烧，时而谵妄，时而清醒。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一个男人膝上，两张嘴吻在一起；他以为在乔治·桑和帕吉洛挨着坐的那张桌上，仅放了一个杯子，他们两人就在这同一个杯子里喝茶。

后来，他嘲笑自己的激动：“是在什么滑稽的喜剧里面，有一个嫉妒者相当蠢，竟要去深询一个杯子变成了什么？他们为了什么在一个杯子里喝茶？”

有一天，他发现乔治·桑在写一封信，便指责她给帕吉洛写信。她矢口否认，威胁说要让人把他关进疯人院，并把信撕碎，扔出窗外。接着，天刚微微亮，她又穿着衬裙去街上捡回它们。

帕吉洛的登场开辟了一个缪塞自觉被排斥在外的局面，是乔治·桑成功地把他排斥出去了。

阿尔弗雷德说她是个笨拙的情妇，把她看低、她则迫使他心生醋意，以此来报复。

从第三者感到另外两人有种同谋关系，而自己被排斥在外之时起，这种醋意就产生了。

一俟乔治·桑与缪塞重建同谋关系，而轮到帕吉洛被排斥在外，这种醋意就消失了。

这时便是帕吉洛难受了。

既然缪塞说过不再爱慕情妇，为什么又要吃醋呢？因为醋意唤醒爱情，并赋予人们原先以为了解它所蔑视的人以新的、高贵的价值。

她无拘无束，可以离开他。但她坚持等他病好后，向他说真话。

帕吉洛则劝她不要说；他认为缪塞还没好利落，经受不起这一打击。

可是，乔治·桑说她的尊严要求她直率。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天哪，还给我在威尼斯时的冷酷的力量吧，还给我对生活的这种粗暴的爱吧，它在我极度失望之中，像发狂一样攫住了我……”

缪塞知道乔治·桑爱帕吉洛，不过他不清楚她是否在他离开威尼斯之前，便已属于帕吉洛了。

他一直耿耿于怀。

她拒绝给他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她说，这是她的秘密；既然她不再属于缪塞，她也就无须向他汇报。

到了三月下旬，乔治·桑和阿尔弗雷德·缪塞不再同居。

缪塞于三月二十九日携一名意大利仆人赴巴黎。他带走了忧伤和快乐。他忧伤的是失去了一个情妇，一个他脱离她时又再度爱慕的情妇；他快乐的是自己表现不错，做出了重大牺牲，以高尚的行动与她分子。

乔治·桑把他一直送到梅斯特雷。充满母爱地深情吻别他之后，她一如平日精神危机发作之时，徒步旅行，以消耗烧灸她自己过多的精力。然后，她回到威尼斯，与帕吉洛在一套小寓室里安顿下来。

乔治·桑在威尼斯的隐居所住了五个月。她在此写完了《雅克》。她将这部长篇小说寄给了缪塞，上面有一句用铅笔写的冷漠的题辞：“乔治献给阿尔弗雷德”。她还在威尼斯写了《旅人书简》的头一部分，并为写意大利的中篇小说做了些笔记。

巴尔扎克不喜欢《雅克》。他认为这本书“空洞，虚假”。

巴尔扎克是这样评论《雅克》的：“杜德望夫人的最近一部小说是劝丈夫们——因为他们妨碍妻子——自杀，以便让妻子自由……一个天真少女新婚六个月便离开了一个‘高傲’的男人，一个有声望的、热情的、爱她的男人，转而跟了一个轻浮的年轻人，一个花花公子，没有任何生理的或精神的原因。其次，里面有一种对骡子的爱，对不育者的爱，像在《莱莉亚》中的一样。这在一个既当了母亲，又以德国人的方式本能地占有足够爱情的女人身上，真是古怪的东西……”

乔治·桑在闲暇的时候便以惯常的热情，做针线活或编织。她亲手为她英俊的意大利人装饰了整间房子：窗帘、椅子、沙发。她要建立一个非法同居的家庭。

佩德罗·帕吉洛是个非常钟情的人，因此有点为难。他的那些威尼斯的情妇力图再获得他，其中有一个在一场由吃醋引起的争吵中，撕破了他漂亮的衣服。可是帕吉洛爱他的法国情妇。

由于帕吉洛一整天在外照料病人，便给乔治·桑留下了八小时安静的工作时间。对于这场爱情，这是持久的保证。

由于太穷，买不起花，帕吉洛便黎明即起，去郊外采摘鲜花送给乔治·桑。

这是幸福吗？是一种已经枯燥乏味的幸福。

乔治·桑和缪塞立刻就惋惜那不幸的时光。在她与阿尔弗雷德分手后，她给他写信道：“往后谁照料你？往后谁照料我？谁会需要我？我又愿意照顾谁？……再见，我的小鸟！永远爱你可怜的老乔治吧。帕吉洛那方面，我也不告诉你什么，除了他几乎和我一样为你伤心……”

至于缪塞，他一旦远离这个好责骂的女人，便又怀念起这个女友。“我仍然一往深情地爱你。”他写道。他一心思念不在身边的女人，并真诚地表现出宽宏大度，祝愿她与帕吉洛一起愉快。“真是正直的年轻人！告诉他我多么爱他。一想到他，我就忍不住流泪……”

乔治·桑哭了：“我跪着求你，别再酗酒，别再寻花间柳！为时太早……只到本性来急切地要求、万不得已时才去享乐，不过别把它当作除烦消愁的药……”

他们两人仍互相忠诚于对方。小缪塞受乔治·桑的委托，在巴黎办了成百上千次事情：买手套、鞋、香精。为了买这些货物，他从布洛兹那儿支钱。而且，他去亨利第四中学看望她的儿子莫里斯。

阿尔弗雷德继续哀声叹气，悉心养护自己的伤口。他去马拉盖滨河街，看到一个茶碟里有乔治·桑留下的一支烟卷，不由得抽泣起来：“决不能恨我；我是做我可能做的事……想想吧，眼下，我身上既不可能再有怒火，也不可能再生愤慨；我想念的不是情妇，而是我的乔治·桑……”

回到巴黎后，他又遇见了他们那一小群对乔治·桑愤愤不平的人。普朗什和桑多大骂她。缪塞则陶醉于原谅之中，准备为她辩护：“我就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很想写我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会治好我的病，使我的心灵高尚。我愿意为你建一座祭坛，哪怕是用我的骨头……高兴吧，我伟大而正直的乔治，你把一个孩子变成了男人……”

在威尼斯，乔治·桑获知了奥雷利安结婚的消息。她给他写信，祝愿他们幸福，并索取她从前的信件。

1834年7月，她终于打算返回法国。她已经写完了她的长篇，能从威尼斯取得的写作素材，她都取得了。她在此钱不多，布洛兹、布古瓦朗、卡西米尔都忽略了给她寄钱。

她已有八个月没见到孩子们。她打算在巴黎出席莫里斯的发奖仪式。她希望在诺昂度过秋天。她怀念家乡，回忆着那儿的小榆树、刺槐、绿树成荫的小径。

问题是：是否把帕吉洛带去法国？

她对他提了出来。

帕吉洛大夫心慌意乱，对她说考虑一下。但他一下便明白他将去法国，然后会孤身一人回来。可是他爱她，宁愿面对上千件烦恼事，也不愿让她独自去走如此漫长的旅程。

于是，他同意了。大夫给他尊敬的父亲写信道：“我疯狂到极点……明天，我赴巴黎，在那儿，我将与乔治·桑分手……”

诚实的帕吉洛头脑清醒，有理智。他既为失去情妇而忧伤，又为在离别之际让家里高兴，并摆脱一大罪孽而愉快。

回到巴黎后，乔治·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公众舆论方面。乔治·桑对拉夏特尔城的评论毫不在乎，却对文人社会，即布洛兹和圣·勃夫的社会里有关她的传闻甚为重视，她注意到，一些人见了她便把头转过去。帕吉洛让巴黎人觉得惊讶、失望。人们原以为她迷上的是某个意大利伯爵，英俊得不可抵抗。可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伙子，虽说讨人喜欢，但她喜欢他胜过缪塞，叫人不可理解。乔治·桑感觉到了这种谴责。

二是帕吉洛方面。她希望温情而高尚地对待他，她把他介绍给一些医生，他们带他参观巴黎的医院；她还把他推荐给布洛兹，希望后者采用他的有关意大利的文章。他没有钱，她想给他，但又不愿损伤他的自尊心。于是她事先设想，叫帕吉洛带四幅毫无价值的油画到巴黎，然后她声称替他出卖，把现金交给他。以此借口，她可以给他一千四百法郎。这样，慷慨和体面便可两全其美。她原以为帕吉洛相信她，谁知这时却突然想吃醋了。

三是在缪塞方面，这又是一场悲剧。缪塞不愿意承认，对于某些不合适的情人，唯一的药便是完全一刀两断。他想再见乔治·桑，却不能经受打

击。

她告诉他，她与帕吉洛一起感到愉悦。这并不是真话，但她自尊心过强，不愿承认这点。

于是缪塞决定远走高飞。他要求她给他最后一个与她相处的机会，还请她给他最后一吻。“亲爱的，我向你作最后的告别……我不写完有关你我的书，决不去死……我以青春和才华保证。在你的坟墓上长出的，将是洁白无暇的百合花。我将以现在这双手，在那里放上你的墓碑。它是大理石的，比我们昙花一现的名人的塑像还要纯粹。后人将反复传诵你我的名字，就像传诵那些不朽的情人的英名。人们提到一个，从不会忘掉另一个……”

然后，他于8月25日赴巴登。她则于29日去诺昂。

卡西米尔应妻子要求，写信邀请帕吉洛。他谢绝了，以留在这诺大的首都，经常出入各家医院为满足。

在诺昂，乔治·桑又看见了她古老的房子，村里美丽的广场，她的树林，她的朋友，她的孩子了，她的丈夫，甚至她从巴黎赶来的母亲。她的贝里朋友马上赶来了。

这些人没有责备她。“斥责只会刺激痛苦人的心，而热情的握手却是最有说服力的安慰。”

在这两个男人之间，她觉得自己疲乏、痛苦，于是她想到了自杀。她说，仅是孩子的爱，才使她活下来。

乔治·桑认为她没有幸福过。她处于被人指责、被人诽谤的境地，可是却有清白无辜的感觉。

1834年9月，她阅读了好几部书。另外，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缪塞的信，尤其是她当时收到的他的信。

那是些热烈的、兴奋的信：“请对我说，你把你的嘴唇、牙齿、头发，这一切，连同我曾经占有的那个脑袋一并给我；并告诉我，你拥抱我，你，我！呀，天哪！呀，天哪！我一想到此，喉咙就哽塞，眼神就慌乱，膝头就摇晃。啊，死亡可怕，如此恋爱也可怕。啊，我的乔治，我多么想念你，多么想念你！我求求你，让我写完这封信。我正在死去，永别了……”

在巴登，缪塞有了一些轻松的时刻，甚至有一个良好的机运，激发他写了一首诗。

但嫉妒是真的，对他认为失去的女人的感情也是真的。

在诺昂，乔治·桑躲在一个小树林里，用铅笔给他回信，并尽力安慰他，“啊！你还过分地爱我，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

可怜的帕吉洛，这个诚实而纯洁的小伙子，也要吃醋了。在他的那些信里，大肆指责乔治·桑。

诗人缪塞从巴登给乔治·桑写了那些令人赞叹的卢梭式的热烈的书信；而软弱多疑的帕吉洛则劈头盖脑给她倾下笨拙的刺人的话。

在这两个情人之间，乔治·桑已经拿定主意，不再犹豫不决了。

她认为自己心灵受到了帕吉洛冒犯，清楚地感觉到帕吉洛不再有诚意，因此他们之间不再有爱情。

在乔治·桑和缪塞的艳情之间，经过帕吉洛这段插曲，悲剧变成了喜剧。乔治·桑以夸张的词汇问缪塞：“高尚的、信任的爱情是否可能？难道我至死都不能遇见它？抓住的总是虚无的影子，追求的总是缥缈的东西！我厌倦了。然而我又爱他，真诚地、严肃地爱这个高尚的，与我一般浪漫，我

以为比我强的男人。我爱他像一位父亲，而你就像我们两人的孩子……”

她本希望大家都幸福，人人相信她所言，每个情夫都爱她，并高尚地同意她也让他情敌高兴。

可是人类并不如此。爱情并非好客的、敞开的；爱情是怀疑的、排他的，充满了不安和嫉妒。

9月15日，缪塞给乔治·桑写信说：“如果我回巴黎，或许会使你不快，也会激起他反感。我承认我现在不再宽容什么人。如果他痛苦，那就让他痛苦好了。这个威尼斯人让我学会了经受痛苦。我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乔治从诺昂匆匆赶回巴黎，以便先安慰帕吉洛，之后再牺牲他。

这个戏剧性情景的精彩之处便是帕吉洛根本不需要她的安慰。从威尼斯到巴黎时，他就预计到这种结局。他在法国的居留使他感兴趣，一些著名的医生对他亲切和蔼，没有情妇的生活使他感到一种美妙的清静。

他是这样叙述断绝关系的：

乔治·桑的一封信通知我，我的油画卖了一千五百法郎……狂喜之中，我跑去买了一个外科工具箱，和对我的职业有用的几本新书……我们的诀别是无言的。我握了握她的手，却不能望望她。她似乎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她是否痛苦。但我的在场使她为难……

帕吉洛退场了。善良的大夫口到威尼斯，在那里完婚，养育了众多子女，一直活到九十一岁。由于这场青年时期的艳事，他享有了一定的声誉。那些一时与某个光亮的命运联系，又很快从聚光灯危险的光束里跳出来的人，是幸福的。

第三节 最后的分手

“我再也不见你朝我低下，也不见你蒙上一层淡淡的忧郁！我柔软而温热的小身躯，您不再在我身上俯倒……”

“我心安理得。我做了我不得不做的事情。”这是她最后的宣言。

乔治·桑和缪塞从第一次重逢起，就又成了情人。

他，为爱情而陶醉；她，感动和同情。

可这并不是完全而甜蜜的和解。

他答应忘掉过去，这是酒鬼的誓言！

他连连不断地以细小的问题纠缠乔治·桑——她何时成为大夫的情妇的？怎样成为的？

她拒绝回答，扯起一块遮羞布，“你认为佩德罗如果问你我的枕间秘事，我会回答他？”

缪塞进入了恶性循环：受虐色情狂患者需要知道最糟情况，吃醋，骂人，大吵大闹；然后内疚，请求原谅，柔情缱绻，并且如果人家反抗便发病。

乔治·桑又一次被迫去他母亲家中照料他。她向女仆借了一顶便帽，一件罩衣。

德·缪塞夫人熟知内情，却假装认不出她来。

阿尔弗雷德病一好，便又到马拉盖滨河街乔治·桑的寓室住下。不过，他们再也不可能愉快了。俩人之间又开始了侮辱人的吵闹和多情的便函交替的局面。

她发现了绝境，“你明白吗，这一切是我们玩的一场赌博，不过赌注是我们的心灵和生命。而且，实际不会与表面上一样有趣。你愿意我们一起去弗朗夏尔，彼此开一枪，打得脑浆迸裂吗？这很快就会是事实……”

接着，由于他们两人都不想自杀，所以她认为一刀两断更明智，于是去了诺昂。

但男人往往鄙视自荐上门的，而追求拒不允婚的。

乔治·桑大概惊讶地看到，这一回，缪塞同意绝交。

她马上停止做如是希望。她的傲气受到伤害，便赶回巴黎，想见他。

缪塞经朋友们唆使，没有理睬。

她知道他谈她时冷酷、愤慨。有人告诉她，他不愿再见到她。在1834年11月的这些不愉快的日子里，乔治·桑写了一篇《私人日记》，这是她写的最优美的文章之一。

当爱情过于强烈地攫住我时，我要不要跑去？要不要把他的门铃绳拉断，一直到他给我开门为止？我要不要横躺在他家门口，直到他经过？……

我要不要对他说，你还爱我，你为此痛苦，你因此脸红，但你太舍不得我，不会不爱我。你明白我爱你，我只能爱你。

拥抱我吧，什么也别跟我说，我们也不争辩。对我说几句温情话，抚摸我，既然你认为我仍然俏丽……好吧，当你以后发现你觉得厌倦，又变得恼怒时，你就把我打发走，就虐待我，但永远不要说这可怕的话：“最后一次！”

你愿要我多么痛苦，我就多么痛苦；只是有时，哪怕一周一次，让我来寻求让我活下去，给我以勇气的一滴眼泪、一个亲吻。可是你不能做到。啊！你已厌倦我，因而你很快就痊愈了……

她试图会见一些朋友。在布洛兹的要求下，她摆姿势，让浪漫主义画派的领袖德拉克鲁瓦作画。德拉克鲁瓦对她说起缪塞的速写所显示的才华，勾起了她的痛苦。阿尔弗雷德欣赏西班牙画家戈雅笔下的女人头像。于是她梦想自己也被画成那样。

她常去拜访亲切的、非常会做人的霍尔滕丝。霍尔滕丝告诉她，对付男人必须用计谋；要佯装生气，使他们归返。真是蠢话！既要用计谋，就不必爱。唯有圣·勃夫不对她说傻话。她问他：“什么是爱情？”他答道：“就是眼泪。您哭了，您就爱了。”然后她寻求孤独。她写道：“我再也不能写作了。”这是她从来未遇到过的事情。

她知道，如果缪塞只是任性，那他会与她重修旧好，可是他还有自尊，那可怕的男性自尊。对她来说，她愿能够重获缪塞的友谊：

要是我不时地得到你的几行字，一封短信；要是你允许我有时给你寄上滨河街上买的几文钱的小图片，寄上我制的烟卷，寄上一只鸟，一个玩具，某种哄骗我的痛苦和烦恼的东西，以便想到你在接受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时，有点想念我，那该多好……

啊，我的蓝眼睛，你们不再注视我了！美丽的头，我再也不见你朝我低下，也不见你蒙上一层淡淡的忧郁！我柔软而温热的小身躯，您不再在我

身上俯倒，您不再摸我的手，说：“小姑娘，起来吧！”

永别了，我的金黄头发；永别了，我的雪白的肩膀；永别了，属于我的一切！现在，在我热烈的夜晚，我将拥抱林莽间的枞树和悬岩，一边呼喊着您的名字。当我渴望快乐时，将昏倒在潮湿的地上……

到了十二月，她精疲力竭，便去了诺昂。她认为自己几近屈从。阿尔弗雷德给她写了一封相当亲热的信，说为自己的粗暴懊悔。“就这样，完了。我不再希望重见他。这叫我太难受了……”

通过这封信，她获知这次绝交是决定性的。她不能经受这一打击。她把秀发剪断，给缪塞寄去。

缪塞收到这沉甸甸的黑色卷发时，泪雨滂沱。他又一次被征服了。

乔治·桑得意洋洋：“阿尔弗雷德又成了我的情夫……”

但他们两人都染上了最糟糕的疯病：对绝对的追求。一次又一次绝交，一次又一次和好。他们垂亡的爱情经历了一次次惊跳，但这不是临终的抽搐。乔治·桑和缪塞活像浑身血汗、扭抱一团、打得鼻青脸肿、观众不能将其分开的斗士。

有一天，缪塞威胁要杀她。接着，通过一封用意大利文写的短函，他要求最后一次约会：“不要见，也不要说话，只要摸一摸一个疯子的手；他明天就出发……”

圣·勃夫是最后这场斗争的仲裁人。他参与进来，以使这对情人间的斗争了结。乔治·桑弃绝了他。

缪塞：“我的自尊心现在已经损害，我的爱情仅仅是出于怜悯，必须消除它。你的行为是荒谬的。我的天哪！我将把你扔在什么样的生活里？酒，妓女，酩酊大醉。说不定还不止这些。而且是永远！既然我不再能做什么事情，使你避免这种生活，那就必须对我延长这种耻辱，对你延长这种折磨……”

由于阿尔弗雷德坚持要来她的寓所，她便跑到诺昂去。乔治·桑在爱情的纷繁杂乱之中，仍保持着机智和组织者的才能。诺昂的女领主在最糟的时刻担负起了散漫主义女英雄的职责。

“我心安理得。我做了我不得不做的事情。”这是她最后的宣言。

喧哗声平息了，雷雨远去了，田野的歌声湮没了最后几声闷雷，不过这段轰轰烈烈的艳史以失败告终。乔治·桑又一次认为可以藐视世界，可以强使人承认自己的独立，可以在爱情和自由中生活。然而爱情和自由显得水火不容。她最忠实的朋友们，她的听忏悔师圣·勃夫暗暗地指责她，并劝她保持贞洁的爱情即接受不圆满的爱情。

不，她既不再希望温柔的、持久的爱情，也不再指望盲目的、强烈的爱情。她明白感情是美好而神圣的事物，她既未好好对待，人家和她在一起也未好好对待。她自忖太老了，不能再激起爱情。她不再有信心，不再抱希望，也不再怀欲望。她不否认她年轻时所崇拜的神，但她并不爱它，而它把她打垮了。对她来说，骑马溜达的时代已经终结，她不再踏马镫。

乔治·桑明白，“我的过错和痛苦都在那里，在毁了我的贪婪的傲气里……男人和书都该诅咒，他们以诡辩助长了我的傲气！我本该只读富兰克林的书。直到二十五岁，读他的书都是我的一桩乐趣。他的肖像挂在我床头，总是叫我想哭，就好像是我背叛过的一位朋友的肖像。我不会再读富兰克林，不会再找我的耶稣会的听忏悔师，也不会再回到延续了六年之久的我的柏拉

图式的初恋；也不会再去收集昆虫和植物标本，再去猎狐，再去纵马驰骋；也不再享哺育孩子的乐趣。我再清楚不过，过去存在的一切将来都不会再存在……”

人们处在浪谷时，便忘了只要继续生活和行动，永恒的运动便会把他们带上波峰，这是人所共有的错误。

乔治·桑怀疑过去存在过的不可能再存在。然而可能的事情仍然不可胜数。当她为给缪塞造成痛苦而懊悔时，她会不会相信，缪塞会如此快地恢复平静？

诗是人们在平静之中记起的一种感情。缪塞不再痛苦，因此，只要艺术要求，他便能心甘情愿地再次揭开伤口。他保留的这个痛苦时期的回忆，这些爱情、欢乐和疯狂的日子里的景象，给他的所有作品提供了养料。有时，这是一声仇恨的呐喊，但更经常的，是他怀念骄傲的女人，怀念她的黑色鬈发和美丽的眼睛。

从前他答应乔治·桑写的关于她的书，1836年以《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为名面世。

他在书里以勃莉吉特·皮尔松之名描写了乔治·桑。笔调并不严厉，甚至带着尊敬。男主人公奥克塔夫在过了放荡生活之后，养成了嘲笑幸福的夜晚所具有的圣洁和神秘的东西的习惯。他一时把勃莉吉特当成不忠的情妇，一时又把她当作自己供养的妓女。勃利吉特却一直怀着慈母心肠。“是的，当您让我痛苦时，”她说，“我不再把您看作情夫；您是一个患病的孩子，我愿意照料，愿意治愈您，以便重新获得我喜爱的……但愿母亲和情人的保护神让我完成这一任务……”乔治·桑肯定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小说以一次原谅的开始为结尾：“亲爱的勃莉吉特，我不相信我们可能互相遗忘。但我认为眼下我们还不可能相互原谅。然而这是无论如何要办到的事情，即使我们永不重见，也要相互原谅……”

乔治·桑读这一段时，大哭了一场，“然后我写信给作者，告诉他一些说不上来的东西：我曾经十分爱他；我完全原谅了他；我永远也不希望再见到他……”

在最后一点上，他俩意见一致。

将近1840年底，有一天，缪塞穿过枫丹白露的树林，回想起了那位使他的青春狂热的女人。不久，他在剧院遇见了乔治·桑；她仍然年轻，漂亮。她嘴角上挂着笑意，像个陌生人一样盯着他看。夜晚，回到家后，他便写出了《回忆》。它的主题是：“是的，爱情逝去，正如人的所有感情，正如人本身。”

人们可以想象比浪漫的爱情更美好的爱情方式，人们也可以希望一种将由时间和意愿改变为观念的激情。一个伟大的灵魂可以凭忠贞和诚意起誓，并恪守誓言。但艺术家的行为与别人的行为，绝不能用同一座天平来衡量。每个艺术家都是一个出色的演员，需要超出可以经受的激动，以使他的思想变成某种丰富而独特的东西。

一个道德家有权利说乔治·桑与缪塞本应生活得贞洁一些。不过这样一来，那些源于他们的过错与痛苦的艺术作品便不可能诞生。

缪塞在乔治·桑之先就经验了肉欲，而不是爱情，这就是我们不能为1834年的一天而遗憾的原因。那一天，在一间充满幽灵的房子里，两个情人处于极度烦恼之中，互相伤了对方的心。房子下面是红色的威尼斯。市井的喧嚣

与死水的浓臭直达他们那儿。无疑，他们的叫喊有某种夸张的意味，他们的狂热也有某种佯装的成份。

第一节 钢琴王子李斯特

1835年，奥洛尔与卡西米尔签了一份离婚协议，由此引出了一场纠纷。

继缪塞、帕吉洛之后，乔治·桑相信自己已经忘记了爱恋的热情。

缪塞离开她的时候，身后留下了弗朗茨·李斯特。

李斯特希望玛丽像乔治·桑一样离开丈夫，然后同情人公开在一起生活。

1835年3月底，诺昂，在初春的日子里，花园里美丽迷人。忧郁的杜德望夫人，走到长春花和风信子花丛，坐在一张长椅子上，准备读圣·勃夫的一些来信。

信中充满了责备、鼓励与提醒，布洛兹感到恐惧，因为她向他索求柏拉图的著作和《古兰经》，他害怕神秘主义倾向会猛烈袭击他的头脑和《两世界评论》杂志。他对圣·勃夫说：“请写信给乔治·桑，叫她不要太神秘化了。”

布洛兹的害怕并不是没有道理。女小说家搞神秘主义，却不再是那种鼓吹爱情狂热的神秘主义。乔治·桑肯定地表示，宁可肝脑涂地，也不会再像最近三年那样生活。

“不要温情而持久的爱情，也不要盲目而狂热的爱情。这两种爱情都很美妙宝贵。可是，对于我来说，它们却已经过时了。”

在爱情上经历了那么多次失败，她感到害怕，希望在其他方面寻求安慰。可到哪里去找？用什么方法去找？像从前在英国女旧道院一样，或者如圣·勃夫忠告的那样，到上帝那里去找吗？她想这么做，不断热爱那陌生的上帝。

在愁惨的夜晚，微弱的星光下，诺昂的庭院里万籁俱寂，神秘莫测，一片昏暗。她感觉到上帝就在那遥远的群星之外。但是，她的优雅妩媚已经消失，她悲伤得要死。她想：“上帝不爱我，也不为我操心；上帝把我留在人间，使我孱弱不堪，无知无识，潦倒不幸……”

她被爱情避弃之后，又被上苍抛弃。

圣·勃夫的来信中，她只记住了两个词：“克己”和“牺牲”。

她愿意投身到某一伟大的事业中，利用那使她窒息的旺盛精力，从个人主义与骄傲自负中解脱出来。这种想法始终显得空泛而漫无目的。

她能对谁表示一片赤诚？

孩子们不在身边，远在他乡：莫里斯念中学，索朗芝在寄宿学校。胖丫头变得调皮捣蛋，谁的话都不听；但是，她的模样漂亮有趣，能得到别人谅解。莫里斯是个多愁善感的小伙子，总想厮守在母亲身边。母亲也希望有人带他回诺昂。但是乔治·桑知道，这样就会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与卡西米

尔常常发生争吵。

拉夏特尔的杜特伊是她的知己和诉讼代理人，他建议奥洛尔做他的情妇，同时又让她与丈夫言归于好。

这计划使她反感：“没有彼此倾慕与深情的亲近，想起来都觉得可耻。一个女人力争与丈夫接近，为的是夺取他的意志，这与下等妓女为了糊口、高等妓女为了奢侈而卖淫毫无二致。”

杜特伊谈到她要替孩子们着想，她加以反驳，说自己对重修旧好本能地深感讨厌。

并不是她的丈夫比别人更引起她身体上的厌恶，或者精神上的反感。但是，她认为一个女人不能像一件东西那样委身于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更是有精神的人。如果说身体的某些功能，比如吃饭、消化等，精神固然不必参与，那么两个人在爱情上的结合，难道能够同那些功能相提并论吗？只要一想起这点，就令人愤慨。”

既然她不想把卡西米尔拉过来，剩下的问题就是从生活中排除他。她热切地希望在肉体上和财产上同他分开，她自己最终成为家里的主人。

杜德望呢？他已厌倦了乡村生活，不反对到巴黎去当单身汉。

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离婚的初步协议，奥洛尔要留在诺昂；卡西米尔将拥有巴黎的纳博纳公馆，每年可收房租 6700 法郎。他要抚养莫里斯，支付其食宿费用和看门人的工资，还要缴纳税款。奥洛尔则负责抚养索朗芝，协议在 1835 年 12 月执行。

协议刚一签字，卡西米尔就后悔了。他舍不得诺昂这个小王国。他的妻子却不把协议看成是悲剧性的，或者是严肃的事情，“我的职业是自由；我的癖好是不接受别人的怜悯与恩宠，甚至当别人用我的钱财对我大发慈悲……”尤其是他很尊重孩子们的意见，不希望父亲在他们的眼里是个受害者。

怎么办？杜特伊建议乔治·桑去请教布尔日城的著名律师路易·米歇尔。

路易·米歇尔尽管才三十六岁，从外貌上看，却已是个秃顶驼背的小老头了。他的脑袋特别大，好像是两个头焊接而成的。他脸色苍白，牙齿洁白整齐，眼睛近视，却充满了柔情蜜意。

米歇尔的父亲是瓦尔省的一个贫苦樵夫，后被人杀害，米歇尔在农村长大，总是穿着不成样子的宽袖长外套，粗笨的木鞋。一年四季他的头上都包着三条头巾，古里古怪。

那是因为他常常生病发烧，感到发冷，在奇异可笑、粗俗而又富有挑衅性的头饰下面，可以见到一件细布衬衫，总是洁白干净。

这个威严的律师很喜欢献殷勤，喜欢女人。他勾引女人的手段就是雄辩的口才。当他口若悬河的时候，似乎变得漂亮动人。

乔治·桑为自己的官司来征求米歇尔的意见，可是他只是大谈自己对《莱莉亚》的看法。在一个美好的春夜，月光皎洁，他俩在朴素安静的布尔日城内散步。米歇尔一直讲到黎明。

这谈话好比一首充满思想的乐章，通过合乎逻辑的联系和轻柔的音调变化，毫不费力、也不用对比，就把杜德望夫人的灵魂一直高举到天上，进入凝思，接着又把她带回人间、置于自然的气息之中。

她毫无招架之力，着了迷，从失败中感到快乐。米歇尔对她使出浑身

解数。他欣赏《莱莉亚》，乔治·桑更使他特别欢悦。他把自己整个儿奉献给乔治·桑，拿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同情心。

继缪塞、帕吉洛之后，乔治·桑相信自己已经忘记了爱恋的热情。实际上，她像一匹勇敢的战马，久经征战之后，重新在享受牧场的安宁。但是，一旦远方响起了号角，便又跳过栅栏奔驰，如果说她的自我奉献是无私的举动，并伴随着强烈的感情，那么哪怕是即时的献身，对她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

她与米歇尔会见不久，便送给他一个戒指，做为他们初次爱情的纪念，她说，他是“她自降生那天起就爱慕的人。相信这是在做了种种幻想之后，终于找到的爱人，并且要把他据为己有”。

然而，尽管在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话，她仍旧保留判断的自由和良知。乔治·桑本能的观念，就是爱情和正义；而米歇尔本能的观念，却是以断头台为手段，达到谋取权力的目的，乔治·桑回到诺昂以后，开始给米歇尔写信，既是恭维，又是对抗。米歇尔，他是个博爱家吗？

博爱造就了慈善的修女。爱慕光荣则不同，产生了其他的人，狡猾的伪善者，你给我闭上嘴吧。在命中注定的陡峭的斜坡上锻炼你本能的力量，你把这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结果误解了自己。至于我，我知道你这个人不肯尽义务，而把义务强加于人。你不喜欢人类，不是他们的弟兄，不跟他们平起平坐。你生来就是国王……

她准备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充满着失误和过错，但是对过去的错误并没有在理论上予以重视：“长期以来，我所认识的人都相当爱我，宽宏大量地评价我，原谅我所做的错事。我的著作，从来没有做出任何结论，既没有好的效果，也没有坏的恶果……”

米歇尔焦急地问道：“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有结论呢？如果您到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出结论呢？”

她喜欢感受到这种力量对自己的鞭打，她第一次同那个比她更倔犟的男人打交道。

他对她喊道：“傻瓜！”

这是一种新的感觉。

她抚摩他那光秃硕大的前额。她认为自己希望米歇尔苍老多病，以便照顾他。但是他生的是心病，徒有雄心一片，却不能如愿以偿。她对他说：“你觉得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呀！时间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过去，你的头发脱落了，灵魂消磨了，而人类却停步不前……”

四月底，米歇尔去巴黎，为那一年的一起政治要案，即里昂起义案做辩护。

乔治·桑打算到巴黎去与米歇尔相见，也看看辩论的情况怎样。

圣·勃夫用情场上的经验来提醒她，她有重新见到缪塞的危险：“朋友，您不要设想不会见到他，也不要设想他不知道您来巴黎，更不要设想他不会来找您。试想一下，您在那里，您替他开门，当时除了您之外，没有第三者在场……”

她偷偷笑了。她正是要见缪塞！

米歇尔竭尽全力为四月案件中的被告们辩护。每晚从法庭回来，他总有几小时惶恐不安。乔治·桑就像热情洋溢的护士，守候在他身旁，把自己的心血全都付与这个不成人样的人。

米歇尔感觉好一点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辩论，这一次为的是转变乔治·桑的思想。

那不是因为她坚持反对的立场；她跟他一样憎恨中庸政府。拿破仑代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她是一个态度不甚明朗的波拿巴主义者。因为她痛恨年老的伯爵夫人们，打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她还继承了母亲的遗传，一直是平民的朋友。她赞成财产平等，但把这看成是分享幸福，而不是分配所有权。

一天晚上，乔治·桑在横跨塞纳河的圣父桥上听米歇尔说教。伊勒里王宫的灯光照耀着广场上的树木，跳跃闪动。他讲的是用暴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

乔治·桑漫不经心地享受着这迷人的夜晚，享受着远处传来隐约可闻的管弦声，享受着明亮温柔的月光与节日的王宫投在河中的倒影相互重迭的美景，米歇尔的声音突然把她从冥想中唤醒。

他喊道：“我对您说，为了使您那腐朽的社会焕然一新。变得年轻，应该让这河里的流水如鲜血一般殷红！让这可恶的王宫化为灰烬！让您目光注视的大城市变成光秃秃的沙滩！让穷苦人家在那里耕耘劳作，建起茅寮！”

这天晚上，他激动地高声喊叫，用手杖猛击古老的卢浮宫的宫墙，结果手杖都折断了。这使乔治·桑感到沮丧和厌倦，她转身朝马拉盖滨河街走回去。于是，他跟着她，哀求乔治·桑继续听他讲。

以后，每天都有争辩，她抱怨米歇尔摆出知识权威的架子。她相信才智与爱情甚于相信暴力。她感激米歇尔使她看到了完全平等的理想，但是她担心如此激烈的雄辩会导致轻举妄动或者动刀动枪。她以严格审慎的理智询问，他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他的计划是什么？而他却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事态的发展会给他指点。他又说：“真理是不会显现给蛰居深山的思想家的。为了找到适用于劳动者社会的真理，应该团结一致，行动起来。”

米歇尔责备乔治·桑没有耐心。一天早上她正要同他争辩，却发现他刚刚已经走了，并把她锁在屋子里。好多天，他都这样把她整天囚禁起来。他笑着说：“我把你藏起来，给你时间去思考问题。”

起初，她还为自己任人摆布而感到某种快乐，然而她的思想并不因此有所改变。她老是在想，下等人与上等人没有什么两样，被压迫者比压迫者更有价值，奴隶比暴君更为可贵。“我从来就对一切将要在泥阶上生长的东西表示愤恨。”然而这种愤恨始终是被动的。除了一些尚武的热情之外，乔治·桑又隐入一种充满诗意的生活中去了。她出于对米歇尔的爱慕，终于接受了他的旗帜，而不接受他的理论。

新旧朋友的更替如同腐殖土层的更新一样。初到巴黎的时候，杜德望夫人有贝里同乡勒尼奥、弗勒里等人做伴；拉杜什和圣·勃夫是她的密友。她与桑多断交，便疏远了巴尔扎克和勒尼奥，随后热情造成了空虚。缪塞离开她的时候，身后留下了弗朗茨·李斯特。缪塞曾带他到马拉盖滨河街。

天才的音乐家李斯特使乔治·桑喜欢不是没有理由的。乔治·桑由祖母抚养长大，本能地懂得最妙的音乐。但是还有别的许多理由。李斯特像她一样，在青少年时代信奉神秘主义，还保持着炽烈的虔诚心；像她一样，他对穷人抱有亲切的同情；像她一样，他把贵族的态度与民主的言论结合在一起；像她一样，他阅读诗歌集和哲学书，追求高尚的感情，希望自己无所不知。李斯特比乔治·桑小七岁，两眼投射着闪电般的光芒。

他演奏时，那柔软光滑的秀发随之飘舞。乔治·桑早就爱他了。

巴黎的流言蜚语说她已经爱过他了。缪塞一度嫉妒李斯特。乔治·桑和弗朗茨总是拒不承认。但是他俩都相当公开地过着狂放不羁的生活，以致人们都信以为真。

李斯特欣赏乔治·桑写的小说，夸赞她关于风流韵事的构思。但她丝毫没引起他的肉欲。

至于乔治·桑，她愤怒地写道：“要是我能爱李斯特先生，我早就爱他了。但是，我不能够……如果我喜欢吃菠菜，那我就吃了，然而我讨厌吃菠菜，要我喜欢菠菜，我会生气的……”

事实上，弗朗茨爱着另一个女人，达古尔伯爵夫人。她是德国银行家贝特曼的外孙女，弗拉维尼伯爵的女儿。这位蓝眼金发女郎，高挑身材，瘦薄如纸，皮肤白皙，正要大胆地风流快活一番。

缪塞把李斯特介绍给乔治·桑；李斯特促成了乔治·桑与德·拉姆奈神甫的结合。

德·拉姆奈是一位神甫，也是一位作家。这是一位天真烂漫、固执己见、心地高尚的教士，是个容易发怒、喋喋不休的“道德标本”。拉姆奈认为教会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圣灵、反对专制政权。除了灵魂，一切都属于恺撒大帝。他回顾教会的作用，发现它始终是同化并且圣化伟大的历史潮流。十九世纪的天主教教义应当是自由化的、社会的和民主的，做为平民预言家，拉姆奈相信自己是应命振兴教会的。结果他受到罗马教廷的严厉谴责，被撤职和开除教籍。他感到痛苦，幻想破灭了。他说。“我希望能够同我自己决裂。”

他住在里沃利街的一个小房间里，幻想为自己建一个地牢，让人们在地牢的门上看到一条座右铭：我宁折不弯。

拉姆奈个子矮小，纤弱干瘦，脑袋挺大，跟整个身体极不协调。他态度拘谨不自然，近视的双眼却在眼神里带着骗人的柔情。他瞧不起妇女，说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进行推理达十五分钟之久的。然而他使乔治·桑狂喜。他给她带来了宗教信仰与社会信仰的混合物。这正是她所需要的。

乔治·桑给拉姆奈大唱颂歌：“世上从来没有一颗比他更温柔的心，没有什么人比他更慈祥地关心别人，比他更有天使般的耐心……”

李斯特向乔治·桑描述了神甫的衣着：磨损了的外衣，只有农民才穿的蓝色粗袜，很旧的破草帽。他还谈到了自己同达古尔伯爵夫人的爱情有了进展。

李斯特希望玛丽像乔治·桑一样离开丈夫，然后同情人公开在一起生活。1835年6月，他终于胜利了。

伯爵夫人说：“这是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考验，但是我的爱情就是我的信仰，我渴望做一个殉道者。”她已有了身孕，那是李斯特的骨肉。她等待小孩在十二月份出生。

乔治·桑看到伯爵夫人这样的贵妇，其所做所为竟像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感动不已。

我美丽的长着金发的伯爵夫人，我本人并不特别了解您，但是我听李斯特谈起过您，我也见过您。我相信，根据这些我能够神志清醒地对您说：我爱您。您是在贵族阶层里看到的唯一光芒四射的尤物。您雍容华贵，美貌绝伦，而又受人尊敬。事实上，您应该是强有力的，使我忘记您是伯爵夫

人。但是，您现在对于我来说，才是真正神奇的公主，多才多艺，举止端庄，谈吐高雅，衣饰华贵。我就是这样看您的，不管您怎么样，我都爱您。我很希望去看望您，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计划。我想，我们见面多了就会真诚相爱。您比我强千倍……

这是一封优雅亲切的信。

然而，这两个女人生来就不能融洽相处。达古尔夫人像杜德望夫人一样，不受家庭和上流社会的束缚。但是，乔治·桑虽然是国王的亲戚，却常常夸耀她那以捕鸟为业的外祖父；玛丽往往提醒那些把她忘记了的人，说自己是出身名门望族。乔治·桑喜欢穿着紧腰宽摆的蓝布衫和男人长裤，在田野上纵马奔驰；达古尔夫人却不穿一千法郎一件的连衣裙就感到不自在。乔治·桑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个才子到另一个才子，情人不断；而玛丽只有一次向恋情让步，并声称要用忠贞来使通奸合法化。

李斯特和达古尔夫人带着自己的爱情一起到瑞士去生活了。在旅居瑞士期间，他们继续同乔治·桑通信。乔治·桑通过他的来信猜测李斯特在日内瓦的情况，不由得暗暗欢喜，看得出他已感到厌倦，尽管他过分表白自己在那里十分幸福。

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催促乔治·桑到瑞士来。可是在临行之前，她要了结贝里的官司。

第二节 离婚的烦扰

“我的东西交到魔鬼手里，我却每年被人赶出家门。然而，镇上的一些放荡女人却睡在我的床上……”

卡西米尔整理出一份备忘录，向法庭披露妻子的一桩桩通奸行为。

伟大的上帝！请您保护一切愿做好事的人，镇压一切要做坏事的人。

1835年2月，奥洛尔·杜德望同丈夫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十一月份执行。但是卡西米尔却拿不定主意，并且变得容易发怒。妻子交了一些政治上的新朋友，使他深感不快。

夫妇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奥洛尔打算撤销卡西米尔对她的家产的管理权。她说是卡西米尔把家产给弄光了。然而她同意甚至在离婚之后仍然供养他。

她在给伊包利特的信中说：“你可以想到，我不会让丈夫在麦秸上断气，尽管他不那么可爱。”

1835年10月19日，他们又发生了一场争吵，虽然说不太严肃，却决定了他们的决裂。

晚饭后，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客厅喝咖啡，莫里斯又要添奶油。他爸爸说：“没有了，到厨房去。滚开，滚出去！”孩子于是躲到妈妈身旁。夫妇俩接着吵起来，奥洛尔显得心平气和，而卡西米尔怒不可遏。他命令妻子出去，她回答说她是在自己家里。

卡西米尔说：“咱们等着瞧吧。滚出去，不然我就打你耳光！”在场的

朋友都出来劝阻。

卡西米尔气得发狂，朝他放武器的地方走去，大喊道：“让这一切全结束吧！”杜特伊看到他拿起一枝猎枪，便从他手里夺过枪，并且严厉地责备他。卡西米尔说：“要是惹我生气，我不能控制自己，也会打你两记耳光。”

乔治·桑用农妇的诙谐语调，对这次争吵做了叙述：

男爵一时起了打我的念头，杜特伊不愿意他这样做。弗勒里和帕佩也不愿意。于是男爵就去找他的枪，要杀死所有的人。大家都不愿意被打死，男爵就说：“够了”，他又重新喝酒。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谁也没有生他的气。而我呢，我可受够了。我讨厌为了活命而写作，我的东西交到魔鬼手里，我却每年被人赶出家门。然而，镇上的一些放荡女人却睡在我的床上，把虱子带到我的屋里。

她到布尔日去了。米歇尔因政治罪正在监狱里服刑。狱中的待遇并不太苛刻。所有的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她应该利用这凑巧的事件，提出尽快离婚，妥善地了结此事。而此时所缺的就是取得卡西米尔的同意。这好办，因为只要卡西米尔的嫡母还活着，他这个私生子不能继承遗产，很需要钱用。事实上，他同意在辞去诺昂镇长的职务之后，就带两个孩子上巴黎，一个送到中学，另一个送到寄宿女校。

奥洛尔已经嘱咐她的母亲，如果卡西米尔去看她，要好好接待，不要刺激他的自尊心。“他也许会找些碴儿，同我过不去。我需要做的事，想做的事，什么也不能阻拦我去做。当我的良心要求我拿出勇气和主持正义，我就会嘲笑一切偏见，无愧于我的父亲。

要是他听任这世界上的傻瓜和疯子摆布，那我就跟他一刀两断。然而，他遗留给我的，是独立自主与父爱的伟大榜样。我将尽力效法，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愤慨。我只关心莫里斯和索朗芝。”

十一月份，她在诺昂等待法庭的判决，同时在这静幽的祖居写完了最后一部优秀的小说《莫普拉》。她没有仆人——卡西米尔把他们都辞退了——只有园丁夫妇俩做家务。

法庭的判决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奥洛尔的言行举止，她在专心地弹钢琴练习曲。

1836年1月，拉夏特的大法官听取证词。指控是众所周知的：1824年在普莱西她被他打了耳光；受到他侮辱人格的谩骂……在合法夫妇的住宅内，卡西米尔与女仆佩皮塔和克莱尔等通奸……通宵达旦地狂饮作乐。

她在诉状中说：

杜德望先生变得如此荒淫放荡，如此吵闹，以致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都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放纵情欲。我在宁静的夜晚经常被他行欢作乐的喧闹声吵醒……1831年元月，我向杜德望先生宣布，我想同他分居，结果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正是根据这个协议，我去巴黎定居……到意大利旅行。在这期间，杜德望先生给我写了一些很得体的信，说对我的远离并不十分关心，也不很希望我回去……

她没有一字提到桑多，也没有提缪塞。

伊包利特尽管是起诉人的哥哥，却站在妹夫一边，鼓励卡西米尔做自我辩护，说乡亲们支持他。卡西米尔却沉默不语。他不想丢掉已经商定的年金。他听任法庭作缺席判决。

拉夏特法庭同意孩子由奥洛尔照管。但是，她要求得到一千法郎，

以便结清她和丈夫共同财产的账务。

卡西米尔不由勃然大怒，坚决表示反对。

伊包利特在这件事上极力怂恿他：“你周围有人帮忙，一下子就能打赢官司。关键在于要使他们开口讲话……”

乔治·桑对丈夫完全改变态度感到突然和恼怒。

相安无事的分居时期结束了。她不得不离开诺昂。直到最后判决之前，诺昂都是属于卡西米尔的合法财产。

她到了拉夏特尔，住在杜特伊的家里。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取得舆论界的谅解，因为小城市的舆论界能对法官施加无声的压力。她尽量使自己讨人喜欢。跟小孩子们在一起就天真活泼；同男人在一起，就贞洁娇好；同女人在一起，就谨慎从事。她在田野散步，追逐昆虫，还想方设法在公园和大路边同米歇尔秘密幽会。她给儿子写了许多亲切慈爱的信，赞扬高尚的道德，她特别努力工作。不管是打官司，还是同米歇尔的冲突，还是频繁的通信，都不能使她不去像蚂蚁一样耐心地劳动。

诉讼的双方都焦虑不安，动员一切人证、物证。

乔治·桑给布古瓦朗写信，让这位爱她的孩子的家庭教师指证丈夫与女仆的通奸行为。

卡西米尔也同样给在巴黎的朋友写信，为妻子在那里的不端搜寻物证。

最后，卡西米尔从麻木迟钝中清醒，整理出一份备忘录，详细列举了令他不满的事，备忘录的开头是这样的：

1825年8月：比利牛斯山之行，同奥雷利安会见与通信。10月：波尔多之行，奥洛尔·杜德望与奥雷利安被当场捉奸。

1827年：奥洛尔·杜德望同斯特凡·格朗萨涅有情书来往。1827年11月：由斯特凡·格朗萨涅陪同做巴黎之行，借口要治病和疗养！

1829年：奥洛尔·杜德望写信给斯特凡·格朗萨涅，向他要毒药，借口要自杀。1829年4月：夫妇俩出发去波尔多，约定在那里住三个星期，或者顶多一个月。一住就是三个月。每天早上，杜德望夫人都要访问格朗萨涅先生，借口是去洗澡……

1830年11月：杜德望夫人到达巴黎，住在塞纳街她兄弟的家里。据看门女仆说，杜德望夫人的行为使整个家庭蒙受耻辱。于勒·桑多先生。

1831年：她回诺昂只住几天，又回到巴黎，她雇的女仆、乡下姑娘玛丽·莫罗同行。

女仆目睹了她同于勒·桑多先生大吵大闹，大打出手。

1832年：古斯塔夫·普朗什先生……

1833年：偕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先生出发去意大利，逗留了八个月……争吵与和解……

1835年：夫妇不和，杜德望夫人学着年轻男人的样子，抽烟，骂人，而且穿男人的衣服，完全失去了女性优雅妩媚的风度。

写了《莱莉亚》一书……

1836年5月，离婚诉讼案重新提交拉夏特尔法庭。法庭严肃认真地审理了丈夫提出的令人不快的控告。结论是，指控既是确有其事，又是恶意中伤；归根结底，指控是荒唐的。那是因为杜德望先生“并不力图摆脱夫妇共同生活，而是要维持现状”。基于指控实质上是使夫妻双方都不抱重修旧好的希望，法庭宣判杜德望夫人与丈夫离婚，禁止丈夫再纠缠她，也不准同她

来往，妻子以母亲的名义照管孩子。

卡西米尔在他的顾问们的鼓动下，就这个判决向布尔日地方法院提出上诉。

乔治·桑前往布尔日，以便与他的律师兼情人米歇尔亲近。开庭前夕，乔治·桑在自己住的房间的细木护壁上写了一段祈祷文：

伟大的上帝！请您保护一切愿做好事的人，镇压一切要做坏事的人……

朋友们从巴黎、拉夏特尔和波尔多赶来支持她，只有她母亲索菲·莫里斯·杜邦夫人避免受牵连，因为她还不知道谁将给她提供年金。

米歇尔替自己的情妇辩护，他声音低沉地对诉讼的另一方说：“夫妇的住所遭到褻读，正是您干的好事；您把腐化墮落和迷信带到家里……”他激动地念着奥洛尔写给奥雷利安的信，证明他的委托人在初恋中纯洁无暇。他描述了这位少妇十分矛盾的处境：她虽然有庄园及大笔财产做嫁妆，却不得不靠菲薄的补助金度日，而她的丈夫则靠着这个家庭及其财产，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他影射杜德望先生的指控“把妻子描绘成最下流的娼妓”，完全是造谣中伤，不能令人深表厌恶。他夸赞这位无可指责的贤妻，是放荡而又吝啬的丈夫逼迫她离开夫妇住所的。

乔治·桑穿着素净的白色连衣裙，戴着白帽，围着带下垂花边的细布皱领，披着花披肩，楚楚动人地倾听米歇尔的辩辞。

在场的人都被这滔滔的雄辩震惊和折服。法庭终于同意辩护，驳回上诉。

然而，第二天法庭却又做了一个折衷的安排。

原来，伊包利特感到事情进展不妙，便建议妹夫对诺昂的权益和索朗芝的去向做出让步：“我没有要你同意拉夏特尔法庭的初审判决，但是你可以只要纳博纳公馆和你的儿子。把诺昂留给奥洛尔。即使要了诺昂，你也会觉得不能在那里呆下去。至于索朗芝的去向，你应该拿定主意。不必扯得太远，我就能向你证明，一个轻浮的女人对女儿一定会比正经的女人更严厉。不要担心现在左右她的男人。不出一年半，他们就要被她赶出大门！她的性格将比任何时候都固执，可能会因为女儿在身边而重新获得某些人类的感情；她会某种自尊心倾注在索朗芝身上，使其不致重蹈覆辙……”

卡西米尔撤回了上诉。

乔治·桑也要了结此事，同意他照管莫里斯并享有对纳博纳公馆的受益权。她抚养索朗芝和继续管理诺昂。

经过多少次愤怒与激烈的争辩，才回到原先达成的妥协。这是一个讽刺！

第三节 情人迪迪埃

两个情人互相指责对方不忠，各有各的道理。

“她写完了《旅人之简之六》，又变得温柔多情。她睡在我的脚边，头枕在我的膝上，她的手和我的手握在一起……”

乔治·桑同李斯特和玛丽·达吉尔相约在贝里见面，可是，只有玛丽只身一个来了。

“不，马上就走，”他说。她把脸靠近他，他吻了吻她那双难以识透、无动于衷的眼睛。

米歇尔·布尔日出色地替乔治·桑离婚做了辩护，但他的雄辩与其说是发自内心的感情，不如说是出于职业的需要。

两个情人不再和睦相处了，米歇尔很快就开始冲撞乔治·桑。两个人幽会的时候，他总是迫不及待，使她觉得很累。尽管她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但米歇尔仍觉得她的封闭的内心世界，永远是一个难以攻克的圣所。

乔治·桑原先以为自己找到的是一位老师，不料却是个暴君。她对他说：“有时我觉得你是一个恶鬼，我看到你对我冷酷残暴、无耻专横。”

为什么她没有与他决裂？这是因为事情太奇怪了。这个专横人物虽说不能够满足她的愿望，但他至少有时使她感到自己像桑多、缪塞、帕吉洛等年轻的情人认为的那样，是个真正的女人。

当命运把我们一个人抛向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曾寻求过爱情，情欲却向我们袭来，既没有战斗，也没有思考。你的欲望超过我，并支配了我。我接受了你的爱情，却不懂得自己爱情的力量。

我如痴如醉地接受你的爱情，预感到你的欲望会首先中止，因为我知道我的爱是多么深厚、集中、宁静和执着。

……我是满含热泪接受你最初的爱抚的。几天里，你相当爱我，以致我梦想把我们的命运在物质上绝对地联系起来。你甚至保证，在以后一段时期都不变心，而那期限快到了。

放心吧！这个诺言已经铭刻在我的心上，而我的心是属于你的。这是生活之书的书页，你可以撕掉它。一旦我的铠甲被一片一片地扯下来，我就完全筋疲力尽了。我的全部生命之弦，在你的手中振动。我的爱，变得深切强烈，除了同你生活在一起，我不能想象还有别的什么生活目的。

她给他写了一些热情洋溢、满是暗语的信件，固为米歇尔夫人令丈夫十分害怕。有时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乔治·桑假装是给一个女人写信。这些信件里字字肉欲横流，句句焦虑不安，用的是乔治·桑惯用的写作风格，显得气喘吁吁。

两个情人互相指责对方不忠，各有各的道理。

米歇尔心怀嫉妒，容易让人理解，因为乔治·桑在不那么钟情的时候，不会放过幸运的机遇。当时有一位俊秀的瑞士青年、三十一岁的夏尔·迪迪埃。他跟米歇尔一样，是她巴黎和诺昂家中的常客，迪迪埃生于日内瓦。他是植物学家，登山爱好者。在感情上，他是个有节制的清教徒。他在本国的贵族资产者当中感到不自在。他曾周游各国，在佛罗伦萨成了霍尔滕丝的情人。将近 1830 年，他怀揣五十法郎来到巴黎，他崇拜的维克多·雨果接见了。他写过一部小说，小有成绩。大约在这时，他读了《莱莉亚》，感到跟这位写作技巧如此高超、创作激情如此横溢的天才相比较，自己实在太渺小，只是一个可怜的作者，卑微的工匠。

这位英俊的崇拜者经霍尔滕丝介绍，认识了乔治·桑。她当时闭着嘴巴，估量着新来的客人。

迪迪埃口才很好，嗓音响亮，两眼低垂，嘴唇上泛起微笑。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傲气十足，相当自信，却仍保持优雅的风度。霍尔滕丝是位评品

男人的行家，她爱上了这位日内瓦的辩才。

迪迪埃成了乔治·桑的知己。

迪迪埃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严肃刻苦，然而因为性欲非常旺盛，需要女人；他也讨女人喜欢。乔治·桑单独邀请他，他就上了钩。

迪迪埃觉得杜德望夫人温柔而随便。他向她表露了爱情。

圣·勃夫对这位青年叙述了杜德望夫人的卑劣行径，特别是与梅里美的一段艳情，迪迪埃却不相信。不久，缪塞上场，成了乔治·桑的床上客，迪迪埃便被忘记了，一直到一天早上，乔治·桑来向他借一百法郎，以便在出发去意大利之前付给木柴商。

迪迪埃没有钱。这个日内瓦青年认为这个法国女人太古怪了。

他 1835 年底从西班牙回来，头发已经过早地变白，却越来越漂亮。缪塞已经消失了。

乔治·桑帮助迪迪埃，推荐他在布洛兹那里工作，并给他钱和所需的一切。

他俩的友情又恢复了。1836 年 3 月 26 日，他在乔治·桑家吃晚饭。

那是难以置信的一夜，迪迪埃五点钟才离开。天已大亮，他懒洋洋地躺在沙发垫子上。而她显得有点忧伤，把手伸到他的头发里，称他是她的老哲学家……告别的时候，她使他俩都堕人情网。

第二天晚上，迪迪埃带着三瓶香槟酒跑到马拉盖滨河街：

乔治·桑显得高兴，笑容可掬。我虽不喜欢她的不良倾向，却加以原谅。酒醉后她温情脉脉，我也一样。她拥抱我，我拥抱她，八点钟我和她分手，碰上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我的白绸巾换了她的开司米披巾。

严肃的男人玩这种感情游戏不无危险：

乔治·桑很想我。……我不想自作多情，由于我和她的性格不合，我将是很不幸的。

然而，他觉得她是个老好人：

“她对我谈了很多关于米歇尔·布尔日的事，讲到他的性格，说他很聪明，还谈到他俩之间的关系。她对我发誓说，自从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关系破裂之后，她就没有情人……她漂亮迷人。

1836 年 4 月 25 日，乔治·桑搬到迪迪埃的家去住了。迪迪埃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她。

她在我家住下后，招来种种流言蜚语，……但是我们更加相爱……这个复杂的人有不少疑点，真让我百思不解。我担心她的感情急剧多变，我对她做了很多研究，仍不了解她。她是忠诚的吗？她是不是在演戏？她是不是死了心？许多问题，都无法解答……

1835 年 5 月 2 日：

晚上，她出去了，直到午夜我们才见面。她写完了《旅人书简之六》，又变得温柔多情，她睡在我的脚边，头枕在我的膝上，她的手和我的手握在一起……啊！美人鱼，你要拿我怎么样？

别人也都在寻思：她要拿他怎么样，米歇尔时期是否已经完全结束？在日内瓦的李斯特写信询问乔治·桑本人是否真的另有新欢。

乔治·桑回答李斯特：“迪迪埃是我忠实的老朋友。您问我是否另有新欢，他是否扮演了某种角色。关于这，我完全不知道人们会说些什么，有人说过我和您的事。在巴黎及外省不是有许多人说，同您一起在日内瓦的，不

是达古尔夫人而是我。迪迪埃的情况跟您的一样，我绝对不会是他的情妇。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在他巴黎家里住了一个星期……”

五月，她出发去拉夏特爾，还是为了那场离婚的诉讼。

迪迪埃爱她爱得发疯，俩人虽在一起同居了，但他仍不满足，比过去更多地自问：“美人鱼，你要拿我怎么样？”有时他希望不要再见她，拒绝艰难地充当密友；有时他被欲火与希望所折磨。因为她刚刚写了信给他；他害怕了，便跟着她到了贝里。

忧郁不快的旅行。争吵。茫然不知所措。我到达拉夏特爾。她睡了；我叫醒她，投入她的怀抱，沉默不语。她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在长时间无言的拥抱着，我们又重新和好。除了她带我到诺昂的那个晚上，我们再也不用别的解释。我同她在一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甜蜜的五天……把世界给忘记了；沉浸在乡村的孤寂之中。诺昂树荫下的晚会，明亮的月光，我们总是单独在一起……星光底下，在平台上度过了一个个夜晚，我的手臂围在她的腰际，她的头偎依在我的胸膛……

在那几天里，迪迪埃感到心满意足。他着了迷，如醉如痴。回到巴黎后，在他收到的她寄来的信中，她谈起了那些美好的日子。但以后她就无消息了。

她几乎没有想到他。她四处旅行，出庭为自己辩护；穿着衣服在河里洗澡，然后湿淋淋地扑在草地上。夜晚，她修改《莱莉亚》，准备出一个修订本。

玛丽·达古对乔治·桑始终不很信任。然而，她继续坚持要求乔治·桑到瑞士来跟他们相聚。

1836年8月，当日内瓦的这对情人准备出去游玩时，乔治·桑突然宣布她将要来瑞士。

她的官司已经打赢了。她带着两个孩子、两个老朋友和女仆一起来了。于是，出游的队伍一下子扩大了很多。

他们在一起谈论哲学、音乐、创作，谈论谢林、黑格尔和上帝。乔治·桑有天赋和创造力，活泼顽皮，充满诗意；而李斯特是音乐之神。十三岁的莫里斯擅长绘画，画了很多速写和漫画。这班旅行人马上路了。

乔治·桑在《旅人书简之十》中记述了这次旅行：“审判的威胁并没有把我压倒，突然间似乎变成了我的希望，并以从未有过的快乐加快了我心脏的跳动。自信与无比坦然告诉我，永久的审判不会把我压扁……”

她感到心绪安宁，从她本人的道德方面来看，她根本没有罪。迪迪埃呢？她可怜他那病态的自尊心。怎样才能既不伤害他，而又不把曾经给过别人的东西给他呢？米歇尔呢？她准备为他牺牲自己性命；但是他已经结了婚，朝三暮四，态度冷淡。她肯定地认为，大吵大闹的日子，对她来说就是得到原谅的日子。

他们一行人回到日内瓦。李斯特根据一首西班牙歌曲谱写了《幻想回旋曲》，还加了题辞：献给乔治·桑先生。乔治·桑立即写了一篇抒情故事《走私者》，对李斯特的回旋曲进行发挥。

10月，乔治·桑不得不回法国。李斯特和玛丽跟她约好在巴黎再见，他们彼此都相当满意，因为天才识天才。然而乔治·桑有点嫉妒他俩的爱情。她认为玛丽对李斯特大缺乏感激之情。

玛丽·达古尔相当痛苦，呆在日内瓦就好像草地上的鲤鱼一样不自在，

抱怨她在那里的生活平淡乏味：天天要为面包发愁。

他们在友好的话语声中道别，乔治·桑带着孩子们和她的一位青年崇拜者离开瑞士。

她的心中有一件事，她在瑞士白白地等了米歇尔，此时希望在里昂同他再见。

在写给米歇尔的信中，她满腹牢骚：

我焦急地等了整整六个星期，望眼欲穿，人都快要闷死了，而你却坚持不來找我；因为在你的头脑里，我应该像姬妾一样温驯地走向你身边。我希望与你在里昂见面，我带孩子们旅行一直到那里。我在一家旅馆里过了要命的五天。同行的还有一位好心的男子，虽然他特别殷勤，但是与他单独交谈却廖无兴致。你竟没有来！由于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我走了；当我到达这里，疲惫不堪，又十分不愉快，为道德而烦闷，在瑞士的日子给我的血液灌输了诗意与热情，我还不知道把这诗意与热情往哪里用。我从您那里得到一封信，顶多像是一个老银行家给他供养的妓女写信！像您这样的男子竟这样评价与对待我这样的女子，这太可怜了。

米歇尔则回信，指责她新的不贞行为。

她又回信，表示了抗议：

我曾一劳永逸地对您说过，如果某一天因为劳累、体力虚弱或有病态的需要，我不幸对您不贞；我将向您承认我的过错，让您作主惩罚我，永远把我忘记。自从我俩有来往之后，您对不起您的妻子，犯了相当严重而不可以原谅的错误。您恨我，是对我的惩罚，可要是跟那种错误相比较，却又算不了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将忍受因我的放荡行为而带来的后果，我有多少罪过，就有多少悔恨。我不会为了您——和其他许多令人尊敬的人物——犯了千万次的一种罪过，到沙漠去赎罪

不瞒您说，我为自己的贞操而感到痛苦。我曾相当神经质地幻想过；血液一百次涌上我的心头。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常常一人独坐在美丽群山的深处，倾听鸟儿的欢唱，呼吸森林和河谷特别沁人的芳香，心里充满爱情，双膝因感官的快乐而颤抖。我还年轻。

尽管我对其他的男人说，我像老人一样宁静，血液在不住地沸腾……我还步行了十里，然后晚上一头倒在旅店的床上。我想着心爱的男人的胸部。那是唯一能使灵魂和肉体同时得到休息的好枕头。您可以相信，我要寻找安慰，不是没有机会；我周围有许多男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们比您年轻……我不曾受到惩罚；有千种办法欺骗您；把一时的粗暴埋藏在阴影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点也不拒绝这样做。这污点本身虽然轻微，然而对正在爱的人却是洗刷不掉的。使我避免染上这污点的，不是被女人们叫做道德贞操的那种东西，而是深藏在我心中的爱情。它使我一想到自己被别人的男人钟情搂抱，就感到无法克制的厌恶。当我浑身被汗水湿透，醒过来以后，您正是我苦苦想念的人。

当崇高的大自然唱着深情的赞歌，山野的空气通过千种欲念的针刺而进入我所有的毛孔时，您正是我呼唤的人……

她肯定地说，她绝对不会向诱惑让步；而当她穿过布尔日城时，有朋友对她说，米歇尔正热恋着“一个极端肥胖的女人”。乔治·桑大为恼怒：

通过一个从不瞎说的小孩的嘴，我确切地知道你住在那个女人家里。我能不能痛苦、不怀疑吗？从前，你同那个女人并没有什么交情，因为你本应

该对我谈到这事，可是你从来没有提起过。我从你本人那里得知，你很瞧不起她的丈夫。你在她家里做些什么？她是搞音乐的，但是她老唱错，而且忸怩作态，令人难受。这我都知道，我听过她唱歌。

她很坏，她恨我，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对我进行攻击与诽谤。这我都知道，我差不多能够听见她讲的话。你怎么能容忍这个恨我的人亲近你？

米歇尔，请告诉我，你在她家里做些什么。为什么放弃你的工作，跑到她那里度过所有的时光？那个女人能像妓女一样，对松松你的腰肾有用吗？可惜，我比你年轻，我的血液、肌肉、神经都比你的多。我的身体像钢铁一般结实，精力特别旺盛，我都不知该怎样使用。年轻英俊的小伙子都不能使我对你不忠实，尽管你忘记我，鄙视我，甚至对我不忠实。如果这高热度使我不安，我就请医生给我放点血。医生对我说，放血是犯罪，是自杀；并且说这并不能给我一点安慰；还说我应该有一个情人，否则血液过剩会威胁我的生命。我想情人也是白想，我不能有情人，甚至不容许有这个念头……

那身体多么美丽可爱！它饱受我多少爱抚；多少次在我的拥抱中精疲力竭，又在我的亲吻中复苏；它好几次在我们的极度兴奋中感到痛苦，又好几次由我的嘴唇、头发和火热的气息治愈……现在我想起那身体就感到讨厌。可惜，我们的记忆在哪里徘徊迷路？有一次，我用我自己的呼吸使你恢复了知觉。我热情洋溢地试图把充满我胸间的生命和爱情输送到你痛苦的脏腑里去。那时我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哦！让我给你注入我的生命之液。即使我就这样死去，那也死得甜蜜愉快。哦！我的上帝！在同污秽的肚皮接触的时候，那曾令我崇拜的身体，被弄脏了吗？你的嘴巴也许呼吸到一种被人称作妓女的嘴巴的气息吧？

因为米歇尔想方设法躲开他，乔治·桑便哀求他同她会见十五分钟：“我不预想你会害怕我，如同害怕米歇尔夫人一样；你不会在我恳求您赏光的一次约会面前后退……”

他来了。接着，在两人达成了表面和解之后，她出发去了巴黎。

诺昂的美好回忆萦绕在迪迪埃的心头，他希望乔治·桑住在他那里。但是，她却租下了法兰西西旅馆的一个房间。

因为李斯特与玛丽·达古尔在这家旅馆有一个套间，而且玛丽·达古尔的客厅是一个作家和艺术家聚会的沙龙。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海涅、密茨凯维支、拉姆奈、米歇尔、欧仁·苏等人的身影。而正是在那里，乔治·桑第一次听到波兰音乐家弗雷德里克·肖邦的演奏。肖邦是唯一能同李斯特在天才与美貌上相匹敌的优秀钢琴家。

可怜的迪迪埃被邀请到法兰西旅馆，在那里见到乔治·桑。她显得秀美俏丽，人们都对她大献殷勤。但她对迪迪埃却十分冷淡。

他不由得在客厅里泪如雨下。经过他的苦苦哀求，乔治·桑终于同意他在午夜去她的家。

但是，不幸的情侣在一起笨手笨脚；他们并没有重温过去的肉体快乐，而是抱怨美好的过去已经一去不返。这一夜以不愉快的解释和可怕的表白而告终。她对他说的话不仅不能激发他的热情，反而使他浑身冰凉。他像死人一样躺在她身边。

乔治·桑又离开巴黎，重返诺昂。

这时，迪迪埃产生了去看玛丽·达古尔的念头，要跟她谈谈乔治·桑这个不忠实的女人。他估计玛丽这个女人会像他本人一样严肃，但要比乔

治·桑更善于听人抱怨。

两个女人都热情奔放，且常常显得高尚；然而，自从在瑞士相遇以后，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一场残酷斗争已经开始了。两个女人都孤高自傲，欲望难以满足。

迪迪埃向玛丽尽吐衷曲。玛丽与乔治·桑是平起平坐的对手，她评论起乔治·桑来头脑清楚而又十分严厉。她高兴地听取这个漂亮的瑞士人发牢骚。她答应要到诺昂住一段时间，去为他打抱不平。

1837年1月初，乔治·桑带着两个小孩回到诺昂。她终于成了自己领地的绝对主人。

她需要亲自管理领地，也需要安静的环境写完《莫普拉》。她还想高米歇尔更近些——他逃开了，一定要重新征服他。

乔治·桑同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相约在贝里见面；可是到一月底，只有玛丽·达古尔只身一人来了。

这两个女人变得更加亲密。她们一起长时间骑马溜达。乔治·桑穿着紧身宽下摆外衣和长裤，显得英姿勃勃。当沿途的山坡太陡，或者涉水处河水太深时，她就牵着玛丽的马，在前面开路。

索朗芝十分漂亮，身材优美匀称。在玛丽·达古尔看来，索朗芝的灵魂同身体一样强悍，她的一生将充满斗争与对抗，不会屈从于一般的规则；即使犯了错误也显得伟大，在贞淑贤惠之中更显得高尚。

莫里斯同妹妹正好成鲜明的对比，他将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循规蹈矩，颇有德行。

他感兴趣的是安安稳稳地享乐和过产业主的生活。

新来的家庭教师欧仁·帕尔丹照料莫里斯。他是个新教徒，父亲是一位公证人。他身材瘦长，像米歇尔一样是个共和主义者。

至于乔治·桑，玛丽认为她被那荒谬无望的爱情所消耗。她接近米歇尔，以便在他身上燃起已经熄灭的欲火，却白费力气。出于私利，也因为疲惫不堪，他希望摆脱这个折磨人的情妇。乔治·桑不免大发怨言：

但愿我的忧郁不致使你操心。我的忧愁郁结很深，是不治之症。但是。我有力量忍受，而你却没有力量治愈。我不再对你提起此事，只要你明白这点就好了。并不是因为你爱我，我才爱你。其他许多人更爱我，但我不屑一顾！也不是因为你一张油嘴善于对女人花言巧语；我遇到嘴巴更甜的善言者，他们根本不值得我的耳朵去听！也不是因为我要仰仗别人的福佑或光荣，或者仅仅要依靠别人的爱。我鄙视虚假的善意，而且我知道，我要委身于你，但世上的急流始终要把我们分开。我爱上你，是因为你讨我喜欢；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能讨我喜欢……你有的缺点，我没有；因为你从来没有驾驭自己的激情。我完全了解你，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人，而你正是我那不可分离的另一半。

类似冗长的信，没完没了地寄出去，可是米歇尔根本不再回复。

你为什么不写信？这是怎么回事？你病了吗？我的上帝！你还生我的气吗？你是不是爱上了另一个人？哎，我相信确有其事。我和你见面以后，这个念头就一直没有离开我；你的眼神不再和从前一样；在我们重新亲热的时候，你难以掩饰烦躁与不安，要急于离开我！……你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会适当地保持尊严。如果我的爱妨碍你，我会保持沉默……

她承认自己做得不对，尖刻而又任性。但她不能没有他她嫉妒所有的

女人，尤其是米歇尔夫人。

有一天你竟想要带我到你妻子的房间去走走，并把你结婚的床指给我看，我不知道你要的什么恶毒的鬼花招？我不明白爱情竟要经受这样的考验。然而我的爱情却经受住了考验。

她有时夜晚策马急驰前往拉夏特尔或夏托鲁，在米歇尔的怀抱里度过几个钟头。但是拥抱过后，紧接着一场大雪崩。每次约会，乔治·桑都要哀求：“我请求一个奇迹，我希望你不要发生什么事，希望你能想出办法整个晚上逃避你的事务和你做为丈夫的责任……”

她自忖什么事情都准备干，其卑贱恭谦的态度令人吃惊。米歇尔想要她在布尔日租一所房子，她照办了，并且闭门不出，形同坐牢。只要他想来，她就任由他摆布。米歇尔害怕纵欲伤身吗，她就同意保持洁身自好：

啊！如果疾病麻痹了你的灵魂，你就来我身边生活，至少可以睡在我的怀抱上！我的爱情始终清醒，就像一座仓库，可以接纳你的爱情，等到它醒来就归还给你。我绝不为了使你觉得应该爱我而打扰你。我要让你忘掉这些，因为你应该在我的身边好好休息：

我的爱永远倾向于你，就像垂柳俯身向它钟爱的流水；我盼望在你身边生活，当我陷入这无望之想时，我最甜蜜的梦，就是想象我正在照料着你多年来虚弱的身子！爱情的乐趣不仅存在于那经久不衰的纯洁的温存与眷恋之中……每天陪伴你；晚上把你搂在怀里，使你暖和，微微地弯着身子，安静地睡觉；排除你感情上的暴风雨，使你免遭摧残。

我们到了生命之液不多的年纪，我为你把我的爱情变成一个如此柔软的枕头，一个如此可靠的隐蔽所，一个如此沉默温和与宁静的夜晚，这就是我所怀抱的希望。

玛丽·达古尔观察着这些，品尝着漫长的和平日子的滋味。她记述道：“每天晚上，乔治·桑都麻木不仁，好像处于一种呆滞的状态。可怜的女人！上帝赋予她的神圣之火找不到什么机会，可以在内部消耗和在外部的吞噬一切尚存的信仰、青春和希望。仁慈、爱情和肉欲享受，是灵魂、内心和感官的渴望；这三者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女人身上显得大强烈了，遇到了怀疑、失望和满足，就被压抑在她的内心深处，使她的生活成了殉道……”

总之，由于更好地认识了她杰出的朋友，玛丽·达古尔认为自己最恰如其分地意识到朋友的个人价值。这倒不是她欣赏女主人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连续写作十四个小时，然后骑马去赴约。她从乔治·桑身上认出了奇特的优雅和天赋的友谊。

但是，最后的评判是严厉的。既然乔治·桑口口声声说爱米歇尔爱得要死，那么为什么她的房子里满是年轻人？他们从拉夏特尔和巴黎远道而来，全都爱慕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可笑的狂热的母爱？这感情一点也不明智，是盲目的本能。

玛丽的初次诊断是最公正的。过剩的活力扼杀着乔治·桑。她常常要人给自己放血。

玛丽讽刺说：“我要是你，就更爱肖邦。”她注意到漂亮瘦弱的音乐家肖邦给乔治·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并且知道乔治·桑愿意把他吸引到诺昂来。

五月，李斯特从巴黎来到了诺昂，他脸色苍白，热情洋溢。于是轮到乔治·桑来观察这一对情人了。这两个人时常呕气。也有冲突。弗朗茨年轻

有为，但不受约束；玛丽骄傲而又爱梦想。乔治·桑想，这场爱情不会长久。

然而，在诺昂的树荫下，1837年的夏天是个十分美好的季节。天空忽而被天才的光辉照亮，忽而被激情的风暴遮盖而变得阴沉。骄阳似火。菩提树闪闪发光，巍然不动。

世界对于乔治·桑突然明亮起来，因为米歇尔同意约会一次。为了他们相遇的纪念日，他给她写了一封比较充满温情的信。

她被久已绝缘的幸福所压倒：“告诉我，这是真的吗？你是否还爱我？要来看我？我是否在月亮初升的时候，在我们绿荫如盖的小径上再见到你？我是否在我们的刺槐树下，让你紧紧偎倚在我的心头？你将给我带来幸福？”

她骑马去与米歇尔相会，那整整一夜都处在幸福之中。

我深重的眼皮勉强能够忍受朝阳的光芒。万物被照耀得火红的时候，我却感到冷。

我饿了，但又不能吃东西；因为身体健康才会有食欲，筋疲力竭的人才会饿。那么，你来吧，我的情人！我苏醒了，就像又被五月太阳照射的大地。我因爱情而颤栗……你将觉得我年轻美丽，因为我将在你钢铁般的怀抱里，高兴得跳跃。来吧，来吧，我将有力量、青春、快乐和希望，我将身体健康……我将去迎接你，就像妻子迎候她亲爱的人一样。对我来说，要么爱，要么死，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米歇尔却抱怨自己被爱恋：“倒霉！为了你，也因为你，我在家里要支持一场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战争，倒也罢了。这是对的。在世上，不经过斗争，不经过战斗，是什么好处也得不到的。我至少能在你的怀抱里找到一个避免这些苦难的庇护所，那就好了……可你不是这样，你要求我和希望我反对你。真是左右逢敌，进退维谷。我对你说，这种局面叫人吃不消……我应该平静地生活。女人之间的一切争斗都是卑鄙龌龊的。我至少需要享受绝对深沉的休息……”

这一回，乔治·桑恼火了：“你把我与那个使你痛苦的女人摆在同样的位置上。你咆哮说是为了我才受苦，好像自愿无私的忠诚可以与家庭纠纷相提并论！你威胁我说，要住到一个简陋的小屋里。如果上帝满足你的希望，上帝就对我太好了。我马上到那里去，来到你的身旁。至于我，你可以把我看成一个忠实的黑奴，照料你可怜的身体。你会懂得女人的爱情不是什么卑鄙龌龊的东西……”

乔治·桑一旦不能控制她自认为所爱的男人，就怀恨在心。她的头脑大清醒了，不能满足一个专横的男人；她大自傲，不能佯装驯顺。1837年6月7日，她终于第一次有勇气取消一个约会。

悔恨与骄傲扫走了情欲。

米歇尔退场了。

诺昂的夜晚，全家人和朋友们在平台上集中。柔和的月光笼罩着古老的房屋。每个人都在梦想。玛丽·达古尔自问为什么所有的情人都为初恋的最初时刻而遗憾，又为失恋而落泪。乔治·桑朗诵莎士比亚的诗句。弗朗茨站起来，走到屋里去，坐在钢琴旁。

月亮躲在高大的菩提树后，把一动不动的冷杉的黑色幽魂勾画在浅蓝色的天空中。

一片深沉的寂静。微风降临高高的青草上面，精力耗尽正在死去。高

贵的乐器开始奏响和弦。夜莺还在与琴声争鸣，声音羞怯而又痴狂。夜莺靠近浓密的树荫，放声歌唱，音色圆润而富有节奏感，真是出色的音乐家。

6月初，演员博卡日到达诺昂，前来催促乔治·桑写一个剧本。他是个浪漫派的喜剧演员，又高又瘦，是个美男子。他三十八岁，热情奔放，充满激情地表达共和主义的观点。

人们谈话的主题涉及戏剧、演员和作家。有人嘲笑维克多·雨果的虚荣，玛丽·多尔瓦尔的堕落。乔治·桑则替他们辩护。博卡日开始追求乔治·桑；而乔治·桑并不显得不高兴。6月15日，漂亮而又阴沉的迪迪埃突然到诺昂来了。

玛丽·达古尔信守当初的诺言，为迪迪埃打抱不平。但是迪迪埃一到诺昂，就后悔自己不该来。他不再讨人喜欢，接待也使他感到尴尬：“她的言谈中流露出一不高兴，要戏弄人……我到这里来，犯了一个大错，她对我冷冰冰的……她水性扬花，铁石心肠！”他在那里遇见了博卡日，还遇见了别的一些人。

在平台上，大家在灯下谈论上帝、多尔瓦尔和乔治·桑收养的一只鸳。乔治·桑自己做酒，夜晚蓝色的火焰照亮了她猩红色的连衣裙。

迪迪埃继续对乔治·桑满怀情欲，对玛丽表示尊敬。他同令人猜测不透的玛丽一起在菩提树下散步，向她诉说自己的失望和痛苦。

乔治·桑似乎只记挂着博卡日。这对可怜的迪迪埃未免太过份了。玛丽·达古尔愤怒而又粗暴地对他说，他们的女主人似乎差一点就堕入卖弄风情的荡妇堆里了，她确信乔治·桑现在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和友谊。

迪迪埃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想着要杀死乔治·桑。虽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幻想，他感到自己已经处在危险的斜坡上，于是决定离开诺昂。

他差一点就不辞而别。但乔治·桑却突然发现他在收拾行李，她说：“我想，你不走吧？”

“不，马上就走。”

“啊！真是的！”她把脸靠近他。他吻了吻她那双难以识透、无动于衷的大眼睛。

迪迪埃退出了这场爱情游戏。

至于乔治·桑，她恢复了一度被米歇尔扰乱了平衡，用两个月时间写了一部优秀的小说。这部《镶嵌画师》回顾了威尼斯之行和圣马克教堂的镶嵌画师。

李斯特在演奏钢琴，夜莺被悦耳的琴声和皎洁的月光所陶醉，在周围的丁香树丛中狂热地高声长鸣。

乔治·桑恢复了平静，连自己也感到惊讶。自从她离开诺昂去体验伟大的爱情的那一天起，尽管满怀希望，她的激情已经三起三落。她现在睡在自己的床上，像布洛兹睡在他的床上一样心平气和。

第四节 巴尔扎克

有人笑里藏刀，私下早已做好准备。报仇的工具是大师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让于勒·桑多放心，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同他毫无瓜葛。

在处理乔治·桑、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与自己的关系时，巴尔扎克耍了个花招。

经过诺昂这个夏天汹涌澎湃的涨潮之后的退潮，弗利西安·马勒菲依像块船板，同乔治·桑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留在了诺昂的海滩上。

这个年轻人 1813 年出生在毛里求斯，九岁回到法国。他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身体瘦弱，轮廓优美，目光锋利，小胡子直竖起。因为贫穷和孤独，他寻找靠山，谋取职位。

他是在法兰西旅馆里由玛丽·达古尔介绍给乔治·桑的。

乔治·桑觉得他丑得出奇，虚荣心重，愚蠢。相反，玛丽·达古尔断定他忠直、善良，才智横溢，极力替他辩护。乔治·桑向她的朋友发脾气，责怪玛丽·达古尔缺乏鉴赏力，竟然容忍那个长得那么丑陋的家伙。尤其是李斯特对她透露说马勒菲依爱上了她，更加使她恼火。她把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不客气地奚落了一番，直至宣称他引起她身体上不可抑制的反感。

然而，因为乔治·桑同古板的帕尔丹不很和睦，她想给莫里斯找一个新家庭教师。

玛丽·达古尔推荐马勒菲依的弟弟列昂，乔治·桑却突然选中了弗利西安。

不久，她同他一起到枫丹白露去，住在不列颠旅馆；而莫里斯当时住在拉夏特尔附近的古斯塔夫的家。马勒菲依成了“一个高尚的人物”，特别忠实，乔治·桑决定在他的陪同下作一次远游，到弗朗夏尔山口去，以前她同缪塞在那里过了难忘的一夜。

在枫丹白露的小住期间，乔治·桑被意外的消息打扰——母亲索菲·杜邦突然得了重病。乔治·桑奔向巴黎照顾她。

不久，索菲·杜邦在平静中离开了人世。

乔治·桑一生中最富悲剧性的事件、最不幸的情感就这样结束了，可怜的母亲不在人世了，她不由得流了许多眼泪。

在巴黎处理母亲的后事这段时间，乔治·桑虚惊了一场。她听到传说，她的儿子被抢走了。于是，她赶忙派马勒菲依坐驿车去诺昂找他。

她相信是卡西米尔抢走了莫里斯。拉夏特尔的一个朋友曾写信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正在那里。

事实并非如此，帕佩把莫里斯交给了马勒菲依，并且同意负责照料索朗芝。

卡西米尔并没有企图抢走莫里斯，可是他却萌生了拐带索朗芝到吉勒里的荒唐念头。

乔治·桑大发雷霆，经许可去见了专区区长。她在马勒菲依和一个诉讼代理人的陪同下，坐上驿车飞驰前往报警，让警察包围了吉勒里。

杜德望先生变得温文尔雅，手牵着索朗芝一直走到他富丽堂皇的住所门口。索朗芝像一位公主，在两国边境线上，被交到乔治·桑的手里。

此后，因为她是在离比利牛斯山不远的地方，乔治·桑就想进行第二次情感远游。

马勒菲依已经继承了弗朗夏尔的激情。这次马尔博雷的游览，给她和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然后他们心里踏实地回到贝里。冬天剩下的时间，各

人做各人的事。

乔治·桑不辞辛劳，写了长篇小说又写短篇小说。马勒菲依写了剧本又写小说，一本接一本。莫里斯画了一张又一张的漫画。索朗芝总在吃鸡腿，弹钢琴老走调。

有人笑里藏刀，私下早已作好准备。报仇的工具是大师巴尔扎克。

从桑多事件以后，巴尔扎克对乔治·桑一直很冷淡。他不仅在乔治·桑与桑多绝交期间支持小于勒，而且在于勒从意大利回来后，还给他提供食宿，以换取桑多曾许诺的泛泛的帮助。由于过份懒惰，桑多却没有践约。

巴尔扎克跟乔治·桑一样狂热地工作，两个月写一本小说，必要时甚至十六天写一本。小于勒生性软弱、怠惰，激怒了这些精神坚强的的庞然大物。而桑多呢，他很快对这急风暴雨式的生活感到厌倦。巴尔扎克曾经这样谈到他：“这是一个听任命运摆布的人，他一生有许多计划，却从来不去实现。”

他接着讲：“与于勒·桑多相交是我的一个错误。你绝对想象不到会有像他这样无所事事、漫不经心的人。他缺乏毅力，意志薄弱；讲起话来娓娓动人，但毫无行动，往往一事无成，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毫无献身精神。我像一位大老爷一时心血来潮，为他花了不少的钱财。我把他放在我的怀抱里，对他说：‘于勒，这是一场戏，你就写这个戏吧。写了这个戏后，再写一个。写一个通俗笑剧，以后在体育馆上演……’但他对我说他不可能在任何人后面动手干活。三年之内，他没有写出半本书！搞文艺批评，他觉得太难。他对友谊失望，犹如对爱情失望。一切都完了。”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分手了。1831年初，桑多准备潜心写一部关于乔治·桑的小说《玛里亚娜》。有人对他说巴尔扎克正在写一部关于桑多与乔治·桑艳史的小说，为此，他写信给巴尔扎克。

有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说，这是我同一个您认识的人的故事。这是一部涉及大家的故事，人们很可能弄错。然而，人们确信您书中每一页都是我青年时代的每一页。关于这件事，有两点使我感到不安：其一，因为出于对我的友谊，您对另一个人就不显得大严厉。其二，因为在这时刻我自己写我命定的历史，为时并不晚。

巴尔扎克让他放心，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于勒·桑多毫无瓜葛。

巴尔扎克因为终于能够与乔治·桑在桑多的问题上有共同的感受，他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同坚强有力而又讨人喜欢的女友来往。1838年2月，巴尔扎克写信给乔治·桑，请求允许他到诺昂去朝拜她。

乔治·桑不喜欢同才子们闹翻，便热情地邀请他。

巴尔扎克因此到了诺昂。以下是巴尔扎克自己对此行的记述：

我于星期六抵达诺昂城堡。将近晚上七点半钟，我见到乔治·桑。她身着睡袍，晚饭以后吸着雪茄烟，坐在单独的大房间的壁炉旁。她趿着漂亮的黄拖鞋，穿着雅致的长袜和一条红长裤。她有了双层下巴，非常胖。她没有一根白发，尽管经历过可怕的不幸。

茶褐色的皮肤没有什么变化，美丽的大眼睛依然熠熠闪光。当她思考的时候，样子仍然愚笨。我仔细研究了一番之后，便对她讲了我的看法。于是，她的整个面部表情都在她的眼中。她在诺昂已经一年了，特别忧郁，但是拼命地工作着……

她深深地隐退了，闭门不出，谴责婚姻和爱情，因为在这两方面，她

只是感到失望。

过去，符合她理想的男人很少，问题全在于此。今后她的意中人也不会多，尤其是她一点也不可爱，因此她被别人爱就很困难了。她像个男子，是个艺术家；她伟大慷慨而又忠实贞洁；她具有男子的伟大性格；所以，她不是一般的女子。经过三天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不像过去那样感到，在她身旁就会感染上一种要对一切女人大献殷勤的毛病，这种病在法国和波兰十分流行。我是在和一个男同志谈话。她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全社会却不喜欢。我们态度严肃、诚心诚意地讨论了婚姻和自由等重大问题，虽然天真烂漫，却像伟大的牧师带领人群前进那样自觉。

我大获全胜，使杜德望夫人承认结婚是必要的。我确信她以后会相信的，而且我认为向她证明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她是一位优秀的母亲，孩子们热爱她。但她把女儿索朗芝打扮得像个小男孩，就不好了。从道德上讲，乔治·桑像一个年方二十的小伙子，因为她内心纯真谨慎，只是在外表上才像个艺术家。

杜德望夫人所干的一切蠢事，在漂亮而伟大的人物的心目中，却是荣耀的事。她被多尔瓦尔、博卡日、拉姆奈，以及其他很多人欺骗。出于同样的感情，她上了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的当。但是最近她才明白这对情人同多尔瓦尔一样骗她，因为虽然她工作能力强、特别聪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极易受骗。她给我讲了李斯特和达古尔夫人的事。这为我提供了素材，我马上就动手写一部小说：《爱情的苦役犯》，或者《强迫的爱情》。而她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写的。她是一个女强人，希望比男人更像男人，尤其是因为她跳出女人的角色，她简直不像一个女人。女人要吸引人，而她却排斥人。因为我很男人化，如果她要在我身上找到那种效果，那她应该对跟我类似的男人起作用。她将永远是不幸的。因此她今天爱一个比她差的男人，在这契约中只有对一个心灵美好的女人感到失意与绝望。一个女人应该始终爱一个比她强的男人，否则她会上当，就像事情本应该发生的那样。

巴尔扎克也许为了让自己醋意十足的情妇放心，说他对乔治·桑的外貌体态漠不关心，乔治·桑男子气很重。这当然都是夸大其词，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从来不对乔治·桑怀有肉欲。由此，完全摆脱了一切束缚，这两个伟大的天才能够自由地交谈。

交谈本应该是热烈而融洽的，然而这两个“伟男子”对任何事的意见都不能趋于一致。乔治·桑是卢梭的忠实门徒，相信原始的自由和进步。巴尔扎克是一个悔罪的卢梭主义者，他相信原罪并认为不可能改变自然本性。乔治·桑是个共和主义者，巴尔扎克是个君主主义者。乔治·桑鼓吹妇女解放，主张恋爱婚姻。巴尔扎克支持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害怕已婚的妇女自由过了头。乔治·桑在小说中塑造了十分理想化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找寻他们，然而却找不到。巴尔扎克在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女人的爱情。在《迪莱克达》这部小说中，他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无情地描绘了男女奸情与腐化堕落。

巴尔扎克认为，他使乔治·桑改变了对婚姻问题的看法，不是为了她本人，而是为了其他的妇女。这个伟大的智者可能对乔治·桑的思想起到有益的影响。至于《爱情的苦役犯》，巴尔扎克发挥了乔治·桑提出的主题，并以此创作了一篇杰作《贝阿特丽克丝》，或者叫《强迫的爱情》。

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暗示了玛丽·达古尔的企图，即把李斯特和

她本人变成新的但丁和新的贝阿特丽克丝。李斯特曾苦涩他说：“但丁！贝阿特丽克丝！是但丁们创造了贝阿特丽克丝们，而真正的贝阿特丽克丝在十八岁的时候就死了。”玛丽·达古尔当时三十三岁，比李斯特大六岁。

至于乔治·桑，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成了费利西泰·德图什。大师对她的肖像勾画充满了赞扬的口气：“她有天分，心眼极好。她过着特殊的生活，即人们认为她过的不是普通的生活……”相反，小说中的贝阿特丽克丝则是对玛丽·达古尔严厉的讽刺：“她有点矮揉造作，似乎通晓一切难题……”至于热纳罗·孔提，巴尔扎克发誓他不是李斯特的原型。李斯特以他惯常的尊严拒绝承认，但也不为之生气。

其实，像巴尔扎克一贯做的那样，素材虽说是搬移来的，但主题思想极为深刻。但玛丽·达古尔不能原谅乔治·桑和巴尔扎克，照她的说法，这部小说是“在诺昂的几天晤谈之后”写成的。

1839年9月，《贝阿特丽克丝》以长篇连载的形式，发表在《世纪报》上。

此时，巴尔扎克写信给乔治·桑：

我希望您会感到高兴。如果有某些东西使您不愉快，我指望我们之间真诚的关系和坦率长久的友谊，会使您对我指出。

小说在书店出售了，然而乔治·桑担心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有什么反应，就请巴尔扎克替她掩饰，写一封信给她，好让她在必要时可以出示。巴尔扎克这时却耍了一个花招；他在写信给乔治·桑的信中说：

我已料想到《贝阿特丽克丝》一书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热衷于给我们制造麻烦的那些人，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我们有着深厚的友情，我们彼此都没有把八天看成是八年。

要我知道关于您和您的内心的什么事，那是很困难的……有人不是也对我说过《贝阿特丽克丝》是一幅肖像，而这一切都好像是你们大家的故事吗？可惜！对于我所做的，这类事总是这样落在我头上！因此，至于所谓贝阿特丽克丝的人物原型，这未免太过份了！

创造一个贝阿特丽克丝，除了我在序言中谈到的理由以外，没有别的理由。这就足够了。

在乡间，戏剧性的夏天结下的果实，就这样成了一篇杰作。

第一节 帕尔马之恋

这次征服可不容易，因为肖邦是个爱挑剔的人。

她已经突然受到了爱的垄击，爱情已经占住了她的心，她不能让理智来控制自己了。

但是，肖邦的身体却惊人地走下坡路……

1837年的夏天，灿烂辉煌而又荒诞无稽。乔治·桑的朋友都发现，年轻的钢琴家肖邦最使她思念不已，神魂颠倒，但她枉费心机也没能把他吸引到诺昂来。她曾一度认为，肖邦似乎是上帝有意为她而降生的。

弗雷德里克·肖邦，这个不幸的波兰流亡者，很易动感情，十分怀念家乡、怀念祖国，更眷恋那温存的母爱。

“要是有人愿意管束我的话，”他曾这样说过，“我会感到很高兴”。

这时，确实有人愿意把他看作自己的情人和孩子。

因为米歇尔的专横使乔治·桑遗憾没有人顺从她，而肖邦比乔治·桑小七岁，她能指望肖邦像儿子，差不多像幼小的儿子一样顺从她，看见这个年轻的音乐家体弱多病，焦躁不安，对于她这个想做母亲和护士的人，该有多少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他的相貌同李斯特一样漂亮。他身材中等而瘦弱，两手纤细，一双小脚，灰黄的头发近乎栗色，褐色的双眼与其说有活力而不如说很忧郁，面颊正中长着一个鹰钩鼻子。

他的微笑甜润，嗓音低沉，整个人显出某种庄严的、难以形容的贵族气质，致使所有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流亡国外的大阔佬。

有多少回，乔治·桑望着诺昂的金色菩提树冥思默想，那漂亮的形象就来到了她的笔端，使笔不住跳动，使她无法再写下去。

马勒菲依是一个正直诚实的青年，可才疏学浅；而肖邦却是天才。乔治·桑受过音乐的熏陶。小时候，她就经常坐在奶奶玛丽的羽管风琴旁，欣赏诗意盎然的音乐。结婚后，她又常蹲伏在李斯特的钢琴旁，分享使她深受感动的音乐。她比任何人都更理解音乐的语言。由于玛丽·达古尔征服了李斯特，那么她的办法就是要使肖邦归顺。

这一切，都使乔治·桑急欲接近这柔弱而有才华的音乐家。

这次征服可不容易，因为肖邦是个爱挑剔的人。他讨厌一切喧闹的争论，讨厌别人衣冠不整，特别讨厌一切丑恶言行。他最喜欢的环境，是摆设令人赞叹的沙龙，里而坐满举止高雅、喜爱音乐的美女，她们在半明半暗中等着听一首吐露隐秘的《夜曲》。他喜欢使高雅的听众深深地陷入沉思，继而突然间以英勇豪迈的感情，歌唱受苦受难的波兰，打动他们的心。在政治上，肖邦是个保守主义者；在爱情上，他多情而又羞怯。见异思迁的精神恋爱观，适合他性格上的弱点。总之，这个相当痛苦的人，他的生活很不协调。

肖邦和乔治·桑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严肃地评价这个浪漫派的女作家。她一副男人的打扮，嘴里吸着雪茄，亲昵地称呼她那些古怪的朋友。除了文艺界，她不和其他人来往。她与那些漂亮的、天使般的波兰金发女郎不相同！而直到这个时候，肖邦还纯真地喜欢她们。

大家都知道，肖邦起初是不愿去乔治·桑家的。去过法兰西旅馆后，他曾说：“这个乔治·桑多么讨厌！她真是女人？我总表示怀疑。”

1837年，乔治·桑回到巴黎，肖邦反而同意与她相见了。

肖邦的内心深处仍是很痛苦的。“我们从一个著名的大师的工作室出来，”肖邦说，“因为几个为我们调琴的独特的意大利提琴制造家不在，不灵巧的手不善于引发出我们的新声。没有弦乐器制造家，我们只好将这新声压抑在心里了……”

肖邦要娶的波兰姑娘玛丽遵照父母的旨意，渐渐地疏远了肖邦，原因是肖邦的体弱多病，令人感到很担忧。肖邦从没对人谈起这件忧伤的事，但他感到需要安慰。

就在这时，乔治·桑给了他所有的安慰。人们在肖邦的一个小本子里，找到一封乔治·桑写给他的信，信是对折着夹在本子里的。在信的角上，乔

治·桑写了这样几个字：“大家爱慕您”，并且签了名。而在乔治·桑签名的下面，多尔瓦尔夫人写道：“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一样！”

1837年10月，肖邦在日记中写道：

我见过她三次。在我演奏时，她眼睛深情地看着我。我演奏一首有点阴郁的曲子《多瑙河的传说》，我的心跟着乐曲飞回到故乡。而她忧郁而奇怪的眼睛，老是盯着我，这双眼睛在说什么呢？她倚在钢琴旁边，灼热的眼光使我的全身发烧……我们被鲜花包围，我的心被征服了！我又见过她两次，从此她爱上了我……

肖邦在乔治·桑身上找到了一种力量，不由得被她吸引，因为这力量支持着他。乔治·桑这个音乐爱好者，会珍重他，给他灵感，甚至能给他出主意。她这个慷慨的女人，只求献身于他。

尽管肖邦生性害羞，好像生来就怕冷，终究经不住诱惑。

诗人亨利·海涅很羡慕他俩，给他们这一对勾划了几笔。她栗色的秀发一直披到肩上，有点暗淡而似睡的双眼，是那樣的温存和安详；她的微笑充满了天真的娇媚；她的嗓音低沉不清，她生性沉默寡言，听得多而说得少。他异常敏感，稍为触动一下，就是一个伤口，稍有一点声响，也会引起雷鸣；他喜欢两人独处，隐居在神秘的生活之中，但是，有时因为被强烈迷人的或者说古怪的念头驱使，才走出来。

1838年春天，乔治·桑几次来到巴黎。晚上，他俩经常住在一起。肖邦演奏音乐；后来两个人都沉醉在吹过的晚风之中，这是燃烧着的天国之爱火。

可怜的马勒菲依完全被忘却了。

但是，和肖邦在一起，难以做出结论，爱情的季节变化无常。早上说：这显然是无法忍受的，可是晚上却说：这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这种羞怯和害臊，比起娇揉造作、故作媚态，更有把握地激起她的情欲。他整日躲开别人，神情冷淡，却使乔治·桑神魂颠倒。

在这变换不走的气氛下，1838年初夏，乔治·桑写了封信给肖邦最好的朋友阿尔贝·克齐马拉伯爵。他是一个好打扮的波兰大胖子，穿一件时髦名牌外套，上面缝满了绦子和花边。乔治·桑称他为自己的丈夫，因而肖邦被看成是他们的孩子。这封认真斟酌过的信，长达三十二页。乔治·桑在信里直率地写了大部分人过去和现在敢想不敢说的事。因此，在伪君子的眼中，似乎任何以诚相见，都是厚颜无耻。

乔治·桑在给克齐马拉的信中这样写道：

让咱们最后一次把问题明显摆出来吧，因为您对这个问题的最后的答复，将决定你今后的行动。您主张，既然我们热爱的人的幸福要求我们竭尽全力；那么，不要最后才考虑自己，也不要全然不顾自己。这样，我们的看法就完全一致了。请您好好地听我说；并请清楚地回答我，不要含糊，直截了当……

信中说的是些什么呢？肖邦要爱、或者以为要爱的是波兰姑娘。首先要知道她是否还会给他带来幸福。乔治·桑不愿做一个损害朋友的人。如果那青梅竹马的女友是位纯洁美貌的姑娘，她不愿做争风吃醋的妖精。此外，乔治·桑心想，既然自己已经和一个称心如意的人（指的是马勒菲依）有了婚姻般的关系，感情融洽，也很体面；那个人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她，她不想抛弃他。如果“我们的孩子”（就是说肖邦）决心投入乔治·桑的怀抱，

她也许会感到害怕：因为这种爱情“只能在它赖以产生的条件下发展，也就是说，断断续续地发展。如果一阵风吹过来，把我们中的一个人吹到另一个人身边，我们将在星际遨游……”

因此，只有两种可能。

其一，如果那个女人生来是要使肖邦获得纯真的幸福，而特别多虑的肖邦，又拒绝以不同的方式去爱两个不同的人；那么乔治·桑就会离去，并尽力使自己忘记他。

其次，情况刚刚相反，如果同那个女人结婚，就是断送艺术家的灵魂，如果肖邦在顾全家庭幸福和严守教规的情况下，能够抽出几小时去享受充满温存、诗意和贞洁的爱情，那么乔治·桑确实愿意继续去看他。乔治·桑绝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妨碍他的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和社会观念。肖邦相应地不责问她的行为：因为“我们将不是每天都见面，不是每天都会有激情；但是，总会有些美好的时光和圣洁的感情……”

还有一个次要的问题，但有必要提出来，那就是完全献身的问题。是让人占有，还是不让人占有？乔治·桑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的态度，实在引人注意和令人吃惊。她承认，关于这一点，她的聪明和她的感情从来没有这样吻合过：因为“在这上面，我既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理论，没有什么学说，没有什么定见，也没有下定什么决心……”

她素来为自己的这种天性感到自豪。她干过不少值得自我责备的蠢事，却没有干过庸俗恶毒的事：

感情总是胜过理智的，我希望处在这两者的边界上，这对我从来都是毫无益处的。

我多次改变主意。我尤其相信忠诚，宣扬过它，实行过它，而且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有些人缺乏忠诚，我也一样，然而，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不忠诚的时候，总是在劫难逃；这是一种理想的本能，促使我去摆脱不完善，追求那些我认为接近完善的东西……

总之，乔治·桑并不是那种水性扬花的女子，她总是忠实于她所爱的东西。就这个意义而言，她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而且，她只是由于别人的过错，爱情被扼杀，才不再保持忠贞。

在当前这情况下，她对自己十分不满，因为确实没有理由怨恨马勒菲依。而肖邦所造成的结果，又使她感到惊愕。如果有时间让她思考和权衡一下，她就会明白，这样做也许是不好的。但是，她已经突然受到了爱的袭击，爱情已经占住了她的心，她不能让理智来控制她自己了。

卢梭和他的情感伦理理论对此是有责任的。不管怎么说，让别人爱并不会扩大错误，最轻微的亲抚都会使不忠的忧虑烟消云散。“失掉了爱情，就等于失掉了一切……”要是男人和一个女人想要一起生活，他们不应违背人的本能，在完全结合的问题上退却。和肖邦一起，必要时她将被迫不再保持贞洁，条件是肖邦也不守贞洁，那是出于对她，或者对另一个女人的忠诚，而不是像虔敬的教徒一样鄙视人类粗鄙的行为。乔治·桑觉得“蔑视肉欲”这个口号是可怕的：

我相信肖邦曾说过，某些行为会破坏美好的回忆。这难道是他说的蠢话，是他设想到的事吗？那可怜的女人在肉体之爱当中，竟给她留下这样的印象，她究竟是谁？他有不相配的情妇？多么可怜的宝贝啊！在男人的眼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被绞死，因为她们糟蹋了造物主最受尊敬、最神圣

的小东西，亵渎了神奇的秘密，玷污了宇宙生命中最严肃、最崇高的行为。

这就是那封有名的信。它特别以其通情达理引人注目。有人说她想占有肖邦，又保留马勒菲依，还找了些合乎道德的借口，企图使人相信她追求的只是这两个年青人的幸福。也许是这样的。但是，那些充满激情的人，谁不会绞尽脑汁，使他的生活在感官和感情两方面协调一致呢？乔治·桑在她的《私人日记》中发问：

那么，所有像你们那样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你们用眼睛、耳朵和记忆来做什么呢，你们说我厚颜无耻，那是因为我看见并记住了使你们自欺欺人的伪善行为，因为我为盲目地追随伪善的德行而感到脸红……

她错了吗？这个自认道德败坏的女人，道德家接受并宽恕了她。因为她认了罪，她不但不会削弱原则，而是加强原则。放荡的拜伦或者波德莱尔，虽然受到惩罚，仍不失为道德的见证人。

而正是她心安理得和毫不惭愧的反叛，激怒了社会。那些虚伪的读者，绝对不能容忍乔治·桑的这封信。因为她在信中坦率从容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因为这封信竟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如果换个男人来写信，那么人们会发现，这不只是一个男人，而几乎代表了所有的男人。然而，乔治·桑就像男人一样地生活。这既是她的特点，也是她的弱点。她却认为这正是自己的光荣。

此外，问题在于肖邦极其谨慎，真实情形乔治·桑是难以想象的，从去年起，肖邦就中止了同玛丽的婚约。那是因为肖邦很痛苦，需要慷慨大度的温存，任凭自己在乔治·桑的怀抱里寻找温柔的宽慰。

克齐马拉的答复大概给乔治·桑吃了定心丸，因为乔治·桑很快就从诺昂回到巴黎。

1838年夏天，令人感到幸福。波兰姑娘玛丽的形象在肖邦的脑子里慢慢淡漠了，最后，只剩下一些诗一般的回忆。肖邦工作很努力，并且发表了一本《练习曲》，献给李斯特的情妇达古尔伯爵夫人，他过分腼腆，所以不会将这练习曲献给乔治·桑。

在这对情侣中，却是男的要求保守秘密，显得不合常理。因为马勒菲依的缘故，乔治·桑这次不得不谨慎从事。她满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他：

他这个人是这样和善聪明，以致我渐渐地不能引导他领会和知晓一切。这是一块可塑的蜡块，我在上面留下我的印记；而且，当我想改变印记时，只要几分谨慎和耐心，就能够成功……

这块蜡在使用的时候，并不像她认为的那样软弱，马勒菲依在被抛弃以后，变得十分嫉妒，并想要抵抗。1838年夏天，他就要与一个来诺昂的朋友决斗，因为这个人曾向乔治·桑献过殷勤。

乔治·桑事先光明正大地通知这位年轻的家庭教师，说他得宠的时间已经结束，爱情从此将转变为友谊。但是，她和另一个男人一有来往，争吵就可能要重演，肖邦尤其不应该是那个第三者。乔治·桑害怕肖邦受到马勒菲依的伤害，因而当马勒菲依到一个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去时，她赶紧给那个朋友写信求援。信中说：

当你们谈到女人的问题的时候，请清楚地告诉他，女人不属于使用暴力的男人；两人互相割喉咙，绝不能重修旧好……

这场风波使玛丽·达古尔感到很高兴：“我说，多么可怜的马勒菲依啊！他现在躺在床上，因为虚荣心受到了损害而病倒了，从此不存任何幻想：不

抱任何希望了。”于是，她说马勒菲依返回巴黎了。

马勒菲依，这个可怜的人，一点也不知道乔治·桑又有了新欢，他甚至到《音乐报》上向肖邦表示敬意。

最后，不知道是什么鬼灵感，使他猜疑起来，进而在肖邦的房门外窥视。乔治·桑每晚都要到那房间去，被他撞上了。马勒菲依在那里变成戏剧性的人物，他叫着、吼着，他凶相毕露，想要杀人。朋友克齐马拉扑到这几个出名的冤家对头中间。人们让马勒菲依安静下来，乔治·桑和肖邦一起溜走了。他们去了帕尔马，在爱神木的树荫下，编织美好的爱情了！

乔治·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编织美好的爱情：如果她不离开巴黎，就会重新引起争风吃醋的风波；另外，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活，莫里斯的身体会好起来。肖邦整天咳个不停，令人不安；他自己担心和乔治·桑的这种暧昧关系一旦公开，丑闻会使他虔诚的家族大为震惊。

至于乔治·桑，她在什么地方都能同样有规律地工作；而且，她总是需要同新情人像正式夫妻一样生活。近五年来，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感到很烦恼；希望有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她和肖邦约定，她带着两个孩子出发，每天赶路不多，途经里昂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肖邦在途中与他们汇合，然后一起乘船去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

1838年11月，他们来到马略卡岛的首府帕尔马。离开巴黎时，天气寒冷；到西班牙时，阳光灿烂，初次印象就十分美好。

置身在帕尔马的树下，那是棕榈、雪松、芦荟、橙树、柠檬树、无花果树和石榴树；碧空万里，大海蔚蓝，群山苍翠。空气清新，人们仿佛在天上一一般。白天，太阳高照，大家穿着夏天的衣服，天气很热；晚上，整夜歌声和吉他声接连不断。他们住的房子建于阿拉伯人时期，葡萄藤从宽广的阳台伸出，垂挂在墙上。总之，生活在这里，令他们十分愉快。

但是，肖邦很快就感到失望了。那两个陈设很差的房间，根本就没有怎么布置，只有几张铺着深灰色垫子的帆布床，一把草垫椅子。他们吃的是鱼和大蒜，一种变了质的油把这里的房子、居民以及原野的空气都熏臭了，令人十分恶心。这足以使一个过分讲究而又敏感的人感到不舒服。

乔治·桑东奔西忙，找到了一个住所。他们想请人装修一下也很难，马略卡人干活既偷懒质量又很差。当地人惯于在大风中生活，房子没有玻璃窗，也没有门锁。

最后，一位名叫戈梅兹的先生把一所乡间小屋出租给这对情人。房子座落在山脚下，每月租金为一百法郎。

因为有甜蜜的爱情支持，最初的日子倒是过得愉快。他们轻松惬意地闲逛，到了12月中旬还在平台上度过美好的夜晚。乔治·桑常常想起威尼斯：入夜，大理石上汨汨的流水声多么神秘；她也忆及诺昂：成群的夜莺在林中整夜欢唱。

马略卡岛的夜晚极其安静，只有雌驴脖子上的铃铛和远处微弱的海浪声，有时会打破沉寂。

但是，好景不常。雨季开始了。大雨滂沱。戈梅兹先生租给他们的小屋，屋里很潮湿，又没有壁炉。建这房子并不是为了抵挡大风暴。墙壁很单薄，房内涂的一层石灰，经雨水一泡，全都如海绵似地膨胀起来。寒冷像一件冰外套，突然罩在他们身上。房里火盆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味，使肖邦的咳嗽又发作了。

就从这时起，肖邦成了当地居民讨厌和惧怕的人物。胆小的戈梅兹写道：“我们遇到了一个得了传染病的人，怪不得他叫我们离开他的屋子。”

城里的三个医生都到这里来给肖邦会诊。一个医生闻他咳出的东西，另一个叩诊他咳嗽的部位，还有一个医生在他咳时，给他听诊。肖邦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逃脱了放血和服发疱药。

由于这些西班牙医生明确地指出，肺癆病是传染的，戈梅兹先生就把房客赶了出去。

他们只得去瓦尔德莫札修道院落脚。

旧道院破败荒凉，尚未倒塌，院里的人都被赶走了。一个政治流亡者匆匆离开故土，留下了他的单人小室和家具。乔治·桑他们在十二月中旬穿过灌木丛和阿福花，搬到这个山间的陋室里来往。

瓦尔德莫札旧道院面积很小，只够十二个修士和一个主持居住。它居高临下，两边靠海。1836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修道院的单人小室，由国家经租。但是，由于可怕的迷信，这里没人敢住。乔治·桑他们孤独地住进了修道院。

他们的邻居中有一个药剂师，一个圣器室管理人，和一个名叫安东尼娅的老太婆。

她替他们干活。但事实上，她要拿走最漂亮的衣服，先尝最可口的饭菜。帮忙做家务的，还有当地大个子巫婆卡达里娜，以及头发乱蓬蓬的小鬼妮娜。

修道院小礼拜堂和回廊，装饰着阿拉伯风格的镶嵌画。晚上，在月光下，这古老的建筑物就显得十分奇特。索朗芝和莫里斯常常沿着螺旋形的楼梯爬到屋顶上去玩。

郁郁葱葱的青山，黄褐色的悬崖峭壁，孤零零的棕榈树，都消失在玫瑰色的天空里。

在阳光明媚的白天，景色雄伟壮丽。然而，他们在瓦尔德莫札旧道院的暂住，实在是失败。肖邦吃不惯当地的饭，乔治·桑只得自己做饭。她亲自下厨，还要到帕尔马的店铺买东西。她带着孩子们，顶着大雨，来往奔波，坐破旧的马车，穿过暴涨的激流。同时，她还要修改《莱莉亚》，写小说《斯皮里底翁》——因为她需要钱，布洛兹资助了他们的旅行，可要她交稿——乔治·桑强健的身体，很能适应这种紧张的生活节奏。

老鹰在他们的床顶上方翱翔，浓雾时常笼罩着群山；小灯替他们在荒凉的修道院里照路，看上去像鬼火一般闪烁。从来没有什么住所比这里的更加浪漫。

肖邦工作在他的修士小室里，房门比巴黎住宅中通马车的大门还要高。他的头发一点也不鬈曲，手上没有带白手套，脸色和往常一样苍白。后来，肖邦终于收到了他的竖式小钢琴，这钢琴一直被扣在帕尔马海关。过去，在钢琴上，常放着巴赫的作品和他自己手写的曲谱。他一直因失去了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熟悉的东西而难过。

邻居们并不喜欢这几个法国人。他们不去教堂祈祷，引起了邻居的反感。当地市长和本堂神甫说他们是异教徒。农民们联合起来敲竹杠。他们要出高价，才能买到鱼、蛋和蔬菜。索朗芝的衣服也十分引人注目，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十岁的女孩，不应穿男人的服装。

这里的气候很适合孩子们的成长。索朗芝容光焕发；莫里斯也神奇般

地恢复了健康。

他们的母亲，一贯勤勉地工作，努力教他们学习。

但是，肖邦的身体却惊人地走下坡路，咳嗽使他整日无精打采，十分虚弱。乔治·桑感到很难过，不能使他得到很好的调养。她常大发脾气，因为女仆们偷吃肉汤，又没有新鲜的面包。天气越冷，忧伤的情绪就越妨碍乔治·桑努力使大家快乐和安宁。

当地的医生诊断肖邦是喉结核，并建议他放血和禁食。乔治·桑觉得放血有生命危险，并且不相信诊断结果。

尽管肖邦感到很不舒服，他还是坚持工作。在马略卡岛的这些日子里，他创作了不少《叙事曲》和《前奏曲》。据说，其中很多乐曲是他焦急等待乔治·桑夜间散步归来时，灵感大发而写成的。

每晚乔治·桑都和孩子们外出散步，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们加快了步子，”乔治·桑这样写道，“以免病人担忧。这种忧虑的确很强烈，而且像是凝固在一种平静的失望里。他流着眼泪演奏一首十分出色的《前奏曲》。看见我们回来，他大叫着站了起来；接着，显得神情失常，用一种奇怪的腔调对我们说：‘啊！我很明白，你们已经死了！……’而当他清醒过来，并看到我们很好时，他因回想刚才梦幻中我们遇险的情景而感到难过。后来，他向我承认，在等待我们回来时，他像是做了一个恶梦；由于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他就弹起钢琴，渐渐地就平静了下来，昏昏沉沉的，以为自己死了。他好像掉进一个湖里，冰冷沉重的水滴，有节奏地滴落在他的胸前。我叫他听，那雨水真的是滴在屋顶上，节奏分明；他却否认听到过这声音。

我用‘模声谐音’这个词，他竟怒气冲冲。他极力表示反对，他有理由反对这种幼稚的听觉模仿。他的音乐才华充满了大自然神秘的和谐，是由他的音乐思想卓越体现的，而绝不是外界声音的刻板重复。这天晚上，他创作的乐曲，在他的想象和在歌曲中，都已变成了从天而降的泪水，敲击着他的心房。”

肖邦就这样，在浪漫的环境中，创作了不朽的杰作。但是，他很快就讨厌马略卡岛。

暂住在瓦尔德莫札旧道院，对他是一种折磨，对乔治·桑也是一种痛苦：

肖邦在社交场合，显得温文尔雅，活泼可爱；但当疾病缠身时，他心里却感到失望，精神上好像被活活地剥皮那样痛苦，一片玫瑰叶子的折皱，一只苍蝇的影子，都会使他感到放血一般难受。除了她和孩子们，西班牙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的反感和愤慨；与岛上生活的不便相比，急于离开的念头更加折磨他。

启程的日期终于决定了。从帕尔马到巴塞罗那，旅途十分可怕。在轮船上，从货舱里散发生猪的臭味十分难闻。船长见肖邦咳嗽，怕他弄脏干净的床铺，给他一个最差的铺位。水手们用鞭子来抽打生猪，治疗晕船，猪群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狂叫。

肖邦在船上咳出了很多血，到达巴塞罗那时，他差一点死去。从巴塞罗那到马赛，法国轮船上的医生十分细心地照看他这个病人。看来二月份他回不了巴黎。乔治·桑做为这个“家庭”的家长，把全家安顿在马赛的一家旅馆。

马赛的风光秀丽迷人，乔治·桑却无动于衷：“因为，我只要稍微探首窗外，走到街上或去到港口，我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糖、一箱肥皂或一包蜡烛了。幸亏肖邦用他的钢琴赶走了烦恼，并将诗意带到了我们的住所……”

有闲者、猎奇者和文学乞丐，都围在她的门外。

乔治·桑说：“我的门口总是挤满了，所有的文学渣滓都来纠缠我，所有的音乐败类都尾随肖邦，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让肖邦装死。如果情况没有改变，我们就四处寄发我们两人的讣告，让别人为我们哭泣，使我们得到安宁。我们想整个三月份都躲在旅馆里，避开那不时刮来的相当猛烈的西北风。我们四月份到乡下租几间好的农舍住，五月份就回诺昂。”

在旅馆里，尽管孩子们在周围嬉戏吵闹，乔治·桑每天仍旧要写完十五页或二十页小说。她从马略卡岛带来了修改过的《莱莉亚》和一本抽象神秘的小说《斯皮里底翁》。

她继续慈母般虔诚地照顾肖邦。她不能出门，因为肖邦不能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周围没有孩子嬉戏和朗读的声音，他就会感到烦躁。肖邦略微胖了些，几乎不咳嗽。肖邦身体好时，她带他去意大利的热那亚，做一次缪塞式的出游，就像当年他带马勒菲依去弗朗夏尔一样。

玛丽·达古尔，挖苦乔治·桑已经“肖邦化了”。

乔治·桑给自己放血，我总对她说：“换了我，我比您更爱肖邦啊！”省得挨那么多刀呀！后来，她就不可能写《致马尔西的信》，也不可能缠住博卡日了。对一些善良的人来说，那可真是大好了。根据我分别了解他们的情况看，他们也许是因为同居了一个月，才彼此传染伤风的。这是两个正好相反的人，但没关系，这可是太妙了。而马勒菲依呢？他在这些纠纷中会怎么样呢！像他所说的那样，再去培养他那卡斯蒂利亚人的骄傲？乔治·桑常常振振有词地向我证实，马勒菲依特别愚蠢可笑，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从来也不太担心莫里斯的健康状况。不管怎么说，西班牙的阳光对于爱情的冲动来讲，是一种灵丹妙药。肖邦是我唯一喜欢的钢琴家，他的演奏不仅不会令我生厌，反而使我听得入神。

这封信被收信人恶作剧般地交给了乔治·桑。乔治·桑果真发火了。由于信的主人要她发誓不要泄露是谁提供这情况的，她认为最简便的办法是不回复达古尔夫人的信：“我不愿意假装友好。”这话使玛丽和李斯特大为吃惊。

李斯特从中撮合，改善情妇和乔治·桑的关系，便写给一位朋友，说：“既然我们是她过去朋友，就在我们中间，悄悄说说算了吧。”

1839年5月底，肖邦和乔治·桑离开马赛，前往诺昂。他们好像市民一样，在沿途的旅馆住宿。

第二节 女人的纤指

肖邦总是生病，不适宜过性生活，不能享受性爱的快乐。很久以来，不管他怎么恳求，她强迫他清心寡欲。

乔治·桑站在他身边，一只手亲昵地放在他的肩上，喃喃道：“大胆些，柔软的手指！”

六月的贝里，骄阳似火。乔治·桑感到高兴，因为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和执掌家政。

肖邦应邀到诺昂作客的那一天，她在自己卧室一个窗户左边的墙壁上，用铅笔写了个日期：一八三九年六月十九日。

这是不是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呢？

她早就意识到，那种骑马散步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做为一家之长，她要负责照顾三个孩子：肖邦、莫里斯、索朗芝。她将竭力坚韧不拔地生活，只是为了他们和她的艺术。

然而，她真正的朋友都希望她过另一种生活，充满温柔的爱，带点家长气概。他们把肖邦看作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并不加以嘲笑和责难。从 1839 年起，他们给乔治·桑写信末尾都是这样写的：“吻肖邦、莫里斯和索朗芝。”

肖邦的言谈举止极其得体，他只称呼乔治·桑为我的主人或本宅主人。这样，形势变得对他越来越有利。

他们愉快地度过了在诺昂的第一个夏天。然而，肖邦根本不喜欢农村。他向往诺昂，但同时又忍受不了那里的生活，他那乡居的欲望很快就得到满足。他外出散步不多，只是在树下坐坐，或顺手采摘一些花。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里，闭门不出了。他不参加乔治·桑和孩子们十分喜爱的户外活动。但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并且从早到晚弹琴不止。

乔治·桑写道：“自从到了这里之后，他创作了很多欢快的曲子。”

在这个夏天，他的确创作了降 B 小调的《奏鸣曲》，第二首《夜曲》和三首《玛祖卡舞曲》。女友的音乐鉴赏能力，对他来说，十分可贵。

乔治·桑是肖邦敏感的听众。由于对肖邦的了解不断加深，她与肖邦真正成了心心相印的知己。她听肖邦演奏，并一直跟随着钢琴家神秘莫测的内心活动——只有他的琴声能把内心活动委婉含蓄地表露出来。

1839 年 10 月，肖邦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都说我身体好多了。不咳嗽，也不痛。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感到很难过。因为，奥洛拉（肖邦对乔治·桑的称呼）的眼神还是那样的阴郁。她的双眼，只有在我演奏时，才显露出喜悦的光芒。在那里，世界是多么光明美好啊！我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跳，她的笔尖在纸上飞舞。她能边写作边听音乐。四面八方都充满了肖邦的琴声，甜蜜清亮，就像温柔的情话。奥洛拉，为了你啊，我都可以在地上爬行。这一点也过份，我要把一切都献给你。我累的时候，你的眼光，你的抚慰，你的微笑，给我多大的安慰啊！我只是为了你才活着；我会为你弹奏出优美的旋律。

亲爱的，你阴郁的目光别太折磨人了，好吗？”

“别太折磨人了，好吗？”那么说乔治·桑在折磨他？

当然不是。但是，在乔治·桑的爱情中，含有几分高傲。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大钦慕那个音乐家和诗人。马略卡岛的共同生活，目睹肖邦旧病复发，足以使乔治·桑感到，肖邦总是生病，不适宜过性生活，不能享受性爱的快乐。很早以来，不管他怎么恳求，她强迫他清心寡欲。后来，他完全无此欲念了。

很多年以后，乔治·桑写信给他俩的密友克齐马拉说：

我如处女那样，和肖邦及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已经七年了。由于我对

情欲是那样地倦怠、失望、无药可医，我已经未老先衰，没费什么力气，也无需做什么牺牲。如果世上也许有一个女人值得肖邦绝对信任，那就是我；而肖邦根本不懂得……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责怪我。一些人说，我强烈的情欲，耗尽了肖邦的精力；另一些人说，我的行为出轨使他很失望。我认为你是知道内情的。肖邦埋怨我剥夺了他爱的权利，等于置他于死地；我坚信，如果不这样做，那才真的置他于死地……

对乔治·桑的这种态度，肖邦如果不感到痛苦，并且不把它归咎于另有所爱，那么肖邦就显得不近人情。只是在后来，肖邦的嫉妒与不公正，才变得难以忍受。

秋天，他们要离开诺昂，乔治·桑深感遗憾。在巴黎时，每当她想起诺昂那些犁过的田地，想起休耕地周围的胡桃树，想起农夫们吆喝着的那些耕牛时，她叹息不已：“没什么好说的，生为乡巴佬，根本适应不了城市的喧闹。我认为，还是家乡的泥土美，而这里的泥土，使我恶心。”

但是，肖邦要回到他的学生们当中去；乔治·桑自己也愿意在巴黎生活，这样可以节省开支。诺昂的家庭负担很重。这个女领主，财产披人搞光了，却不愿显出一副寒酸相，以逸被人骂作吝啬鬼。每天，都有些朋友不请自来，一来就是十二个，甚至还没起床就有人来。每月要开支一千五百法郎；而在巴黎只需一半。因此，这个“家庭”决定搬到巴黎去。

起初，乔治·桑和孩子们住在皮加尔街十六号两间独立的小屋，屋前有个漂亮的大花园与街相接。肖邦住在特龙塞街五号，有一个套间。他仍然需要精神上的依托和精心的照料，最终也住进了皮加尔街。

他们这样同居了三年。

巴尔扎克参观过这套房子，并在给他的情妇的信中，以拍卖估价员和小说家独特的观察力，做过精确的描写：

她住在皮加尔街十六号，房子坐落在花园的尽头，面向街，首层是车库和马厩。饭厅里全是橡木雕花家具。她接待客人的大客厅、小客厅的墙壁呈浅褐色，里面摆着精美彩绘的花瓶，插满了花。一个花盆架，鲜花盛开。大客厅的家具呈绿色，餐具柜里放满了精巧的摆设。墙上挂着德拉克鲁瓦的油画和卡拉马达替她塑的像……那架竖式黄檀木钢琴十分华丽。此外，肖邦总是坐在钢琴旁。平时，乔治·桑只抽香烟卷。她每天四点钟起床；肖邦刚好四点钟才上完课。要登上又陡又窄的叫做磨坊梯的楼梯，才能到她的住处。卧室呈褐色，床是土耳其式的，即铺在地上的两张床垫。

1842年，热心而又泼辣的马尔利亚尼夫人替肖邦和乔治·桑在奥尔良花园广场附近找到两套房间。那里是个高级住宅区，具有意大利宫殿式的高雅气派，室内光线充足，室外砾石铺地，绿树成荫。在广场附近，还住着一些艺术家和作家。

这样，奥尔良花园广场，就成了一个大家庭式的组织了：他们甚至设想过一起吃大锅饭，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开音乐会和朗诵诗文。

乔治·桑和肖邦与朋友们聚会。乔治·桑的朋友：皮埃尔·勒鲁、巴尔扎克、亨利·海涅、博卡日、玛丽·多尔瓦尔、霍尔滕丝等人和她的所有贝里同乡；肖邦的朋友则是一些音乐家、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和波兰人。

聚会使乔治·桑成了斯拉夫语的学者，她颂扬密茨凯维支的光荣。

欧仁·德拉克鲁瓦和肖邦一样讲究时髦，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情。他们敏感多情，易受感动，言谈举止与思想都具有贵族派头，比起他们同那位

民主派女友的关系来，他俩更加亲近。

亨利·海涅是奥尔良公园广场一个幽默风趣的常客，乔治·桑很喜欢他。他和大家一样，曾钟情于乔治·桑；但是这未能如愿的狂热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称乔治·桑为“我亲爱的表妹”；给她的信，用“我的心拥抱你的心”来结尾；信中常有这样的话：“您的小说很美，真是文如其人……我现在还给您……”他跟乔治·桑开玩笑，说缪塞是一个过去伟大的年轻人。他是很赏识这个女人和作家的。乔治·桑的伟大和从容，谁也不如他描绘得那么维妙维肖：“乔治·桑多么漂亮，多么温顺。对于一只爪抚摩、一只爪抓伤她的恶猫，以及拼命向她狂吠的狗，她都像月亮一样，在高空温存地望着它们。”

谈起肖邦，乔治·桑仍旧情深意切：“他永远像天使一样善良。没有他纯真亲密的友情，我就会失去勇气，”“肖邦慢条斯理地过日子。他是有天才的人中，最和蔼、最隐秘、最谦逊的人……”

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乔治·桑没有再把肖邦带口诺昂。1840年，她自己也没回去。

但是，在后来的六个夏天里，她又在诺昂为她的“三只小鸡”垒起了小窝。

在这期间，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肖邦演奏的琴声，琴声伴随着玫瑰的香味和鸟雀的欢唱，一直飘到在楼上工作的乔治·桑那里。她唱起古老而又鲜为人知的歌曲，肖邦替她伴奏。莫扎特的《唐璜》，在这几个朋友的眼里，是最理想的，他们为德拉克鲁瓦在诺昂布置了一个画室。他和肖邦，还有年已二十几岁的莫里斯经常在一起谈论他们的艺术，乔治·桑漫不经心地听着。

她正在写《康絮爱萝》。这部小说写得很出色，乔治·桑曾这样描述诺昂的那些晚上：

肖邦坐在钢琴旁，并没有觉察到大家都在听。他好像是偶然地即席演奏。接着，琴声停了下来。

“啊！啊！”德拉克鲁瓦叫了起来，“还没完啊！”

“还没开始，一点构思都还没有……只有不定形的倒影、阴影和立体形象。我寻找合适的颜色。我还没想到画面该是怎么样的。”

“色彩和画面，两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德拉克鲁瓦又说：“您都会找到的。”

“但如果我只找到月光呢？”

“那您将找到反光的反光。”

这想法使非凡的艺术家感到高兴。他又演奏起来了。但并不显出是重头来的样子，因为他的构思是那样模糊，好像拿不足主意。我的眼前慢慢浮现出了温柔的色调，它和耳朵里听到的美妙曲调，协调一致。接着，响起了表现蓝色的音符，我们仿佛在澄澈碧蓝的夜空中，轻柔的云朵，形态万千，神奇变幻，布满天空，簇拥在月亮周围。月亮给它们抛去巨大的乳白色光轮，唤醒了沉睡的色彩。我们梦见了夏夜。我们等待夜莺的到来……

肖邦开创了诺昂的戏剧事业。

在开始时，当年轻人演戏或跳滑稽芭蕾舞时，肖邦就即席演奏钢琴。他得心应手地引导他们，让他们按照他的想象，从打趣变成严肃，从滑稽变成庄重，从优雅变为狂放。

而肖邦自己呢，就是一个真正天才的哑剧演员。

有时，他站起身来，突然出现在钢琴后面，绝妙地模仿奥地利国王或一个波兰犹太老人的神态。

当他们在森林里散步时，肖邦骑在驴背上，其他人却步行。在草地上，和着风笛的拍子，村民们翩翩起舞。这风笛声启发乔治·桑写了小说《风笛手》。这些活动使她对那浪漫的乐土和欢乐迷人的喧闹，有一个大略的印象。

把 1840 年到 1845 年间的肖邦，描绘成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倍受一个欲壑难填的荡妇折磨，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乔治·桑对肖邦的影响是完全有益的。她在事业上，给他的创作提建议；在生活上，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肖邦尽情愉快地度过了在诺昂的这几个夏天。可惜，他的性格和疾病都不允许他这样长久地愉快生活。很多朋友同情乔治·桑。连肖邦的同乡密茨凯维支也说：肖邦对于乔治·桑来说，是祸根，是精神上的吸血鬼和苦难的十字架，而且他最终也许要把乔治·桑置于死地的。

肖邦心地是好的。但是，他像所有神经质的人一样，总是过分挑剔，不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在政治上，他与乔治·桑观点不一致，他既不能容忍乔治·桑所赞赏的某些人物，也不能接受这些人判断事物的激烈方式。譬如：他责备自己的学生玛丽和沃德赞斯基伯爵的关系大显眼。他猛烈攻击他们，尤其是因为乔治·桑袒护他们。

乔治·桑已经知道他病态的偏好与厌恶。她就像对孩子讲话一样，改换话题。否则，他会整天沉默不语，伤心难过，做出些古怪的举动。在诺昂，乔治·桑邀请了肖邦，就不敢再邀请自己袒护的诗人一起作客了。

乔治·桑的哥哥伊包利特喧闹的玩笑和熊一样的举止，时常会激怒肖邦。在巴黎，乔治·桑的客人的衣着和态度，往往引起他的反感。英国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曾这样描写过他们：

她喷烟吐雾，唾沫横飞。一大群没有教养的男人，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一个希腊人亲昵地用你称呼她，把她紧紧地搂抱在怀里；一个男演员，庸俗极了，竟扑倒在她的脚下，称她为最了不起的女人，于是高傲的女人不慌不忙、温柔而又轻蔑他说：友情使人忘乎所以。

戏弄乔治·桑的这帮人，激怒了肖邦。然而，很久以来，不同政治观点、各异的兴趣和嫉妒心，却一点都没有影响他和乔治·桑之间深厚的友谊。在肖邦，那是爱恋之情；而在乔治·桑，则是母爱与钦佩之情。

乔治·桑继续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病人。肖邦单独去巴黎，她就赶紧通知马尔利亚尼夫人，使肖邦能洗上热水，找到通风的房间。“这是我的小肖邦，我把他托付给您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请多加照料。我不在时，他自己照管自己的能力很差。他有个好心的佣人，却很笨。我并不担心他的饮食，因为各方人士都会宴请他的。但是，早上匆忙去上课，我担心他忘了喝一杯巧克力或一碗汤。我在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我总是要灌他喝一杯的。现在肖邦身体很好，只是要像大家一样吃好睡好就可以了。”

肖邦还没痊愈，但经过乔治·桑的照料，好多了。乔治·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随时准备放下一切去照料他。肖邦对她始终忠诚。因此，当她卧床不起时（她也常有病，她一生都说肝痛和肚子痛），肖邦热诚地履行护士的职责，忠心耿耿，动作机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爱美这一点上，他们继续保持一致。在诺昂，有一天晚上，乔治·桑对肖邦叙述了乡间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妙，她讲得好极了。

了。

肖邦说：“您讲的这些多美啊！”

乔治·桑回答道：“您感觉到了吗？那么，请把这些用音乐表达出来吧！”

肖邦马上即席演奏了一首真正的田园交响乐。

乔治·桑站在他旁边，一只手亲昵地放在他的肩上，喃喃道：“大胆些，柔软的手指！”

谁知道，如果没有乔治·桑这只手抚在他的肩上，没有诺昂神奇的影响，肖邦在他短促的一生中，能否写出那么多杰作？甚至，谁知道他是不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第三节 女人间的冲突

李斯特的情妇玛丽·达古尔既想恢复与乔治·桑的关系，又忍不住肆无忌惮地议论她。

“乔治·桑恨我，我们不再见面了。”

人们大概已经注意到，在诺昂和皮加尔街的来访者中，肖邦和乔治·桑这对情人先前的朋友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不再露面。自从那封信的事发生以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面。因为乔治·桑答应过不透露提供消息的人。所以，她就不能抱怨。

玛丽因不知道自己已被出卖了，完全不理解诺昂方面为什么缄默不语。她说这沉默无法解释。她继续肆无忌惮地议论乔治·桑。在给朋友的信中，她这样写道：

根据什么我不能爱也不能理解我的朋友们？而且，这是关系到世界上最容易了解的人啊！怎么能要我对她自己都不能严肃对待的事严肃对待呢？这不都是因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诗兴大作，才使她将石头看成钻石，把癞蛤蟆看作天鹅的吗？我只想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活着。当我在她家里时，我都尽量不去打听她生活的某些细节。这和我对她的感情毫不相干。此后，我从公众舆论中得知一些情况。此外，乔治·桑又是那样愿意让人知道！

对于我来说，唯一真正严肃的事情，就是我要当面跟她讲清楚，她的聪明才智变得迟钝麻木了。自从她写了《致马尔西的信》以来，她只写了些毫无价值的小说。显然，激动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她今天必须做进一步研究、深思熟虑和集中思考。然而，博卡日、马勒菲依和肖邦，都不能帮助她，也不能引导她走上新路。

她在激情的驱使下，极尽疯狂之能事，竟至认为爱情只是一个生理问题。当她不可能保持贞洁时，她把一个不能对她施加任何影响的人做为情人，她不欺骗他，而这个人她的生活中也微不足道。她终于干出了一心满足自己肉欲的男人才干的事。

她一边干丑事！一边悲叹她肌体的需要；由于她完全自觉和绝对忠诚，比男人显得更高明。

1837年8月，玛丽感到惊讶，有些担心再也得不到乔治·桑的复信。她请人转达了最后的呼唤。

玛丽·达古尔给乔治·桑写了信：

亲爱的乔治·桑，您也许对我坚持给您写信感到很惊奇吧，因为一年半以来，您完全沉默了，尤其是我最近写信请您来和我们一起避暑，您也不回答。这一切足以表明，您觉得我们的交往使您厌烦。

但是，既然我认为我们的交往是件严肃的事，既然我们彼此交换过的一些意见对我具有始终不变的意义，哪怕是出于自尊，我都不可能听任我们的联系无缘无故地结束。

我想，这种联系应该与我们同在。

我认为，您没有什么好怨恨我的。因为，即使这样，您也应该赶快告诉我，好让开诚布公的解释尽快地消除暂时的误会。这是友谊中最容易而又最应该尽的义务。

此外，我也反复地想过，但都枉费心机，找不到一点错误的表现。弗朗茨也自问，怎么您和一个他自认有权称作朋友的男人亲密了，就马上要断绝同我们的来往呢？

说实在的，您第一次和我们朋友中的一个亲密起来时，也曾有过同样的结果。从那时起，您就表示不想常给我写信。弗朗茨那时跟您谈话，使您把头脑中早已决定了的事住后推：慢慢地疏远我们，并且最后中止同我们的交往。对您古怪的做法，我只能做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仍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

过去，您在爱情上经历了很多挫折，使您心灰意懒，您受到过多次的提醒。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一切，还都不足以得出如下悲观的结论：您不可能有持久的感情；初次短暂的爱情，总是压倒经过考验的爱情；对您来说，说话不一定算数，您将思想最深处的隐秘，付诸偶然吹来的风；而且，您喜新厌旧，旧人在您的心上早已没有地位，任凭新人辱骂。

请让我告诉您，我还是满怀希望。我衷心希望得到一个您和我都相宜的解释，以了结这难以忍受的痛苦状况。

要是您仍然坚持沉默，那我将明白，您一心要断绝关系。您多变的性格竟使您背叛了神圣的友谊；它大概同样促使您把友谊忘得一干二净。至于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虔诚地把友谊铭记在心，并把一切冲淡、破坏友谊的想法默默地埋藏在心底。

弗朗茨想给您写几个字，但他的信也不过是重复我要说的话。我阻止他提笔写信，以免使您厌烦和伤心。我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不能相信您会满心喜悦地同两个经得起考验的朋友绝交。

玛丽

由于这封信是托人转交的，委托人未能送达乔治·桑。最后，信又回到了玛丽·达古尔的手中。

九月，她连同另一封信一起寄给了乔治·桑。

乔治·桑收到信后，考虑选择什么方式和玛丽绝交。

她决定答复玛丽，首先是要证明肖邦是无辜的。因为玛丽·达古尔可能会在音乐界里向肖邦挑起不必要的冲突。她完全明白，见面将是不可避免的。

乔治·桑在给她和玛丽·达古尔的中间人马尔利亚尼夫人的信中写道：

然而，请注意，我承认有必要心平气和地见见面。但是，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没有解释清楚，就不可能会面。不然，她会大吵大闹，一有机会，就要演一场大闹剧的。我了解她！在维护其尊严的争吵中，她是很出色的演员。除了您这个东道主和我之外，大家都会觉得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乔治·桑要求三个人在一起澄清事实——态度十分坚决。而马尔利亚尼很厌烦，她要向玛丽承认自己不谨慎。

1839年10月，马尔利亚尼给玛丽·达古尔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玛丽，有一件事，我应该对您，也对我自己解释清楚。我一直打算等您回到巴黎后亲口对您说。但有一个特殊情况，使我决定现在就开诚布公地跟您谈谈：那就是，乔治·桑马上要来我这里。而您坚持责问她对您沉默的原因；您还告诉我，已经把给我看过的信寄给了乔治·桑。您在去年十一月九日和今天一月二十三日给我写了信，我想您还记得吧？您在信中冷酷无情、轻率唐突地挖苦我的朋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给您回了信，后来闭口不提那令人难受的事，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态度。直到那时，我都相信您对乔治·桑的友情，而正是通过她，我才有幸认识您。

她从此不把您当作她的朋友，而我出于对她的深厚友情，尽了朋友的职责。乔治·桑对我说起过您，并说没有及时给您回信，我写信对她说，我认为她不应该指望您的友情，我觉得有责任告诉她，并且要她不必多问，因为我不回答她的。乔治·桑从来没向我提过一个问题。我也从未向她说起过您的信，也没给她看过信。

如果说我通风报信，不够慎重，对不起一个如此亲密的朋友，做了错事，那是可能的。总之，我能让您放心的就是我的作法，除了上述原因，没有别的动机——我的作法，您也许会抱怨。但是，根据我对真诚友谊的义务之理解与认识，我不会后悔。

这样，乔治·桑和玛丽·达古尔直接通信恢复了。乔治·桑对老朋友毫不宽容，她一直视玛丽为敌人。她给玛丽的信写得很出色，文笔斩钉截铁，分析细腻入微：

玛丽，我并不确知最近马尔利亚尼夫人对您说了些什么。我只对她埋怨您……您却向很多人埋怨我，他们便怨恨我和诬蔑我。要是说我是生活在一个流言蜚语的世界，我可不是创始人，我试图尽量少学您这个榜样。

我不知道您想求助于我们过去的是什么。我很不明白。我是很自然，甚至是很热情地投身到您亲切的友谊中的。您嘲笑我迷恋于友谊，滑稽可笑。当您毁坏了我对您的一片痴情，这就不够宽厚。

您对友谊的理解跟我大不相同，您大肆吹嘘友谊，让别人对您讲友谊。您对友谊不抱幻想，毫不宽容。然而，对待友谊应该具有无可指责的赤胆忠心。当面评论别人与背后议论别人，都要一样严格。大家将会习惯这种态度，尽管它不那么讨人喜欢，但至少是可以利用的吧。

学究气对某些事总有用处，用心恶毒就毫无用处。

而您只会对喜欢您的人，讲些甜言蜜语，给以温存的抚慰，甚至泪如泉涌，深表同情。过后，在您谈到他们，特别是写到他们时，您就傲慢无情地对待他们……您嘲笑他们，蔑视他们，贬低他们，甚至诽谤他们，还带着优雅和轻浮的娇媚态度。这使您如此对待的那些人猛地觉醒，感到吃惊和相当不愉。至少应该允许他们在某些时间里好好思索，保持缄默和难受。您那时做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难以解释。您责备他们。而这责难，却使认为

彼此相爱的人感到骄傲和快乐；也使互相仇视的人感到悲伤和可怜。您对他们破口大骂，在友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您显得痛苦和懊悔。但是，在另外的情况下，您只是流露出恼怒或者憎恨。是的，是憎恨，我可怜的玛丽！

不要试图自我幻想了：您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您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恨我。一年来，我只有承认您一直恨我，才能对您作解释。至于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甚至不怀疑。

这只是本能的反感；我就是这样解释您从那时以来的行为。

总的来说，我喜欢看到事物好的方面，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怪癖。您对李斯特那样忠诚，看到他对我的友谊由于您的讽刺挖苦而受到严重损害时，您想向他体面地表示爱情，试图做出巨大的努力。您让他相信您爱我，也许您也想使自己相信……因此，您突然地、一阵一阵跳跃式地爱我，有时也许是被我给您的友情征服了……但是，当我不在的时候，或者您想吐一吐长期压在心里的苦水，您就又厌恶起来。

我相信，如果您在内心深处仔细想想，您会明白这一切的。

至于我，既原谅您，也埋怨您，就是这样。如果我不是您这种倒霉的试验的牺牲品的话，我也许会赞赏您：但是我应该感到遗憾，自己轻率匆忙地犯了错误；我特别应该遗憾的是，您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直爽地恨我——因为我了解您，这对我毫无害处——要么坦率地爱我。这也许证明，您不仅没有高尚的理想与愿望，而且也没有能力具有这样的感情。我正是抱有这种理想，或者照你说，有别的理想。

嘲笑我具有如您所说的指鹿为马的能力，剥夺我最珍贵的理想，这对我未免有点残酷。

现在，您为我大动肝火是正常的。不过，玛丽，请冷静点！我并不怨恨您，也不责备您什么。我已经尽力而为。请和我一起，用您的感情代替您的理智，理智又会占上风。

当心！理智的成分不要太多了，我可怜的朋友！如果过分仁慈——像我时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会使大好的晴天变成阴天；那么，过分远见卓识就会导致寂寞孤独。既然我们已和人类一起被迫来到了这个世上，在战争与和解不断交替中生活，这与永远地同人类闹别扭，也许没有什么两样。

我可怜的玛丽，就此停止，别的就不用操心了。忘掉我吧，就像做了一场恶梦，最终摆脱了我。不要试图爱我——您永远也不可能爱我——而要试着克服对您有害的仇恨心。如果我根据痛苦引起我的怜悯来判断，那该是很痛苦的。别再苦苦地构想奇幻的小说，向您周围的人们解释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冷淡。

当李斯特来到这里时，我根本不接待他。为的是不堕入您奇谈怪论的圈套：他在我们之间，好像是个争夺的对象，您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这只是巴尔扎克的一种想法。而且，我向您保证，即使有办法实现，——我现在还不相信——任何怨恨的情绪也不能使我那样去想，因此，相信此事，谈论此事，甚至任由别人去谈论，对您都是不适宜的。

我接受——我承认，感到某种自豪——您对我品德的嘲讽。但是，我只对含沙射影的攻击予以有力的还击。

醒醒吧，玛丽！这些可悲的事有失您的体面。至于我，很了解您。我知道，您的聪明才智需要高贵的气派，而一种女性的忧虑不断地同它作对。

您希望有绅士派头与骑士风度，但是您却不能靠牺牲和压倒别的女人，

来显示自己才貌双全。正因为这样，您不难称赞我为“好男子”。而您，从女人的角度出发，还没有足够的狠毒来污辱我。总之，您有两种骄傲，一种渺小，一种伟大。尽量让后者占上风吧。您是能做到的，因为上帝赋予了您很高的天分，而且您要上帝交待是怎样对待上帝赐与的美貌、才智和诱惑力。

以上是您从我这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到的说教。请原谅我的这些话，就像我原谅您说了我的许多坏话，而又没有告诉我一样……

在巡回演出的李斯特，从他的情人那里得知这场激烈的争论。马尔利亚尼夫人也因此受到了所有的人，包括她的丈夫的责备。明知一些话会令人伤心，却偏要传出去，其罪过大于轻率他说长道短，几乎每个人都染上这有害的恶习。为了开脱自己，马尔利亚尼太太证实说，是拉姆奈怂恿她将这两封信的内容透露出去的。

当这三个女人 1839 年 11 月在巴黎重新见面时，玛丽·达古尔对马尔利亚尼夫人很冷淡，对乔治·桑却如先前曾许诺的温和友好。

乔治·桑显得恼怒，更显得忧郁，她说，她对玛丽的思想及其对爱情的忠贞，从未停止钦佩。但是，她知道玛丽根本就不爱她。至于那些信……

玛丽打断乔治·桑的话，说她请求乔治·桑原谅，一点也不感到羞愧。

就这样，乔治·桑向她伸出了手；以后见面不应该再提彼此的爱慕与友谊了。

“我同意这样的关系，”玛丽说。“因为我相信，它是会改变的。时间是伟大的主宰，几个月或几年之后，您会对我说，是您错了。”

“这也可能，”乔治·桑回答说。“我是很容易受诱惑；况且，玛丽，您又很有魅力。”

李斯特同意自己女友的态度，说：“您对乔治·桑的态度使我非常高兴……您应该耐心和适可而止。您能做得到，因为，您是很坚强的……与乔治·桑断绝来往，我觉得还不是时候……如果可能的话，对许多事，不必过问；而对别的事，要宽容。如果你们断绝来往，一定要有肯定的、明显的益处……”

但是，表面上的和解，一点也不解决问题，流言蜚语继续到处传播。

1840 年 1 月至 3 月，玛丽·达古尔给弗朗茨·李斯特的信中说：

昨天晚上时，乔治·桑相当阴郁。

在吃饭时，她让克齐马拉直接地抚摩她那像香槟酒一样红光闪闪的膝盖，并且说：“模吧，唉，克齐马拉，告诉我，我的膝盖长得怎么啦？”

克齐马拉说：“皮肤已经变成玫瑰色了。”

乔治·桑说：“啊！那么，别摸了，你弄得我痒痒的。不然，我可要抓破你的皮……”

谈话无精打采而又不自然，一直进行到深夜。我不能再见到这样的人了。

维尼来了。他仍是很温柔，他对我谈了很多关于多尔瓦尔夫人的事。他说是乔治·桑使多尔瓦尔夫人堕落！他从那里知道我看不起乔治·桑，打心底里叫了声：太好了！

我同马尔利亚尼的关系重新好起来。我相信肖邦那一对不久就要分道扬镳。一般的朋友要他假装得了嫉妒症，假装失恋，自欺欺人。乔治·桑感到厌烦，她只担心，一旦离开他，他就马上夭折……

1841 年 2 月至 5 月，玛丽·达古尔在给一位画家朋友的信中说：

拉姆奈神甫经受得住牢狱生活。他不愿在那里接待女人。我想这是为了不愿见乔治·桑……

乔治·桑恨我，我们不再见面了……

弗朗茨在巴黎音乐学院举行贝多芬作品演奏会。会场充满庄严的气氛，他俩当之无愧。乔治·桑对这些成功感到厌烦。她促使肖邦开了个音乐会，只邀请朋友参加。李斯特就那个音乐会写了一篇文章，好得出奇。我想，这使他们很恼火吧！想想看，她是多么疯狂地和我作对啊！她竟对弗朗茨说：您过去也是我的情人！弗朗茨很机智地作了回答，他善于这样做。仇恨只能是越来越深了。我已完全脱离了马尔利亚尼的小集团了……

拉姆奈神甫有这样一句名言：“人们让我们和解；我们互相拥抱；从此，我们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此话用在乔治·桑与玛丽·达古尔两人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第四节 秋风淫雨

女演员玛丽·多尔瓦尔成了于勒·桑多的情妇。

圣·勃夫尽管风流韵事不多，但也有过几次艳遇。

《康絮爱萝》堪称佳作，它充分显示乔治·桑是伟大的小说家。

玛丽·达古尔气得直跺脚。李斯特再次劝她沉住气，保持沉默。

1843年，乔治·桑：“过去诺昂充满欢乐和笑声，它现在变多了。我快满四十岁，让严肃主宰诺昂……此外，最不幸的是，我们的朋友，身体不好，使大家习惯于忧愁，或者至少是沉思……”

1845年，乔治·桑：“生活是个大伤口，它很少愈合，也从不见好。我很伤心，也很忧愁。但是，我因此更喜欢那些值得人爱的人……”

时间的长河把乔治·桑和她曾热爱或仇恨过的人，都带到死亡的瀑布。

1837年，卡西米尔就从嫡母杜德望男爵夫人那里，继承了吉勒里的领地，条件是要偿付遗留的大量债务。他成了一个拮据的大业主。

他生活在加斯科尼省，住在城堡里，很少外出旅行。他喜欢这里茂密的树林、碳类植物和葡萄园。邻居们把他看作是当地的神甫和好上帝。

同奥洛尔一起生活，他学到了很多他的朋友不具备的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他喜欢引用名言，谈起自己的不幸很有分寸。吉勒里的居民很难相信妻子离开他是因为他平庸和粗野。大家觉得他态度温和，息事宁人，身材相貌都不错。

有个名叫布瓦斯马丁的中年妇女爱上了卡西米尔，试图获得他的爱，却是枉费心思。

因为卡西米尔太了解热情女人的危险。一天，他给儿子莫里斯写信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布瓦斯马丁夫人死了……”

话说得绝情，但是卡西米尔过去受到过绝情的对待。

孩子们每年都到吉勒里来过一段假期。从1844年起，他和女管家姘居。她给他生了个女儿罗斯。他本想正式娶罗斯的母亲，而且一直深深地爱她。

但是，因为奥洛尔还活着，合法的手续都不能办。

由于姘居的原因，卡西米尔不能参加宗教仪式，他感到很痛苦。然而，他每个星期天都去做弥撒，还尽领主的本份，参加圣诗班的合唱。他承受过可笑的重压，而不失体面。

于勒·桑多继续在世上走他的路。

痛苦的初恋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他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发生过的事。然而，桑多完全是多亏了乔治·桑的帮助。与乔治·桑相识时，他只是个没有才华的无名小卒。1839年他出版了小说《玛丽安娜》，读者们这时才承认这个真正多情的作家。这本书的成功，抵消了他以往在情场上的失败。杂志社、出版商纷至沓来，向他约稿。

女人也找上门来。他成了玛丽·多尔瓦尔的情人，因为多尔瓦尔对维尼另寻新欢表示厌倦。但她仍是乔治·桑的女友。说来也很奇怪，钦佩这位狂热可爱的女喜剧演员，成了小于勒和第一位情妇之间的唯一联系。

初与桑多有来往时，多尔瓦尔是总想着维尼：“我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但我痛惜我的爱情。我不能用别的什么取代它。我并不喜欢桑多，只是尽力地爱他而已。但我觉得难以成功。”

后来，她觉得自己逐渐老了，就热烈地爱于勒。多尔瓦尔给桑多的信中说：“啊！”

我是多么爱你啊！你使我的双眼迷惑，精神愉快，感官兴奋，内心欢乐。”1831年乔治·桑由诺昂寄出的信，内容大体也是如此。

1840年，他陪情妇巡回演出时，曾这样写道：“我们亲爱的玛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小于勒最希望的是娶一个富家小姐。他对海军军需官的女儿波利娜·波蒂埃的嫁妆垂涎三尺。

于勒的姐姐是玛丽·多尔瓦尔的知己，她收到了多尔瓦尔的一些哀怨的来信，信中说：“我伤心，而又无法解脱。两个月前，他把我留在外省，回来写他的书。我回来了。”

我得知波蒂埃夫人和小姐也在巴黎。我极度心烦意乱，对您的弟弟说起这事。他对我说，那是真的，我心灰意懒地回到家，整整三天，我都极其焦虑不安地等待于勒！他来了，并对我说要跟我分手。我很惊讶。我叫道，我不能活生生地与亲爱的人分开啊！他回答说，他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菲莉茜，请把我对他的爱同我的痛苦加以比较吧！我不得不把这些告诉您。”

1842年，于勒在南特结了婚。当时，玛丽·多尔瓦尔正在巡回演出。

收到桑多的结婚请柬后，她到乔治·桑那里痛哭一场。这两个女人痛苦地谈起有关往事。

这个金发鬃曲的青年，头已早秃，写了些道德小说。人们说他要进法兰西学院了。

拉杜什继续在欧内村过着孤僻的隐居生活。他从远处痛苦地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既有辉煌成就，也有屈辱失败。他写信给表弟杜维纳，谴责一个女人竟然把他的痛楚写进小说。但是，他希望和解。1840年，他自己出版了一本小说。

乔治·桑没有读她启蒙良师的小说，但是，她让别人去读，并且知道他对自己并无恶意。因此，不久之后，在创办《独立杂志》时，她请拉杜什先生合作。

乔治·桑致杜维纳的信中说：“我见到了拉杜什。他仍然优秀迷人，现在我们完全和解了。如果他不那么任性的话，那他就是贝里地方报社最严肃、最有才华、工作最出色的编辑。但是，怎样才能让他相信，我们没有合伙拆他的台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怀疑和故作姿态后，他几乎是轻易地重新感受到了这种友谊。

但是，乔治·桑觉得他被激怒，满是暗伤，对当时的政治、风俗与文风表示气愤。这种极度的精神苦闷持续了十五年。

有一些人被生活所困扰，但有些人却是自寻烦恼。可怜的拉杜什是后一种人。

奥洛尔·杜德望的第二位良师是圣·勃夫。他已是权威的批评家。初出茅庐，他的威望即被承认，视为合法，如今更加声威大震。他在贵族圈子里大受欢迎，那个圈子里的很多人都与他过往甚密。他向贵妇们透露文学界的内幕，讨她们的喜欢。

乔治·桑冒失地让圣·勃夫保管她与缪塞的来往信件。圣·勃夫把那些信放在一个大信封里，背面写上贵妇的名字，然后分别转寄给她们传阅，且他几乎不擦去她们的名字。那些信就这样传遍了贵妇的小客厅。圣·勃夫尽管风流韵事不多，但也有过几次艳遇。娇媚的霍尔滕丝就投入过他的怀抱。

禁欲主义以男子的睿智，
回报那无比温馨的礼物，
只有您，或者阿斯帕西
才能梦想起那些话语，
夜晚的抚爱，或早上的幽会。

他擅长于写这些拉封丹式的诗句，比过去题献给阿黛尔·雨果的哀歌写得更好。

他对乔治·桑显得彬彬有礼、谨慎和冷淡。实际上，他对乔治·桑不再表示敬重。

当一个朋友对他说：“啊，给缪塞的信写得美极了！乔治·桑女士是个好心肠的人。”

他却回答说：“是的，她有一个很好的心肠和一个很大的屁股。”

而且，他很风趣地引用了一句话：“她吞下了她的情人之后，并没有把他们扔下河，而是让他们都到了她的小说里去了。”

这都是私下偷偷说的。而他评论乔治·桑的文章，仍然谦恭有礼，甚至加以颂扬。

至于皮埃尔·勒鲁，是圣·勃夫亲自把他介绍给乔治·桑的。而现在他却说：“这个勒鲁搞的哲学，像在沼泽地行走的水牛一样粗野。”

维克多·雨果也说：“要是皮埃尔·勒鲁善良，那他也许是最好的男人。”

乔治·桑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勒鲁渐渐地丧失了威信，乔治·桑却继续支持他。哲学家理所当然地成了门生的情人了。而乔治·桑却矢口否认，并很肯定他说：“某些人声称，爱情产生了奇迹。我很愿意在思想上仰慕他，至于哲学家浓密的长发，我一根也没动过。这头发跟土耳其皇帝的胡子一样，与我毫不相干。我生活中最严肃的东西就是严肃的道德行为，而不是像一个平庸的女人，暧昧地迷恋医生或忏悔师。”

乔治·桑拒绝做为男人的勒鲁，而做为哲学家的勒鲁太感激她了，不

能不原谅她。

他写信给乔治·桑说：“您真好，您的友谊对我大有裨益！没有一个词不直透我内心深处，没有一句话不使我白天黑夜反复回想与思考。我多么感激您的信任啊！啊！不！”

恶狗不应沿着您的血迹跟踪您。您的痛苦是神圣的。要活下去，并且要取得胜利，至于我，很悲伤，我讨厌的只是您信中写的再见这个词，尽管我吻过这个词，并因此而感到欣喜；因为它胜过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我也就十分喜爱它。您说，‘心和思想都属于您’。

我本来就很模糊地喜欢这个‘属于您’，我对您说过，感情、理智和行动这三个方面，都是虚假的。没有什么‘存在’，更真实的了；‘存在’包括这三个方面，并在友谊和爱情上同样表现出来，只是两种表现有所不同罢了。那么您的‘再见，是什么意思呢，啊！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个‘属于您’，最好是不确指的，可以加上一些限定词‘也许’、‘勉强的’、‘今生或者是来世’等等。而我呢，我要用尽气力，由衷地对您说：‘属于您。’”

虽然乔治·桑不是属于他，但是她尽力为他做事。不然，她怎么会撇开慷慨的出版家布洛兹的《两世界评论》，而去和这个没钱的勒鲁创办什么《独立杂志》呢？

拉姆奈嘲讽地评论他俩的合作：

“据可靠消息透露，乔治·桑和勒鲁主办的一本新杂志，就要出版了。他们想要和《两世界评论》展开竞争，他们也许是只承认一个世界吧。恐怕还不到这地步，说实在的，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他们将要改造这个世界；而且，当这个世界被改造之后，我们大家在那里将会如鱼得水。我要说：谢天谢地！但是，哎呀！我们的人已经破坏了这个世界。除非他们的杂志饶有趣味，我也许从中多少还能得到一些安慰。至于说新的宗教，那令人发笑的新玩意，在这讨厌的年代里，也许是会取得一些成功的。”

“有人刚把勒鲁和《独立杂志》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个人比以往更加陷入创立一种宗教的构想之中，而且相信会成功。据他说，十年后，私有制在法国将会被完全铲除。

他的杂志将按照这思想去办，他把自己的著作，起码是著作的某些部分，第三次重印后塞进创刊号里。除了一些尽人皆知的事之外，人们还从中看到耶稣基督明确地允许通奸。

因此，很多原来约好的撰稿人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和乔治·桑。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乔治·桑对这个启蒙者十分忠诚。她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我真担心，她原来的才智在这本小说里表现得太少了。怎么能随便去糟蹋这样罕见的天赋呢？”

乔治·桑的天赋，根本没有被糟蹋。《康絮爱萝》堪称佳作，它充分显示乔治·桑是伟大的小说家。她早期的作品《印第安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拉姆奈说得有道理，勒鲁对乔治·桑在政治上颇有影响。乔治·桑自青年时起，就错误地认为，世界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解释。勒鲁自称能提供公式，使乔治·桑喜出望外。

布洛兹原则上要发表乔治·桑所有的稿子，却提了很多反对意见。勒鲁批评乔治·桑尤其不应该同意布洛兹改动她小说的文字。乔治·桑于是收回了她的稿子。

乔治·桑写了一本《奥拉斯》。在这部小说里，她把一个珠宝首饰工人

保尔·阿尔塞纳同一个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对照。奥拉斯像青年时代的于勒·桑多，有时像马勒菲依。这个年轻人聪明，有才干。但是，他空谈伟大的事业，却不脚踏实地地去干，并且尽情玩乐，耗尽了贫穷的父亲省吃俭用得来的血汗钱。他抛弃了出身贫贱、为他怀了孕的情妇，去追求夏依子爵夫人。这位夫人的形象完全是冷酷的玛丽·达古尔：

她干瘪瘦削得吓人，牙齿长得不好，但她有一头难得的秀发，常常饶有兴致地特别细心地梳理。她的手干瘦细长，却像大理石一样白净，手指上带着世界各地制造的戒指。

她有某种风韵，博得许多人的欢心，总之，她具有称之为矫揉造作之美。她自炫博学多才，标榜与众不同。她涉猎群书，甚至阅读政治和哲学书籍。她把早上从书本上看到的，或者昨天从几个严肃的人那里听到的，重复给其他尚未知晓的人，好像是谈论自己的看法。说真的，听她这样一讲，真是稀奇极了。总的来说，可以把她的表现称之为装腔作势，不懂装懂。

夏依子爵夫人出生于银行家的家庭。她家的爵位，是在摄政时期买来的。可是，她却要显示自己出身贵族世家，甚至连扇柄上都饰以花环和盾形纹章。和少妇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傲慢无礼，令人难以忍受。她眼红女友们以金钱为目的的婚姻。此外，她相当热情地款待年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和他们在一起时，她无拘无束地大摆贵族架子，还在他们面前假装不着重功罪。反正她的牙齿、乳房和心肝，都具有人为的贵族气派……

玛丽·达古尔气得直跺脚。李斯特再次劝她沉住气，保持沉默。既然李斯特宽容了《贝阿特丽克丝》，达古尔也能装出与《奥拉斯》毫不相干的样子。李斯特相当严峻地加上一句：“可以肯定，乔治·桑描绘夏依夫人卖弄才华、搔首弄姿、装腔作势，显然就是要刻划您的尊容。”这证明乔治·桑和巴尔扎克说得有道理，李斯特长期以来不喜欢《贝阿特丽克丝》。

《奥拉斯》发表在《独立杂志》上。布洛兹擅自删改乔治·桑的文稿，乔治·桑决心摆脱他。同时，乔治·桑也是为了帮助勒鲁获得成功。第一期，她送去了《奥拉斯》和一篇研究诗人的文章；第二期，送去《奥拉斯》的后半部分和《乌托邦主义者拉马丁》。

后来，又献上《康絮爱萝》。她确是极其慷慨地献出了她的财富。最妙的是，她认为《独立杂志》的真正价值在于传播勒鲁的学说。

《独立杂志》只有李斯特等几个朋友感兴趣。杂志没有人订。勒鲁销声匿迹了二十几天，校样没有修改。可是，乔治·桑认为勒鲁还是有威望的。

“最近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很长的信，他极其悲伤。我知道，他为了完成事业，也许还为了维持家庭生活，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就是他恐惧和忧虑的原因。今天，我给他寄去了五百法郎，我们不能让他倒下去，他思想的光芒不应该在这场战斗中熄灭。

不应该因为缺少几张钞票，就让惊恐和失望征服他。让他讲出真情，道出沮丧的秘密吧。”

在拉夏特，乔治·桑和朋友创办了《安德尔侦察兵报》。肖邦给报纸捐赠了五十法郎。这份报纸起初打算在巴黎印刷，但是勒鲁买了一个印刷厂，乔治·桑就把《侦察兵报》委托给他办了。肖邦十分怀疑地观看，并嘲讽地评论他的东道主的善良举动。

在乔治·桑和肖邦之间，从来没有有什么不能逾越的障碍。他们彼此相爱，有坚实的基础，肖邦爱乔治·桑，而乔治·桑以一种温柔的母爱对待他。

乔治·桑很欣赏肖邦的音乐才华，而肖邦很敬重这位大作家。

然而，“这不再是爱情了”，这对情人的熟人玛丽这样写道，她是个成熟的少女，而且是肖邦的学生，她说：“这不再是爱情了，至少对于乔治·桑这一方来说是如此，而是体贴和忠诚，其中随着时间的不同，夹杂了惋惜、悲伤和懊丧。”

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没有第三者的话，这体贴与忠诚本来已经足够，并能保持下去。乔治·桑总是感到同她的这个孩子和朋友密不可分。而非常敏感的肖邦，又不能忍受感情的不专一。

莫里斯这时已是个大人了，很爱自己的母亲。但是，母亲经常和肖邦在一起，他觉得是件大丑事，心里很痛苦。

1844年，索朗芝已满十六岁。她在混乱的家庭纠纷中成长，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也不尊重任何人。她有时嘲笑肖邦，有时向他卖弄风情，并且还很成功。因为家中只有她不把肖邦看作是惯坏的孩子，她让肖邦着了迷。

索朗芝的脸型和肤色，都很像她的曾外祖母玛丽。这个有男子气概的美人，生来就冷酷和古怪。她总是随心所欲，前后矛盾。索朗芝有点疯癫，像母亲一样大胆，才华却不及母亲。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性情太暴躁了。”当索朗芝还是个孩子时，乔治·桑就这样写信责备她。

性情乖戾依然如故，好的心肠却难得见到了。

父母与孩子之间，情人之间，都同样地关系紧张，富有戏剧性。孩子长大了，独立自主，使父母惊讶和气愤。以前讨人喜欢、任人摆布的孩子，现在成了冤家对头。

像乔治·桑这样的母亲，期待着孩子们顺从和尊敬，做为对自己无可置疑的牺牲精神的报偿。莫里斯给予了她期望的一切，而索朗芝则染骛不驯。母亲不能容忍女儿的独立性，而她自己在少女时，就强烈要求这种独立自主。因此，母女亲情破灭就会导致仇恨。

在一段时间里，乔治·桑再也不能容忍索朗芝，试图离开她，把她托付给肖邦的学生玛丽小姐。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玛丽出身名门望族，却缺乏金钱。她被肖邦未婚妻那个不专一的哥哥勾引和遗弃。

这使她变得情痴迷迷，好说谎话。她喜欢说长道短，谈论丑闻。

乔治·桑很生硬地禁止玛丽小姐对索朗芝谈论某个先生的身材怎样，另一个先生的小胡子又怎样。乔治·桑认为，爱情的挫折引起的愤恨，决定了玛丽小姐令人不快的变化。

“要我全都对您说了吗？那时您是个风骚女人，现在您的眼睛仍然可怕地闪烁着淫荡的光。男人们都注意到了，要是您对这无所谓，那我也一样。但我要把您同索朗芝分开，一直到那阵轻微的歇斯底里的发作过去，直到您任意选择了一个情人或丈夫。”这是给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封信。

她太伤心了，绝不原谅乔治·桑。

然而，玛丽小姐要挑起肖邦对乔治·桑的反感实在太容易了。为了主办《安德尔侦察兵报》，皮埃尔·勒鲁把一个赞同他的政治观点的年轻人带到拉夏特尔。这个年轻人叫维克多，常在诺昂逗留。肖邦因此不由得嫉妒起来。两人之间产生了摩擦。

1844年，肖邦的姐姐和姐夫在诺昂暂住，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两个女

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但是，这次来访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持续很久。肖邦的情绪变得更坏了。他越来越阴郁、敏感和嫉妒。乔治·桑写道：“他比往常更加作弄人，更加吹毛求疵。”

乔治·桑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把自己的痛苦写进一本书，以此宽慰自己。她的对头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了，写了一本《内里达》的小说，撕碎了李斯特的心。乔治·桑则在她自己的小说《吕克里齐娅·弗洛利亚尼》里，用改头换面和前后颠倒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她和肖邦这一对古怪的情人。

女主人公吕克里齐娅有过很多奇遇，她像乔治·桑一样原谅自己。她不是一个妓女，因为她献身于情人们，却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甚至对朋友们也一样。她爱过很多人，但从未真诚地希望共同生活，也从没幻想永远忠贞。她的热情持续八天，甚至只有一小时。但是，每次她都以为是白头偕老。

然而，在她以为自己情场生活就此结束时，却遇上了一个令人爱慕、温柔、敏感和善于办事的青年，一个漂亮的天使，脸蛋长得像忧郁的美人，单纯、轻盈，显得贞洁热情。他的名字叫卡罗尔。卡罗尔王子喜欢自己幻想出来的女人。别人爱他胜过他爱别人。

他迷人的脸蛋使人产生好感。他身体虚弱，使充满母爱的女人对他感兴趣。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思想偏狭。

当然，卡罗尔钟情于吕克里齐娅，而吕克里齐娅照顾他像照顾自己的一个孩子。卡罗尔羞怯而狂热地爱着她，对她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吕克里齐娅相信，这种上天注定的爱情是永恒的。她献身给这个王子，他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幸福的时光。后来，令人喜爱的卡罗尔暴露了他自私的性格，变得嫉妒、偏狭和令人难以忍受。

但是，卡罗尔越是气愤，越显得彬彬不礼和自我克制。

经常赌气，终于损害了不幸的吕克里齐娅的健康。她的美貌消逝了，变得又黄又瘦。

情人不尊重她，虐待她，使她未老先衰，令她痛苦不堪。她不再爱卡罗尔了。一天早晨她突然去世。

因此，小说结束得艰涩、生硬，比起现实生活，显得不够真实。这是对肖邦的一个教训与警告。奇怪的是，肖邦竟一点也不觉得小说写的就是自己。一天晚上，乔治·桑给德拉克鲁瓦和肖邦朗读《吕克里齐娅·弗洛利亚尼》。

后来，乔治·桑否认吕克里齐娅就是她的形象。但是书中著名的意大利女演员年轻时就到乡下隐居，抚养孩子，这情形很像她本人。

德拉克鲁瓦谈起那晚的事说：“我听这部小说，感到很痛苦。刽子手和受刑人都同样使我感到吃惊。乔治·桑显得十分自然，肖邦也不住地称赞小说写得好。我们午夜一起离开。肖邦要送我一程，我抓住这个机会，深听一下他的印象如何。难道他真的对我装样子？不是的，他确实没听懂。这个音乐家仍旧热情称赞这部小说……”

某些熟悉的朋友抨击乔治·桑。

1847年5月，霍尔滕丝在给圣·勃夫的信中说：“我没有告诉您，我对《吕克里齐娅》多么气愤……乔治·桑完成了牺牲钢琴家的丑行。她向我们抛出肖邦，透露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可耻细节。她态度冷淡，翻脸不认人，真

是毫无道理。尽管女人变心会使情人远离，但她们不会过分加以指责。现在看来，吕克里齐娅冷酷的愤慨是不可宽恕的。这样好端端的一个天才人物，怎么会被歪曲成这个样子？”

霍尔滕丝直率憨厚。她写信告诉乔治·桑说，她已经把这事告诉了圣·勃夫，乔治·桑却很自然地否认在他创作卡罗尔王子时想到肖邦。她写信说：您的责备比称赞更使我感动。因为，我认为称赞是朋友们的一点礼貌与爱恋的表示，而责备则是出于真诚关心的忧虑与坦率。因此，我赶快回信告诉您，您的信使我感到很难过，我应该读它两遍。

哪个魔鬼使您产生这种想法呢？是玛丽·达古尔？……要是她了解肖邦，她应该明白，那不是肖邦。如果她不了解肖邦，从何而来这样肯定的解释呢？

但是，您怎么会了解他，并在这小说的人物中认出他呢？应该说，是某些用心恶毒的人搬弄是非，给了您这个错误和荒谬的消息吧！

我现在身体很好，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要轻率地离开我的朋友，八年来，我们肝胆相照，他对我的友情是无法估量的。我是在他身旁写成这部小说的，并且，逐段逐段念给他听的。在创作过程中，我俩共同工作。接受或者拒绝他的意见，是常有的事。

表面上看，我们相互了解，但是还不如公众对我们的了解。故事的确挑起人们的好奇心。如果不是您，而是别人批评我，那么，我只是付之一笑。但是，您严肃地责备我，我因此也严肃地答复您。卡罗尔王子可以是十五个不同的人，就像是所有完整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那样。因为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女人，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给热衷于文学的艺术家，提供艺术实践中的一个对象。

我相信我曾对您讲过这些；而且，我很惊奇，您也是一个艺术家，竟同平庸的读者一样，有这种幼稚可笑的想法：他们总想在小说中看到真人真事，希望主人公的面貌是按照他们熟悉的人描绘的。

第五节 儿女的婚事

索朗芝才十八岁，情窦未开，她想结婚只是为了能有夫人这个称呼。

索朗芝很清楚，自己能对肖邦施加影响。玛丽也不满乔治·桑。她俩合谋煽动肖邦来反对乔治·桑。

乔治·桑和肖邦分手，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回头。

爱情开始于伟大的感情，但又往往因一些小的争吵而结束。

一群人在一起生活，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婚姻和家庭之爱，可以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使一切都得到解决。在自由乱交的情况下，一切联系都会中断。因此婚姻就成了唯一的联系，时间能使婚姻关系密切。

在诺昂，一切似乎很愉快，富有诗意。大家读书、作曲，在田野里玩耍，在小河中游水，做舞台造型，猜字谜，在肖邦即兴的伴奏下跳芭蕾舞，等等。

但是，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不平静。

1845年，乔治·桑邀请奥古斯蒂娜·布洛特到诺昂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乔治·桑收养了这个年轻的姑娘。

布洛特是乔治·桑外祖父家的远亲。她的父亲是个裁衣工人，母亲阿黛尔是个卑鄙无耻的半老徐娘，靠情人供养，她想把美貌的女儿当作摇钱树。乔治·桑出面干预，给了那个女人些钱做为补偿，收养了奥古斯蒂娜，让这个姑娘做自己孩子们的伙伴。

对这个漂亮的姑娘，莫里斯很自然地表示欢迎；索朗芝却摆出一付男爵夫人的架子，对这个表妹傲慢无礼。两条阵线就这样形成了：乔治·桑和莫里斯保护奥古斯蒂娜，索朗芝和肖邦则攻击她。

索朗芝野蛮粗暴，奥古斯蒂娜温顺听话，乔治·桑更喜欢奥古斯蒂娜，称她为自己真正的女儿。

1846年的夏天，气候非常炎热。

肖邦出汗不已，甚感惊奇。他因此很沮丧，抱怨说洗澡都是白费劲，总是浑身臭哄哄的！这个纯洁的人竟然不赞成人们出汗，大家忍不住笑得流出了眼泪。园丁偷东西，乔治·桑便把他辞退了。肖邦对这严厉的做法，感到很吃惊。他不明白：人们已经忍耐了二十年，为什么不能忍耐一辈子。

秋天时，索朗芝宣布她已经订婚了，她征服了附近一个年轻的领主。此人出生殷富人家，有威严的绅士气派，莫里斯给他画了一幅古典式半身肖像，把他画得很漂亮，又有点可笑。

乔治·桑没有反对女儿的这门婚事，也不急于成事。

索朗芝才十八岁，按她母亲的说法，她情窦未开。她想结婚只是为了能有夫人这个称呼。

乔治·桑喜欢某种意义上的爱情，胜过这种没有意义的婚姻。她说：“这个青年很漂亮，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但他没有什么头脑，特别是说话不清……至于我呢，打心底里喜欢他。但是，他不能在巴黎飞黄腾达，光彩夺目。他不懂得现代文明。他在树林子里打发日子，和马、野猪以及狼打交道，用鞭子柄敲碎这些动物的头……可是‘公主’，爱上了他，并且操纵他。”

还有另一桩事，乔治·桑更希望促成实现，那就是莫里斯和奥古斯蒂娜的婚事。但是，莫里斯对结婚没有很强烈愿望，下不了决心。乔治·桑肯定，在这两个青年人之间，存在着友谊，一种神圣的友谊。

鉴于莫里斯有过两次失败的情事，乔治·桑劝儿子“不要再犯严重的错误，不要匆匆表态，你再也不应该像小孩子那样”。

莫里斯曾对奥古斯蒂娜寄予很大的希望，而后来却拿了父亲卡西米尔的话来做挡箭牌，明显是撤退的借口。

这时，索朗芝很嫉妒这个褐色皮肤的姑娘。她毫无证据地对肖邦说，这个年轻的姑娘是莫里斯的情妇，害羞的肖邦就加以指责。诺昂就又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

晚秋季节令人难受。两个表姐妹亲密地手挽着手散步，却互相勾心斗角，彼此怀恨。

肖邦还是那个坏脾气。除了索朗芝，他对所有的人都冷眼相待，大发雷霆。他对索朗芝无比宽容，对可怜的奥古斯蒂娜却惊人地严厉刻薄。

莫里斯声称要离家出走，因为肖邦不断地斥责他和表妹有暧昧关系。

“这不可能，并且不应该是这样的，”乔治·桑写道，“肖邦不容许我对

这件事做公正的和必要的干预。他低着头，并说我不再爱他了。这是什么混帐话，我以母亲的诚心，和他一起度过了八年啊！但是，这颗可怜的破碎的心，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说胡话。”

1846年11月，肖邦离开诺昂。这天，他根本没有想到再也不会回来。他继续给乔治·桑写信，每封信都很友好，而且常常是令人愉快。但是，在他写给其他人的信中，他开始放肆地挖苦那个把他奉为上宾的家庭。新的、令人气愤的事是索朗芝的婚事。肖邦过去同意索朗芝订婚，因为这个贵族求婚者与他很相投。

但是，1847年初，索朗芝和她的母亲到巴黎去订嫁妆，一个喧闹的、不修边幅的人，突然闯进了母女俩的生活之中。此人从前是个骑兵，现在当雕塑师。他到处窜，从营区的咖啡馆到雕刻室都可见到他。他叫奥居斯特·克莱森热。1846年3月，他曾给乔治·桑写过一封很古怪的信。大话连篇，白字成堆。

1847年2月，母女俩来到巴黎，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退伍骑兵，就跑去找她们，并请求能荣幸地为她们在大理石上雕塑半身像。

他把索朗芝的像塑成女猎人的模样：鼻子微微颤抖，双肩袒露，头发在微风中飘荡。

让人塑像这件事，莫名其妙地扰乱了姑娘的心。她突然决定，在订婚的前一天终止与子爵的婚姻关系。

索朗芝选定了那个退伍骑兵。

乔治·桑说：“被抛弃的可怜人是一个高尚的孩子，真正具有法国骑士风度。”

但是，乔治·桑也对退伍骑兵感兴趣。

然而，有人把克莱森热的缺点告诉了她：“他疯疯癫癫，很粗野，欠了别人很多债，而且酗酒。”

乔治·桑竭力想分开索朗芝和雕塑师，赶紧把索朗芝带回了诺昂，但完全无济于事。

大胡子骑兵追到拉夏特尔，像真的疯子一样，硬是逼得乔治·桑同意了。

因为那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刻不容缓。他甚至不吃饭不睡觉，也要马上达到目的。

没过多久，索朗芝就病倒了，因为她是第一次强烈地爱上了一个人。

克莱森热简直是把火，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乔治·桑告诉朋友们，这么匆忙地做出决定，是因为那个无法无天的退伍骑兵征得了索朗芝的同意，拟定了一个抢亲的计划：“这婚事要很快地进行，突如其来地完成。”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乔治·桑对肖邦只字未提。因为这和他无关，而且采取了断然的行动。生米已煮成熟饭，多说也无益。她自己则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并不理想的选择，她慷慨地给新娘陪嫁，还称赞新郎将为他妻子增光，也将为自己增光。

因为索朗芝尚未成年，必须征得父亲卡西米尔的同意。克莱森热因此马上跑到吉勒里去。这个性情暴躁的人和宽厚的卡西米尔讨论的结果对婚事毫无不利影响。最后，就是要尽可能迟地通知肖邦了。

这时肖邦正病得厉害。他对克莱森热十分看不顺眼，特别是克莱森热

裸身若狂。肖邦忧伤他说：“明年，我们将会客厅里看到，那个小人就在索朗芝的身后！妈妈是挺可爱的，但她缺乏做一个伟人的常识。莫里斯赞成克莱森热，因为他讨厌彬彬有礼的世家子弟。”

婚礼于 1847 年 5 月 20 日在诺昂举行。卡西米尔从吉勒里赶来参加；他对女婿和乔治·桑都很亲热。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索朗芝和丈夫作了短期蜜月旅行后，回到诺昂。这时莫里斯邀请了一个叫泰奥多尔·卢梭的朋友住在家里。他是一个擅长画草木、森林和草原的画家。

他爱上了漂亮的奥古斯蒂娜。乔治·桑觉得欠了她一笔债，竭力让卢梭去向她求婚。

如果卢梭决定了，乔治·桑甚至答应提取 10 万法郎稿费来做嫁妆，真是慷慨大方。

索朗芝憎恨奥古斯蒂娜，出来干预这件事，根本不愿由乔治·桑给这姑娘出陪嫁。

此外，她也想为婆家，为克莱森热的弟弟做件好事。因为这个小叔也爱上了奥古斯蒂娜。

索朗芝叫人告诉卢梭说表妹另有所爱；况且，这婚姻只会给她带来怨恨。

卢梭很不安。他对乔治·桑说，他的确很喜欢奥古斯蒂娜；但是要娶她却……

这是一幕可悲的杂乱无章的闹剧。乔治·桑不得不用计骗莫里斯，因为莫里斯眼看奥古斯蒂娜就要出嫁，他那犹豫不决的爱情又萌发了。

乔治·桑想再把卢梭拉回来。“如果您以为我原则上反对这门婚事，那您就从来没见过我写的书……”

卢梭让一封匿名信弄得十分烦躁，索朗芝也使他丧失了信心，他就躲开了。

奥古斯蒂娜如雨后的玫瑰一样，非常平静。但是，乔治·桑和女儿女婿之间的争吵，却变得十分激烈了。

乔治·桑特别怨恨索朗芝，说她心狠手辣、冷酷固执、厚颜无耻，从不感到内疚，毫无恻隐之心。

乔治·桑说：“她刚刚出嫁，就撕下了假面具，把一切都踩在脚下。她挑动头脑简单、容易发怒的丈夫攻击我，攻击莫里斯和奥古斯蒂娜。索朗芝对奥古斯蒂娜特别恨之人骨。要说奥古斯蒂娜有什么错的话，那就是对索朗芝太宽厚，太忠心了。是索朗芝耽误了可怜的奥古斯蒂娜的婚事。是他对卢梭大造谣言，恶毒中伤莫里斯和奥古斯蒂娜，并使卢梭一度神经失常。她竭力挑拨我和朋友们的关系。她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由于我偏爱大哥和表妹，她倒成了牺牲品！她玷污了她出生的家庭，肆意捏造谎言，胡说这个家庭卑鄙无耻，藏污纳垢。她连我都不放过，往后的争吵，令人难以相信，我们差点在这里互相残杀起来。”

雕塑师举起锤子要打莫里斯。乔治·桑为了保护儿子，打了女婿一拳。索朗芝一直在挑动打架。

这就是人间的生活。一天早上，撒旦突然附在一个漂亮女人的身上。索朗芝的理论是：不当刽子手，就要被砍头。

乔治·桑在给肖邦的学生玛丽的信中说：“这对凶恶的夫妇，昨天晚上

走了。他们背负了一身债，不知羞耻，反而趾高气扬，在镇里留下了永远难以洗刷的耻辱。总之，三天来，我在自己的家里受到伤害。我永远也不愿再见到他们了，他们永远不要踏进我的家门，他们太过分了。我的上帝啊！我做了什么错事，竟有这样一个女儿啊！”

索朗芝很清楚，自己能对肖邦施加影响。玛丽也不满乔治·桑。她俩合谋煽动肖邦来反对乔治·桑。她不说雕塑师动手打人才引起了家庭纠纷，反而含沙射影地说，乔治·桑是年轻的维克多的情妇，也许还是莫里斯画室的同伴的情妇，而乔治·桑不想让了解内情的人留在家里，所以把他们赶了出来。索朗芝又诬蔑他哥哥容忍维克多住在诺昂，是因为他要利用这事作挡箭牌，好掩盖他和奥古斯蒂娜的关系。

这些流言蜚语，肖邦几乎都深信不疑。他津津有味地听索朗芝无中生有的诬蔑。乔治·桑出于关心，写信叫他到诺昂去，他连信都不回了。

乔治·桑认为肖邦爱索朗芝胜过爱她，他在跟自己赌气，站在索朗芝一边。

她认为像往常一样，被自己愚蠢的感情欺骗了。“六天来，我每个晚上不能入睡，一直为他的身体担心。原来他却忙于同克莱森热夫妇一起设想和议论我的过失。真是大妙了。关于这些，有很多事，都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且我知道，在挑起成见和使人轻信这方面，我女儿是多么能干。我终于看清了！我将做出相应的行动。我不再把自己的血肉做为忘恩负义、腐化堕落之徒的谈论资料。”

对于自己的女儿，在写给肖邦的信中，她说：“她也许很不情愿地说，她需要母亲的爱，可她又讨厌和诬蔑这个母亲。她用残忍刻毒的话玷污了母亲最圣洁的行为以及家庭！您兴致勃勃地听，也许深信不疑，我不会参与这种战斗，因为我感到厌恶。我宁可看见您成为我的敌人，而不愿对付那个我亲生的、用我的乳汁养大的敌人。”

最后，她对肖邦说：“关心她吧，既然您认为为了她，可以不惜做出自我牺牲。我并不怨恨您。但您应该明白，我是被侮辱的母亲，我受尽了欺骗和折磨。我原谅您，并且从此绝对不责备您，因为您的忏悔是真诚的。这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但如果您觉得这样做了，心里更自在但然，那么，这奇怪的大转变，不会使我感到痛苦。

“别了，我的朋友！愿您的病早日痊愈，而且，我希望您现在就康复。并且我将感谢上帝，我们长达九年的特殊友谊就这样奇怪地结束了。请不时给我来信，谈谈您的情况吧。再也没有必要重提其他的事了。”

两个曾经十分恩爱的人闹翻了，这是件非常痛苦和愚蠢的事。实际上，这通常并不严重。在不介意的时候，讲出从来没讲过的话，或者不大相信的话，往往会被爱献殷勤和阴险刻薄的第三者张扬出去。由于愤懑或者自尊，被诬蔑的人又不愿做辩解。长时间的沉默，使谁都把对方当作死人，感情就这样破裂了。原来的感情越深，失望所造成的怨恨也就越深，多少朋友因为过去他们的友谊被过分地赞扬，而在友情破裂的日子里，焚烧他们钟爱的东西，变得过分严厉！

但是乔治·桑相当仁慈。

在怨恨的道路上她十分克制，但是也感到精神衰竭。她今后唯一想知道的，就是肖邦的身体怎样。

1847年11月，乔治·桑写信给肖邦的学生玛丽：

索朗芝向我转告肖邦的意思：那架钢琴是一件贵重的乐器，但我可以留着，由肖邦付租金。

我根本不想让肖邦替我出钱租钢琴。对恨我的人，我不愿欠他们的人情债。而且肖邦对他的朋友们吐露的知心话向我证实，他同我的关系从此究竟会怎么样。

我很清楚，他的思想和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我的眼睛睁开得太迟了。

我真心原谅他。我看他再也不能自制了。对于其他人，那是罪过；而对于他，只是失去理智而已。

我一直都预感到，他对我的友谊会转变为厌恶，因为他做事都是做到底的。

现在，我对此感到心安理得。所有过去的事，我都清楚。我仅仅希望他不要给我帮忙。”

此后，就是沉默。乔治·桑不再试图结束这冷淡的局面。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简短而又富有悲剧性。

1848年5月，肖邦到马尔利亚尼夫人家去，出来时，在前厅门口碰见了乔治·桑。

他向她致了问候。接着，他问她是否很久没有得到女儿索朗芝的消息。

她口答说：“有一个星期了。”

“前天没有消息吗？昨天呢？”

“没有。”

“我告诉您吧，您已经当了外婆了。索朗芝生了个女孩儿，我很高兴，是我最先告诉您这个消息。”

向她道喜之后，肖邦就下楼了。

一个仆人陪他出来。他想自己忘了对她说索朗芝身体很好，这对于做母亲的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他又不便再上楼，就请仆人上去，对她说索朗芝身体很好，孩子也很好。

他在楼下等仆人。她和仆人又一起下来了。

乔治·桑很关心地问索朗芝的身体怎样。

他对她说，本来觉得很痛苦，但她看到女儿，就将一切痛苦都忘记了。

她问他身体怎样。肖邦回答说很好。最后，他向她告辞了。

生活就这样前进。

两个人相依为命就会相互珍重。但是，日常生活的协调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惯。把两棵植物移栽，让它们彼此分离，那么它们的根就在新的土地上生长了。从前，对一个人无话不讲；现在，要不要对他讲点小事也拿不定主意。

乔治·桑和肖邦分手，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回头。

第一节 逐情之外的淑女

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

共和国在颤抖……

“女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她们的生活作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爱的人。”

不止一个传记作家想把这句话用于乔治·桑的政治生活。他们说：“她没有理论，她在思想上追随她所爱的男人。”

其实并非如此。甚至在爱某一个人之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肖邦是个贵族，缪塞是个怀疑论者；他们都没有使乔治·桑变成贵族或者怀疑论者。她曾从米歇尔·德·布尔日、拉姆奈和皮埃尔·勒鲁等人那里，吸收过他们的一些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是她原来就有的。

在政治上，她本来就是极端大胆、热情和激烈的。她是十九世纪在法国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少有的妇女之一。

乔治·桑从孩提时起，她就已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她珍重人民，并且常常喜欢想到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长期亲密无间地和农民的孩子一起生活。她认为母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小就对母亲怀着强烈的爱。因此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不相信富人，天生就同情反叛者。她尝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化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她也参与这种腐化，于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大众的美德上。

因此，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至少她自认是民主主义者。和拉夏特爾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反对君主派，为共和派和拿破仑派辩护。在她看来，凡是国王，即使他自称公民，都是暴君。当莫里斯和蒙彼利埃公爵在同一个班上学时，她禁止儿子接受年轻的亲王的邀请。她拥护共和政体；但是，她在寻找最好的共和国。

乔治·桑从来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给妇女以政治上的平等。她认为母爱的职责，同公职不相容。她说：“妇女将同男子一样受教育，但是女人的心，将仍是爱情、忠诚、耐性和慈悲的庇护所。正是女人要在粗暴的情感中拯救仁慈的基督精神。女人不再起这种作用的世界，是十分不幸的。”

她为妇女要求的不是投票权和选举权，而是公民权的平等和情感的平等。她认为，男人控制女人的奴役方式，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幸福，而这幸福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如果女人能如愿以偿的被人爱，她们也许就无所求了：“但是，男人们虐待她们、责备她们被迫养成的习惯，鄙视她们的无知，嘲笑她们的学问。在爱情上，男人们把她们看成妓女；在夫妻的情份上，则把她们看成佣人。男人们并不喜欢她们，男人们使唤和利用她们，并且希望这样迫使她们屈从于忠贞的戒律。”

这就是她主要的抱怨，也是她自青年时代就发出的呼声。这在她后来的作品里都有反响。男人认为忠贞是徒劳无益和可笑的。但是，凭什么公理，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公理，人们能够要求妇女忠贞？如果那男人是个追逐女色、粗暴放荡之人，为什么妻子还要对他保持贞洁呢？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在我们的偏见和习俗里，一个男人越是交了好运引人注意，人们就越是对他笑脸相迎、巴结奉承。某人吃得脑满肠肥，情场上春风得意，就被看作是快活的伙伴。而被指控为奸妇的女人，却不会有这种地位。这就是人们给予妇女的唯一的荣誉。对丈夫不忠的女人，她变得憔悴，被人轻视；在子女眼里，她也是很丢人的；她该受到侮辱性的惩罚，比如说坐牢。

乔治·桑所希望的是，把妇女因结婚而被剥夺了的公民权利归还给她

们；并且希望废止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侮辱性惩罚的法律，因为那是“使通奸现象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加的野蛮法律。”

她认为整治两性结合不合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地中止和改变夫妻关系，而这种自由那时还不存在：“在世上，一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已经进化到懂得完美的爱情的时候，就不能够——最好说，就不允许——走回头路，仍旧像野兽一样对待性行为了。”

当肉体的结合不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时，它对人来说是一种罪过和亵渎行为，即使是结了婚，也是如此。女人应有权躲避这样的结合：“我认为，在爱情中显露虚假的快感，以及在不完整的爱情里极力制造快感，都是莫大的罪孽。我认为，并且要说：要么全心全意地去爱，要么干脆如处女般生活下去。”

在她看来，错误和罪过并不在于更换情人，去爱自己所爱的人，而在于委身于自己不爱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这就是她的女权论的界限。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妇女来讲，这种女权论并不牵涉到政治行动。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随大流，还是逆潮流，他们都要受到同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或者与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乔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继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号召社会革命。

1847年，乔治·桑的个人生活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中断了同肖邦的来往；出现了克莱森热与索朗芝的婚姻悲剧。这些打击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悲伤压碎了，我相信，这是无法医治的忧伤。因为，我越是能够暂时忘记忧伤，忧伤越是向我袭来。往后，我就更加阴郁不快，心碎欲裂……”

尽管这样，她仍然继续工作，而且显得很愉快，有时也会真的心情舒畅。

乔治·桑终于为她的奥古斯蒂娜找到了一个丈夫，三十六岁的图画教师卡罗尔。他是流亡法国的波兰人，维克多发现了他；乔治·桑曾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对奥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这对年轻人没什么财产，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为了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乔治·桑给了新娘三万法郎的陪嫁，又为新郎找到一个税务员的职位。

乔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疯狂的克莱森热挥霍浪费，结果负债累累。为了使收支平衡，她写了十卷本的《我的自传》。

1847年，乔治·桑几乎没有见过皮埃尔，勒鲁，十分宽宏大量的乔治·桑很严肃地批评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勒鲁的事，我开始习惯做这样的设想：他在与世隔绝的、想象的钢丝绳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将会变成怎样，但他总可以找到办法，一方面，他办事情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坚持不懈。而且，他很善于从他不承认的这个世界，取得必需的帮助。多年来，他心甘情愿地过着穷困的日子；但是，他一家老小，那么多人吃饭，却从来不缺少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拖延下来，他并不那么担忧，他有令人赞叹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过难关。他也有令人赞叹的才智，使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年轻的维克多此时成了诺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将在巴黎举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乱。乔治·桑起初还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惊，全法国也为之一震。

乔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于一种女性的强烈愤慨。

她写信给儿子，劝他不要再去那里闲逛了，因为人们会被砍伤，而且这对正义的事业毫无好处。她见儿子没听她的劝告回诺昂，感到很吃惊。莫里斯喜气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热。乔治·桑很担心，于是决定去找她的儿子。

到了巴黎后，乔治·桑突然感到，这是伟大的日子，不仅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她发现朋友们都已上台掌了权。

共和国是坚强的。大家不再放弃它，为了保卫它，必要时就战死在街垒上。正直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许不能胜任只有拿破仑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部分人都尽力去工作。

乔治·桑看到临时政府的首脑，被工人和资产阶级拉来拉去。他们用工作服反对礼服，用鸭舌帽反对礼帽，将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立。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乐观，尤其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她使她的朋友们被任命为共和国在拉夏特尔等城市的专员。旧情人米歇尔已被撤职，因为他害怕作蛊惑人心的宣传，背叛了民主。乔治·桑还使莫里斯成了诺昂的镇长。

她有一张长期通行证，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随时去找临时政府的成员。她成了革命的缪斯。革命行动使艺术家们大为振奋，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危险，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容易任人塑造。

美梦是不会长久的，这就是美梦本身的含义。富人们害怕，穷人们也一样，人民对一八三一年怀着惨痛的记忆。那时候，国王从人民手中抢走了共和国，人民仍然握紧武器。

乔治·桑1848年3月写道：“我看见了不信任和怀疑已经钻进了富人的心窝，我看见了野心和欺骗戴上了赞同现政权的假面具。”

她跑回了诺昂，为的是陪莫里斯回去就职，并了解一下外省的情况。一个乡间的庆祝集会就在市镇广场上举行。但是，在拉夏特尔，资产阶级表露了敌对的情绪。“我回到这里，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们，变革那已经变得相当麻木的贝里。不管怎样，并不因为拉夏特尔不同意，共和国就失败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顽强，变得更好斗。回到巴黎后，她十分自豪，自命为政权的智囊和笔杆子。

伟大真诚的信仰在她的心头掀起了波涛。

巴尔扎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权的运气：共和国维持不了多久，顶多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尽量不失时机。要是他有钱的话，他也许会像他的小说中的投机者一样，趁着人心惶惶之机，低价买进债券和田产。他写信给情人说：“为了建立共和国，要摧毁一切，重建一切。这事业没有人支持。因此，我们将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巴尔扎克本来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乔治·桑有分歧。

普选临近了。乔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权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说去选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选人。但是。全省除了几个属于工人的城

市外，都像拉夏特一样保守。

不过，乔治·桑不承认被击败了。她撰文威胁道：

如果选举不能使社会真理取胜的话，如果选举只代表一个人民不真诚信任的特权集团的利益，那个本应是拯救共和国的选举就将会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大概只有一条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过去建起过街垒，他们也许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意志，使错误的国民议会决议推迟实行。这是最后的、可悲的办法。法国愿意迫使巴黎再求助于这个办法吗？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这是号召举行暴动。

乔治·桑不害怕暴动。在她看来，政府、报刊、整个法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纯粹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们与君主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派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派，她是其中的一员。她想，唯有战斗的结果才能区分两大阵营。

然而，在等候选举时，政府中思想先进的人，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政权。很多人把造成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乔治·桑的文章。

乔治·桑在别的报纸上力图解释说，她不主张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说的，不主张“特权集团和小集团”。“特权集团”就是所谓的领导阶级，“小集团”指的是狂热鼓吹暴力的小集团。但是，实际上，她是鼓励“小集团”，而公众反对她的叫骂也是很厉害的。

这时，乔治·桑还能到一些部长的家里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乔治·桑劝告他们的那样做了。巴黎的起义者们闯进了彼旁宫，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紧急动员令，富人区的国民卫军挽救了国民议会。

5月15日，乔治·桑在哪儿呢？波旁宫旁边的勃良第街，人群密集，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看见，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在发表演讲，并博得众人的喝采。她就是乔治·桑！

5月15日晚上，乔治·桑断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失败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诺昂去。

但是，她等了两天，因为有人说她将要被捕。她不愿意显出逃走的样子。在等待搜查时，她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没有任何人想要为难她。于是，在17号晚上，她平静地回诺昂去了。

当乔治·桑回忆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况时，她就会觉得，诺昂就是她的避难所。但现在却应该改变这种看法。在混乱的巴黎，人们都把她给忘了，而在这乡间，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反动派把她当作攻击目标，邻居们指控她犯了种种过失和罪行。

诺昂新镇长奥拉尔是乔治·桑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私交。他劝乔治·桑离开家乡，直到各种谣言和愤怒平息之后再回来。

乔治·桑去了图尔，报纸讥笑说：“乔治·桑到哪里去了？她狼狈不堪，六月事件的时候，收拾好家具和雪茄烟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图尔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义失败和六月的血腥屠杀之后，有上千人被流放。社会共和国被推翻了。一道新的血腥的壕沟挖好了，横在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乔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报上发表文章。她说：

“我不给任何报刊写了，至少是现在不写。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想。所谓当务之急，就是要做些让步，而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但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崩溃了，还未复原，我要等它康复。”

这时，肖邦在伦敦越来越恶毒地谈论他旧日情侣的不幸：“最近这段时间里，她陷进泥泞里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进泥潭。人们认为，燃起内战之火的公告是她写的……”

除了外界的责难，乔治·桑的心中充满了痛苦的斗争。奥古斯蒂娜的父亲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为《当代女人——乔治·桑的传记及其阴谋》。他在文章中指责乔治·桑把奥古斯蒂娜拐到诺昂，做莫里斯的情妇，然后把这姑娘随便嫁给一个男人。

乔治·桑去请教了大律师谢·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说，他儿子和养女之间，只有圣洁的兄妹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乡间，家庭里充满亲密的友情，我一直看着他们长大。”

谢·戴斯丹日吓坏了那位父亲，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没有发表。

但是，轮到肖邦来指控了。他说：“总之，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议论这桩最肮脏的丑闻。做父亲的虽没有尽责，但那都是事实。这就是那桩善举！当这姑娘来到这个家时，我是竭力反对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并且经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乔治·桑写给索朗芝的信：“对于他，我不能以怨报怨，以怒报怒。我经常想到他，就像是想起一个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为了迎击敌对派的进攻，乔治·桑再次把自己的书桌变成防卫的堡垒。她重新开始写《我的自传》，并又挖掘乡间题材小说。

这种新的田园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好感。那并不是因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确实放弃了激烈的政治观点。她说，她从此也许可以接受两种所有制：一种是个体制，只有阶级调和才能使它为人们所接受；另一种是集体制，她希望它能够实现，并且范围尽可能广泛。

第二节 丈夫·情人·朋友

肖邦临终前，有几个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

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

1848年12月底，伊包利特去世了，他病了将近两年，在酒里找寻一种人为的刺激。

他什么也不吃，每天喝酒，越喝越多。死神来到了，他却没有察觉到。

1847年，奥古斯蒂娜生了个儿子，取名乔治。

玛丽·多尔瓦尔的外孙也叫乔治。玛丽·多尔瓦尔变老了，她退出情场，断绝了一切来往，只是一个热心的祖母。她的女儿卡罗琳娜，嫁给了喜剧演员勒内。小夫妇俩在事业上并不成功；但已有三个孩子了。玛丽的丈夫已经瘫痪，成了残废。沉重的负担压在多尔瓦尔的身上。她勇敢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巡回演出。因为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里，除她这个流浪女演员的演

出报酬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收入。小乔治身体很虚弱。

为了使多尔瓦尔能带孩子到南方去调养，乔治·桑给孩子出旅费。孩子却因患大脑炎而夭折，多尔瓦尔也只比孩子多活了一年。

临死前，多尔瓦尔曾叫人通知大仲马和桑多，说她想见见他俩。大仲马跑来看她。

玛丽担心会被抛到公共墓穴中去，大仲马安慰她，并答应为她买块墓地。但是小乔治错过了这最后的会面，他来得太迟了。在她的墓前，竖着一个黑色木十字架，上面写着：“玛丽·多尔瓦尔，死于悲伤。”

在她被诅咒、被抛弃和被侮辱的一生中，她是艺术和命运的牺牲品，乔治·桑慷慨地照顾她的外孙们——雅克和玛丽长期在诺昂度假。

肖邦没有再见到乔治·桑。1849年10月17日，他与世长辞。有人说他斯喃喃地说：“乔治·桑对我说过，我只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肖邦临终时，有几个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乔治·桑得知这个死讯时，把肖邦过去给她的一绺环状鬃发，放在一个小纸袋里，在上面写道：可怜的小乔治！死于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两年之后，小仲马在俄国与波兰边界，发现了乔治·桑给肖邦的全部信件。肖邦的姐姐把信从巴黎带到了密斯罗维奇，因为怕信被那里的海关截去，就把信留在朋友那里。

那些人为了让年轻的小仲马开心，让他看了一个法国女人的情囊，而他们根本不认得她。

自从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之后，玛丽住在巴黎。她同家里的人（除了丈夫）言归于好，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主持政治沙龙，发表了一些严肃的作品：《论自由》《共和主义者的信》《伦理学提纲》。在写三卷《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的时候，她想和乔治·桑接触，希望这个当年参与这出历史悲剧的演员能帮助她回忆这段时间的历史。

可是，这两个女人不和已经有十一年了。

1850年11月，玛丽·达古尔给乔治·桑写信：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人代表您向我淡了些知心话，说到我心坎上。但我还不敢沉浸在它带来的欢乐里。要是您是单身的话，我本来随时想去向您了解一下，我们间事实上破裂了的、美好友谊，是否还给您留下某些惋惜之情？您是否也和我一样觉得那友谊是永恒的，并且是一点也不能替代的呢？

公众误以为我们相互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如果您发现我对不起您，我随时准备忏悔。但说实在的，我认为我们两人，只有一件事情是可责备的，那就是我们少不更事。

我们那时年轻，就是说我们轻信，爱挑剔，又太暴躁。我们曾天真地相信了那些恶毒的，或至少是轻率的谣传。我们自以为强烈的温情被人出卖，流露过激烈的言词。但我怀着不能夺走的坚定信念：因为如果我们在那痛苦的年代的每时每刻，透过所有愤怒的谣言背后，都能了解对方真实的思想，那么我们的友情就会真挚深厚和牢不可破。

刚才提笔给您写信，我还很犹豫。我对您的感情对您是否还有些魅力呢？

岁月也许是把我也变得比较好些了，但也使我变得没有那么可爱了。金发女郎翅膀不知留在哪里了，神奇的公主脱下了她蓝色的裙子，神圣的光

芒已经离开了她的额头。

在您充满才华的一切幻觉中，只剩下一个女人了。她性格倔强，更加勇敢，慢慢地走在一条孤独的路上，走在长长的送葬行列的最前头。

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我还是写信给您了。您将会感到这些话严肃而又真诚。我感谢您住日真诚地对待我。

乔治·桑，在我写这个如此亲切的名字时，我似乎看到自己又回到青年时代。所有疑虑都消失了，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们的友情将会复活，不仅亲密，而且更加坚强。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热烈的希望了。

而您呢，乔治·桑？

乔治·桑并不反对这种半和好的想法。但是，在同意和解之前，她坚持要把脓肿挤干净！要澄清一切事实。她给玛丽·达古尔写信，说明了这层意思。

说实在的，这两个女人间的友情，不可能继续存在。她们互相说得太多，写得太多了。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手与伙伴对自己的看法。过分直率，就不能相互原谅。它使对方大清楚别人的评价。这评价过去残酷无情，现在可能依然如故。没有信任就没有友谊。

而且，尊重对于友谊来讲，即使是虚情假意，也比严厉的真实更有利。此外，真诚常常也只是一种生气或怨恨的表示。

乔治·桑的孩子们几乎没有变。索朗芝和她的丈夫在爱情与离异之间摇摆。他们因支付不了抵押的利息，法院根据债权人的请求和申诉，把纳博纳公馆贱价出卖了。女儿自己的陪嫁挥霍光了，母亲仁慈地答应给她每年三千法郎的补贴。1849年5月，一个小女孩降生在卡西米尔的家里。她就是让娜·克莱森热。

莫里斯还是那样优柔寡断，仅有愿望而没有行动。他老是说要成家，但计划总是落空。

1850年12月21日，母亲在信中对他说：“不对，你对结婚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是悲剧性的，不要以为我责备你的过去。”

她劝儿子，如果真想找妻子，要在巴黎把结交的范围扩大，并且深入到各种不同的团体里。“还有别的阶层：你愿意见达古尔夫人吗？她接受伟大思想的最芳香的花朵。

我们之间已经言和了。尽管我不愿常去她那里，但你可以去看看她。她会热情接待你的，因为她渴望和解，她有几个女儿，她会接待年轻人的。然后，新朋友再介绍新朋友……”

她特别要莫里斯经过认真的选择之后再决定。这是很重要的事，不仅对莫里斯是这样，对她也一样。如果将来她和媳妇不和，就得离开诺昂。

根据她自己的经验，乔治·桑提醒儿子，只有一种方法可使夫妻幸福，这就是说要诚心诚意，而不是只有些游移模糊的想法。她劝人们要保持忠贞。这可能使人惊讶。但对爱情的忠贞却是她的一贯主张。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终生的苦役。

不久前，我就听你说，你认为不能永远爱一个人，也不能保证结婚后永不变心。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不要结婚。因为那样你会成为戴绿帽的丈夫，那你是咎由自取。你得到的，不是个愚蠢的牺牲品，就是醋意十足的泼妇，或者你所瞧不起的骗子。

人们在相爱的时候，总是确信对爱情忠贞不渝。人们完全可能受骗，

但是相信保持忠贞，立下山盟海誓，能坚持多久就能幸福多久。要是专一的爱情不能维持一生，至少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人们可能相信忠贞不渝的爱情。

在我看到你有自信心的时候，我就安心了。

莫里斯在诺昂吸引了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青年，有画室的同伴，也有政治上的朋友。他们长期住在诺昂。乔治·桑把自己的生活同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1850年以后，亚历山大·芒索升级为受宠的人，并且在诺昂留了下来。他使乔治·桑女士完全满意，她的政治偏见和模糊的母性都得到了满足。

芒索比乔治·桑小十三岁，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但身子单薄，肺也不太好。

他出身贫寒，父亲是卢森堡宫的卫士。他是个很有艺术才能的雕塑家。他起初给乔治·桑当秘书，很快又成了她的知己。

当乔治·桑去巴黎时，她不听莫里斯的意见，要往在芒索的家里。尽管母亲人到中年，莫里斯还是担心这样做又会招来闲话。但乔治·桑对莫里斯说：“你希望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我住在芒索那里，比住在你那里更好。要是你和我住在一起，要是你能睡在他的工作室里，就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即使你不来睡觉，也不会有的。你想，除了看门人之外，谁也不知道我住在那里！每天，一个男青年把他的套间，借给一个外省来的夫人，特别是这位夫已经四十六岁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乔治·桑的生活中，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她在诺昂又重新过起平静的生活，重新每天观赏美丽的鸢尾花和欧石南，重新生活在吵闹而又快乐的年轻人的周围。

芒索要她去照顾，儿子要她去爱，这个家要她去管理；而且，每天晚上，她要写二十页小说。她的生活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路易·波拿巴被选为共和国总统。新的元首对乔治·桑并不陌生。路易·波拿巴年轻时就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烧炭党人。大概在1838年，乔治·桑在巴黎的一个沙龙见过他。当时，路易谋反的计划败露后，被送进了哈姆监狱。

亲王知道乔治·桑女士对他很感兴趣，便叫人告诉乔治·桑说，要是她能够到哈姆监狱来的话，对于他就是盛大的节日。她并没有去，但给亲王写过信，彬彬有礼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那时，乔治·桑真想相信这个年轻波拿巴的真诚。朋友们要她谨防上当；但是，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她还是在《改革报》上发表了一篇不抱敌意的文章。

1851年11月，她来到巴黎，参加她写的《维克托里娜的婚姻》的彩排。该剧于1851年11月26日在体育馆上演。

索朗芝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保护人多尔塞伯爵观看了首场演出。克莱森热夫妇若即若离，忽而分居，忽而合好。第二年，这对互相仇恨的夫妻的动荡不安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这时，大家都在谈论着可能发生的政变。谁来反对政变呢？是资产阶级？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是工人？他们为什么要捍卫那个曾经下令枪杀他们的国民议会呢？

十二月初的一天，有人对乔治·桑说：“如果总统不马上搞一次政变，他就是个外行，因为现在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那天晚上，乔治·桑和索朗芝与芒索一起去看马戏。凌晨一点钟，他们走过爱丽舍宫，看见院子的正门关着。只有一个哨兵守在那里，万籁俱寂；路灯光照着泥泞滑溜的路面。乔治·桑笑着说：“这还不是明天！”这一夜，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一早，有人来告知她：“国民议会已被解散。”这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很久以来，丧亡中的共和国就已不再是她所期望的共和国了。

大街上，人们都很平静，但是，晚上《维克托里娜的婚礼》在体育馆演出时，观众寥寥无几。

“现在，我非常能控制自己，”乔治·桑对一个朋友说。“再也没有什么会激起我的气愤了。我对待反动派，就像是对待盲目的命运，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耐心，才能战而胜之。”

她坐在炉旁度过了这个路易·波拿巴晚上，细心地听着外面有什么动静：“什么也没有，到处是死亡、蠢笨或者恐怖造成的寂静。”在这几天里，她希望路易·波拿巴这个新主人将尽力使法国人和好。

但是，新政权一开始就充满血腥与暴虐。就像白色恐怖时期一样，一些极端分子要求路易·波拿巴亲王做一个冷酷无情而又公正的人，并要求他手持严酷的利剑，越过世纪。

凡是忠实于共和国的，都被残酷地消灭了。地方上的报复行动，使镇压有加无减。

半个法国都在检举别人，依据匿名、诬告而做出的不能上诉的判决，使无数不幸的人被囚禁、被运往非洲，或流放到美洲去。

贝里也笼罩在惊恐之中。诺昂的常客中，很多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指定流放。

有人说乔治·桑也要被捕。她不愿逃走；相反，她决定要去见路易·波拿巴。

其实，她根本没什么危险。亲王总统很尊敬她。她坚持要得到总统的接见，她要替朋友们的案子做辩护。

1852年1月，她来到巴黎，并写信给亲王：

“我一直把您看成是一个天才的社会主义者，对您满怀虔诚的信任。我认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高声责备上天和民族，责备由上帝所降生和为人民所拥护的人，简直是一种罪过。”

总统亲笔回信给她：“夫人，我将很高兴地接见您，时间由您定，下星期随便哪一天，下午三点钟吧。”

她担心时间不够，不能讲完自己的意见，事先准备了一封很长的信。这是一份要求宽容的呼吁书：

亲王，我来到您身边大胆地进行交涉。亲王，我童年和老年时的朋友们，我的兄弟和我收养的孩子们，现在都已身陷囹圄，或者被流放。

在陌生的天空底下永远过流亡生活，这不是您的意愿吧？

但愿您知道它使最平静和最漠不关心的人都感到沮丧啊！而且，在候审监狱，羁押着身患疾病和生命垂危的人。囚犯们都挤在铺草的地上。那里臭气薰天，而且冰冷难熬。

母亲和女儿完全不理解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她们焦虑不安。温和的工人和农民都惊呆了。他们说：“难道要把那些不谋杀和不偷窃的人，统统投进监狱吗？我们都要去吗？而我们那时投票选他，都是多么高兴。”

亲王，我过去爱戴的亲王，请您本人好好考虑吧！您还不至于为了进行统治，而变成无情无义吧。政治也许做出了伟大的事情；但是，只有良心才能做出奇迹。扪心自问一下您的良心吧！

赦免吧！我的亲王！如果您不听我的话，我在临死之前做了这最后的努力，那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自己既不会使上帝不高兴，也不会损害自己做人的自由权利。我尤其不会有愧于您对我的敬意。我珍视您对我的敬意胜过珍视宁静地度过晚年和辞别人世。

路易·波拿巴握着乔治·桑的两手，听她慷慨陈辞，请求实行大赦，揭露以政治为幌子的公报私仇。亲王对她说，非常尊重她的性格，同意她为朋友们提出的要求，并把她介绍给内政部长。她从这位部长那里获得了对一些贝里人的从宽处理。

接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了让不幸的人们获得赦免，她进行了勇敢顽强的斗争。

这真是两头不讨好的任务：她坚持不懈的奔走，几乎激怒了当局；而她与当局的关系，又引来了共和派朋友的指责。然而，她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在几个月里，乔治·桑在部长、亲王与警察局长之间周旋，来回奔波。她拯救生病的囚徒；为他们的家庭争取救济；阻止运送被流放者的囚车出发；给被流放者寄书汇款。

为了维护请愿者的尊严，她替他们写请愿书，从行刑队手中抢救出几个被判了死刑的士兵。

当乔治·桑碰到的麻烦太多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写信给总统，乔治·桑继续相信这个从前的哈姆监狱囚犯的善心，可是他已成了爱丽舍宫中的昏君。

总统差不多取得全国一致同意，当了皇帝。乔治·桑再也见不到他了。

第三节 心灵的变迁

她想用仁慈做为行动的动机，来代替情欲。

索朗芝受到一见钟情的熏染，思想露骨放肆，行为大胆无耻。这使母亲大为反感。

人们最钟爱的人和不喜欢的人，晚上在墓地徘徊……

莫里斯给母亲下了最后通牒：“他或者我，我们中的一个，必须离开诺昂

乔治·桑经历了爱情，保持着光荣，她没有像其他很多人那样，忧愁地自问着将会发生什么事。她记得过去发生的事。而将近五十岁的时候，她由于年龄起作用，不可避免地衰弱了。但是，发现美貌消失对她又有什么关系？对于不愿只是做为一件奢侈品的女人来讲，承认不能再出风头的那一天来临，虽然不是无关紧要，却是可以忍受的。

乔治·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尽管上了年纪，她仍然有吸引力。她

是统治诺昂的家长，有巨大的权利。莫里斯的朋友都十分崇拜地奉承她。家里住着那么多男青年。乔治·桑以为，她和年轻人生活在一起，是她保持青春活力的办法：“大家在我家玩耍，我总是很愉快。”

当诺昂的房子里坐满了人，或者拉夏特尔的朋友们来到时，这里的生活仍然像以前一样有规律：午饭，散步，工作，晚饭，玩骨牌，然后大家围在桌旁读书。

乔治·桑经常做非常细致的活：默默地做绒花。午夜时分，芒索给她准备好了油灯，并且陪她到工作室去，她在那里一直呆到早上六点，一边写东西，一边吸烟，她把烟蒂都扔到一个水杯里。

下午，她收拾房子，料理花园。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需要很多人干活。平时有八、九个仆人，当城堡来了很多客人，或者在夫人做她的醋栗果酱时，还有一些散工来帮忙。她要自己亲手做果酱，她有自己的配方，为此颇为自豪。

在这里做工的人，都得到比较好的报酬。乔治·桑立了条规矩，要比邻近的庄园主多付点工钱给工人，她不愿意别人谈论主人和仆人。一个自由的人是不需要主人的，在她那里有的只是家务工作人员，各负其责。乔治·桑喜欢完美的东西，因此，她要求很高，但她叫人做事。从不使人难堪。她既不同意仆人们穿制服，也不愿人家用第三人称对她讲话。在要求别人做事时，她都采用贝里人的习惯说法：“您愿意做这事吗？”而她又最喜欢人家回答：“我很愿意做。”她特别要求为她服务的人具备一种品德：严守秘密。谁也不能把在诺昂发生的事讲出去。她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始终是个秘密。

大自然的景象，使人体的变化变得容易忍受。秋天黄色的树木，预示着冬天的来临，而不诅咒冬天。乔治·桑也泰然地迎接向她大步走来的老年。

她想用仁慈做为行动的动机，来代替情欲。仁慈是一种她本来就具有的美德，有时却被她强悍的个性所掩盖。她心血来潮，就和病善待人；她希望从此始终如一地做个好人，她以为她的研究结束了。并不是甘心罢休，而是暴力的效果使她讨厌暴力。从此她只愿无怨无仇地为别人的幸福而奋斗。

这种思想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年就像剩余的生命，要经历涨潮和落潮。乔治·桑将会有消沉、恼怒、邪欲、懊悔、失足和不公正。因此，她有时也会过分高兴。轻浮是一种狂热状态。而且，嘻笑声往往掩盖了内心的声音。这时，由于她希望自己前后一致，她不仅原谅了自己的过去，而且诚心要改变它，使它配得上这善良的决心。缪塞会怎样想呢？乔治·桑对于他只是个忠诚的天使，那神秘的情欲呢？婚姻的恩怨呢？这都只不过是浪漫的形式。

在她写的书里，结婚越来越受人尊敬。是的，上帝希望的爱是由爱情决定的，但它又区别于动物的本能。理智干预了选择，选择是唯一的，要继续下去。

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问道：“如果爱情死亡了，是不是要到别处去寻求呢？”

女主角反驳道：“为什么要到别处去找呢？不如用您赋予爱情的强大力量，去医治它那罪恶的厌倦情绪呢！”

除去自身邪恶的欲念，很好地去了解与之结合的人，比另外找一个人要好，这就是婚姻幸福的奥秘。

巴尔扎克曾把这个道理告诉乔治·桑，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时间是

最好的老师；它比朋友的忠告更有效。

这种新的婚姻哲学出现在乔治·桑的脑子里实在是大迟了，以致不能挽救可怜的卡西米尔的婚姻。此外，挽救他们的结合也不可能。有时，一个女人越是尽力深入了解丈夫，她就越难以看到丈夫可爱的地方，怎样鼓吹和解也都是枉费心机。乔治·桑对此本来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老年妇人和年轻姑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悲剧。

老年妇人想到这些。不是为了自己，而为了女儿、媳妇、孙女的利益，而且，她们也总是有相当的能力去抵御别人感情的诱惑，索朗芝母亲的判断与感受，不可能与卡西米尔妻子的一样。

索朗芝和母亲彼此关系很僵。乔治·桑和莫里斯一起反对这个凶恶的小姑娘。她振振有词地摇唇鼓舌，无耻地挑拨离间，致使她周围的人们，莫名其妙地互相仇视。她从童年起，就目睹母亲的私情。起初，她对此加以谴责，而后，就十分嫉妒了，乔治·桑说：“当我向她谈起上帝，她就当面嘲笑我。”

索朗芝受到一见钟情的熏染，思想露骨放肆，行为大胆无耻。这使母亲大为反感。

这两个女人，一边在互相叫唤着亲爱的，其实并不相爱。在肖邦还在的时候，她们之间就暗里争风吃醋。后来，乔治·桑愿意原谅她。

乔治·桑两次给女儿办嫁妆：起初赠予纳博纳公馆；这幢房子被扣押后，又给一笔年金，她毕竟希望女儿的婚姻能够维持下去。

结果乔治·桑劳而无功。因为克莱森热是个疯子，只一年工夫，就欠下了一大笔债，不得不拿那个公馆作抵押。他使妻子破产，使岳母明显地穷了。虽然乔治·桑尽力挽救他，却枉费了心机。

然而，索朗芝热衷于栽赃诬陷，竟对她的朋友说母亲的债主向她讨债！她还鬼鬼祟祟地向乔治·桑隐瞒了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

让娜·克莱森热的出生，才使这母女间的关系有了缓和，却仍不能使她们亲近。乔治·桑说：“如果说克莱森热是两个人中最疯狂的一个，那么他还不能算是最坏的。”

1851年2月，索朗芝带女儿来到了诺昂。

当时，乔治·桑给奥古斯蒂娜·写信说：“我要告诉你，索朗芝比莫里斯早一天回到这里，同她的小女孩在这里住了四天。这小孩长得很漂亮，但是一点也不好带。索朗芝决心回来，决定要讨人喜欢，显得泰然自若，就像一个贵妇胸怀豁达。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因为索朗芝这次回来的动机和她的本意，谁也不知道。她说要到家乡来避暑几个月，而且设法租个住所，但是，没有找到，理由是找不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想不请自来的借口。我明确地对她说，不愿意接待她的丈夫、仆人、朋友、马匹和狗；我只愿意接待她和她的女儿。这是出于小心，提防争吵。她回答说，不打算住在我这里。

因为她有很多仆人，恐怕我的家容纳不下。她说她丈夫挣了很多钱。这我相信，我只是想知道她的债务是否还清。她总是多方袒护丈夫，说他只是脾气不好，心地却很好。只要她满意，那就太好了。我觉得她只是把变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做为个人幸福的标准。而她对于所面临的社会，无情地加以损害和嘲笑。她身体不好，这是不好的方面，我认为，那是她的过错。她有一次小产，第二天就骑马，从此，几个月她都没能恢复起来。她假装温柔地

给我写了些信。我对此已拿定主意，不再伤心，也不再受骗，我心平气和地看着不可改变的事实。”

乔治·桑十分憎恶索朗芝和她的丈夫，认为这一对夫妇可能犯罪作恶。她恳求莫里斯不要去她妹妹家里吃饭。

她说：“我不愿你在他们家吃饭。克莱森热是个疯子，索朗芝没心肝。这两个家伙缺乏道德，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认为私利高于一切。残忍的嫉妒心，早就吞掉了索朗芝的良心，去他们那里要千万小心，但别忘了我说的话。对于罪恶，人们往往不相信会发生。这不是偏见，是必然的倾向，罪恶正在残忍的人的心里慢慢地产生。这是一种狂暴的行为，通常是一种疯狂的举动。”

她终于承认，对她的女儿，她已丝毫没有感情。乔治·桑给索朗芝本人写信说：“你的生活太荒唐了。”

索朗芝的行动很古怪。她有时到吉勒里她父亲那里住。可怜的卡西米尔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做她的父亲。虽然尽了做父亲的责任，他却免不了被索朗芝埋怨。

克莱森热变了心，索朗芝也想效法。由于她长得很漂亮，有种特殊的美，思想又敏捷开朗，很容易打动钟情于她的人。1852年，她离开了克莱森热，因为丈夫对待她如对待模特儿。后来，她躲进一个修道院里去了。

从前的两个杜邦夫人，也就是乔治·桑的奶奶和母亲，婆媳不和，全靠她在某些日子里把母亲和祖母联在一起。现在是同样的情形。乔治·桑和索朗芝在一起时，都喜欢听索朗芝的女儿说话。

1854年5月，新的灾难终于来临了。克莱森热得知妻子和意大利卡尔洛·阿尔菲里伯爵关系暧昧，强行闯进索朗芝的房间。经过一场可怕的争吵之后，他拿走了妻子情夫写来的全部信件，寄给了自己的律师。他离开自己的家，由人陪着到诺昂去找女儿，并且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向通奸的妻子提出分居。可怜的孩子再次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有时寄养在她的教母那里，有时在她父亲那里，最后被父亲送进一所寄宿学校。

可是，这事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初步结果。索朗芝十分激动，心碎欲裂，想改弦更张。隐居在圣心修道院，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想依靠上帝，表现出了某种谦恭：“应该出现奇迹，把我的女儿归还给我。上帝能够让奇迹出现，但是，我值得上帝显灵吗？”

盼望出现的奇迹，终于在1854年12月出现了，法庭在宣判这对夫妻离婚的同时，将孩子托付给外祖母。

元旦临近了，要是让娜这时回来，诺昂将会怎样祝贺她呀！乔治·桑想。可惜，要等待判决生效。克莱森热还会上诉，而且律师是冷酷无情的。

1855年元旦那天，索朗芝只得拿了些玩具去夏托布里昂街的德里尼埃尔寄宿学校。

她就像小时候一样，站在寄宿学校门口。

大冷天，父亲让女儿出去，没有注意到她还穿着夏天的裙子啊！晚上，他把女儿带回家。女儿病倒了，而他却到离巴黎很远的的不知什么地方去打猎了。可怜的孩子染上了猩红热，不久就病死了。

乔治·桑悲痛至极，感到要为小外孙女的死写一篇文章。乔治·桑说：“上帝对于男人冷酷无情，对女人更厉害。”

让娜死了以后，莫里斯和别的朋友想带乔治·桑去意大利散散心。

这是一次很美好的旅行。他们先走海路，坐船从马赛到热那亚，在长满果实的橙树下露天吃饭。然后，他们走陆路，穿过罗马乡村，挤在公共马车里，朝佛罗伦萨走去。

乔治·桑恢复了体力，登山虽然使她感到劳累，却很快乐。他们找到很多不知名的植物和昆虫。他们在废墟上捕捉蝴蝶。总之，乔治·桑感到幸福。

在年老时，人的思想变得像块墓地。人们最钟爱的人和不喜欢的人，晚上在墓地里徘徊。

格朗萨涅在 1847 年去世了，伊包利特则死于 1848 年，肖邦和多尔瓦尔死于 1849 年，巴尔扎克和马尔利亚尼死于 1850 年，拉杜什和吕茜姨妈死于 1851 年，让娜·克莱森热死于 1855 年。

然而，诺昂仍然贵客盈门。

莫里斯为母亲仍心神不定而担忧。他做了很多事，都做得相当好，可是没有一件做得十分完美。他的漫画画得很有趣，他的插图很精巧而且富有诗意，他为木偶戏谱写的音乐非常奇特，他甚至写起小说来了。但他一点也没有从郁郁寡欢中解脱。母亲的光荣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尽管乔治·桑蜚声文坛，她一直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儿子，一直用保护人的腔调和儿子谈他的作品：“把你的小说拿给布洛兹看看吧。为了让我高兴，他会接受的。”

莫里斯将近四十岁，年纪也不小了，还只是母亲的孩子，他感到很难过。乔治·桑本来希望他早点结婚，但他对此犹豫不决。

乔治·桑还是很惋惜他没有娶奥古斯蒂娜，乔治·桑和她经常通信。奥古斯蒂娜和她丈夫总是有些事要求她办。

由于芒索经常咳嗽，吐出的东西十分可疑，而这只有乔治·桑才知道得最清楚。

至于索朗芝，她像个放纵的女人，在社交界里闯荡。她美貌绝伦，但品格低下，一味追逐男人。她去过比利时、伦敦和都灵。

乔治·桑因为要维持这个家，帮助被放逐的人们，资助玛丽·多尔瓦尔的孙子们，以及很多靠她和靠她的笔杆子生活的人，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加倍工作。

在诺昂，她每天都要应付川流不息的来访者。很多女人请求借助她对拿破仑亲王的影响，为她们打通关节。她很恼火，希望有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干自己的活。

有一次，她和芒索到拉克勒兹河谷郊游。那里依山傍水，地势渐高，已是山区。她把那里叫做贝里的小瑞士。她发现了一个名叫加尔吉列斯的小村子，村旁有条同名的小河流过，她高兴极了。

这个村子建在一个漏斗状的洼地上，那里气温高，又保护得很好，有泉水，景色十分秀丽。村里有一个罗马拜占庭式的教堂，一座浪漫派的城堡。乔治·桑说：“我们不是非要住在巴黎，我们梦想在村里安排个临时住宿处。所有热爱乡村的艺术家，都渴望在简单的生活条件下，甚至是田园式的生活中安度余日。”

她很快就想在加尔吉列斯买一幢房子。这要花五百到一千法郎。芒索征得她同意，替她支付了这笔钱，他在河边找了一幢房子，买了下来，接着花三百法郎请人包工把房子重新粉刷了一遍，另外置办了家具。他把房子装饰得像一只船似的，房间很小，但很舒服。

乔治·桑一开始就喜欢这地方。一旦她想要宁静地工作，就和芒索离开诺昂，躲到加尔吉列斯。他俩在这里享受田园诗般的乐趣。

1857年，阿尔弗雷德·缪塞和古斯塔夫·普朗什去世了。

普朗什一直到最后都用文章支持乔治·桑。乔治·桑把他看作是当代唯一严肃的批评家。

至于缪塞，他的心因太疯狂和太过分，已过早地疲惫了。他曾想替代乔治·桑，他从来也没忘记过乔治·桑。在1851年，他曾去意大利旅行，让当年美好的记忆重新浮现脑际：

啊！命运！盲目而又变化莫测！

痛苦使爱情如痴如醉！

走开吧！纠缠不休的记忆，

走开吧，我总看见的那双媚眼……

威尼斯朝夕相处的情人，令人失望而又难以忘怀。每当他在梦中不由自主地看见“她那如天鹅绒般温柔的眼睛，带着深邃居郁的目光，从眼前经过，”他就反复吟咏上面的诗句。

乔治·桑保存了她和缪塞的全部情书，约在1860年时，她想公开发表这些资料。她确信，这些信件可以证实他们相互间真挚的感情。

但发表这些信是否合适呢？乔治·桑决定请教圣·勃夫。他是自己和缪塞关系破裂的见证人。圣·勃夫建议她还是不要发表为好。

1861年2月，乔治·桑给圣·勃夫复信：“您的意见很好，我将照着去做。这些信只在我百年之后才发表。我想这些信将证明，下面的三件事不会使您的女朋友在思想上感到有重压：一、当着垂危的缪塞的面，与新欢恣意作乐；二、威胁并想把他关进疯人院；三、在他神智恢复后，不顾他的意见，决心重新得到他和引诱他……”

乔治·桑对自己的信任，使圣·勃夫很感动。从索朗芝那里得知诺昂社团财政不佳后，圣·勃夫想通过法兰西学院，发给这个伟大的小说家价值两万法郎的戈贝尔奖金。

但表决结果反对乔治·桑的有十八票，只有六票赞成。

于勒·桑多没有参加投票！为了乔治·桑能获奖，梅里美十分积极，写信鼓动小于勒。但是，桑多不能原谅损害他青年时代的人。

在皇宫里，不管乔治·桑愿不愿意，大家继续保护她。皇室因这次失败而感到很气愤。皇后提议说，法兰西学院不发奖金，也许可以给一个席位吧。后来，出现了一本叫做《妇女进法兰西学院》的小册子，作者描写了法兰西学院接纳一名女院士的情形。这只能是乔治·桑。

在1861年，莫里斯三十八岁，他母亲已五十六岁了。乔治·桑因感到年老体衰，极力坚持要莫里斯结婚。她又想抱孙子了。

“我更喜欢一个新教家庭……”乔治·桑和天主教的关系越来越松弛。在英国女修道院时，她喜欢天主教的仪式。后来，她不参加宗教仪式，只信奉有限的基督教。

事实上，莫里斯没有娶一个信新教的姑娘，而是娶了一个二十岁不信教的意大利姑娘。她是雕塑师卡拉马达的女儿。他是她父亲的朋友，因而看着她长大。

丽娜·卡拉马达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她是个漂亮迷人、聪明能干的姑娘。在乔治·桑的眼中，十分重要的是，她是个热情的爱国者。这样，

在婆媳之间将不会有政治上的分歧。

虽然如此，对宗教信仰上，莫里斯与乔治·桑意见相悖。

莫里斯在这点上，比他母亲更加不妥协，而丽娜赞成未婚夫的意见。因此，他们举行的是世俗婚礼。

在诺昂，这两个女人和睦相处。丽娜有一副美妙、爽朗、圆润的嗓子，这使她的婆婆很高兴：“这是一种天性和特点：唱起歌来令人高兴，发脾气也温柔动听；声音甜蜜，使我们感到很意外。她把我们每天的休息时间，都变成了快乐的节日。”乔治·桑说这个意大利姑娘感情细腻。不久，这对夫妻就要添个孩子了。

1863年7月14日，正好是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莫里斯的儿子马克安托万出世了。

像所有激动诺昂人心的事件一样，他带来了生动活泼、近乎疯狂的气氛。

但是，乔治·桑想离开诺昂。

很久以来，莫里斯和芒索之间的关系紧张。莫里斯一向把这个同龄的伙伴视为部属，眼见他成了宠儿，不免感到痛惜。芒索做为秘书、会计，受权管理诺昂，不仅是代理人，而且是真正的经营者，莫里斯感到蒙受羞辱。

芒索出奇地像乔治·桑小说中的民众英雄。大公无私成了他的癖好。他手上有一点钱，都要设法拿了去给人，对乔治·桑夫人，他像只狗一样忠诚。对别的人则隐约地表露出骄傲。

此外，他也是个有才华的男人，不仅文艺批评家们认为他是优秀的雕刻家，而且他对戏剧也颇有见地，在乔治·桑的大力帮助下，他写了一出小诗歌剧，在剧场上演。他常为乔治·桑主持排练，给演员们读剧本。这个家庭的客人，诸如小仲马、福楼拜对他都很热情亲切。马蒂尔德公主请他去吃过晚饭；他的戏首场演出时，拿破仑亲王也前来观看。

乔治·桑向小仲马称赞芒索说：“这就是您可以器重而不怕失望的人。一个多么好心，多么忠诚的人啊！也许是我和他朝夕相处十二年，才使我终于与人类的本性和解。”

1863年，诺昂的紧张气氛变得难以容忍。莫里斯和芒索为了玛丽·卡约争吵起来。

玛丽·卡约因陶醉于演戏和做女人的成功，她变得轻浮和随便。因此，就像在肖邦在的那段时间一样，莫里斯给母亲下了最后通牒：“他或者我，我们中的一个，必须离开诺昂。”

一时间，乔治·桑似乎要牺牲芒索。

但是，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后，乔治·桑认为，现在的情况和1847年不一样。莫里斯已经结了婚，成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从此可以不需要母亲经常在身边；而芒索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不应该抛弃他。

二十四日，乔治·桑选择了芒索，决定出走。

接下去是艰难的日子。乔治·桑被这决定的严重性弄得心神不安，她病倒了。神情紧张的芒索，在诺昂和巴黎之间往来如梭，在乡间寻找一个住所。

在巴黎，乔治·桑和芒索住在斐扬底纳街九十六号。她装了一口假牙，每星期看四次戏，并且常跑郊区，打算在那里找一所小房子。

芒索的堂兄麦亚尔住在帕莱索，就在凡尔赛到利穆尔的那段路上。他

给他们介绍了一幢房子。

德拉克鲁瓦刚去世。乔治·桑拥有这个画家的二十幅画。乔治·桑写道：“这些画值七万到八万法郎。”

她决定卖掉这些画，只有两幅不卖：画家送给她的第一幅画《异教徒的忏悔》和最后一幅画《半人半马》。这笔买卖可以使乔治·桑送给莫里斯一笔三千法郎的可观年金，还可以买一小块领地。

乔治·桑别墅是用芒索的名义买的，芒索答应以后遗赠给莫里斯。

他们在诺昂做了最后的逗留，向乡亲们告别。年迈的镇长都哭了。莫里斯和丽娜劝告童心未老的母亲要审慎从事。

诺昂变得处在黯然神丧的状态，因为莫里斯和丽娜也不愿挑起管理这所大房子的重担，他们决定去吉勒里，到卡西米尔家去。卡西米尔一直是孩子们最重要的庇护者。莫里斯和丽娜十分热爱他。

乔治·桑喜欢巴黎的新住宅，它虽然很小，却令人愉快，方便适用，窗明几净，式样迷人。帕莱索使她感到高兴。

但乔治·桑在帕莱索刚安顿好，就收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孙子小马克安托万在吉勒里病倒了。

接到消息后，收拾好了箱子，他们就赶紧出发了，急忙奔向吉勒里。

他们下午两点钟到达。但半小时前，他们从乡邮员那里得知，来得太迟了，孩子已经在早上死了。

他们最先见到的是莫里斯，然后是乔治·桑的前夫杜德望先生和他的情妇，接着是孩子的母亲丽娜。

乔治·桑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了她的丈夫。

卡西米尔讨厌在家里看见她，但他说：“我不能阻止她来看她的孙子。”当有人说男爵夫人的马车来了时，杜德望和他的朋友们出来，站在台阶上。

奥洛尔带着医生和芒索一起来到了。她喃喃地说：“卡西米尔……”

他说：“夫人，您认得您的房间，自您走后，它一直是空着的。”

小妾有礼貌地陪着正妻。乔治·桑对她说：“我的老丈夫就托付给您了。”

乔治·桑穿着一条古怪的裙子，卷在红色底裙上面。她抽着特大号香烟。吃饭时，她什么也没说。在场的吉勒里人注意到她神情沮丧，身体圆胖，耷拉着脸。第二天她就走了，后来，一位医生问卡西米尔：“和您妻子最后一次见面，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他回答说：“啊！我不想叫她奥洛尔，她更像一个落山的太阳了。”

莫里斯和丽娜回到了诺昂，乔治·桑回到帕莱索。

在这服丧期间，乔治·桑又一次使朋友们大为惊讶——她很快就平静下来。“多么痛苦啊！但是，我需要另一个孩子，而且我要支配他，因为需要爱，需要经受痛苦，需要哭，需要希望，需要创造。”

她在饭店吃晚饭，看通俗笑剧，去体育馆、剧场。生活重新又成了封闭线路。

迁到帕莱索后，芒索经常咳嗽。晚上，他常和乔治·桑玩纸牌。

1865年是痛苦的一年。芒索咳嗽、发低烧，身体迅速衰弱，快得吓人。乔治·桑也一样，埋怨着浑身的痛楚。但她还是很活跃。她跑到花园的泥地里，种下诺昂寄来的洋葱。每天晚上去巴黎看戏，使芒索在奔波中耗尽了气力。但她总是抵挡不住木偶戏的吸引。

乔治·桑像仁慈的修女，忠诚地照顾着芒索，亲自替他擦身、洗澡和湿敷。现在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芒索每天念日记。现在，她要显出不真实的乐观，又难免流露出使垂死的病人害怕的失望，她在这两者之间，艰难地保持着平衡。

1865年8月，芒索整日整夜咳个不停。

8月21日，经过表面上完全平静的一晚，他在早上六点钟去世了。

整整五个月，乔治·桑没有一天离开这垂危的病人。当他一去世，乔治·桑就写信给莫里斯：

“我们可怜的朋友不再受痛苦的折磨了。半夜里，他睡着了，神志十分清醒。不管怎样，我心都碎了。但是，我给他穿好衣服，并亲自把他安顿在他临终的床上。我还有能力控制自己没有哭。我不会病倒的，放心吧。一旦我替可怜的死者妥善地办完后事，整理好他的东西和我的东西，也是你们的东西，我就想去和你们团聚。”

尽管芒索还有双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妹妹，但他还是把他自己的东西留给了莫里斯。

安葬完毕，激动不安和悲痛的一天过去以后，莫里斯领着母亲回到诺昂。

1865年8月21日，乔治·桑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儿子就是我的灵魂，我将为他而活着。我将爱善良正直的人们——是的，至于你，你曾那样地爱我！安息吧，对你的爱是永恒不灭的。”

乔治·桑见到丽娜已经怀孕四个月了。她很精神，身体发胖了，房子收拾得整齐、清洁。莫里斯和丽娜似乎越来越爱诺昂了。媳妇勤快、温柔和顺从。

乔治·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后来，暑假结束以后，人们又见到她在巴黎：在剧院，在剧场。她忍受着痛苦，她不愿使自己感到痛苦。她谈到自己，像谈另一个女人一样：“她像小孩一样痛苦，这使事情越来越糟，而不能唤起责任感，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到孩子的坟前，不是为了祈祷或思考人们不道德的行为。而是为了看看这小块的土地，那里只剩下他不朽的灵魂在人间短暂停留的躯壳。如果伤口不继续恶化，时间将使创伤愈合。”

乔治·桑给福楼拜写了一封信，十分真诚地描绘了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在她经受这次考验时，福楼拜时常来看望她，是个忠诚友好的知己。

第四节 大师福楼拜

房子依旧总是为朋友们敞开着，只是朋友们都变了。

“我们振颤的工具不需要更多的激动，频频吹来的微弱的欲念之风会把那些工具粉碎。”

乔治·桑对小仲马说：“小仲马，我打赌，你将要向朱丽埃特大讲爱情吧？”

乔治·桑孤独地在帕莱索隐居时，她踏进了老年的门槛。

芒索的去世，使乔治·桑又和诺昂亲近。她喜欢有多处住房，保留了帕莱索的小房子和巴黎的一个套间。她是个戏迷，要参加晚上聚餐，观看她的剧本的排练，这都常把她吸引到巴黎。她去法兰西剧院看过缪塞的一出喜剧《勿以爱情为戏》。她看过后指出：“这是个古老的故事，迷人的戏剧。”

在这个古老的故事里，她又重温自己说过的话，重忆已逝的爱情。

乔治·桑在帕莱索的房子，由住宅看管人夫妇俩收拾得很整洁。他们虔诚老实，家务管理得很好，就像芒索还在时一样，没有忘记按时给时钟上发条，也没忘记撕下每天的日历。这样，乔治·桑想在那里住上几天，就可以在宁静和沉思中，平静地度过几个晚上，独自一人，不太悲伤。不过，实际上她始终眷念亲爱的诺昂。

从小女孩到姑娘，直至出嫁以后，乔治·桑没有一年不回故乡老家，在林荫小径散步，同死去的亲人和故土取得联系。杂草丛生的墓地，残败老朽的高大榆树，瓦顶的小钟楼，粗木做的门廊，这一切，使曾在这地方长期平静生活过的人，一想起来就感到甜蜜和亲切。周围是农民们的小屋，住着她童年的游戏伙伴及其子孙。敲钟和殡葬的杂役是她的老朋友。也许这个女领主过去使全村人反感。有些人以为在公园里见到了鬼，听到了古怪的音乐。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乔治·桑现在是诺昂的老夫人，传奇式的人物，一个守护神，她为和谐的贝里增了光。

和乔治·桑一起生活的，不仅有莫里斯和丽娜，还有一个小孙女，她的名字也叫奥洛尔。

小奥洛尔长得很漂亮、娇嫩、快活。她有祖母一样的黑天鹅绒般的眼睛，即使是在笑的时候，眼神也显得很庄重。1868年，她满两周岁，奶奶为了庆贺她的生日，从花园挑了一束白色的报春花送给她。

房子依旧总是为朋友们敞开着，只是朋友们都变了。

乔治·桑老年时，最好的朋友是古斯塔夫·福楼拜。芒索死后，福楼拜到帕莱索去陪伴乔治·桑，终于抓住了她的心。后来，乔治·桑做了回访。这种结合非常成功。

乔治·桑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一点钟时到了诺昂。我看见福楼拜和一辆车在车站等我。他带我去观光了市容，参观了美丽的古建筑，真是美不胜收！福楼拜的母亲是一个漂亮的老妇人。这里无比美妙，住房舒适漂亮，收拾得很整齐。清洁、供水、应急等生活设施完好齐全，应有尽有，令人满意。我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个晚上，福楼拜给我念一本非常好的书《圣安东尼的诱惑》。我们在他的书房里，一直谈到两点钟。”

回来后，乔治·桑给福楼拜写信说：“我受到您热情款待，十分感动。像我这样流浪的蠢货，出现在您舒适的家中，颇为反常，人们会觉得讨厌。可是，人们不仅不讨厌我，反而把我当成亲人一样接待，我看到发自内心的待人接物的好榜样。你与很可爱的女朋友在一起，可别忘了我。你是一个勇敢的好男子，尽管你是个伟大的人物，我全心全意地爱你。”

后来，她又与福楼拜一起去了他的家一趟。

乔治·桑的日记再次记述了她的旅行：“一点钟时和福楼拜一起从巴黎出发，车开得很快，气候适宜，景色迷人，谈话投机。在诺昂车站，我们见到福楼拜的母亲和她的另一个当医生的儿子，在克鲁瓦塞，我们先在花园散步，然后聊天，吃晚饭，又再聊天和读书，一直到一点半钟。床铺舒适，睡得很熟。”

第二天：“天气好极了，从花园一直散步到果园。工作。我在我的小房里觉得很舒服，很暖和。一起吃晚饭的人有福楼拜的侄女及其丈夫，后来，古斯塔夫给我念梦幻剧。

剧里充满了值得称颂和迷人的事件，但太长了，太丰富，太全面了。我们还是谈到两点半钟。我觉得饿了，我们下楼到厨房去找些冻鸡吃。我们把头伸出院子，想去水泵那儿取些水，天气如春天般温暖。我们一起吃了起来。然后，又回到楼上，一起抽烟、聊天。

早上四点，我们才分手。”

福楼拜称乔治·桑为亲爱的大师，或者亲爱的尊敬的大师；而乔治·桑则称福楼拜为我的本笃会修士，或我的行吟诗人。从表面上看，这种相互间的柔情是很令人感到意外和吃惊的，因为很难见到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这样亲近。乔治·桑喜欢走动和旅行，而古斯塔夫的生活总是不离开他的别墅、他的手稿和舒适安逸的生活。

福楼拜给乔治·桑的信中这样讲：“在这里大家都亲近您。您身上集中了那么多罕见而又不同的优点，您是出生在什么样的星座下呀？我不知道我对您怀着怎样的感情，但是我对您怀着特别温柔的感情，我直到现在对任何人都还没有过这种感情。我们很融洽，是吗？这真好，我也常问自己，我为什么爱您，因为您是个伟大的人物，还是因为您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我们以往夜晚的聊天实在是好，有好些时候，我像个胖孩子一样，忍着不去吻您。”

世上除了文学，没有什么使福楼拜感兴趣。乔治·桑写作是为了生活。她说：“神圣的文学，它在我的生活中，只是第二位的。我喜爱某个人更甚于文学，而我喜爱我的家庭更甚于那个人。”

福楼拜对一个词的使用，要反复推敲，花费很大的气力；而乔治·桑一个晚上就可以写三十页，并且在一本书刚写完以后，就又开始写另一本书。

乔治·桑曾对福楼拜讲：“您艰难地进行写作，使我感到很吃惊。”

不过有时她也不那么自信：“当看到老朋友很费力地写小说时，我对自己轻而易举地写完一本小说感到怀疑和泄气，并觉得我搞的一定是很拙劣的文学了。”

福楼拜很谦虚他说：“您的思路宽阔流畅，奔流不息如一条大江。而我的思路，则是一条细细的水流。要形成一个瀑布，我就要在艺术上做很大的努力。”

他们经常讨论艺术家耽于声色的问题，乔治·桑对人类的这个方面十分感兴趣。

有了青年时代的经验之后，乔治·桑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艺术家尽最大的努力从事艺术创作，却常常不能享受他们所描写的欢乐。

乔治·桑对福楼拜讲：“我不相信这个唐璜就是拜伦的化身。唐璜不会写诗，据说拜伦并不会谈情说爱。不过他也许有几次——生活中激动的次数，是可以算出来的。在心灵、思想和感觉上都完全处于狂喜状态。他经历了相当多次的激动，才成为一个爱情诗人。我们振颤的工具不需要更多的激动，频频吹来的微弱的欲念之风会把那些工具粉碎。”

福楼拜反驳乔治·桑：

“维吉尔所说的关于贞洁的道理，正是我的看法。这种努力是美好的，并不是我的自我克制。不然的话，就要像天主教徒那样，诅咒肉体了。应该欢笑、哭泣、爱恋、工作、享受和受苦。总之，要尽可能地精神振奋，充满

感情。我想，这就是真正的人生。”

他们讨论圣·勃夫的情况。圣·勃夫虽然年纪老了，却仍贪淫好色，总是遗憾不能常去拾花引蝶。乔治·桑责备他道：“他现在惋惜那些不很值得惋惜的东西，仍像过去一样狡猾，精干此道。”

福楼拜是很宽容的，他说：“这样对圣·勃夫老爹太严厉了吧。他不是耶稣会士，又不是圣母会员！男人们总是觉得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而女人，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个深不可测的……”

乔治·桑对此不能苟同：“不，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禁止那些极端可怕的事情发生，我是指丑恶的老头千方百计要自己得到年轻姑娘。这不是爱情。因为，不是什么感情的意愿促使年轻的姑娘投到丑恶的老头的怀抱。那里，没有自由和相互友爱的关系，那是对圣洁的少女的残害。”

这是多么不同的观点，又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们是两个行吟诗人，相信爱情，相信艺术和理想。

乔治·桑本来想把福楼拜吸引到诺昂来。但是，福楼拜有书要写完，不同意休息。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没去诺昂的原因。这都是女骑士们的故事。为了更好地拉弓射箭，她们连乳房都压扁了。”

乔治·桑认为，尽管穿哨兵的上衣和男人的裤子，但她从来不是女骑士。恰恰相反，她尽力要成为个艺术家和女人，既是艺术家又是女人。

1860年之前，朱丽埃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女作家。她和一个难以忍受的丈夫结了婚。她的丈夫是个保守主义者，还是个坏情人，使她很恼火。朱丽埃特来到巴黎便十分讨人喜欢。她活泼迷人，不仅她政治上的朋友和共和主义者非常欢迎她，像梅里美这样的第二帝国的拥护者也欢迎她。她以一本小书打开了局面。她写书捍卫妇女的权益，特别热情地称赞乔治·桑和玛丽·达古尔，认为她们敢于自由地生活。因此，她很快就受到达古尔伯爵夫人的邀请。

当时，达古尔主持着政治沙龙和自由主义者办事处的工作。乔治·桑知道朱丽埃特时常到她的敌人那里去，就不愿见她。乔治·桑认为，坦诚的断交比说闲话要好，她对朱丽埃特说：“到您也讨厌达古尔夫人时，您就会感到乔治·桑才是您的朋友，您才会去找她。”

当朱丽埃特和她的丈夫分手时，达古尔夫人表示赞同，并给予支持。但是，在一起散步时，她总要提到乔治·桑：“我不能宽恕她。她虽出身名门，举止却不雅，穿着随便，在诺昂粗野地胡闹。她这样的年纪了，却像个画室的艺徒一样，她出身高贵，在年老的时候，没有理由仍然像个淘气的孩子。”

1867年，她的丈夫死了，朱丽埃特高兴极了，并决定尽快地嫁给他心爱的人。

除了达古尔夫人，朋友们都祝贺她。达古尔夫人说：“成为寡妇是不幸的，想再嫁是愚蠢的。我认为您不会做这种蠢事吧？一个善于思考的女人应是自由的。”

她得知朱丽埃特再婚的消息，大发雷霆，把她看成是愚蠢的乡下佬，并且对她预言说，不出两年，为了做家务活，她就要停止写作。

和达古尔夫人的不和，终于使朱丽埃特去见乔治·桑。她要求安排一次接见，后来亲自去了斐扬底纳街九十六号。她很激动地走进客厅。她看见

一个矮小的女人，在卷着一根香烟，并且示意自己在她身边坐下。

乔治·桑点着了烟，她好像要很费力才能说出话来，但又没说。来访者泪如雨下，说乔治·桑像母亲一样，向她张开臂膀。朱丽埃特扑到乔治·桑怀里，这无声的场面，成了她们一种长久的友谊的开端。

朱丽埃特认为，乔治·桑比达古尔夫人好得多，感情细腻，心灵高尚，对生活有深刻的认识，经过严酷考验后，没有偏见。

乔治·桑很快就接受了这个精神上的女儿。她想带朱丽埃特到店去吃晚饭，并把她介绍给朋友们。

这个漂亮的妇人使宾客大为兴奋，他们讲起些下流的故事来。乔治·桑气愤他说：“你们知道我讨厌这种无聊的谈话，我感到恶心……”

小仲马赞赏朱丽埃特的美貌说：“我倒很希望她没有任何才华。有这样的身材和小脸蛋，何苦要做女才子？”

乔治·桑对小仲马说：“小仲马，我请你注意你对女才子的轻蔑态度！我打赌，你将要向朱丽埃特大讲爱情吧？”

“肯定这样。有那样的外貌，就当不了作家。”小仲马说。

乔治·桑对朱丽埃特说：“我的孩子，别听这些人的。您只要读读他们的书，看他们把钟情的妇女变成什么样子，诸如包法利夫人等，您就会知道，他们不可能给您好建议。”

小仲马说：“您呀，您从来就只是喜欢您书上写的英雄。”

有时，乔治·桑力图把自己从动乱的生活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讲给朱丽埃特听：“随着我们彼此进一步了解，我要告诉您，我在人生的路上攀登，走的是怎样的路。尤其是我找寻更平坦舒适的路，那路就更加艰难曲折。善良本来应该是一种敏锐、沉着的美德，在我身上却恰似一股只求向外倾泻的汹涌激流。一旦人们激起我极大的同情，我就总惦记着他们。我盲目地扑向每一个行善的机会，而那盲目性往往给我带来痛苦。我反省，发现一生中有两种炽烈的感情，就是母爱和友爱，我接受给我提供的爱情，并没有特意寻找和选择。这样，我给予和有求于这种爱情的，完全不同于这种爱情给予我的。”

从得到过我爱的人之中，我本来可以找到些朋友和儿子；在对这两者进行初次选择之后，我再也无权把友情强加于人。对此应该有道德权威。男人们只是勉强地朋友般相爱。他们能同偶然遇到的任何女人在一起而感到快乐，并打算利用其感受到的柔情蜜意。”

乔治·桑的自我诊断如此正确，使她的敌人们大为吃惊。她们把她看成是魔鬼缠身的女人，但是，她讲的都是真的。她起初委身于是出于仁慈；后来，像她所说的，因为她再也没有道德权威强加友情！再后来，是出自于习惯和独特风格的需要。她得出结论：“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将肉欲掺进强烈的伤感中。”

乔治·桑向朱丽埃特不厌其烦地解释说，她对缪塞做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善事，她只想让他自己救自己。乔治·桑请求朱丽埃特，当有人当她的面指责乔治·桑背信弃义，就这样回答说：“如果乔治·桑失去了被做为女人来评价的权利，却保留了被人做为男人来评价的权利。在爱情上，她是你们中间最忠贞的一个。她没有欺骗任何人，也从来没有脚踏两只船！她唯一的罪过就在于，在艺术占了很重要位置的生活中，她选择了艺术家团体，并且喜欢男性的道德胜过女性的道德。”

她进一步向朱丽埃特传授自己的经验：“做为一个女人，非女性化就是贬低自己。

好好记住这些。您和我过去一样，在被男人包围的情况下生活。您会被他们中的很多人爱上，而且也许是迷恋上的。在最初的时候，您要好好地记住：当男人占上风的时候，他对于特殊的女人来讲，是个值得羡慕的朋友；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讲，他同样只是个情人，常常是最低贱、蠢笨的女人的最好的情人。我有爱的经验，情人的经验，可惜很复杂。如果我重新开始生活，我也许会是个贞洁的女人！”

朱丽埃特和她的女儿艾丽斯于是成了乔治·桑日常的朋友。她同这两个女友一起去旅行。

朱丽埃特去戛纳过冬。乔治·桑也接受邀请，一同前往。乔治·桑带了莫里斯。

莫里斯已是令人钦佩的父亲。他同母亲在一起，照料并保卫她，还使她快乐。

丽娜第三次怀孕了，独自一个人呆在诺昂。乔治·桑说：“她马上就要生产了。为了不让索朗芝破坏我在这里的小住，她要莫里斯来陪我，因为索朗芝只怕莫里斯。”

这时，索朗芝在戛纳正交上好运，和一个外国的亲王在一起，而乔治·桑坚持不肯见他们。

莫里斯讨这里的主人喜欢。他们觉得他很有才华、很快乐。

这群欢乐的人还到附近一些名城游玩：尼斯和摩纳哥。

在蒙特卡洛的游乐场，莫里斯上前和人攀谈，说自己是个农民，来这里赌博，可是不知该怎么玩。一些人说他是傻瓜；另一些人给了他一些忠告。他的伙伴们笑死了。最终，警察把他们赶出了赌场。

乔治·桑很开心，因为“她喜欢别人仍旧年轻活泼，又挺喜欢自己的年老。在这幸福的时光，她只不过是女友、母亲和祖母。”

大家如此快乐，喜欢生活在一起，便拟定了一个将来的集体行动计划：乘大篷车周游法国。

大家带着甜蜜、快乐的回忆依依惜别。他们发誓在诺昂再见。

乔治·桑赶紧回诺昂抱孙女加布里埃尔。她是乔治·桑不在诺昂时出生的。

朱丽埃特第二次结婚之后，于1867年7月与丈夫一起来到诺昂。他们很喜欢这里富有诗意的房子。晚上，打开窗户，望见繁星满天，花园的清香沁人肺腑扑鼻而来。他们听乔治·桑别具特色地演奏莫扎特和格鲁克的乐曲。

第二天正逢节日，莫里斯放了些礼花，每个人都拿出了从田里采摘的东西做礼物，晚上还表演了一出木偶戏。

朱丽埃特发现，乔治·桑只有在诺昂才显出她真正的面貌。她自己边笑边说：“完全是流浪才使我离开诺昂的。”

她越来越乐于想到，骑马散步只不过是除了她唯一热爱的生活以外的偶然的偷闲。

这时来诺昂的客人有小仲马夫妇、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等。有一天，甚至连奥德翁剧场的整个剧团都来做巡口演出，上演喜剧小说。歌声、笑声和香槟酒的碰杯声，一直闹到清晨三点钟才告停止。

每天的日程没有变化。乔治·桑每天都到小河游泳，全身没在水中，

只露出下巴。

在这绿荫如盖、河水清凉的小河里，她又完全恢复了气力。她十分喜爱这条小河，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很多时间，它使她在长期面对墨水瓶而坐之后很快地就能恢复体力。

夏天，她常到小河洗澡，那里因为有树荫而十分凉快。

中午，大家共进午餐，然后在花园长时间散步，观看花木，劳动，或者给小奥洛尔上课。

六点钟吃晚饭。在花园再散一次步后，大家回到蓝色的客厅，乔治·桑坐到钢琴旁，演奏古典乐曲、西班牙乐曲或者贝里的老调。

孩子们上楼去睡后，大家就围在桌旁。乔治·桑独自玩牌，或者为她的孙女缝制裙子。莫里斯画漫画，其他人玩打仗的游戏或玩多米诺骨牌。有时，福楼拜、屠格涅夫和乔治·桑试读未发表的新作。但是，大家通常在说笑话，像孩子般傻笑。乔治·桑尽管沉默不语，但喜欢在身边有喧闹声。她说：“欢乐对身体和思想都是最好的保健。”

她相信欢乐，就像相信健康和仁慈一样。正如她的朋友福楼拜说的，她希望大家无比快乐。六十岁上下年纪了，都没有改变她爱开玩笑的嗜好。

她和莫里斯一起，将一只公鸡藏在朱丽埃特夫妇房间的一个木箱里，弄得俩人整夜都没能合眼。

朱丽埃特则收买了敲钟人，进行报复。打钟人半夜大力敲钟，把全家人都吵醒了。

福楼拜总是低声埋怨无法忍受木偶戏。乔治·桑友好地反驳，并把诺昂木偶戏中的角色写进小说题献给他。

因为乔治·桑还在写小说。每天晚上，客人们睡了以后，乔治·桑以她坚定的笔法，写完二十页小说。她从不重新抄写，也很少修改。她说，“我写作就像从事园艺工作一样。”

她在自己周围选择创作题材和作品的主题。《梅尔冈小姐》的主题是取材于她的女儿索朗芝的生活。她用欧纳斯特这个名字来描写她的女儿：“她性格高傲任性，思想易于产生矛盾，一半异想天开，一半脚踏实地，并且懂得利用自己的地位去获取利益。”

索朗芝这个四十多岁的漂亮女人，有好些高贵富有的情人。她从他们那里得到数目可观的生活津贴。尽管这样，她仍然接受她父母提供的生活费。

一次次欠帐均已结清，所有的情欲都已消失，乔治·桑感到很幸福：“我将向着帕尔米尔的废墟哭泣吗？不，这将要过去。与我同时代的人们不幸，就在于他们希望走回头路。人们回不来，消逝了。他们是淙淙流水。如果他们反映了美好的东西，加以歌唱，付与爱，难道不是已经流够了，响够了吗？人们讨厌继续这样下去，也害怕从头开始。人们衰老了，形只影单，忧伤不已，或者沉思冥想；但是感到坦然自若，总是更加坦然自若……”

乔治·桑身体很结实，她像是被太阳的烧着的一块砖。她还能徒步行走一天，回来后还能到冰冷的河里去洗澡。

第五节 生活是美好的

乔治·桑给福楼拜的信中说：“为什么您还不结婚呢？独身使人不愉快，是会致命的。”

乔治·桑过去的朋友和敌人都去世了！

她最后的话是：“永别了丽娜，永别了莫里斯，永……”

在生命的旅程中，名列前茅的人总是越来越少。1869年，乔治·桑的首任神师圣·勃夫去世了。

卡西米尔还活着，妻子在远处继续注视着他，并且让索朗芝和莫里斯提防遗产会落到他非婚生的女儿手里。这个女儿会从吉勒里剥夺他俩的权利的。

在乔治·桑的推动下，他俩去和父亲打官司。这桩诉讼是关于杜德望男爵夫人的遗嘱应说明的问题。乔治·桑用母亲的热情、女人的策略和法官的灵活引导谈判的进行。

这个诉讼程序使卡西米尔十分伤心。他失眠了，并失去了健康。他从来没有力量和奥洛尔斗。法庭催促他变卖了吉勒里的财产。他从所得的收益中，给自己留下十四万九千法郎，莫里斯和索朗芝平分剩下的部分（十三万法郎）。从此，卡西米尔隐居到了离吉勒里六公里的巴尔巴斯特村，并于1871年3月8日在那里去世。

痛苦使他的脑子日渐衰弱，并且扰乱了他的判断能力。1869年5月，他给皇帝写了一封令人吃惊的信。在信中，杜德望男爵，第一帝国退役军官，请求恩赐荣誉勋位勋章。

拿破仑三世认为，夫妻生活中的不幸，哪怕是有历史原因，并不值得授勋。但是，他不得不认为这封信尖刻刺人，他1870年退位以后，把此信公诸于世了。

乔治·桑根本没想到埋怨卡西米尔。经过许多困难的折磨之后，她在安享充满活力、荣誉和胜利的晚年。

1870年，乔治·桑六十六岁。她记述道：自己“没有累倒，身体很好，很活跃，肩上没什么负担。”

七月，酷热笼罩着诺昂，温度计都升到四十五度，到处没有一株草，树木已经枯黄，树叶纷纷跌落。那非洲般的酷热好像把一切都带到了世界的末日。接着，灾难来临：森林起火，惊愕的野狼也来到人住的房子周围转悠，流行病猖獗。

在这样凄凉的夏天，普法战争爆发了。

八月初令人难以忍受。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消息，忧愁的期待变成了焦虑不安，被禁止发言的报纸什么也不说。乔治·桑观察着农民对皇帝的愤怒：没有一个人不说，我们要把第一颗子弹打到他的头上！

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但是，这是不信任和不满的情绪，以及通过将来的选举进行惩罚的决心。

乔治·桑写信对朱丽埃说：“我们要同时赶走普鲁士人和一切帝国。”

莫里斯本来想投笔从戎，但是到处都很混乱。”拿起武器！拿起什么样的武器呢？”缺乏枪枝和给养，一切都缺。

将近八月底，失败的消息开始传开了。1870年9月，乔治·桑在日记中写道：“终于来了一份官方的电报，悲惨啊！唯一的慰藉是皇帝被俘了。

但是，我们可怜的士兵啊！

因为要杀死他们，结果四万人投降。这是帝国的末日。”

九月，天花病流行，使诺昂的人口锐减。乔治·桑一家人到拉克勒兹省去了。孩子们特用芦苇杆做的枪，玩抓普鲁士人的游戏。

在村子的广场上，男孩子们拿着木棍进行操练。乔治·桑做为法国妇女与和平主义者感到难过。德国人使她感到痛苦和惊讶：“他们像暴风一样冰冷残酷地袭来，毫不改变主意，尽管在生活习惯上是最温和的人，必要时也会凶狠毒辣。他们什么也不想，现在还不是想的时候；然而焦虑、怜悯和后悔在家里等待着他们。他们是没有理智的、可怕的战争机器。”乔治·桑希望和平，但希望得到的不是屈辱的和平。

停战使巴黎政府重新控制法国。

接着，像 1848 年一样，举行了选举。除了巴黎，主和派取得了胜利。

乔治·桑明白，法兰西将会很快地复兴。这个贝里农妇知道自己的祖国有无穷的资源和惊人的复兴能力。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接近自杀；但是，每次她都从危机中挣脱了出来，重新焕发了青春，显得就像是法国的象征。

后来，巴黎公社成立了。巴黎到处是街垒、大炮和机枪。

这事件从三月一直持续到六月，后来，梯也尔取得了胜利。

这时，乔治·桑觉得，拯救一个开明的共和国需要时间，人们需要有耐心。她的思想完全变了样。

1872 年 11 月，乔治·桑给福楼拜的信中说：“为什么您还不结婚呢？独身使人不愉快，是会致命的。而且：对于爱您的人来讲，这是残忍。您所有的来信都充满忧愁，使我心痛。难道您没有爱过一个女人，或者您没有被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爱过？那就娶她，让她和您一起生活吧。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个男孩，您相信自己是他的父亲呢？那就抚养他，忘了自己吧。独自生活是不好的。”

乔治·桑劝别人怎么生活，她自己就怎么生活。首先，普法战争以后，乔治·桑是一个热心的祖母。她教孩子读书，给他们讲地理、历史和文体。对于她这个天生的小学教师来说，这多么愉快。小孙女们围绕着老祖母，像小兔子一样，在欧石南丛中奔跑。

“我的上帝啊，当人们喜爱的一切，生气勃勃和乱钻乱动时，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乔治·桑和孙女们在一起，继续愉快地享受着旅行、大自然、太阳和芳香花朵。

她不像过去那样喜欢写作，她一年写两本小说，都只是因为要履行合同，替《两世界评论》和《时代》撰稿。这是因为她的家庭和朋友都需要钱用。她应付得相当自如。

但是，她写作的主题并没有什么改变，福楼拜促使她读些年轻人写的书，如左拉和都德的作品。她相当喜欢他们的书，但觉得这些书太阴郁了。

很久以来，评论家们就没再提起她新写的小说。尽管她为雨果写了评论文章。雨果自己不给她写一篇文章；她在文坛上感到很孤立。但是，新的一代人中有些人，开始称赞她的理想主义。文学界和社交界一样，都在围绕着一种固定的观点，摇摆不定。

福楼拜的喜剧《候选人》和《女人》遭到了重大的失败。在具有鉴赏

能力的人们中，他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但是，他仍然相信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相信词的本义、句子的韵律和作品的文雅。只要人们认为作品的艺术性强，别人说什么，对于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乔治·桑略为温和地责备他说：“他只是追求华丽的句子，这不是完整的艺术，只是半个艺术。”

她恳求福楼拜到诺昂来，重新投入家庭欢乐和温情中去：“如果一个人被两三个好人爱着，有十万个敌人也不要紧。”

但是，1872年，福楼拜仍然坚持不去诺昂。

在1873年复活节时，福楼拜终于到诺昂来朝圣。屠格涅夫也到诺昂来见他。大家邀请他参加狂欢化妆舞会，每人要换三次衣服。

1873年4月，乔治·桑在日记中写道：“大家蹦呀！跳呀！唱呀，叫呀，使福楼拜头昏脑胀。他总是想阻止这一切，以便谈论文学！他无能为力。屠格涅夫喜欢热闹和快乐。

他跟我一样孩子气。他跳舞，跳华尔兹舞。这是个多么善良正直的天才！福楼拜的谈吐很生动，而且古怪。但是，他只顾自己说话。屠格涅夫虽然讲得更有趣，却很难插嘴。

晚上，玩一个竞赛游戏，直到深夜一点。大家终于互相道别。在生活中，人们的性格比聪明和高尚显得更为突出。亲爱的福楼拜使我很累，精力尽。不过，我喜欢他。他是个优秀的人物，但是个性太强。”

福楼拜回去后，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我们分手才五天，我就因离开了您，感到惆怅得像个傻瓜了。我因小奥洛尔和您全家不在身边，感到惆怅。是的，是这样的，大家在您家多有意思啊！您是多么好，多么才智横溢。”

夏天，乔治·桑带领全家外出旅行。她建议去瑞士，孩子们更喜欢到海边去。“去海边！只要去游泳，我就高兴得发狂了。我完全像我的孙女们一样。她们还没去，就欣喜若狂。”

乔治·桑不再过问政治了。

乔治·桑给她的朋友拿破仑亲王写过贺年信，当然不是祝愿波拿巴主义者复辟。

乔治·桑只期待着一个共和国的得救。1875年，她终于看到共和国取得了多数票，建立了起来。

索朗芝自1873年起就住在诺昂附近的蒙吉弗莱城堡里，这是她以其十分肮脏的钱财，向堂妹莱昂蒂娜，即乔治·桑的哥哥伊包利特的女儿买的。

1871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她和母亲及莫里斯和好了一段时间。一天，有人看见她来到诺昂，像个难民，苦苦哀求。好心的丽娜出面替她说情。索朗芝被战争的危险制服，一度收回了她的爪子。

和平恢复后，母女俩的关系又重新恶化。乔治·桑曾制止她得到蒙吉弗莱城堡，因为她不希望这个“猫头鹰”从那高楼上窥视她。

而索朗芝不予理睬，通过一个中间人买下了这城堡。

她的生活补贴被取消了。最后连诺昂几乎也对她关闭了，因为她指责这里所做的一切。但偶尔她像一阵风似地回来。孩子们讨厌她，守护着祖母的房门，不让索朗芝进去。

乔治·桑过去的朋友和敌人都去世了！

1875年3月5日，玛丽·达古尔死了。在垂暮之年，表现得理智和骄傲。

于勒·桑多身体已很衰弱。上了年纪后，他身体臃肿，头发蓬乱，怠情沮丧的情绪使他头昏脑胀，但是，人们从他的神情中猜得出，他年轻时一定是很迷人的。当他坐在王宫广场咖啡馆时，过路的人会说：“看，那就是桑多，乔治·桑的第一个情人。”这成了他唯一的光荣称号。

巨人马尔夏尔引起了乔治·桑和小仲马的忧虑，他很懒惰，粗心大意，很不守时。

他从来没按时交付过雕刻品和模型。大部分的订货最终都被取消了。另外，他又失去了两个有力的保护人：拿破仑亲王和马蒂尔德公主。自从帝国统治倒台之后，他们都迁居国外了。他过起放荡不羁的可耻生活，不择手段地搞钱，到处告借以维持生活。乔治·桑写道：“好酒与美色将要把他毁了。”

在别的地方，人们听到这个话题，以为是从乔治·桑给缪塞的信中抽出来的话。她写道：“十年的母爱都没有驱除两个可恶的魔鬼：懒惰和放荡。”

女人变化大不，男人也一样，这倒是真的。

霍尔滕丝也渐渐地变老了。她根据自己爱情的经验，写了一本很大胆的书——《谨慎的魅力》。

乔治·桑七十二岁时，自己还不觉老，并且开始相信她是个老寿星。

1876年初春，乔治·桑不时感到有些不舒服。她一生都在埋怨肝不舒服，肠胃病难治好。

五月，莫里斯和丽娜请来医生给她看病，母亲的病使这对夫妇十分担心。

乔治·桑以为自己得的是顽固性便秘，因而并不怎么在意。

死亡是个卑谦谨慎的来访者，它会无声无息地来到。

五月二十八日，午饭乔治·桑女士没来吃，她像往常一样有些不舒服。她觉得剧痛已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没有引起她更多的忧虑。午饭后，乔治·桑女士从楼上下来，走了一会，欣赏她十分喜欢的各种鲜花，田野上长满了幼嫩的小草。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乔治·桑病痛很厉害。她说：“我的肚子里有鬼啊！”

肠梗阻的剧痛使她大声喊痛。她的医生对莫里斯说：“她没有希望了。”

只有马上动手术，也许还能挽救她的生命。乔治·桑要人把法弗尔医生从巴黎叫来，她相信他。

当地的乡村医生终于决定把外科医生于勒·贝昂找来。但是，他认为不能做肠切除手术，只能做腹部穿刺。这之后，乔治·桑还是痛了六天，她拼命呼叫着要死，并觉得自己得了这种病，是件丢脸的事。

六月七日，她要见见孙女们，她说：“我亲爱的孩子们，我多么爱你们啊！拥抱我吧。要听话。”

从七号晚上和八号，她说了多次：“我要死啦，我的上帝，我要死啦！”这时，索朗芝和丽娜已在她身旁。莫里斯叫人带了字条去告诉索朗芝：“我们的母亲病了，而且病情十分严重……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来看看吧！”

当时索朗芝在巴黎，她接到仆从的电报通知，就赶回来了，事先十分谦卑地请求允许她探访一小时。

晚上，就只有索朗芝和丽娜守在乔治·桑的床边。她们听到乔治·桑说：“永别了，永别了，我要死了。”

接着，她讲了一句难以理解的话。只听见她最后说：“留下青翠的草木。”

仁慈与温存仍然流露在她眼神里和握手的动作里。但是，她说不出话，显得心不在焉。她最后的话是：“永别了丽娜，永别了莫里斯，永……”她在早晨六点钟去世。

午饭时，索朗芝坐在她母亲先前坐的位置上，指挥着大家。莫里斯痛苦得泣不成声。

乔治·桑安葬在诺昂花园里围起的墓地里，在她祖母、双亲和外孙女旁边。

那天，下着寒冷的细雨，风儿吹动了多节的紫杉和黄杨，发出了微微的沙声，与年老唱经人的祈祷声混杂在一起。附近所有的农妇都跪在潮湿的草地上，诵读着长串的祈祷文。

乔治·桑的朋友们都十分惊讶，葬礼竟然按照天主教的礼仪举行。这是索朗芝要这样做的，莫里斯作了让步。

十五个亲密的友人从巴黎来参加葬礼，其中包括 1872 年重新获准在法国居住的拿破仑亲王，以及福楼拜、小仲马等人。

受维克多·雨果的委托，莫里斯宣读了雨果的一封信：

我痛惜一个伟大的女性的去世，向这个流芳百世的人致敬……我们失去了她吗？不，她的崇高形象虽然隐去，却不会消失。完全相反，人们几乎可以说，她的崇高形象会获得发展。那形象变成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又以另一种看得见的形式出现。那是崇高形象的升华。人的身体好比遮光板，它遮掩了神圣的面貌，即思想。乔治·桑是一种思想，她超出了肉体，她自由了，她去世了，她却永生了。

1876 年 6 月 25 日，福楼拜写信给屠格涅夫：“可怜的母亲乔治·桑的去世，使我感到无限悲痛。在她下葬时，我像头小牛似的哭了，而且哭了两次。她永远是法国的一位杰出人物，而且是法国唯一的光荣。”

